

国际问题论丛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霸权之间：世界体系与 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

任洪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霸权之间：世界体系与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任洪生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4

(国际问题论丛)

ISBN 7-301-09787-5

I. 霸... II. 任... III. ①经济地理—研究—亚洲②经济地理—研究—欧洲 IV. F11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8084 号

书 名：霸权之间：世界体系与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

著作责任者：任洪生 著

责任编辑：张盈盈 周 瑾

标准书号：ISBN 7-301-09787-5/D·1311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ss@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排版者：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刷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8.375 印张 241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作者简介

任洪生 男,内蒙古赤峰人 2003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后(国际经济法方向),现任职于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贸易体制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等,曾发表《资本主义生产贸易体系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比较》、《蒙古:北约东扩的终点》等多篇论文,以及《国际关系学》(合著)等多部著作。

谨以此书献给我尊敬的导师
王正毅教授

序

作为区域发展动力的“机动性” 和“贸易”

2000 年开始,任洪生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区域经济专业博士学位。2003 年他以《霸权之间:世界体系与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的博士论文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就是他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经过近两年时间修改完成的。

这本著作以蒙古为案例,涉及两个核心命题——1500 年以前的世界体系是否存在?导致蒙古兴衰的原因是什么?

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产生以来,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世界体系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挑战。^①早期的世界体系论者几乎一致认为,“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 1500 年左右的西欧。这种观点受到后来学者的挑战,其中,挑战的命题之一便是“1500 年以前的世界体系是否存在”。这一挑战命题导致许多学者对欧洲之外的不同“区域”进行研究。一种研究来自美国西北大学的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 Abu-Lughod)教

^① 关于世界体系论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面临的挑战,读者可以参阅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225—299 页。

授 她在其代表作《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 年的世界体系》^①集中探讨了 16 世纪以前，特别是 13 世纪的世界体系。^② 在她看来，在 11 世纪之后就存在一个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将亚洲和中东的农业帝国和欧洲独立的城镇连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在 13 世纪达到了高峰。14、15 世纪，这个体系由于战争、瘟疫等才开始衰退，出现了沃勒斯坦所说的“封建危机”。她认为，13 世纪的世界体系，无论就劳动力转移的方法以及组织的方法，还是合同的实现、价格的形成、交换率的确定等都是一个很先进的体系。第二种观点来自施奈德（Jane Schneider）、蔡斯—邓恩^③以及弗兰克等人。他们批评沃勒斯坦过分局限于 1500 年以后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分析，而不承认 1500 年以前世界体系的存在，他们将“世界体系”的逻辑假设前移到 1500 年以前。^④ 第三种观点来自日本学者滨下武志^⑤和本人。^⑥ 一方面主张 1500 年以前基于“朝贡贸易”的独立的“东亚世界体系”的存在，另一方面则认为，东亚在 1500 年以后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地缘政治”和“商业网络”是这一地区兴起的两大

①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② Ibid.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主要研究了 13 世纪的世界体系。这部著作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The European Subsystem）主要探讨这一时期欧洲的体系；第二部分（The Mideast Heartland）主要探讨中东腹地出现的体系；第三部分（Asia）则主要探讨亚洲地区的世界体系，特别是印度次大陆和中国的体系。这部著作因此获得美国社会学会 1990 年度杰出著作奖。美国社会学会授奖委员会对这部著作的评价是：“这部著作写得很漂亮，她的范围可以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费尔南·布罗代尔所涉及的范围相媲美，通过强调从杭州到布拉格（Bruges）共同拥有的文化和商业制度，阿布鲁富有实质性的分析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以往对]现代世界体系所作的欧洲中心论的解释。”

③ 关于施奈德和蔡斯—邓恩的观点，参见 Christopher Chase-Dunn and Thomas D. Hall, eds., *Co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Precapitalist Worlds*, Westview Press, 1991.

④ Andre Gunder Frank,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5000 Years of World System History”, *REVIEW*, XIII 2, Spring 1990, p. 159. 另外，弗兰克的新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正是这一思想的系统化。

⑤ 相关著作为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⑥ 相关著作为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动力。

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对“区域”的兴衰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主要工作集中于16世纪以后的欧洲,12—14世纪的欧洲、中东和中国,近代亚洲以及1500年以后的东南亚,而任洪生的这本著作完成的是对亚欧大陆腹地的研究。

在世界体系框架内研究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区域发展的动力”问题。沃勒斯坦教授将其归之于“资本积累”,阿布—卢格霍德教授诉诸“文化—商业制度”,滨下武志教授集中于“地域经济圈”,笔者认为是“区域制度”。而任洪生博士在本书中主张将“贸易结构”与“机动性”结合起来分析“生产区域”。

“机动性”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提出的。麦金德使用这个概念来分析早期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所依赖的基础,大陆帝国所依赖的机动力量是马和骆驼,而海洋帝国所倚重的是船只。^①“机动性”既反映了区域的某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是不同区域政治优势倚重的基础。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这种机动性是不同的民族(族、城邦、帝国、民族国家)发展的动力。“贸易”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已经为人们所认同。但不同的区域,由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因而自然禀赋就不同。这种不同的自然禀赋导致不同区域“贸易结构”的显著差异。将“机动性”与“贸易结构”联系起来分析区域经济体,是这篇博士论文的最大创新之处。

本书从地缘经济的角度出发,将亚欧大陆按照生产类型重新划分,进而考察亚欧大陆腹地在整个世界体系内的发展问题。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角度出发,本书首先对亚欧大陆腹地作了时空划分。从时间的角度而言,以亚欧大陆腹地机动性的生成、成长、消退为特征来划分时间纬度;从空间角度而言,以亚欧大陆腹地与其地缘区域的内在关系来划分空间纬度。并在此基础上以机动性和贸易结构为基本分析线索,对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作了长时段的综合分析。

本书的行文分为三个时间段:第一阶段是1200年以前的亚欧

① [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7页。

大陆腹地。1200 年以前的亚欧大陆腹地虽然始终保持着对农业区域的地缘军事优势,但地缘经济上一直依附于周边的农业区域,这主要与亚欧大陆腹地独特的生产类型以及由此决定的食品和服装结构有着相应的关系。第二阶段讨论的是 1200—1800 年的亚欧大陆腹地。1200—1800 年的亚欧大陆腹地获得了对于农业区域的全面优势,这与游牧社会的制度变革有着直接关系。在世界体系的同一经济周期之内,技术变革表现为常数、生产方式和作战方式表现为一致性的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最强的机动性。第三阶段讨论的是 1800 年以后的亚欧大陆腹地。1800 年以后,机动性的变化导致了亚欧大陆腹地地缘政治优势的彻底丧失,并且世界体系的核心区发生了转移,亚欧大陆腹地开始衰退和边缘化。

在本书中可以看到,从地缘经济结构上讲,1600 年以前的核心区是存在的,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地缘经济和政治的后果,这在理论上向着世界体系论两个假设的反例前进了一步。1800 年以前的世界体系,亚欧大陆腹地作为边缘区,地缘上与核心区相连,限于食品结构的约束,其融入的方式以军事征服开始,以被融入结束。而 1800 年以后的世界体系,亚欧大陆腹地依附于边缘区,边缘化趋势加强。作者在最后一章《理论与现实的反思》中给出了一种合乎逻辑的推测,如果亚欧大陆腹地试图改变几千年来处于世界体系边缘区的角色,只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思考本区域的发展问题。

正如当年自己的导师看到自己学术有所进步时感到欣慰那样,在任洪生博士的这部著作即将面世之际,作为他的指导教师,虽然不能确定在学术上曾经给予他多少,但每每看到他在不断进步,内心已感到莫大的欣慰。

王正毅

2005 年 7 月于北京大学

第一章

导 论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所有的社会理论家以及许多历史学家都是在错误的地点开始考察早期近代的历史。他们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

——〔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

亚洲各国各地区有着自己固有的不同历史,因而在寻求一种既能有效地承继过去的传统,又能全面地把握各国不同历史特质和现状,进而把亚洲整体作为探求对象的方法,至今还很难说已经确立。只有以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设定问题,并将其作为历史探讨的对象,从中寻找把握世界史进程的契机,同时通过对成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媒介的各国历史的把握,才有可能对近代亚洲取得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说,要从体现历史纽带的亚洲区域内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整体内在变化之中,去把握作为亚洲史的发展形态的亚洲近代。

——〔日〕滨下武志

从上古开始,生活在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不断地从这里冲杀出去,侵入亚洲和欧洲的农业区域,他们时而大肆侵掠,时而建立一些大大小小的王朝,到 13 世纪,这种侵掠达到了一个高潮,蒙古人

席卷了差不多整个亚欧大陆，建立起一个空前绝后的世界帝国。虽然作为一个整体的蒙古帝国存在了不到一个世纪，但是它所造成的影响仍然断断续续地持续到18世纪前后。蒙古帝国的出现，使得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游牧民族，尤其是对于蒙古帝国的研究俨然形成了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蒙古学，同时民族学、历史学也对之始终表现出一种格外的关注，到目前为止，历史学和民族学对蒙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

然而，“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不应把亚欧大陆看做是由欧洲和亚洲这两块大陆组成的，而应看做是由中东、印度、中国、欧洲和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区这五块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地区组成的”^①，蒙古帝国只是亚欧大陆腹地这一地理区域所产生的一种结果，单纯从蒙古学、历史学或者民族学的角度出发，并不能解决整个蒙古帝国与自身、亚欧大陆腹地、东亚、欧洲以及中东的关系问题，尤其是把一个民族的研究脱离了它所处的时空背景，既不能从根本上去认识这个问题，也不能解决繁衍在这里的、同一种生活方式之下的所有的人们的发展问题。对于亚欧大陆腹地而言，它首先是作为一个区域而出现的，这个区域有其存在的独立系统，需要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来审视。事实上，亚欧大陆腹地对于东亚、中东和欧洲在历史上的关系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地缘经济结构意义上的关系，而非民族或者国家意义上的问题。偶然的地缘经济分工使得亚欧大陆腹地内部衍生出的机动性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影响。同样，亚欧大陆腹地由于机动性优势的逆转，一种机动性让位于另一种机动性，亚欧大陆腹地作为一个区域衰退了。但是，无论哪一种机动性的兴起和衰落都伴随着巨大的破坏力，给地缘上相近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阻碍。由于地缘经济和政治结果造成的某种机动性的生成，所产生的巨大的对外冲击力，自古至今一直在威胁着地区甚至全球的发展。那么，这种亚欧大陆腹地机动性的动力来自哪里？

因此，本书试图对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作一次系统的地缘经济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与政治分析,分析的过程需要贯穿生活在亚欧大陆腹地上那些游牧民族的历史,尤其是蒙古族的历史。在进行具体的论述之前,本章需要讨论以下问题:(1)为什么要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讨论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问题?(2)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应该如何来探讨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问题?(3)研究这一问题的意义何在?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对于亚欧大陆腹地的研究,在理论研究取向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时间视角的研究和空间视角的研究。这样划分的依据,是针对研究者对于亚欧大陆腹地的不同理解。着眼于前蒙古时代亚欧大陆腹地的研究,主要是民族学和历史学以及考古学的研究;着眼于蒙古时代亚欧大陆腹地的研究,主要是蒙古学的研究;着眼于现代亚欧大陆腹地的研究,着重于地缘政治的研究。其中,前两方面属于时间视角的研究,后者属于空间视角的研究。

(一) 关于亚欧大陆腹地时间视角的研究

1. 对于前蒙古时代亚欧大陆腹地的研究

在蒙古帝国兴起以前,亚欧大陆腹地生息过匈奴、东胡、鲜卑、契丹、室韦、突厥等游牧民族,这些民族曾经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但是这些政权都没有能够超出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相继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直至蒙古族重新统一了草原部落,南侵进入农业区域,建立了一个跨越游牧区域和农业区域的大帝国。

关于前蒙古时代游牧民族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序经著《匈奴史稿》、林幹著《匈奴史》、林幹编《匈奴史料汇编》、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江鸿著《匈奴兴亡之追踪》、陶克涛著《毡乡春秋·匈奴篇》、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米文平著《鲜卑石室寻访记》、曾凡礼和杜玲著《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法〕费琅(G. Ferrand)辑注《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

注》、马大正著《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耿世民著《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许浩福编译《国外突厥学研究概况译文集》、〔波斯〕拉施特编《史集》、王小甫著《唐朝对突厥的战争》和《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蔡鸿生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刘锡淦著《突厥汗国史》、吴玉贵著《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薛宗正著《突厥史》、刘迎胜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英〕汉布里(Gavin Hambly)编《中亚史纲要》、〔苏〕威廉·巴托尔德著《中亚突厥史十二讲》、〔苏〕A. 伯恩什达姆(Александр Натанович Бернштам)著《6至8世纪鄂尔浑叶尼塞突厥社会经济制度——东突厥汗国和黠戛斯》、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辽金史论文集》、〔日〕爱宕松男著《契丹古代史研究》、〔宋〕叶隆礼撰《契丹国志》、张正明著《契丹史略》、孙进己等编《契丹史论著汇编》、杨若薇著《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李侠编著《中国北方民族货币史》、〔日〕三上次男著《金代女真研究》、张博泉编《金史简编》、孟森著《满洲开国史》、王可宾著《女真国俗》、孙进己等著《女真史》、陶晋生著《女真史论》等,这些著作主要以历史的方法为主,针对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作历史的描述和考证,关于经济制度等方面以传统历史学的描述方法进行叙述,对于许多游牧民族在历史上兴起和衰落以至于最终消亡并没有给出相应的结论。

2. 对于蒙古时代亚欧大陆腹地的研究

蒙古族是草原民族最为杰出的一个典型,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世界帝国,其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系统都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对象。早在18世纪下半叶,俄、法、德等国就已经开始了蒙古学的研究,现在世界上有五十多个国家在研究蒙古学问题。

外国蒙古学研究的史料渊源主要有以下几种:

历史专著:〔波斯〕拉施特著《史集》、〔波斯〕志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波斯〕瓦萨甫著《伊儿汗史记》、阿卜尔嘎齐(1605—1664,系成吉思汗系术赤后裔)著《突厥世系考》;一些游记:〔法〕普兰诺·迦尔宾著《蒙古史》、〔法〕鲁布鲁克著《东游记》、〔意〕马可波罗著《马可波罗游记》等,主要是关于蒙古的生活、政治和军事情报,蒙古文史料:《蒙古秘史》等,调查材料:从19世纪中叶开始,俄法等国

的学者和传教士到中国的蒙古地区收集考古、历史、风俗、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材料,成果有:[俄]帕列瓦爾斯基著《蒙古和唐古特》、[俄]波斯德涅也夫著《蒙古和蒙古人》、[法]古伯察著《鞑靼西藏旅行》等,记录了当时的蒙古地区情况。

欧美的研究者之中,著名的学者有[日]那珂通世、[蒙古]达木丁苏荣、[俄]符拉基米尔佐夫、[匈牙利]利盖提、[德]海涅士、[法]伯希和、[法]多桑、[英]霍渥尔斯等,主要著作有《多桑蒙古史》、《蒙古社会制度史》等。其主要的研究范围在历史、语言和文学方面。

中国的蒙古学自元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那时主要研究蒙古的语言学。至16世纪末至17世纪后期,蒙古族学者开始大规模地研究蒙古史,主要的著作有:《黄金史纲》、罗布桑丹津编《黄金史》、《大黄册》、善巴著《阿撒拉嘎齐史》、萨囊彻辰著《蒙古源流》等。降而至清初,学者主要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至18世纪,蒙古族学者相继撰有:官布扎布《恒河之流》、达日玛·固什《金轮千辐》、《蒙古秘史》、何秋涛校勘《圣武亲征录》、洪钧《元史译文正补》、魏源《元史新编》、屠寄《蒙兀儿史记》、柯劭忞《新元史》、张穆《蒙古游牧记》等。这一时期的蒙古学研究主要侧重于考据和补遗。

民国以降,成果主要有:王国维《蒙古史料四种》、冯承钧《多桑蒙古史》等,多为校注和翻译工作;阿拉坦敖其尔编著《成吉思汗战书》等,论及成吉思汗一生的战绩。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中科院民族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和历史研究室等机构,南京大学韩儒林教授、中央民族学院翁独健教授、西北民族学院谢再善教授等一批蒙古史和蒙古文专家学者主持编写了《蒙古族简史》、《蒙古族简志》等丛书。在改革开放以后,内蒙古大学、南开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成为了蒙古学以及元史的教学与研究基地,主要的研究成果有李治安《元代的分封制度研究》、李干《元朝社会经济史稿》、郝苏民《巴思巴蒙古文辞典》等专著。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针对蒙古族的各项专题研究。

（二）关于亚欧大陆腹地空间视角的研究

对于亚欧大陆腹地空间视角的研究,始于英国地理学家哈·麦金德(Mackinder Sir Halford, 1861—1947)爵士。麦金德著有《历史的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他认为,世界霸权的获得源自于游牧民族在枢纽地区(heartland)获得了机动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同样在布满铁路的西伯利亚获得了机动性。

麦金德所言的枢纽地区^①相当于金帐汗国、罗斯汗国、察合台汗国以及大汗国的北部地区。麦金德认为亚欧大陆腹地是获得世界霸权的枢纽地区,谁控制枢纽地区谁就获得了世界的霸权。

在麦金德看来,欧洲文明正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因为,从5世纪到16世纪的全部历史过程中,图兰语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帕济纳克人(Patzinak)、库曼人、蒙古人、卡尔梅克人从欧洲人并不了解的亚洲内陆,穿越草原,接踵而至,进入欧洲的中心。出于反对他们的需要,产生了一系列的欧洲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人。东亚的中国也不止一次地屈服于来自北方的征服者,印度也是如此。究其原因,在于亚欧大陆腹地没有能够通到海洋的河流,在这一片两倍于欧洲的土地上,所有的水系都注入了北冰洋,外部力量无法到达,但却非常适合骑马和骑骆驼民族,并赋予这些民族很强的机动性。连接了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通往印度的好望角航线,正是迫于亚欧大陆腹地游牧民族的压力而产生的。哥伦布时代以后,陆上强国依然存在,哥萨克骑兵在亚欧大陆腹地的东侵,孕育了和好望角一样的政治后果,铁路在草原上创造了更大的机动性,直接代替了马和骆驼的机动性。

麦金德总结道:“当我们考虑对这个广阔的历史潮流所作的迅

^① 为了防止地缘政治关于“亚欧大陆核心区与边缘区”和世界体系理论“核心区与边缘区”在概念上的混淆,本书在行文中,将地缘政治中所提到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称为“枢纽地区和新月地区”,以此与世界体系理论的概念相区别。

速回顾时,不是觉得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地理关系吗?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①

对于亚欧大陆腹地的重要性,美国人马汉(M. T. Mahan, 1840—1914)和麦金德观点相似,他认为亚欧大陆腹地是重要的力量中心,但是马汉从海洋大国的角度出发,认为强国的主要条件是控制海洋,英国统治世界得益于拥有优良的海军基地,美国拥有两个大洋的优势,因此应该继英国之后,领导海洋霸权,控制世界。马汉还认为,亚洲北纬30度到北纬40度之间的地区是英国海军力量和俄国陆军力量之间存在的不安定地带,由海上运兵以阻止俄罗斯的发展,包围俄罗斯就可以掌握中国,这符合英、德、日、美等国的共同利益。因此,马汉认为如果想成为一个强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海军,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占领殖民地,建立海军基地,控制海洋,进而控制亚欧大陆上的陆权国家,才能获得世界的霸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政治地理学家开始重视地缘政治的研究,其中最为核心的人物是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 1869—1946)。

豪斯霍夫著有《地缘发展中的日本帝国》(Das Japanische Reich in Seiner Geographischen Entwicklung, Siedel, Vlnna 1921)、《太平洋的地缘政治》(Die Geopolitik des Pazifischen Ozeans, Berlin 1924)、《今日世界政治》(Weltpolitik Von Heute)等著作,他认为德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第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枢纽地区”的政治势力,这个枢纽地区包括德国、苏俄、日本、中国和印度,基本上包括蒙古帝国四大汗国的统治范围。这直接导致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欧大陆腹地的战略倾向。

20世纪30—40年代,在麦金德学说广为流传之时,美国政治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 1893—1943)提出了与麦金德相

① [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0页。

反的观点,相关的著作有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42),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44)。

斯皮克曼认为世界的权力中心不在亚欧大陆的“枢纽地区”,而是在北大西洋沿岸、中国沿岸和印度沿岸。更基于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海权国家和枢纽地区国家联合起来击败新月地区国家的现实,斯皮克曼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建立在防止亚欧大陆上的国家联合,同时在欧洲和亚洲维持势力均衡。因此,斯皮克曼将麦金德的命题修改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着亚欧大陆;谁支配着亚欧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斯皮克曼所提出的政策“适合美国走出孤立主义,要在世界事务中建立其主导地位的步骤,故对美国战时和战后的对外政策有一定的影响”^①。

冷战后期以及冷战之后,美国前总统卡特的顾问、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Z. Brzezinski)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Game Plan: A Geost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Conduct of the U. S. Soviet Contest (Boston: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86);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Books, 1997)。这些都进一步发展了对于亚欧大陆腹地的地缘政治理论。

布热津斯基将亚欧大陆比作一个大棋盘,是美国为争取全球首要地位而进行斗争的地区。棋盘的西端是民主桥头堡——西欧,东端有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在东、西两端之间有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这个地带政治混乱,但是能源丰富,对于欧洲、中国和印度而言,都具有潜在的重大意义。

布热津斯基认为,在这个棋盘上下棋,美国可能成为赢家,其条件是:棋盘的中间地带逐步并入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之中,南部不被某一个国家单独主宰,东部的国家不联合起来将美国驱逐出近海的军事基地。现在,美国的力量直接部署在亚欧大陆的西部边缘和东部边缘的一些岛屿和朝鲜半岛上。有鉴于此,布热津斯基主张美

^① 王恩涌、王正毅等:《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国必须制定一个关于亚欧大陆的全面战略,核心目的是构建一个横跨亚欧的安全体系,在亚欧大陆的西端扩大民主阵地,在东端加强与中国的地缘合作,将俄罗斯吸纳进大欧洲之中。

麦金德所论述的那种地缘结果,确实在亚欧大陆腹地持续一个多世纪,但其崩溃的速度,要比蒙古帝国还要迅速。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回到了19世纪,在中亚退回到了19世纪中叶,其西部边界更是回到了1600年伊凡四世时代,在亚欧大陆的正中心造成了一个“黑洞”,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像被突然从世界地图上挖走了一样。^①虽然,布热津斯基也推测俄罗斯可能重新崛起,但俄罗斯最近十多年的发展,结果越来越边缘化,正像俄罗斯杜马外事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卢金所言的那样:“过去俄国虽然落后于欧洲,但却自认为比亚洲先进。但是从那以来,亚洲发展的速度要快得多,……我们发现自己不再处于‘现代化的欧洲’和‘落后的亚洲’之间,而是处于‘两个欧洲’之间的一个奇怪的中间地带。”^②

因而,布热津斯基认为,现在的俄罗斯所在的亚欧大陆腹地不可避免地陷入一个缓冲地带的角色。俄国任何试图拼凑的“反霸”联盟,都将因此成为不断扩大的欧洲和扩张主义的中国之间的缓冲区^③,俄国唯一真正的选择就是欧洲,俄国向欧洲靠拢的速度越快,欧亚大陆的黑洞就会越早地由一个越来越现代化和民主的社会填补。^④

分析以上几种观点,可以看出,其共同的特征仍然是承认在亚欧大陆有一个枢纽地区,其讨论的内容是枢纽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关系问题,亦即陆权和海权的关系问题。审视的角度不同,每种理论得出政策主张不同:麦金德是基于亚欧大陆的立场,讨论陆权的实现问题;马汉是基于美国的立场,讨论海权的实现问题;斯皮克曼是基于

① [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② 《我们的安全困境》,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2年秋季第88卷,第60页。转引自[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126页。

③ [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153页。

④ 同上书,第160页。

美国的立场讨论以海权遏制陆权的问题，布热津斯基也是从美国的立场出发，讨论以陆权遏制陆权的问题。

二、问题的提出

综观前人研究，将亚欧大陆腹地的研究归类于蒙古学的居多，在前蒙古时代，又归入了民族学和历史学一类研究之中，研究最多的是从体质上追寻各个民族的溯源，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多为历史考证方面的内容，而将亚欧大陆腹地作为一个地缘经济区域来研究的并不多见。同时对统率各个游牧民族的各种机制也缺乏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蒙古帝国成功、衰落的原因分析，缺乏理论上的探讨。至于地缘政治学家的研究，又完全忽略了人的因素，纯粹从地理的概念去论述问题。这些研究都不能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蒙古帝国崛起以前的游牧民族都融入了亚欧大陆腹地外围的农业区域？13世纪兴起的蒙古帝国获得成功的原因何在？而游牧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1800年以后衰退的原因是什么？游牧民族的兴衰究竟是经济因素、地理因素，还是种族因素所致？如何处理人地关系呢？这些都是本书所关心的问题。

亚欧大陆腹地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缘经济与政治区域，有其特有的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对于亚欧大陆腹地的研究，不能流于脱离环境的纯人类自身研究，也不能忽视人类自身的纯自然环境的研究。本书之所以选择将其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经济系统，即因为经济区域既关注自然的因素，也关注人的因素。

从地缘经济区域的宏观角度出发，对这一地区进行地缘经济乃至国际经济结构研究，着眼于一种有关经济区域间关系的分析，而非民族学、人类学或者历史学的分析，是本书分析亚欧大陆腹地发展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在考虑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问题时，要从地域之间的禀赋差异问题、地缘分工问题、边境贸易问题、社会机制问题等谈起。

三、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书把亚欧大陆腹地作为研究的对象，其意义如下：

（一）理论意义

对于亚欧大陆腹地各个游牧民族的研究成果可谓丰富多彩,但是尚没有著作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论述这一问题。从目前的各种观点看,一般认为,游牧民族获得世界霸权的原因多在于技术性因素,或者解释为地理因素。但这些观点无法解释一些现实问题,如较之拥有同样军事技术的农业民族为何持续处于劣势,而游牧民族持续地获得优势,但是却又长期地依附于周边的农业民族?为什么1800年以后的游牧民族不再有霸权优势。这些所涉及的不单纯是技术问题、地理问题或者经济问题,而是地缘区域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正是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内容所在。

同时,世界体系论者一直担心:如果16世纪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已经存在,那么,世界体系论关于中国是一个世界帝国的假设就需要修改,如果东亚的兴起是地缘政治的后果,世界体系论关于东亚是西欧世界体系一部分的假设也需要修改。^①以亚欧大陆腹地为出发点的地缘分析,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探讨。

（二）现实意义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亚欧大陆腹地在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中都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历史上,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曾经不止一次地统治过东亚、中东和欧洲,尤其是13世纪蒙古帝国的崛起,直到今天仍然震撼着整个世界,这一地区曾经是人类历史上获得世界霸权最为长久的地区,并且一直维持到16世纪以后。随着沙皇俄国的向东扩张,游牧民族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并没有因此而消退,控制了这一地区的苏联曾经在世界上称霸了七十年之久,究竟是地理因素还是生产因素导致的

^① Christopher Chase-Dunn & Thomas D. Hall, eds., *Co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Pre-capitalist World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p. 45—112.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rise of East Asia, or the world-syste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Keynote Address at Symposium on “Perspective of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in the Beij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ponsored by projec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Jan. 23—24, 1997. 转引自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01页。

这一地区的世界霸权,是我们需要讨论的内容。苏联解体以后,亚欧大陆腹地支离破碎,位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蒙古和哈萨克就显得异常重要,它们究竟如何寻求新的发展,关系到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甚至世界地缘格局的重新调整。

第二节 研究框架

本书将以机动性和国际贸易结构为基本工具^①,分析在世界体系之下的不同地缘区域的地缘关系,分析不同地缘经济区域不同的机动性,以及所产生的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问题。

一、研究的范围

本书所论述的范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地理范围、历史范围。

(一) 地理范围

本书涉及的第一个地理概念就是亚欧大陆腹地,从地理意义上讲,亚欧大陆腹地的范围十分泛泛,而且所指范围并不一致,针对此范围的种种观点,将在下一章讨论。

游牧经济时代的亚欧大陆腹地是作为一个地缘经济区域出现的,本书讨论的是游牧生产方式下的亚欧大陆腹地(Asia-Europe Steppes on the Horse),这个区域随着游牧民族机动性所及的范围经常变化。

(二) 时间范围

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段很长,也很复杂,但是由于历史在一定的区间内有共时性^②,即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整个区域内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不会发生突变,所以本书把所论述的内容分为几个时段来论述。

① 具体的分析见第二章第二节。

② 这个共时性按照布罗代尔的论述,和他的“地理时间”相类似。详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9页。

本书从机动性出发,以地缘区域机动性的生成、成长、消退为特征来划分历史时段,亚欧大陆腹地从整体上可以分为三大阶段。这三大阶段分别以1200年和1800年为界限,1200年以前是亚欧大陆腹地的霸权成长阶段,1200年—1800年是亚欧大陆腹地的霸权获得和维持阶段,1800年以后是亚欧大陆腹地的霸权消退阶段。

二、研究的视角

(一) 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探讨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问题

1. 传统的“发展”视角以国家为分析单位

经济发展是古典经济学家最先注意到的问题,发展经济学的出现则相对较晚。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理论以结构主义为指导思想;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经济发展理论主要以新古典主义为主导思想;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理论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①但是,无论发展经济学的哪一个阶段,都是局限在以一个国家,或者一国产业作为分析框架的,其核心内容是:(1)后进国对先进国的追赶;(2)先进国家的知识和技术向后进国家转移的平衡与非平衡增长;(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4)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5)后进国家对于产业的保护与成本—收益分析。^②并且,不同的学派都主要强调的是政府的干预问题,这一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发展经济学并不考虑各个国家之间的禀赋的差异,认为整个世界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发展模式,如果落后国家能遵循发达国家的模式,就能够获得成功。

2. 新兴的区域化发展以市场结构为分析单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代表,出现了多次区域化发展的浪潮,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功。在区域化的最初阶段,

^①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② Ohn Eatwell, Murry Milgate & Peter Newman,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The Macmillan Press Limited, 1991, pp. 819—824.

取得成功的有欧洲经济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等,这些区域化组织的发展对以往的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冷战以后,区域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从欧盟统一货币政策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始,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美洲自由贸易区、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与中日韩的“10+3”方案)等等,各种区域性的经济组织也不断发展和重组。

实行区域一体化的形式有: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追溯到1241年的汉莎同盟。二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范之作是从比卢荷经济联盟发展而来的欧盟。这些组织的出现,有许多复杂的原因,有的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更多的是出于贸易保护的需要。因为,在国际贸易中很难实现完全的自由化,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实行区域化是一个次优的选择,对于小国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不过是追求对内自由贸易、对外实行保护贸易的市场一体化。

从区域一体化的经济组织结构看,其构成单位是民族国家,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维持其运作的则是一个共同市场。

3. 亚欧大陆腹地的内部结构,既不以国家为单位,也不以市场为经济特征

亚欧大陆腹地基本上属于干旱草原,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畜牧业无疑是最好的生产方式,匈奴、突厥、回纥、契丹、蒙古、女真等民族都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过,都以畜牧业为主,大部分的历史时期是以部落为社会的组织结构。那么,这些民族的共同之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它们共同之处:

(1) 从政权形式上来说,亚欧大陆腹地的各个游牧民族建立的几乎都是部落军事帝国,主要为它们的军事目的服务。虽然这些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各有特色,但多为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政权的各级官吏既充当军事首领,也管辖行政事务。普通的百姓平时生产,战时为兵,军事组织和生产组织合而为一。

(2) 从经济类型来看,这些民族基本上属于游牧经济,逐水草而居,畜群是他们的主要财富。从整个经济史来看,由于地缘因素的影响,这一地区产生了与相邻农业区域不同的生活习惯,尤其是不同的

食品结构 进而形成了不同的需求结构 这就意味着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问题 首先应该是一个地缘关系问题。

因而 对于亚欧大陆腹地的这种经济与政治形式 单纯的上述两种视角的发展理论是无法讨论其发展问题的 这需要我们重新寻找新的视角。^①

（二）研究的基本线索

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问题 首先是世界体系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分工问题 地缘经济分工形成了基于地缘禀赋所决定的世界体系问题。在特定的世界体系里面 分工不同的地缘区域是如何相互转化的 或者说是如何相互依存的 其内部的发展方向如何 将构成本书主要的分析线索。

基于以上考虑 本书将分为三条线索进行论述：

1. 亚欧大陆腹地动力问题的静态分析

这条线索主要分析亚欧大陆腹地不单纯是一个地理概念 亚欧大陆腹地是一个地缘经济区域 它代表着一种经济类型——游牧经济 这种经济类型是基于地缘经济的原因 具有特定的禀赋 也就有特定的内部运作机制。

亚欧大陆腹地首先是一个地缘经济区域 而不是以各个不同的游牧民族的身份为特征的种族区域。在这个地缘经济区域内 其向外的俯冲力量是如何获得的？游牧民族的食品和服装的地缘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后果 亚欧大陆腹地作为地缘政治区域对外进行扩张的动力 主要来自于哪里？亚欧大陆腹地作为一个地缘经济与政治区域 获得世界霸权之后 其向世界体系融入的原因是什么？在不同的地缘经济区域之间 为什么发展的方向是单向的且不可逆转？亚欧大陆腹地对于中原地区的边缘化、半边缘化和融入的地缘因素是什么？

本书将以地缘生产结构为分析工具 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亚欧大陆腹地的动力问题。

2. 亚欧大陆腹地动力问题的动态分析

^① 进一步的讨论将在第二章详细展开。

这条线索从世界体系的贸易结构出发,分析世界体系内部各个地缘区域在国际贸易之中的关系。

无论是1800年以前还是1800年以后,本书都认为亚欧大陆腹地是作为世界体系的边缘区而出现的。那么,丝路、长城和京杭运河的地缘经济与政治意义是什么?国际分工和技术变革是否决定了亚欧大陆腹地地缘优势的最终逆转?现代世界体系之下的亚欧大陆腹地,将寻求区域化还是全球化?地缘上相邻的区域如何面对这一问题?这就需要对亚欧大陆腹地进行动态分析,分析各个时代的世界货币和国际贸易结构,以解决地缘经济区域之间互动的动力问题。

3. 亚欧大陆腹地动力问题的地缘结构分析

这条线索主要讨论世界体系内部各个地缘区域的机动性问题,分析亚欧大陆腹地作为地缘经济区域对外进行扩张的动力与游牧经济这种生产方式的关系。

基于地缘经济分工所形成的不同经济类型,所产生的稀缺性问题是不同的。亚欧大陆腹地与亚欧大陆其他地缘经济区域之间结构性冲突的表现和解决,主要是这样的一些问题:不同的经济类型的稀缺性产生不同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地缘经济区域相互间的稀缺性冲突是如何解决的?外向型解决稀缺性问题的经济类型,在不同的地缘区域中,如何解决资源的使用问题,以及生活方式是如何决定的?

第三节 应用的核心概念

麦金德认为,在后哥伦布时代,任何一种社会力量的爆发,都不会无声无息地消散在每个角落,相反,它会得到全球范围的回应。^①彼得·泰勒认为,全球问题或者是世界范围的问题决不是仅关注当前的问题,因而泰勒主张用世界体系论方法(the world-system ap-

^① Peter 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 Economy, Nation State and Locality, pp. 2—3.

proach)来分析全球问题^①,弗兰克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并不只局限于对于欧洲世界经济体系的分析,而且对于哥伦布以前的时代,也可以应用这种分析方法。^②本书要采用的方法是世界体系方法,具体内容将在第二章详细讨论。在用世界体系理论分析亚欧大陆腹地时,本书所应用的核心工具是机动性和贸易结构。

(1) 机动性。机动性首先是一个军事学用语,机动性作为地缘政治核心概念的应用是在1904年,麦金德在他的陆权理论中有相关的论述。^③学术界虽然尚未给出关于机动性的确切概念,但是,机动性概念的应用仍然是遵循军事学的原则,在地缘战略理论中来加以发挥的。从纯军事学角度而言,机动性是指军事力量最大范围地扩大作战半径或者尽可能地获得更为广泛的军事基地,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机动性则指其对外力量尽可能完美地与本国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有机地结合,也就是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的一致性。

本书中的机动性要解决的是地缘区域的动力问题,也就是说,机动性是指某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半径和市场半径。生产半径要解决的是这种生产方式获得资源的能力,市场半径是指这种生产方式下,其社会分工的深化程度。

(2) 贸易结构。从1500年以来,就有一个全球世界经济及其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这种世界经济具有可以认定的自身的体系特征和动力,它在非洲—欧亚的根源可以上溯一千年。^④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本书认为,从贸易结构去分析亚欧大陆腹地和周围地区的地缘关系,更能反映这一地区的地缘经济特征。从世界体系内部的贸易流向之中,可以分析核心区 and 边缘区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及其走向。

通过分析世界体系内部的贸易结构,以及在这种贸易结构之下的世界货币及其流向问题,将勾勒出亚欧大陆腹地在世界体系之中

^① Ibid., p. 1.

^② [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中文版前言。

^③ 麦金德在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对机动性做过论述。

^④ [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第90页。

较深层次上的地缘关系 ,也将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亚欧大陆腹地动力的来源问题。

第二章

世界体系与亚欧大陆腹地

为了简化世界史,并使之条理化,总的来说,我们拥有的手段不容低估。我们能推导出一种世界规模的经验时间:世界的时间,但它既不是,而且也不应该是人类历史的总和。这种非同寻常的时间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控制着某些空间和某些实在。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不应把亚欧大陆看做是由欧洲和亚洲这两块大陆组成的,而应看做是由中东、印度、中国、欧洲和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区这五块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地区组成的。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20 世纪 70 年代,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创立了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在 16 世纪以前,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这一结论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但是,另一位学者表示了不同的意见——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认为在 16 世纪以前存在过一个世界体系,不过这个世界体系早在 14 世纪就已经结束了。^① 随后弗兰克(Gunder Frank)也对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提出

^①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

了挑战,认为16世纪以前的世界体系不但存在,而且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东方世界仍然是整个世界的核心区。虽然各派对于世界体系的起点各持己见,但没有人否认地理大发现对于欧洲获得世界霸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但与大西洋同样重要的亚欧大陆腹地,却没有引起世界体系论者的注意。亚欧大陆腹地作为一个地理区域对于世界霸权的意义,虽然20世纪初曾经有人^①提出有关方面的见解,并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地缘政治学者一直将其与世界霸权的获得联系在一起,但它并没有进入世界经济的讨论范围。

世界体系作为一种新出现的社会科学方法,分析世界经济有其不同的侧重点,本章主要讨论世界体系需要讨论的核心内容,然后,试图将亚欧大陆腹地纳入整个世界体系的分析之中,因为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虽然从表面看来,亚欧大陆腹地这一游牧地区一直是世界的边缘,但从世界体系的发展看来,这一地区对于世界体系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在世界霸权的转移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为了解决亚欧大陆腹地与世界体系之的关系问题,本章将讨论以下几个问题:(1)世界体系内在的动力是什么?(2)世界体系应该以什么为分析单位?(3)整个亚欧大陆腹地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域来看?

第一节 世界体系理论述评

一、几个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派别

世界体系理论是目前欧美学术界较为流行的一种新兴社会科学,在有关世界体系的学者中间,大体分为以下几个派别:

1. 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现代世界体系(Modern World-System)

^① 英国人麦金德在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亚欧大陆腹地对于整个世界霸权的意义。

理论^① ,遵循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拉尼、布罗代尔的“欧洲特殊论”^②传统 ,宣称真正的世界体系诞生于 16 世纪以后的欧洲。

2. 认为在现代世界体系之前 ,仍然存在另外一个世界体系的是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③和滨下武志。^④ 前者认为在 14 世纪以前 ,即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之前 ,就已经存在另外一个世界体系 ,在这一时期 ,亚洲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 ,但是这一体系已经在 14 世纪崩溃 ,她并不反对现代世界体系理论 ;后者认为早在现代世界体系之前 ,存在着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

3. 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世界体系 (Modern-World System) 理论^⑤ ,弗兰克最初支持沃勒斯坦的观点 ,并且是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作家。使弗兰克思想发生转变的是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 ,她的观点极大地启发了弗兰克 ,弗兰克认为欧洲并没有比其他地区更为特别的地方 ,相反 ,中国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一直是世界体系的中心 ,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 1800 年左右 ,欧洲只不过是这一体系的继续 ,并且 ,这一体系的中心正在向亚洲回复。滨下武志的研究支持了弗兰克的观点 ,但是滨下武志并未向沃勒斯坦的理论提出挑战。

二、世界体系理论的历史回顾

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发端于法国年鉴学派^⑥ ,年鉴学派主张“通

① 相关的代表著作为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 , II , III ,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 1974 , 1980 , 1980。

② 这种特殊论是一种学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讨论 ,而非政治意识形态上的讨论。

③ 相关的代表著作为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1350 , New York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 1989。

④ 相关的代表著作是《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 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⑤ 相关的代表著作为 Re Orient ,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8。

⑥ 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建立了自己的全面的历史体系 , 批评当时占主流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历史学 , 并于 1929 年创办了在当时具有革命意义的杂志《经济和社会史年鉴》 , 试图将历史研究从纯政治史、纯制度史和战役史引向对社会、经济的过去和现在的重大问题的研究 , 更加关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以及人种学等社会科学 , 从而建立一种全面的历史学。

过研究某个特定的问题,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观察者寻求抓住它们深藏的脉络,将之重新安排在周围总的环境里:当时的经济气候、政治和社会因素的相互状况,文化的分量(远的,传统文明的影响;现实的,文学和意识形态运动的影响)”^①。布罗代尔吸收了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他将历史分为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社会史(群体和集团史)、事件史三种类型(或者说是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在这种历史观里,所有的历史变迁和现代经济变革,导致的文明之间必然的根本冲突难以根除,并且随时重新出现并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布罗代尔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总体世界观,认为一些历史的状况除了有明确地位的政治问题起次要作用以外,恰恰是文明带来的问题。^②此后,布罗代尔把这三种历史时间称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了三个与之相适应的概念——“结构”、“局势”、“事件”^③,布罗代尔在扩大时空和历史的范围之后,提出了历史无非是上述三种时段的辩证关系的历史观。^④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的最初模式,出自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概念,布罗代尔认为,一个“经济世界”有三个要素:一定的地理范围、一个中心(城邦或者国都)、中心以外的中间地区和边缘区,这个“经济世界”范围可以伸缩,中间区和边缘区可以转换,中心区与边缘区是一种不合理的剥削关系。^⑤沃勒斯坦在这一基础之上创立了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虽然就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本身而言,其学术渊

①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中译本序。

② 同上书,中译本序、第一版序言。

③ 所谓“结构”是指变化极为缓慢的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作用的因素,“局势”是指较短时期内具有周期性的历史现象,“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事件。

④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7页。

⑤ 同上书,第10—11页。

源甚广^①,但是比较现代世界体系和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可以发现,其间具有最为直接的和本质上的理论衍生关系。沃勒斯坦以经济为首要特征界定经济区域,布罗代尔以政治区域为首要特征来定义经济世界,并且前者认为自古以来只有一个真正的世界体系,那就是自16世纪以来诞生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沃勒斯坦不同的是,布罗代尔主张的“经济世界”有若干个。那么,也可以说,现代世界体系是布罗代尔经济世界之中的一个特例。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是一种三元结构的世界经济体系。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具有单一的劳动分工和多元文化。‘称之为世界体系并不是因为它包括整个世界,而是因为它比任何法律形式定义的政治单位都要大。’”^②世界体系论有三个逻辑假设:“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体系,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有自己的规则和结构,有开始也有终结,这个体系有自己的周期性,资本主义这个历史体系总的趋向是衰退,最终毁灭的原因是其成功。”^③而且,世界体系作为一个历史体系,它是一个经过“最广泛的集中地理上的生产过程而建成的,通过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周期性的运行方式寻求运动和变化,最终趋向极化的”^④的历史体系。同时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体系,它主要涉及三个问题:“第一是不断扩展的单一的世界经济,第二是很多国家并存而且不断扩展着的国家体系,第三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问题。”^⑤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体系,它的发展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时间’问题,亦

① 王正毅教授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学术渊源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及熊彼特、波拉尼、康德拉捷耶夫和普雷维什等人的学说,并且沃勒斯坦本人也承认这一点。详见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世界体系论的学术思想渊源”以及沃勒斯坦的序言。

②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15.

③ Immanuel Wallerstein,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8—39.

④ Ibid., pp. 162—165.

⑤ Terence K. Hopkins,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World-System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Sage Publication, 1982, pp. 222—223.

即世界体系的周期问题；一个是内在的逻辑问题，它关注的是世界体系的趋向问题。”^①沃勒斯坦所设定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和逻辑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众多政治国家及多元文化之上的，在这个体系内，社会关系上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结构，空间概念上存在核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的三重划分，在国际和人际的对立上并非泾渭分明，存在着融入和边缘化的过程，矛盾会在一定时期内较为缓和，但随着结构中人际冲突和国际冲突的加剧，会有一种对世界政府的内在需求。在好几个方面，世界体系论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又有不同。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所有，沃勒斯坦则认为剩余价值的获得者是核心区，这是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社会关系上的划分，一种是空间区域上的划分。对于资本积累，马克思认为资本家通过剥削而获得高额利润进行资本积累，世界体系论则认为资本积累是中心区和边缘区共同追求的目标，核心区由于积累的速度快而获得更高的收获。在工资水平的认识上，马克思认为工资源自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世界体系论则认为是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再者，世界体系论者的一个结论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会采取一种新的形式，即世界社会主义政府”，这一结论显然是受马克思的影响，但是“他对此提法作了两点补充，一是对当前政治结构及未来政治结构不能完全肯定，因此他宁愿使用秩序（order）一词来代替政府（government）一词；二是他们的主张完全是一种可能性的演绎，即仅是根据演绎而提出的看法”^②。世界体系论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一直存在着反体系运动。其中19世纪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一直引人注目。世界体系论主张的世界经济是二元一体的，“在世界体系向全球扩展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未进入世界体系的国家以及地区之间存在着一种‘融入’和‘边缘化’的关系，‘融入’

^① Terence K. Hopkins,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World-System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p. 12.

^② 郑伟民、王正毅：《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中译本前言。

和‘边缘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融入’是指世界体系不断包容新的国家和地区的过程。‘融入’是‘边缘化’的第一步。随着‘边缘化’过程的深入，被边缘化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加入整个世界经济的‘商品链’之中”^①。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而出现的世界体系论，不是一种对现实进行描述的概念，它“力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在政治、经济和文明三个层面重新构建世界秩序……”^②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而出现的世界体系论，其出发点是首先要将世界看成是一个整体，其分析单位是“世界体系”。世界体系论经济层面的分析主要结合长时段的历史分析和结构分析方法，研究世界体系的发展机制；世界体系论政治层面的分析主要探讨近代世界体系和霸权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互关系，研究世界体系的运作机制；世界体系论文明层面的分析中将文明与生产方式结合起来，研究世界体系的形成机制。世界体系理论对世界体系进行政治、经济和文明的全方位的分析，是世界体系论者力图对世界秩序进行历史的和结构的重建某种程度上的努力。现代世界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布罗代尔的主张是基于不同的历史时段，采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对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世界得出不同的结论。由此而言，现代世界体系是建立在布罗代尔的空间分析、康德德拉捷耶夫的时间分析以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基础之上综合而来的一种关于世界的最终目标的理论。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从一诞生就引起了欧美学者的极大兴趣，并且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研究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世界经济史以及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③，直到1989年阿拉伯裔美籍学者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发表了她的著

① 郑伟民、王正毅：《历史资本主义》，中译本前言。

②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第6页。

③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译本第1、2卷序（庞卓恒）。

作《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 年的世界体系》^①，才提出不同的看法。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认为在 16 世纪的欧洲霸权以前，11 世纪之后，就已经存在一个世界体系，这个体系连接了亚洲和中东的农业区域以及欧洲的独立城市，并且在 13 世纪，这个体系达到了它的巅峰时代。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认为：“13 世纪的世界经济不仅是迷人的，由于不包括任何一个单独的霸权国家，所以它可以与由它产生的世界体系进行对比：那个欧洲重新改造的控制了很长时间的体系。这个对比说明世界体系的特征不是不变的，组织者不是唯一的，而且，世界体系不是静止的，它们发展变化着。此时，16 世纪开始的世界体系在痛苦地变化着，了解它以前的体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知道面临着什么。”^②为此，她要求现代世界体系能够重视亚洲的存在。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极大地启发了一个人——依附论的代表人物弗兰克^③，他是泛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作家之一。弗兰克提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并非从来就有的，也不会凭空产生，在现代世界体系之前，肯定存在某种可以称之为体系的东西^④，并在 1993 年出版了他的新著（与英国人吉尔斯合著）《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⑤。弗兰克开始重新思考地理大发现的动力问题，沃勒斯坦也曾

①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研究的是 13 世纪的世界体系。这部著作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的是欧洲的次体系（The European Subsystem）；第二部分讨论的是中东腹地体系（The Mideast Hearland）；第三部分讨论的是亚洲的世界体系，对中国和印度体系是其论述的核心内容。

②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4—6.

③ 其主要代表作有：《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1967）、《拉丁美洲：欠发达的革命》（1969）、《流氓资产阶级》（1972）、《世界性积累（1492—1789）》（1978）、《依附性积累与欠发达》（1978）等著作。

④ 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载于〔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⑤ Andre Gunder Frank and Barry K. Gills, eds.,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经对此做过论述^①,思考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弗兰克认为地理大发现是基于东方早已存在的一个世界体系,而不是像沃勒斯坦所说的那样基于欧洲现代世界体系本身。弗兰克认为马克思、韦伯直至沃勒斯坦等人的欧洲特殊论存在着三个假设:欧洲是一个合理的独立存在的社会实体,欧洲的特殊性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产生标志着世界命运的断裂。弗兰克出版了他的《白银资本》则对此提出挑战,究竟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还是世界造就了欧洲。弗兰克的主张在于,世界体系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资本积累是历史的推动力,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可以应用到1492年以前的世界体系,历史的演变不是线性的而是周期性的发展。弗兰克的理论设想是建立一种生态—经济—技术纬度、政治—军事纬度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纬度的全球性的社会理论。

弗兰克认为,世界始终只存在一个世界体系,这个体系至少存在了五千年,并不是沃勒斯坦所谓的世界体系是以1450年为起点的。^②为此,弗兰克改造了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建立在永不休止的资本积累所支撑的结构优势之上^③,即以金银或纸币等抽象财富为目标,它可以增殖并能转换成财富的其他形式。弗兰克则认为剩余的生产、榨取、转移和积累的非货币形式也应该包括在内,并特别强调政府和私人资本的存在和组合。^④在世界体系之中,生产是手段,消费和积累是目的,由此,弗兰克主张,世界体系应研究积累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⑤

弗兰克用“world system”表示“世界体系”,以示与沃勒斯坦的“world-systems”相区分。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范围很大,几乎等同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p. 52—60.

② Andre Gunder Frank and Barry K. Gills, eds.,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p. 297.

③ Ibid., p. 293.

④ Ibid., p. 107.

⑤ Ibid., p. 97.

于整个世界,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①。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范围则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资本主义泛化过程,指这个体系自身成一个世界。^②两人定义的不同与他们关于确定世界体系范围的理论有关。沃勒斯坦认为,“衡量是否是世界体系或世界体系的一个部分,关键是看贸易的性质”^③,从事大宗产品的贸易发生在世界体系的内部,从事奢侈品的贸易则处于世界体系的外部,只有当长距离贸易(奢侈品贸易)扩展成大宗贸易后,世界经济才能形成。^④弗兰克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奢侈品贸易作为精英之间的交换会影响到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并将再造劳动分工、阶级结构和积累的形式,这对确定世界体系内部关系方面甚至比大宗贸易更为重要。^⑤

这一结论,弗兰克通过他的新著《白银资本》进行了论证。16世纪和18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并没有引发通货膨胀,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弗兰克还阐明了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对于欧洲的发展的重要意义——没有中国的这种需求,西班牙的白银生产将无利可图,欧洲人就不可能习惯性地消费如此多的中国商品,欧洲的兴起既不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也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而是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弗兰克所谓的白银贸易是指欧洲为获得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商品而支付白银所导致的贸易,欧洲人对中国的手工业品、加工后的农产品、丝绸、陶瓷和茶叶有需求,但是没有可以向中国出售的手工业品或农产品,商业经济扩张中的中国对白银有近乎无止境的需求。因而,近代早期的欧洲绝不

① Andre Gunder Frank and Barry K. Gills, eds.,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p. 3.

② 任洪生、柳彦:《资本主义生产贸易体系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比较》,《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5期。

③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第291页。

④ 同上书,第291—292页。

⑤ Andre Gunder Frank and Barry K. Gills, eds.,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p. 93-94.

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先进、更重要,即便是把大西洋外围地区包括在内,当时的欧洲也绝不是任何世界范围的经济体或体系的“中心”或“核心”,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以及其他,包括弗兰克等所谓的以欧洲为核心区的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真正的世界经济整体的一个边缘部分,1800年以前的亚洲真正地占据着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中国在这个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

三、世界体系理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从世界体系理论的历史评述之中,可以归纳出世界体系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一共有两个:其一,是世界体系内部区域的周期问题,也就是世界体系的时间问题;其二,是世界体系内部区域的地缘关系,也就是世界体系的空间问题。

第二节 世界体系:时空透视

世界体系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空间概念,世界体系有其自己的运作周期,也有其发展的地缘变化,考察一个经济区域的发展,就要考察世界体系的时间和空间变化。

一、世界时间的世界体系

什么是世界体系的时间?

经济学可以将时间划分为不同的时段,“为了简化世界史,并使之条理化,总的来说,我们拥有的手段不容低估。我们能推导出一种世界规模的经验时间:世界的时间,但它既不是,而且也不应该是人类历史的总和。这种非同寻常的时间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控制着某些空间和某些实在。但其他的实在,其他的空间却不受它的支配,仍与它格格不入”^①。布罗代尔认为,不同的经济世界有不同的时间,

^①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前言。

从世界体系论角度讲,即为经济周期的问题。对于经济周期的主张有很多种:美国经济学家基钦周期为3—4年,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提周期为9—11年,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捷耶夫周期为40—60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周期为20年,世界体系论者关心的是康德拉捷耶夫周期甚至更长的周期。康德拉捷耶夫周期是根据技术发明、世界市场的扩展以及资金供应的上涨来解释周期运动的,曼德尔用技术革命来解释周期,罗斯托是根据增长的动态平衡来解释,布罗代尔和茨威齐(Sweezy)认为解释周期问题不应该仅从资本积累出发,资本主义得以运行的社会结构有多种积累方式。

沃勒斯坦是以霸权的周期来划分世界体系的时间的,他认为霸权是这样一种机制:在大国之间的竞争中,一个大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文化原则和意愿强加于这个国家体系之中。^①获得霸权的经济基础在农业—工业生产、商业和金融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沃勒斯坦还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三个霸权国家作过比较^②,但是沃勒斯坦仍然将自己局限在1500年以后的世界里。分析16世纪以前的世界体系,仅仅局限于欧洲和东亚之间是不严密的。因为,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片巨大的草原,正是这片草原才和欧洲、东亚一起构成了世界体系的全部历史。同时,分析世界体系的霸权周期仅仅局限于欧洲这一经济区域,仍然无法讨论世界体系的发展,只有讨论整个世界体系在各个经济区域的经济周期,才能更好地探讨世界体系的周期问题。

从世界体系的时间角度上讲,时间段的划分将以技术创新为特点来划分时段,这种创新改变了以往的生产方式,或者产生了一种有别于其他经济世界的生产方式,由此,我们可以重新划分整个世界的世界时间,也就是周期问题。“‘世界的时间’将因此成为总体历史的一种上层结构和一种归宿:这种上层结构似乎由在它下面活动的力量所创造和支撑,虽然它的重量对基础也产生着影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8.

^②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第167页。

响。根据不同的地点和时代,这种自下而上的双重作用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①

因而,世界时间显现出极强的时代性特征和地域性特征,在不同的区域之间,总有某个区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趋势,或者说,在某个世界时间之下,整个世界体系呈现一种阶段性的特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某些或某个区域具有主导性特征,即在这个世界体系之下,在特定的世界时间里,会有一个区域表现为一种时代的趋势。世界时间应该是以生产方式为特征、以技术变革来划分周期的。

二、世界空间的世界体系

毫无疑问,世界体系理论是基于一种全球经济的观点来论述的,其争论的焦点在于世界体系究竟是一种特殊现象,还是一种普遍现象,沃勒斯坦等人主要继承马克思和布罗代尔的生产方式决定论,来讨论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特定的对象在特殊的地区发生的特别的现象,弗兰克则站在全球贸易和白银资本的商业角度来讨论世界体系是一个积累方式的问题。世界体系论的种种争论,其核心问题,就是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问题,沃勒斯坦的生产方式分析方法是基于国内生产的角度而言,从世界霸权角度而言,这种分析并没有脱离他所反对的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范式。弗兰克以积累的方式来探究世界经济体系的问题,贸易盈余仍然表现为某一个国家作为核心区的经济分析。显然,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积累方式的分析,都没有针对产品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分析,尤其是涉及霸权国家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对于其在整个世界体系中所获取的霸权的意义,没有相应地作出分析。所以本书试图以生产方式为特征,来划分基本的分析单位,以积累的方式来分析世界体系的时间问题,同时比较各个区域之间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以此来讨论世界体系的霸权问题。本书的研究将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并列研究,并进一步简化为机动性与贸

^①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前言。

易结构的相互关系。

从本书的角度而言,世界体系的区域分析,是一种时空关联的分析,它需要分析整个区域的内部问题(生产结构)、外部问题(贸易结构),以及区域机动性优势对比——世界霸权问题作相应地比较分析,就此而言,世界体系分析不是哪一个区域的世界体系,也不是哪一历史阶段的世界体系,而是世界时空观念下的世界体系。

所以,对于世界体系的区域分析,应该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 (1) 区域发展的生产结构问题;
- (2) 区域发展的贸易结构问题;
- (3) 区域发展和世界霸权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世界体系的经济以何种方式增长

从世界体系的理论发展脉络来看,马克思关注的是分配问题,韦伯关注的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布罗代尔关注的是市场问题,沃勒斯坦关注的是分工问题,但是最终这些人讨论的一个世界体系起点问题就是增长的问题。如果说康德拉捷耶夫周期只是代表了一种经济世界的资本积累周期,那么,不同经济世界的不同增长才是世界体系的经济周期,也就是积累方式的变化。

从地缘上讲,世界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经济世界,以东亚为代表的农业经济世界、以亚欧大陆腹地为代表的游牧经济世界和以欧洲为代表的商业经济世界,前两种是因食物的获得方式而形成的不同生产方式。下面我们就不同的经济世界的增长方式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游牧经济的增长方式

从公元前 3000 年直至 20 世纪,亚欧大陆腹地是一个适宜游牧型经济的地理区域,沿着 200 毫米等降水量线,从亚洲大陆向西向

南 地缘上相邻的区域都能够从事农业生产^① ,而匈奴、突厥和蒙古等各个民族所居住的内陆亚洲则只能进行游牧型的生产。即使现在发生了重大的农业技术变革 ,这一地区的自然景观仍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

这种生产方式受地理条件的限制 ,主要存在于亚欧大陆腹地 ,虽然其他地区也有零星分布 ,但都没有形成地域和时间上的连续性。游牧经济包括两种形式 :纯粹的游牧和游猎两种。

游猎经济是以捕获的动物为生产对象的 ,猎取的动物也是整个社会财富的源泉 ,只要投入足够多的劳动 ,就会获得足够多的猎物。但是 ,这种方式最终要受到人地比的制约 ,动物驯化以后 ,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游牧经济是以驯化的动物为生产对象的 ,从游牧地区的食品结构、服装结构和交通工具来看 ,驯化的动物是其整个社会的财富来源。驯化的动物的生产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自我繁衍的功能 ,也就是说 ,只要有足够的食物 ,驯化的动物数量会自然地增长 ,同时 ,人们的财富也就随即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唯一需要的要素就是草场 ,也就是土地。也就是说 ,对于游牧经济而言 ,其经济增长的最终来源是土地的增长 ,游牧生产的技术要求仅仅针对于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 ,比如说马、牛、羊毛皮和奶制品的技术 ,但是对于这些产品本身的生产几乎没有劳动力的要求 ,因为牧群只要有相应的草场 ,它们就会自动繁衍 ,所以 ,游牧经济的扩大生产的第一要件就是草场面积的扩大。

因而 ,游牧型的生产方式属于单一要素的增长模型 ,其投入要素就是土地 ,获得的土地越多 ,财富就会越多 ,这种生产对土地的需求类型没有特别的要求 ,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就具有一种对于土地扩张需求的潜质。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1500 年以前的世界》 ,第 82—92 页 ,第 106—110 页 ;曹冠一 :《中国农业经济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韩茂莉 :《辽金农业地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美]H. J. 德伯里 :《人文地理 :文化、社会与空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236—240 页。

二、农业经济的增长方式

从技术角度讲,农业生产需要特定的技术支持,对劳动力的投入要求很高,中国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这就要求在固定的土地面积上,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尤其是农业生产周期为一年或者是半年(部分地区两年三熟),农业作物必须经过重新种植才能够再次收获。

农业型的生产方式属于双要素的增长模型,其投入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在这种生产模型下,土地或劳动力的投入都要受到边际收入的约束,所以在这种生产方式下,首先会发生变化的就是劳动和土地的比率,由于古代农业技术发展得十分缓慢,而适合开垦的土地又是有限的,适用于农耕土地的有限供给造成了农业区域对于人口的总数有相应的上限。所以,在农业区域内,农业技术没有重大突破以提高单位产量或者开发更为贫瘠的土地,其结果就是内部自发地调节人地的比例,而不是向外扩张。

亚欧大陆腹地草原区地缘上相邻的是农业区,两种生产方式对于土地的不同要求,决定了两种生产方式不同的对外态度:游牧经济对外扩张会以土地的绝对面积为追逐目标,农业经济会以土地的相对面积为追逐目标。

三、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

考察马克思、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弗兰克关于积累的态度问题,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积累是资本主义最为核心的内容,那么积累来自于何处呢?这个问题还要从欧洲重商主义的传统开始说起,看看欧洲转移世界体系核心区的前提条件。

重商主义产生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为人们广泛接受。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贵金属即财富,交换产生财富,国际交换是国家财富的源泉。重商主义政策实行的第一阶段,即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认为贵金属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追求财富唯一指向贵金属,进出口之间应该永远保持一种不平衡的关系。因此,政策取向为长期奖出限入。重商主义的第二阶段,即

17 世纪中叶至 18 世纪中叶,已经认识到贵金属不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财富还有物质形式。但是重商主义最终追求的仍然是贵金属。由此产生的一种基本贸易政策就是,在交换的出口和进口之间作比较,出口导致财富积累,其政策结论就是奖出限入。

重商主义首先表现为对硬通货的追逐,我们首先从一个极其简化的货币经济模型,来看一下商业资本和实物产品之间的关系。

表 2-1 货币经济模型^①

银行		企业	
负债	资产	负债	资产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300	收入	300	收入

该模型是从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 年)的革命性阐述——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的理论出发,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即企业利润来自银行的信贷,银行收入来自企业的存款。这个简化的经济模型假设,企业的资本全部来自银行信贷。由此推出,资本主义生产(或社会)关系建立在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之下。

此外,这个模型还有一个重要假设,即总有一笔初始资本,才能开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或社会)关系。那么,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第一笔预付款来自哪里呢?

许多学者把这笔预付款归结为一个历史的因素,弗兰克认为:“西方是如何兴起的呢?严格地说,欧洲人先是买了亚洲列车上的一个座位,然后买了一节车厢。……欧洲人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那么究竟是怎么找到了钱的呢?最基本的途径有两个,或者说是三个。最重要的途径是,欧洲人从他们

^① 本模型是南开大学柳欣教授在其《货币经济的宏观模型》一文中提出的,该文是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双周学术讨论会上的一篇讨论稿。

在美洲发现的金银矿那里获得了金钱。第二个途径是,他们在那个最好的赢利行业中‘制造’了更多的金钱,主要是开采出白银,更准确地说是强迫美洲当地人给他们开采白银。欧洲人也参与他们在美洲经营的或对美洲经营的其他各种赢利的商业活动。”^①布罗代尔认为:“从新大陆而来的金银使得欧洲得以能够在超出其财力的状况下消费,超出其储蓄的条件下进行投资。”^②琼·罗宾逊认为这笔预付款来自于重商时代的遗产,“从贸易获得的大量财富和从海外掠夺的金钱财物提供了现在可以用来投资建设工业的资金。贸易渠道以及征服地和殖民地则开辟了市场(在这些市场里,制造品的售价可以比当地手工业者的产品低),同时供应了用来加工制造的原料”^③,马克思和沃勒斯坦对此也有相似的论述。^④因而人们认为,如果世界上根本没有美洲大陆,那么哥伦布向西航行最终能够到达中国和印度,欧洲不可能马上逆转东西方的贸易关系,则整个西方世界仍然是东亚的边缘区,更不会快速完成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美洲的白银和非洲的黑奴给欧洲资本主义带来了一笔巨大的预付款,事实上,只有拥有这样一笔足够多的预付款,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够突破原始的、在没有收益情况下的消费和投资。商业资本便是在这段时期形成的,并且十分活跃。^⑤而在此以前,有效需求不足一直是困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难题。

地理大发现、美洲的白银和非洲的黑奴给欧洲资本主义带来了一笔巨大的预付款,直接涉及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只是针对某一个国家。沃勒斯坦的研究证明,恰恰是美洲的白银造成了盛极一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的覆亡,原因是这两大殖民国家

① 弗兰克:《白银资本》,第373页。

②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 128.

③ [英]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页。

④ 关于这一点,沃勒斯坦在他的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和王正毅的《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中谈到地理大发现时有过这方面的论述。

⑤ 详见[意]洛·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从美洲获得的白银流向亚洲购买奢侈品和英国的工业品,这极大地抑制了本国的生产力,而扶植了欧洲其他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①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一旦掌握了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就锲而不舍,给予密切的注意和照顾,经几个世纪而不倦,就像保护幼苗那样地小心周到,……这是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商业政策的主导原则,……国家的一般政策与政治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就这一点而言,英国历史提供的证据也是非常确凿的”^②。李斯特由此得出结论:“英国工业的成长与进展已经登峰造极,它的生产力原是欧洲大陆各国得来的。”^③所以说,琼·罗宾逊所言的持续不断的顺差依赖于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使英国早期工业化得以顺利完成,而这种经济政策正是处于工业化初期的民族国家所必需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民族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必须获得一笔预付款,而从历史上看,这笔预付款往往来自该国长期执行的一种重商主义经济政策。

前面的模型告诉我们,如果是持续不断的贸易顺差所获得的这笔预付款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那么后者就一定能够维持并持续扩张。

第四节 亚欧大陆腹地何以成为一个独立区域

本书将亚欧大陆腹地作为世界体系的一个区域来讨论,但如何界定区域,亚欧大陆腹地何以成为一个区域呢?这需要将几种区域的概念加以分析,进而界定亚欧大陆腹地作为一个区域的内涵。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p. 165-221.

^②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页。

^③ 同上书,第56页。

一、地理学关于区域的概念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区域首先就是一个地理概念。首先关注区域问题的是地理学,18世纪晚期发展起来的近代地理学,一直为“地区单元的性质”所困扰。一些学者最初试图以“自然区”来取代传统的政治区划,但最终这一理论被证明是无法做到的。之后,李特尔、布黑、弗勒贝尔以及拉策尔都对此做过相关的努力,区域地理学仍然衰微了,直至19世纪末,地理学家才重新把区域作为具体的单元,这时的地理学家认为“区域,亦即 *Landschaft*,据称构成了各个明确的单元,它具有形态和结构,因而也是具体的物体,与别的类似的具体物体相联系,因而可以认为地球的外表‘是由各个景观或区域镶嵌而成的马赛克’”^①。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相类似。^②但是这两种观点都最终遭到学界的抛弃。

地理学最终形成了两种主要的划分区域的方法。一种是以单一系统的方式,特殊区域是按实际地表的樣子来识别的;或者以几个系统相结合的方式,把世界各地区归入各种类型,并不过于关注实际的地理分布状况。另一个方法,是根据所有文化特征而不是景观覆盖来建立分类系统,文化特征是依地区在土地利用中被综合起来的。^③

对于前一种方法,较为适合没有人文发展的地区,在有人文发展的地区,后一种方法相对而言要比前一种方法更具深远意义。它是在人类组织为单元整体的要素复合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此外,它也有更为严格的逻辑性,当然,它是以一种假设为根据的:在任何地

① 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A Critical Survey of Current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Lancaster, Pa. 1946, p. 250.

②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他在1897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一书中,具体论述了国家有机体的概念,在此之前,李特尔曾经提出过有机体的概念。

③ 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A Critical Survey of Current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p. 363.

区,可以认为只有一种土地利用类型、一种土地利用单元形式是占优势的,因而也是有特色的,因此,只要这一假设正确地表现了实际,这个系统也就是有效的了。^①

二、经济地理学关于区域的概念

经济地理学关于区域的概念源于区位论的思想,区位论最早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形成了一门分支学科。

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 H. Von Thünen)发表了《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是古典区位论的第一部名著。此后,韦伯(Alfred Weber)的工业区位论、帕兰德(Tord Palander)的经济区位论、高兹(Erich A. Kautz)的海港区位论、胡佛(E. M. Hoover)的运输区位论、克里斯特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一直到廖什的市场区位论(August Lossch),乃至商业区位论和行为区位论等相继出现,使区位论的研究不断向地理学领域扩展。

从具体的理论内容来看,杜能的区位论主要讨论的是市场价格、生产费用和运费对于利润影响^②,韦伯则将杜能应用于农业的理论进一步拓展到了工业生产。^③此后的一些区位研究中,区位分析由生产扩充到市场,由单个厂商扩充到整个产业分析,但总体而言,区位论分析属于经济学中成本与收益分析范围之内的讨论内容。

三、区域经济学关于区域的概念

对于区域的概念,继地理学家之后,许多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许多主张,尤其是区域经济学已经成为了一个专门的学科,区域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于40年代和50年代发展起来。

^① 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A Critical Survey of Current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 pp. 363—364.

^② 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③ 刘继生、张文奎、张文忠:《区位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区域经济学关于区域的最大争论,是区域究竟限于一个国家的内部还是可以超越国界。

苏俄以官方形式定义了区域,1922年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俄罗斯经济区划问题委员会拟订的提纲》中有关区域的定义为:“所谓区域应该是国家的一个特殊的经济上尽可能完整的地区。这种地区由于自然特点、以往的文化积累和居民及其生产活动能力的结合而成为国民经济总锁链的一个环节。”^①中国许多学者也认同区域即一国国内区域的说法,南开大学的郝寿义、安虎森认为,“区域是一个优先的空间概念,必须包括于某一主权国家的疆域内,中央政府对它拥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控制权,或由中央政府的代表行使控制权,拥有能够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尽可能完整的经济结构,胜任全国和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杨栋生认为“区域是一个空间概念,特指一个主权国家疆域内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在全国专业化分工中分担一部分职能,且经济结构较为完整的社会经济综合体”^②。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认为“区域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它可以按照内部的同质性或功能一体化原则划分”^③。“集聚而成的区域”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以及实行国家政策而言,是最为有用的区域分类,是基于行政管理范围所及的边界而分的区域。^④

有的学者并不认为区域一定就是一个主权国家之内的区域。方伦认为,“所谓区域,乃为有内聚力的地区。它是通过选择与特定问题相关的特征并排除不相关的特征而制定的。也就是说,区域包含的地区具有同质性”^⑤。林德全认为,“区域乃为有内聚力的地区。

① 《苏联经济区划问题》,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2页。

② 杨栋生:《区域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③ 埃德加·胡佛、弗兰克·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页。

④ Edgar M. Hoover & Frank Glarratani, An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s, 3r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4, p. 243.

⑤ 方伦:《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载《区域经济研究》1988年第1期。

区域所包含的地区具有同质性,经济上有密切的相关性、协调运转的整体性、相互交叉的渗透性”^①。张金锁认为,“区域经济学中所研究的‘区域’不是一个‘纯自然区域’,一般也不是‘行政区域’,而是具有某种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②。

区域经济学对于区域的概念,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逻辑,主张区域研究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国宏观经济问题,主张区域不受国界限制的概念可以归结到地理学对于区域的第二类划分方法之中。

四、关于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

经济世界是布罗代尔生造的术语^③,这个词是借用德语中“Weltwirtschaft”的特殊用法,意指“只涉及世界的一个局部,它在经济上独立,基本能自给自足,内部的联系和交流赋予它某种有机的整体性”^④。

本书之所以将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单独提出,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在所有关于世界体系的理论之中,只有布罗代尔从文化特征来划分世界,而其他的理论对于区域的划分,要么是地理概念上的划分,要么是基于市场结构的划分^⑤,这种划分是基于结果的划分,并非是出于对地缘区域初始形态的划分,布罗代尔遵从了这一点。

五、作为一个独立区域的亚欧大陆腹地

地理区域最大多数的不同特征,体现于一种世界类型地区划分中,这种划分是以人类生产性土地利用中综合起来的大量文化特征

① 林德全:《区域规划的理论与实用方法》,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资料》1986年专辑,第1页。

② 张金锁、康凯:《区域经济学》,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③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2页。

④ 同上。

⑤ 前者如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和弗兰克,后者如沃勒斯坦。

为基础的。^① 在经济学中所有关于区域的定义有一个共同的概念，“一个地理区就是一个统一体，因此可以就整个地区进行重要的阐述”^②。不论区域是不是真正的单元实在，但没有一个人可以怀疑，地球表面的特征形成相互联系的复合体，其不同地区部分——亦即区域——也各不相同，没有一个人可以怀疑，任何一个区域的现象，大部分是由其特定的复合体决定的。^③ 既然不同自然要素对人类的相对重要性，肯定并非由与人类性质迥然不同的自然界所决定的，可见我们的系统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人文基础，在这一意义上说，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称为“人为的”^④。因而，本书对于世界体系内部的地缘区域要基于以上这两种事实。

世界体系理论十分注重核心区和霸权国家的关系问题，从欧洲经济史的角度出发，世界体系论理所当然地将霸权国家与核心区、霸权与核心区合而为一地加以分析，但是，对于亚欧大陆腹地而言，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亚欧大陆腹地获得过世界霸权，但这里从来就不是一个经济核心区。那么，基于以上的分析，对世界体系内部的地缘区域进行重新划分是必要的。

（一）亚欧大陆腹地的地理环境

经济的发展都有赖于客观的地理环境，这种环境为塑造不同的经济类型和不同的经济特性提供了内在的物质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各地区经济创造的发展趋向，并且越接近原始阶级，这种影响力也就越大。亚欧大陆腹地的经济是有别于农业文化的典型的游牧经济，这种经济类型的形成，究其原因，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起到了重要作用。大约在北纬40度以北的地区，蒙古草原、西伯利亚草原、中亚草原和俄罗斯草原连成一片，由于其内部地域极为辽阔，几乎没有有什么大的天然屏障可以对其进行明显划分，因此在政治、军事上的

① 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A Critical Survey of Current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 p. 361.

② Edgar M. Hoover & Frank Glaratan, *An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s*, p. 243.

③ 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A Critical Survey of Current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 pp. 285—286.

④ Ibid., p. 305.

统一相对容易,经济文化也具有同一性的特征。

(二) 亚欧大陆腹地的区域特性

亚欧大陆腹地相继活跃着许多古老的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女真等,他们在这里生息繁衍,有着悠久的历史。

亚欧大陆腹地上建立的最早的政权大约是在公元前 209 年,匈奴人冒顿单于建立的游牧军事国家。一方面,力能弯弓的士兵,则尽为甲骑,所有适龄男子都要被编为骑兵,另一方面各级的军事指挥员也是各级大小官吏。匈奴帝国形成了一整套政治军事制度,把政权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单于庭,二是左贤王庭,三是右贤王庭,在左右贤王以下设立二十四长等官职。这种政治军事组织系统形成,对后来生活在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的影响十分巨大。

在匈奴消亡后,鲜卑兴起,鲜卑属东胡系统。它是统治亚欧草原的又一个游牧民族。大约在公元 2 世纪中叶,鲜卑逐渐强盛,其首领檀石槐统一诸部,建立了强大的军事联盟,他依照匈奴旧制,将领地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各置大人统领,总属于他自己。

大约在公元 6 世纪中叶,突厥在北方草原兴起,辖地东至辽海,西达里海,南抵沙漠,北至北海,公元 552 年建立汗国,公元 745 年被回鹘所灭。突厥也是以畜牧业为生活基础的一个游牧民族,另外,狩猎业在突厥人的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手工业已有了悠久的传统,尤其是冶铁业,突厥的社会组织也和匈奴相仿,也是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普通百姓平时是生产劳动者,战时则是战斗的骑兵。其所领部众都归可汗管辖。

此后,契丹和女真先后于公元 10 世纪初和 12 世纪初统治着北方的游牧民族。契丹族的首领耶律阿保机在 10 世纪初统一诸部,建立起独立的政权——契丹国,后改辽朝。契丹原以畜牧、狩猎为主,兴起后农业和手工业都取得了迅速发展,手工业中尤以冶铁突出。其全盛时期,统治疆域从东北至今日本海、黑龙江口,西北到今蒙古国中部,南与宋接界,统治遍及蒙古高原,蒙古各部当时处于辽上京管辖范围内。

在 12 世纪初,女真族兴起,首领阿骨打率领诸部推翻了辽的统治,建立金朝。女真人在辽时被分为“生女真”和“熟女真”,其中生

女真比较落后，10 世纪以后，生女真中的完颜部农业逐渐发展起来，并掌握了炼铁技术，社会生产迅速提高，势力日益扩大，最后由完颜部的首领阿骨打统一了诸部。建国后，阿骨打采用氏族制时期的猛安、谋克制，使其成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兼具军事、政治、生产三方面的技术职能。

从 13 世纪开始，完成统一后的蒙古开始大规模的扩张活动，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蒙古建立起了一个庞大帝国，这个帝国仍然是以游牧为经济特征，政治上表现出极强的军事特点。

可以看出，整个亚欧大陆腹地的经济不仅具有共同的特征，其政治和社会结构也有着相似的特征，亚欧大陆腹地作为一个区域，具有非常鲜明的区域性色彩。

（三）亚欧大陆腹地——谁的霸权？区域还是国家

亚欧大陆腹地表面给人的印象，往往首先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因为蒙古的对外扩张过于宏大，历史上许多其他的游牧民族便被掩盖在蒙古民族的光环之下，但是考察曾经在亚欧大陆腹地境内生活过的大部分民族，就会发现他们也曾经过在这一地区四处出击，并获得霸权。

表 2-2 南侵的亚欧大陆腹地游牧民族

民族类型	南侵年代	南侵地区	生产类型	原居住地
辛梅里安人 西徐亚人	公元前 7 世纪	小亚细亚、阿 美尼亚、米底	游牧	高加索南部 (自外部侵入)
月氏	公元前 2 世纪 公元 1 世纪	大夏 印度	游牧	戈壁
匈奴人 鲜卑人	公元 4 世纪	中国北方	游牧	戈壁
拓拔人	5 世纪	中国北方	游牧	戈壁
怛哒匈奴	5 世纪	大夏(Bactria)、 旁遮普	游牧	
匈奴人	5 世纪	巴尔干、高卢、 意大利	游牧	阿提拉

续表				
民族类型	南侵年代	南侵地区	生产类型	原居住地
突厥人	7 世纪	中国河套	游牧	6 世纪从蒙古里亚南下,建西突厥斯坦
蒙古人种契丹人	10 世纪	中国北方(北京)	游牧	中国北方
伽色尼突厥人	10 世纪末	东伊朗 ^① (Iran)	游牧	
塞尔柱突厥人	11 世纪中叶	阿拉伯帝国	游牧	
通古斯种的女真人或者金人	12 世纪	中国北方	游牧	中国北方
成吉思汗系的蒙古人	13 世纪	中国、伊朗、俄罗斯		中国北方、蒙古
帖木儿	14 世纪之末	伊朗	游牧	
帖木儿系人	16 世纪	印度	游牧	
满洲人	17 世纪	中国	渔猎	中国东北

资料来源：〔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268—269 页。

历时两千五百年的游牧民族南下史极具规律性，在同一地带，有不同的民族不断南下。地中海南部也有与之相同的历史演进，都是从干燥的草原侵入农业区域，西徐亚人和匈人的社会形态一致，属于畜牧阶段。这些入侵者都属于畜牧阶段，“这是人类地理学的具体事实，制约着亚洲的一切侵入的历史”^②。

亚欧大陆腹地相邻区域的反方向的运动：

① 原著译作伊兰。
② 〔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第 270 页。

表 2-3 来自于亚欧大陆腹地外围的防御力量

	攻打时间	攻打对象
大流土		西徐亚人
中国汉代	公元前 2 世纪之末	蒙古里亚
中国唐代	7 世纪初	蒙古里亚
阿拔斯王朝	8 世纪	河中
撒曼王朝	10 世纪	楚河、伊犁
帖木儿兰	14 世纪	蒙古斯坦
中国明代	15 世纪初年	蒙古里亚
阿拔斯沙 纳迪尔沙	17 世纪 18 世纪	乌兹别克
中国清代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	蒙古里亚

资料来源：〔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第 268—269 页。

格鲁塞认为，以上出兵都具有十分鲜明的防御性质。^①

从上表里面可以看出，获得世界霸权的并不是蒙古民族的专利，而是游牧民族在整个冷兵器时代的共同特征。那么，我们讨论蒙古民族霸权的问题，实际上是游牧民族的霸权问题，需要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考虑。

（四）亚欧大陆腹地——作为一个区域

亚欧大陆腹地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本身具有非常大的模糊性。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中论述范围是从长城以北边境到匈牙利之间、沿亚欧大陆中部向北方伸展的一个辽阔地带，麦金德所涉及的范围更广一些。戴维·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在《俄国、中亚和蒙古的历史》(A History of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一书中所论述的范围比麦金德的范围还要广，这些论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游牧经济作为论述对象的首要特征。所以本书的亚欧大陆腹地这一名词所涉及的地理范围指亚欧大陆内部，从里海到黑龙江流域一带从事游牧经济的地区。本书所讨论的地理范围是依赖于某种生产方式之上的，其机动性所能够有效控制的范围，属于经济学和政

^① 〔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第 269 页。

治学的范畴,而非单纯的地理学范畴。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主张“基于特定的目的,用实际景观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也许是最有用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不同特征,却体现于一种以人类生产性土地利用总和起来的大量文化特征划分的世界类型地区”^①,而这种基于生产方式的划分,更能够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历史上,总是那些从事游牧经济的民族主动向外扩张并且获得世界的霸权。所以在这里,将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亚欧大陆腹地划分为一个地缘经济区域。

但是从黑龙江流域到伏尔加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这一区域的范围却是变动不居的,这个范围时而大、时而小,因为这里所要讨论的是以相同的生产方式或者是生活方式所界定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这种生产方式有一种地缘上相对的机动优势或者机动劣势。

从地缘区域的禀赋开始分析世界体系的问题,或许更有意义。偶然的自然禀赋决定着一个地理区域在人类当时的条件下所能够从事的生产活动,也就是说当时的技术水平决定着当时的区域生产方式。当然,在这一区域取得最终特征的不一定就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可能在一定的区域内取得代表性的特征,但是偶然性的自然因素首先所决定的一定是生活在该区域内的人们的生产方式,亦即其经济增长模型的类型。当然,地缘区域首先是以生产方式为特征,但是人类发展到一定时期,可能也会以生活方式为表现特征,这些特征都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区域特征变化的最终决定性。

笔者遵从弗兰克的观点,认为不存在单一的经济秩序,存在的是各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经济区域中最初由大自然的偶然性决定其初始的生产方式,不同的区域之间基于不同的生产方式,其财富的积累方式并不相同,不同的积累方式导致的特定的贸易结构,构成了世界体系之中的空间分工。

^① Richard Hartshor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A Critical Survey of Current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 p. 361.

小 结

亚欧大陆腹地在整个世界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区域,是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独立区域。为了解决亚欧大陆腹地与世界体系的关系问题,笔者将按照以下几条线索进行分析:

第一,世界体系内部各个区域的内在发展动力是什么?分析世界体系内部各个区域的内在动力,主要目的在于寻找世界体系核心区与边缘区形成的原因所在。在世界体系论的条件下,核心区为什么会比其他区域具有更强的聚集能力,边缘区向核心区融入的条件是什么?

第二,生活在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获得世界霸权的原因是什么?以这条线索为基础,分析亚欧大陆腹地作为典型的游牧经济区域,是如何把生产条件和作战条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蒙古帝国崛起的原因首先在于它的地缘经济优势。

第三,亚欧大陆腹地的作用是什么?它与东西方的关系是什么?她对东西方的作用是什么?长期以来,亚欧大陆腹地虽然获得了世界军事上的霸权,但是在经济上却一直处于边缘区的角色,国际贸易流动的路线在于从核心区到半边缘区再到边缘区,亚欧大陆腹地没有像理论描述的那样处于半边缘区的外围,而是在空间上处于核心区与半边缘区的中间,这就为生活在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从事居间贸易提供了条件。

第三章

1200 年以前的亚欧大陆腹地： 兴起、结构与动力

食物的种类很多 ,因而 ,无论兽类或人类 ,都有许多种生活方式 ;
没有食物 ,谁也无法生存 ,食物的不同 ,决定了各自的生活方式的
不同。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亚洲的国际贸易的总体格局基本上维持着原样。……当时的葡
萄牙人殖民统治并没有给东南亚的商业带来一种新的经济因素。
……从数量上看 ,中国人、日本人、暹罗人、爪哇人、印度人……以及
阿拉伯人所经营的贸易超出葡萄牙人的贸易许多倍。……各地的贸
易继续安然地进行。……凡是声称 18 世纪 (更不用说更早的时
候 !)有一个欧洲人的亚洲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

——〔荷兰〕范勒尔

1200 年以前 ,世界体系的核心区在东方 ,将亚欧大陆腹地作为
一个区域纳入世界体系分析时 ,就要考虑在地缘上最为相近的两个
区域——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关系 ,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关系 ,因为
只有这两种关系最能够反映世界体系中各个区域的地缘关系。

第一节 食品的获得：1200 年以前亚欧大陆腹地的地缘生产结构

讨论 1200 年以前的世界经济 ,核心的内容就是食物的获得 ,因为在 1200 年以前 ,直至 1700 年以前 ,世界体系核心区的恩格尔系数都在 0.6 以上(接下来将证明这一点)。粮食生产是世界上各种社会形式存在的物质基础 ,粮食的生产可以分为生产过程和自生过程两种形式。^① 整个亚欧大陆腹地沿着 200 毫米等降水量线分为两大区域 :一个是农业区域 ,以食品的生产过程为主 ;一个是游牧区域 ,以食品的自生产为主。“食物的种类很多 ,因而 ,无论兽类或人类 ,都有许多种生活方式 ;没有食物 ,谁也无法生存 ,食物的不同 ,决定了各自的生活方式的不同。”^② 正是在亚欧大陆上存在着多种获得食物的方式 ,也就产生了多种生产方式 ,人们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决定着人们对于资源的不同态度。

一、核心区的生产结构——13 世纪以前的东亚地区

在 1581 年明代实行“一条鞭法”以前 ,中国的赋税一直以实物税为主 ,实物税构成了整个中国经济的主要内容 ,这也说明了那一时期的国民经济一直处于温饱型的生产状态 ,其主要的社会财富以食品和服装为主要内容。

^① [美]德伯里：《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第 231 页。马克思认为农业供应着人类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详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697 页。

^② 转引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第 117 页。

表 3-1 宋代以前中国各代赋税制度

	地税、丁口税	工商税	庸	调	备注
秦代	地 税 （ 征 实）、丁口税（征钱）	自 战 国 以 来，盐 铁 皆 有 税，秦 汉 因 之。 ^①	徭 役（可 以 以 钱 代 替）。		实物、货币、劳动力为征税对象。
汉代	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平民算赋120钱，商人240钱，算赋从120钱最后定为80钱。 ^② 汉武帝时开征口赋，初为20钱，后追加3钱，后丁口税为资产税取代。 ^③ 汉代亦有海税。 ^④	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成为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东汉和帝时，改由民营，国家征盐、铁税。征收商税。 ^⑤ 除国家专卖手工业之外的私人手工业，官府收工税。 ^⑥ 汉武帝始对于商人、高利贷者、囤积者按钱纳税，税率6%，手工业者和冶铁者，税率3%。 ^⑦ 车船	更 卒 1 月，戍 卒 1 年， ^⑧ 可以出钱代替服役。		田 赋 为 实 物 地 租，货币和劳动力也为征税对象。

① 余也非：《中国古代经济史》，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页。
② 《通典》卷四，食货四，《赋税上唐》。
③ 余也非：《中国古代经济史》，第352页。
④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载：“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以属大农佐赋。”
⑤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第四上，载：“市肆租税。”
⑥ 《续汉志·百官志》载：“其地有工多者，设工官，主工税物。”
⑦ 张守军：《中国古代的赋税与劳役》，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⑧ 《通典》卷四，食货四，《赋税上唐》。

续表

	地税、丁口税	工商税	庸	调	备注
		税,车每乘240钱,5丈以上的船通一乘。东汉时工商税沿袭西汉,但是盐铁酒实行征税,此时关税上涨为10%。 ^①			
曹魏	田租亩四升。 ^②	魏晋南北朝时期,盐、铁、丝、麻之类的手工业均设有专官管理。 ^③	更役没有定期。 ^④	户出绢2匹、绵2斤。 ^⑤	期间,吴国和蜀国赋税要比魏国更重,但是都是实物地租为主。 ^⑥
西晋	每亩8升,再依户等级不同而升降。 ^⑦	此时开征客栈税。 ^⑧ 六丁以上取三人,限年17	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两人,女及次	丁男之户岁输绢3匹,绵3斤。	实物税为主。

① 张守军：《中国古代的赋税与劳役》,第55—57页。
②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第一。
③ 余也非：《中国古代经济史》,第339页。
④ 同上书,第361页。
⑤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第一。
⑥ 《中国农民负担史》第1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138页。
⑦ 《初学记》卷二七宝器部“绢”字条引《晋故事》。见《隋书·经籍志二》,《晋故事》卷43。
⑧ 张守军：《中国古代的赋税与劳役》,第58页。

续表						
		地税、丁口税	工商税	庸	调	备注
			岁以上至 50 岁以还。①	丁男户者半输。②		
东晋		取 十 分 之 一，亩 税 米 三 升，后 有 两 升 之 时。③	开 征 交 易 税。④	丁男岁役 20 日。⑤	丁 男 输 布、绢各 2 丈，丝 3 两，禄绢 8 尺，禄绵 3 两 2 分；丁女半输。⑥	此时均以实物和劳动力为纳税对象。
十六国时期⑦	后赵	租 3 斛。⑧			户 货 2 匹。⑨	
	前燕	无 牛 无 地 者，官 私 八 二 分 成，有 牛 无 地 者，官 私 七 三 分 成，受 田 之 家，十 一 而 税 之。⑩				此时，纳税的对象仍然是粮食和丝织品。

① 《全晋文》卷五《晋武帝伐吴诏》。

② 《晋书》卷二六 志第十六，《食货》。

③ 《隋书》卷二四 志第十九，《食货》。据《中国农民负担史》考证，“升”多为“斗”之误写，第 162—163。

④ 张守军：《中国古代的赋税与劳役》，第 58 页。

⑤ 《隋书》卷二四 志第十九，《食货》。

⑥ 同上。

⑦ 因为十六国时期资料缺乏，仅以后赵和前燕为代表。

⑧ 《晋书》卷二六 志第十六，《食货》。

⑨ 同上。

⑩ 《晋书》卷一〇九，载记第九，《慕容皝》。

续表

		地税、丁口税	工商税	庸	调	备注
	南朝	宋时“岁输布4匹” ^① ；梁时“始去人货，记丁为布” ^② 。				南朝基本上沿袭东晋旧制，仅有些许更改。 ^③
北朝 ^④	北魏	户粟20石。 ^⑤		60户出戎马1匹，后20户输1匹马，牛1头。 ^⑥	户帛2匹，絮2斤，丝1斤；州库入帛1匹2丈。 ^⑦	
	北齐	一夫一妇租2石，义租5斗。 ^⑧			一夫一妇调绢1匹，绵8两。 ^⑨	
	北周	一夫一妇租粟5斛，未婚租粟2斛5斗；麻布产区，一夫一妇租粟5斛，		岁一月役。 ^⑩	一夫一妇调绢1匹，绵8两；未婚丁男调绢2丈，绵4	丰年全征，中年征一半，下年征三分之一。 ^⑪

① 《宋书》卷六 本纪第六，《孝武帝》。
② 《梁书》卷五三 列传第四七，《良吏》。
③ 《中国农民负担史》第1卷 第174页。
④ 北朝的东魏和西魏资料暂缺。
⑤ 〔北齐〕魏收：《魏书》志第十六，《食货六》。
⑥ 同上书，帝纪第三，《太宗纪》。
⑦ 同上书，志第十六，《食货六》。
⑧ 《隋书》卷二四 志第十九，《食货》。
⑨ 同上。
⑩ 《周书》卷五 帝纪第五，《武帝上》。
⑪ 《隋书》卷二四 志第十九，《食货》。

续表

		地税、丁口税	工商税	庸	调	备注
		未婚丁男 2 斛 5 斗。①			两；麻布产区一夫一妇调麻布 1 匹，麻 10 斤，未婚丁男麻布 2 丈，麻 5 斤。②	
隋代		一夫一妇租粟 3 石，义仓税，上户不过 1 石，中户不过 7 斗，下户不过 4 斗。③	盐酒、矿冶、关市不征税。④	成丁每年 20 天，一生服徭役 39 年。⑤	桑土调以绢 絁，麻土以布。绢 絁以匹（长 4 丈），加绵 3 两；布以端（每端 5 丈），加麻 3 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后减调绢 1 匹为 2 丈。⑥	

① 《隋书》卷二四 志第十九，《食货》。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张守军：《中国古代的赋税与劳役》，第 59 页。
⑤ 《隋书》卷二四 志第十九，《食货》。
⑥ 同上。

续表

	地税、丁口税	工商税	庸	调	备注
唐代	每丁岁租粟 2 石,地税每亩 2 升,户税分为九等,从 4000 文到 500 文不等。 ^①	安史之乱以后,工商税增多,公元 780 年两税法后,商人税为 1/30。唐后期,茶税收入每年近万缗,仅次于盐税,关税每千钱 20 文。 ^②	岁役两旬,庸绢每天 3 尺。 ^③	调随乡土所产,綾、绢、絁各 2 丈,兼调绵 3 两;布加 1/5,兼调麻 3 斤。 ^④	期间,唐曾经有实行过两税法,这是一种货币税,在真正实行中,仍以实物税为主,两年即告失败。

从以上列表可以看出,中国作为世界体系的核心区,其国家财政的核心构成仍然以粮食和服装为主,直到蒙古帝国崛起以前,中国仍然维持着这种生产状况。

下面是北宋太宗和真宗某年的岁赋统计数字,通过这组数字可以进一步了解当时粮食和服装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

表 3-2 宋太宗至道末年(997 年)岁赋收入^⑤

种类	单位	总数	折算(贯)	折粮(石)
谷	石	31707000	9512100	31707000
钱	贯	4656000	4656000	15520000
绢、絁、绸	匹	1898000	2467400	8224667
布	匹	282000	84600	282000
丝线	两	1410000	141000	470000

① 《旧唐书》卷四八,志二八,《食货上》。

② 张守军:《中国古代的赋税与劳役》,第 60 页。

③ 《旧唐书》卷四八,志二八,《食货上》。

④ 同上。

⑤ 关于各项指标的折算,采用《中国农民负担史》第 1 卷,第 384—386 页的推算。宋真宗天禧末年的推算与此同。

续表				
种类	单位	总数	折算(贯)	折粮(石)
绵	两	5170000	403260	1344200
茶	斤	490000	73500	245000
刍茭、蒿	围	32680000	1634000	5446667
薪	束	280000		
炭	秤	530000		
鹅翎杂翎	茎	620000		
箭杆	只	890000		
黄铁	斤	300000		
总计			18971860	63239534

资料来源：《文献通考·卷四·历代田赋之制》。

通过表 3-2 中的数据可以计算：

谷在这一年度岁赋所占比重大约为：

$$9512100 / 18971860 = 50.14\% , \text{ 或者 } 31707000 / 63239534 = 50.14\% ;$$

服装在这一年度岁赋所占比重大约为：

$$(2467400 + 84600 + 141000 + 403260) / 18971860 = 16.32\% \text{ 或者 } (8224667 + 282000 + 470000 + 1344200) / 63239534 = 16.32\% .$$

那么 ,两者合计为：

$$50.14\% + 16.32\% = 66.46\% .$$

这一时期所征收货币税所占的比重为：

$$4656000 / 18971860 = 24.54\% , \text{ 或者 } 15520000 / 63239534 = 24.54\% .$$

表 3-3：宋真宗天禧末年(1021 年)岁赋收入：

种类	单位	总数	折算(贯)	折粮(石)
谷	石	32782000	9834600	32782000
钱	贯	7364000	7364000	24546666
绢、绝、绸	匹	1796000	2334800	7782667
布	匹	338000	101400	338000
丝线	两	905000	90500	301667

续表

种类	单位	总数	折算(贯)	折粮(石)
绵	两	3995000	311610	1038700
茶	斤	1668000	250200	834000
刍茭、蒿	围	20679950	1033998	3446660
薪	束	280000		
炭	秤	26000		
鹅翎杂翎	茎	740000		
箭杆	只	1360000		
黄铁	斤	350000		
鞋	量	816000		
总计			21321108	71070360

资料来源：《文献通考·卷四·历代田赋之制》。

通过表 3-3 中的数据可以计算出：

谷在这一年度岁赋所占的比重：

$$9834600 / 21321108 = 46.13\%, \text{ 或者 } 32782000 / 71070360 = 46.13\% ;$$

服装在这一年度岁赋所占的比重：

$$(2334800 + 101400 + 90500 + 311610) / 21321108 = 13.31\% \text{ 或者 } (7782667 + 338000 + 301667 + 1038700) / 71070360 = 13.31\% .$$

两者合计为：

$$46.13\% + 13.31\% = 59.44\% .$$

货币税在这一年度所占的比重为：

$$7364000 / 21321108 = 34.54\% , \text{ 或者 } 24546666 / 71070360 = 34.54\% .$$

从以上北宋两个年度的岁赋可以看出,粮食和服装是当时主要的财富构成形式,货币并没有成为主要的财富形式,也就是说,当时社会仍然处于温饱型的生产状态之中,社会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解决人们的食品和服装问题。所以,在讨论 1200 年以前世界体系的生产结构时,主要讨论粮食和服装的生产。

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这一时期的手工业没有计算在内,问题

在于这一时期手工业的主要内容是盐铁 ,至于丝绸的生产则属于农业范围之内 ,是国家的纳税对象 ,盐的生产属于食品的范畴之内 ,铁虽然不是 ,但是两者的数据如果同时计算在内的话 ,恩格尔系数将还会提高 ,本节接下来将专门讨论盐铁等手工业问题。

(一) 粮食的生产

在生产技术和人们的收入没有得到普遍提高的前提下 ,粮食和服装的生产成为这一时期东亚地区的主要生产内容。

从技术角度而言 ,中国在农业生产方面显著的技术发明有 :方板链泵、有效耕畜挽具(胸带)、 轭等 ,^①这使得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 ,但是 ,亩产量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 ,这种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为可耕地范围的扩大。

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普遍应用铁犁牛耕和水具灌溉 ,从秦朝至南北朝时期 ,更为推广和改进了许多重要的发明 ,从而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②。

表 3-4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

单位 :市斤/市亩

朝代	平均亩产量	人均成品粮	人均耕地(市亩)
战国中晚期	216	563	4.26
秦汉	264	597	3.76
东晋南朝	257		
北朝	257.6		
唐	334	665	3.76
宋	309	605	3.75
元	338		
明	346	626	3.23
清前中期	367	350	1.71

资料来源 : 吴慧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农业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194—195 页。

① Joseph Needham ,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 Volume 1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54 , pp. 242—243.

② 余也非 :《中国古代经济史》,第 218—219 页。

对于东亚的中国来说,即便是在中国较为强盛的汉代,全社会的经济结构也主要是围绕着粮食和服装为中心的。据推算,“两汉人口都在5000万人左右,农业人口占90%,即为4500万人,每户5口人,2个劳动力,则农业劳动力为1800万人,一个农业劳动力产粮1268市斤,则用下列公式计算即可得出全国人口每人每年占有的粮食数量”^①。其计算公式如下:

$$(\text{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数} \times \text{从事农业的年劳动力总数}) / \text{全国人口总数} = \text{全国人口每人每年所占有的粮食数量}$$

计算的结果:汉代全国人口每人每年所占有的粮食约为456市斤。^②汉代的农业生产技术得益于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牛耕的普及以及农田灌溉面积的扩大,但总体而言,其生产水平是很低的。在这样的生产力之下,一个五口之家(汉代平均每户5口人左右)在劳动力较强,土地也较为肥沃的情况下,能够满足生活需要并且还有些剩余,能够过上温饱的生活,即所谓上农之家。中农之家只能聊以卒岁,下农之家则难持温饱,这些尽属正常年份的推算。^③到了中国最为强盛的唐代,其农业生产水平仅仅是对汉代稍有超越,“总的情况是,江南和北方水田种稻,产量高些,一般水平,亩产可达2—3石。北方旱作种粟麦,产量低些,亩产高的1—2石,低则只有几斗,一般当时是1石左右。从全国看,在常年平均是亩产1石左右”^④。

在唐朝中期,普通的五口之家的恩格尔系数可以通过计算得出。

唐时“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诸户留长上者,丁口日给两升五合,中男二升”^⑤,另,“内园丁年给口粮七斛五合”,即每日两升。以此标准,可以假定丁男日2升5合,妇女2升,余者3人,2中1小,中口1升半,小者6合,那么,全家5口每日合计

① 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第205页。

② 这个数据与吴慧的计算有些出入。见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页。

③ 同上书,第205—206页。

④ 同上书,第497页。

⑤ 《唐六典·尚书刑部》。

需口粮 8 升 1 合,全年共需要 29 石 1 斗 6 升。唐朝平均受田 50 亩计算,唐时平均亩产 1 石,50 亩即产粮 50 石,这就是丁男为主的五口之家的一年收入。^①唐制,每户所交的赋税有租庸调等,折合 12 石^②,但是,属于农业的只有 3 石,5 口之家粮食所剩为:

$50 - 3 - 29 \text{ 石 } 1 \text{ 斗 } 6 \text{ 升} = 17 \text{ 石 } 8 \text{ 斗 } 4 \text{ 升};$

不包括农业再生产资料,则消费掉的粮食所占比重为:

$32 \text{ 石 } 1 \text{ 斗 } 6 \text{ 升} / 50 \text{ 石} = 64.32\%;$

如果再加上农业再生产的资料,按照宁可等人的计算,这个比重还要高一些^③:

五口之家,占有耕地 40(唐)亩,每亩产粮 1.5 石,全年粮食总收入为 60 石。

全家的口粮为 40.75 石,占总收入的 67.9%;

赋税:地租 2 石,地税 0.8 石,计 2.8 石,占总产量的 5%;

再生产:种子每亩 3 斤,耕牛一头,饲料 3 石,计 4.5 石,占总产量的 7.5%;

此三项共占总产量的 80%。

一般学者认为恩格尔系数在 0.59 以上者,即为生活贫困的家庭,中国汉唐时代的家庭生活水平公认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是较高水平的,但是仍然处于勉强度日的状态,至于衣服等只能靠家庭副业纺织来弥补,对于发生持续性的自然灾害,显然没有足够的粮食自救,只能靠政府来救济。粮食和服装的生产,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内容。

(二) 手工业——盐铁专卖制度及其开放

秦统一中国以后,官营手工业的规模很大,各手工业均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主要是盐铁之利。西汉时,郡国设有盐官 31 处,铁官 49

① 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第 517 页。

② 唐制,每丁交租 2 石,地税每亩 2 升,50 亩即为 1 石,两者合计为 3 石。调:绢 2 丈,庸:20 天徭役折合庸绢 6 丈(每日 3 尺),两者合计为 8 丈,即 2 匹。按《通典》载,唐天宝年间一匹绢价 210 文,两匹是 420 文。《通典》载户税每户 250 文。则庸调绢和户税共计 670 文,天宝时,每斗米 13 文,1 石是 130 文,670 文合米 5 石 1 斗 5 升多,按粟每斗成米 6 升计,折合粟约 9 石,再加上租庸调、户税合地税,共计 12 石。

③ 宁可:《中国经济发展史》第 2 卷,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23 页。

处^①，到汉和帝时，朝廷“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②，这标志着盐铁业民营的开始，但要向国家纳税。东汉时，官营盐铁已经不成气候，民营盐铁业专盛，汉明帝时，正式废除了官营煮盐业和冶铁业^③，私人的盐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④。魏晋南北朝时代，各个割据政权为了军需之用，皆重盐铁之利，无论官营还是私营，规模都很巨大。^⑤

隋唐以后，盐铁业不再是手工业的主要内容，纺织业趋于全盛时期。^⑥

（三）手工业——纺织品的生产及其独特的经济作用

1200 年以前的世界，中国的主要经济内容是耕作和纺织，除了粮食生产以外，服装的生产是最为重要的生产活动，蚕丝桑麻的饲养和种植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地位异乎寻常。

服装的生产共分为两种，一种是丝绸，一种是麻，棉花被引进中国以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即为农桑结合或者是农麻结合两种形式。这时丝绸主要供给上层社会消费，下层社会仍然以消费麻布为主。

丝麻纺织品，汉代同样也设立了管理机构^⑦，纺织业并不禁止民间经营，东汉时期，政府收缩了官营纺织业，民营纺织业进一步发展，但主要是作为家庭副业和农业结合而出现的。^⑧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丝绸的生产，对于麻而言，其生产可能还要早于丝^⑨，丝绸的生产分为官府手工业

①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第八上；《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② 《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纪》第四。

③ 余也非：《中国古代经济史》，第 357 页。

④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载：“东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盐铁论·错币第四》载：“文帝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盐铁论·复古第六》载：“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人。”

⑤ 余也非：《中国古代经济史》，第 338—339 页。

⑥ 同上书，第 424—458 页。

⑦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载：“少府，秦官，……属官有……考工室……东织、西织，……河平元年（公元前 28 年）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绥和二（公元前 7 年）废。……王莽改少府曰共工。”

⑧ 余也非：《中国古代经济史》，第 338 页。

⑨ 1972 年，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葛布残片，早于丝绸。

和家庭手工业两种^①。汉代,官营的纺织作坊规模很大,“三工官官费五千万。……故时齐三服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东、西织室亦然。”^②这说明当时官办的纺织作坊规模很大,此时的民间纺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役使的兵、工多者至40000人,少者亦数千人、8000人、500人”^③。隋唐以后,丝纺织业在南、北方相并发展,中唐以后,南方超过了北方。^④

到了宋代,拥有丝织业的地区大为增加,产量激增。根据《宋会要辑稿·食货》统计,宋每年南北各地丝织品的收入数^⑤如下:

表 3-5 宋代某年绫的产量

单位:(匹)

地区	产量	地区	产量	地区	产量
河北东路	22321	成都府路	16793	淮南西路	4106
梓州路	20600	东京西路	5468	两浙路	1369
东京	1341	立州路	1289	江南东路	1004
京东东路	447	河东路	379		

表 3-6 宋代某年绢的产量

单位:(匹)

地区	产量	地区	产量	地区	产量
河南西路	428010	梓州路	381353	成都府路	337357
两浙路	1667285	河北东路	679470	河南东路	606334
河北西路	323889	荆湖北路	312923	利州路	190923
京西南路	137396	京西北路	113940	淮南东路	71051
淮南西路	60537	夔州路	28935	福建路	28901
荆湖南路	7903	东京	7578	秦凤路	3717
广南东路	594	广南西路	579		

① 彭泽益:《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② 《汉书》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第四二。
③ 余也非:《中国古代经济史》,第339页。
④ 同上书,第441页。
⑤ 〔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2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43—244页。

以上是宋各路绫绢征收数,不是各路绫绢的实际产量。

宋代将布帛细分为“罗、綾、絹、紗、紵、紬、杂折、丝线、绵、布葛”十类,除布葛以外,其余九项均为丝织成品。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纺织业已经达到了很细的分工。

在很长的时期内,中国手工业的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北方的手工业一直占有绝对的优势,经历东汉末年以来的一系列战乱,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对南方的不断开发,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中唐以后,纺织业和金属手工业在南方的发展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北方地区。

北方地区的相对落后,核心区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的南移,就为亚欧大陆腹地南下的游牧民族融入核心区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二、13 世纪以前的边缘区——西亚中东地区的生产结构

从 7 世纪至 11 世纪,穆斯林军人征服了整个中东地区,并且沿着地中海,征服了北非,统一了从比利牛斯山脉到信德、从摩洛哥到中亚的所有地区,到了 11 世纪,这一地区在文化上已经伊斯兰化,语言上已经阿拉伯化。^①但是,早在 7 世纪以前,阿拉伯半岛仍然是游牧民族的天地,仅有小部分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尼罗河—红海—波斯湾航线受阻,世界的主要贸易路线改由叙利亚经阿拉伯半岛西部直至也门,麦加成为了印度、非洲、欧洲以及阿拉伯半岛之间贸易的交通枢纽。

在阿拉伯帝国兴起以前,阿拉伯半岛仍然是一个游牧蛮族生活的穷乡僻壤,除了南部的一些地方以外,其余地区都处于游牧和部落状态。6 世纪后半叶,由埃及的混乱与拜占庭和波斯的战争导致传统商路改变,麦加因此变得非常重要而获利匪浅。^②在阿拉伯世界,马固然是最珍贵的家畜,但是骆驼却是最为有用的动物,游牧人的营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第 351 页。

② 传统的尼罗河—红海—波斯湾航线被阻断以后,商人们改从叙利亚—阿拉伯半岛西部—也门—印度洋路线进行贸易往来,麦加处于这一路线的中段。详见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85。

养、运输、贸易无不依赖骆驼，驼乳可以解渴，驼肉可以充饥，驼皮可以做衣服，驼毛可以织帐篷，驼粪可以做燃料，驼尿可以做生发油，也可以入药。对于那些居住在沙漠里的阿拉伯人而言，沙漠不仅是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而且是防范外界侵略的第一道防线，沙漠缺水，气候炎热，没有固定的路线，以及食物的匮乏，都是在战争期间入侵的敌人所不能克服的障碍。^①

7世纪，阿拉伯半岛处于多神崇拜、部落战争和政治分裂的状态，犹太教和基督教开始从北面传入阿拉伯半岛，这使得一些阿拉伯人试图统一阿拉伯半岛，创立本土神教，穆罕默德成功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愿望，创立了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以麦地那为基地，组织对麦加商队的袭击，这种袭击是阿拉伯游牧民族较为普遍的经济活动，一旦阿拉伯人开始侵略，便充分利用他们在沙漠作战的经验，骑着骆驼，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发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国家。

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建立，阿拉伯帝国的首都从大马士革迁往巴格达，这标志着帝国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新哈里发的权力建立在享有薪俸的官僚和军队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各个部落的支持上。在一个世纪之内，巴格达拥有了一百多万人口，成为了一个世界商业中心，两河流域出产小麦、大麦、稻米、椰枣和橄榄等，阿拔斯王朝还通过排干沼泽地和发展灌溉工程来扩大耕地面积，以增加农业生产，各省出产丰富的金属资源，工业也很繁荣，纺织业尤其发达，许多地方生产亚麻布、棉花和丝绸，既用于地方消费，也用于出口，地毯制造业更是随处可见，繁荣的经济和辽阔的疆域，激发了地区间的广泛贸易，穆斯林商人从陆路经过中亚，或者从水路与东方的印度、中国往来贸易。^②

虽然在7世纪时，中亚地区就已经遭到突厥人的入侵，但是突厥人并没有大量地来这里定居，而是主要在锡尔河一带的草原地区从事游牧经济，但是总的看来，包括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在内的中亚和中东地区是广阔的，这里民族众多，人种复杂，经济上是多样化的，这

①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页。

②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360—362页。

里既有绿洲农耕地区,也有草原游牧区,独特的手工业很发达,商业贸易和城市经济生活更是这一地区的一个显著特征。^①

这时的农业区主要是在绿洲之上,绿洲上又以城镇为中心,当地的小邦君、贵族、商人和地主都住在城市里,他们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垄断水利,操纵贸易,役使农民。^② 其重要的商业中心有沛肯城、撒马尔罕、哈瓦维斯,这些巨大的商业中心,汇集着世界各地的商人和商品,当地人很少从事农耕,专事买卖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从怛逻斯至里海的广大中亚地区,缺少雨水,皆以雪水种田,出产的作物有大麦、小麦、稻禾、豌豆、毕豆等农业作物。中亚各地的手工业分为几大类:

纺织 棉布:呼罗珊、你沙不儿、赫沙特、谋夫、花刺子模等

丝织物:你沙不儿、谋夫

毛纺织:布哈拉、石汗那

制毡:花刺子模、白水胡城、塔里寒

制革:安巴尔

造纸:撒马尔罕

酿酒:悉没言、塔里寒、苏对沙那

作醋:谋夫

葡萄干和葡萄浆:赫拉特

制马具:胡实健

制弓箭:塔仕干

中亚商人们的主要贸易对象是中国内地,贩运的货物主要是丝绸。^③

在阿拔斯王朝初期,农业受到很大的鼓励,农业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农民主要是伊拉克的土著,伊拉克重要的作物包括小麦、大麦、稻子、椰枣、芝麻、棉花和亚麻等,还出产大量的水果和蔬菜,呼罗珊地区农业的富裕程度也并不亚于伊拉克和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里

① 王治来:《中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67—268页。

② 同上书,第268页。

③ 同上书,第272页。

存在着现实的四大乐园，它们分别是位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之间的粟特河谷、法里斯的旺山峡、从巴士拉东南延伸的伍不莱运河区的田园、大马士革的果木园，这四大乐园出产各种水果、蔬菜和香花，有椰枣、苹果、杏、桃、李、柠檬、柑子、橙子、桔子、无花果、葡萄、油橄榄、扁桃杏、石榴、茄子、萝卜、黄瓜、蔷薇、罗勒等，其园艺并不限于果木和蔬菜，鲜花的栽培也受到了鼓励，用于商业目的的养花业给当地带来了大量的赋税。^①

农民阶级构成了帝国人口的大多数，并且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阿拉伯人认为，从事耕作是有损尊严的事情，从事农业的主要是本地的土著，还包括祆教徒、摩尼教徒、哈兰的萨比教徒，这些顺民（根据条约而获得信仰自由的人）在农村和自己的家园里，保持着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从事农业生产。改奉伊斯兰教的人，许多都迁移到城市里去了。

在城市里，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往往会在财政、书写和专业工作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往往引起穆斯林居民的不满，引发一些歧视性的约束，但是尽管如此，基督教徒还是获得了很大的自由。

但是随着阿拉伯帝国疆域不断扩大，在一些不完全的征服之中，埋下了地方分权和群雄割据的种子，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之间、阿拉伯穆斯林和新穆斯林之间、穆斯林和顺民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伊斯兰教内部的离心力很大。希提认为阿拉伯社会和道德力量的瓦解，以及横征暴敛专为统治阶级谋私利的地方政府都极大地削弱了农业和工业，统治者日益富裕而下层民众日益贫穷，连年征战耗尽了人力，许多耕地变成了荒地，如此种种，造成了国民经济衰退，自然造成文化衰退和创造性思想的窒息，导致了阿拉伯帝国在面对蒙古军队时的不堪一击。^②

同罗马帝国一样，阿拉伯帝国很快陷入混乱之中，庞大的帝国开支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帝国的衰弱导致了蛮族的进攻，到了13世纪

①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第411—412页。

② 同上书，第580—581页。

前期,整个阿拉伯世界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之中。^①

这一时期中东地区的生产内容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

三、13 世纪以前欧洲的经济与人口状况

与中国汉朝同一时期,罗马人在地中海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罗马人统一的原因在于两点:其一,意大利半岛的地势较为平坦,从南到北没有被大山横亘阻隔,没有被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区域,因此更容易统一和保持统一,尤其是从罗马通到布朗迪西恩的阿庇乌大道将整个意大利连接在一起;其二,罗马准许半岛约四分之一的居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其余的人享有拉丁公民权,即一种大而不充分的特权,这一政策使得罗马的意大利诸同盟保持着对罗马的忠诚。罗马获胜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拥有优势的兵力,发明了高明的战略^②,使得社会能够得以分层,从而统治整个社会较为便利。

罗马帝国是一个巨大的、有着固定的天然界限的地区,独自形成一个繁荣的、实际上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③,使得罗马帝国得以维持繁荣的局面的因素很多,包括有效的行政管理、稳定的币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及帝国内外的广泛贸易。

罗马帝国境内地理条件迥异,所出产的产品各不相同,埃及出产小麦、纸莎草纸和玻璃织品,叙利亚出产亚麻布、毛织品和各种水果,小亚细亚出产羊毛、木材和小地毯,意大利出产酒、油和各种制造品,高卢出产谷物、肉类和羊毛,西班牙和不列颠出产各种矿物,这些不同的产品通过国内的贸易来完成交换。

罗马广大的公路系统在罗马帝国的商业发展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可是海路的重要性也不次于陆路,地中海是罗马扩展中不应忽视的地理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大运河起到了和地中海之于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第 368—371 页。

② 同上书,第 228—229 页。

③ 在这一时期,从福斯湾到克莱德湾的防御工事是罗马帝国最北的防线,莱茵河、多瑙河、撒哈拉沙漠构成了罗马帝国天然的防线。详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第 236 页。

欧洲的作用,这一点在第四章再作论述),正是这个风平浪静的海面把南欧、非洲和亚洲联系起来。

“帝国时代的意大利已是一个大世袭领和大地主领地的国家;大业主拥有这些土地,使用着一大群一大群奴隶来耕种,……这些大领主们几乎都经营种植橄榄和葡萄并畜牧牛羊”^①,在罗马帝国的内部形成有机的分工,各个地区因地制宜地生产本地区的特产,除了发达的海运以外,公路网络也十分发达,尤其是北非。罗马的公路网络状地分布在全境,这就使得境内的农业和商业都达到了顶峰。欧洲古代世界是围绕着地中海这个伟大的内湖诞生的,欧洲人凭借着地中海相互沟通并且传播着自己的思想和商业,在日耳曼人入侵以后,这种局面仍然维持着,对于定居在意大利、非洲、西班牙和高卢的蛮族而言,地中海仍然是他们和拜占庭帝国往来的交通要道,欧洲的这种经济生活一直持续到7世纪,伊斯兰教徒的突然出现,影响了以后全部的历史进程。从8世纪初起,在地中海周边地区,欧洲商业日趋困顿,整个经济活动转向了巴格达,从9世纪至11世纪,西方实际上处于被封锁的状态之中,地中海西部的航运完全停顿了,商人作为一个阶层消失了,进而造成了基于商业所维系的城市生活的衰落,罗马帝国的城市呈现普遍的贫困状况,金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银币,这标志着这一地区与古代经济或者地中海经济断绝了关系。此时的欧洲已经退回到一种纯粹的农业状态,土地是生活的唯一来源,是构成财富的唯一条件,整个社会生活建立在地产或者对土地的占有上,国家的军事制度和政治制度也建立在土地所有的基础上。大地产制度成为这一时期的基本经济特征,9世纪以后西欧在本质上是农业社会,交易与商品流通已经降到了最低限度。^②

欧洲中世纪的经济生活主要是关于自然经济和土地占有,以及有关土地上农民所负担的义务问题,庄园制在中世纪流行一时,它是一种政府形式,也成为了一种社会结构和一种经济制度,普通百姓的

①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

② [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生活完全是乡村化的农业生活,这种状况直到 11 世纪仍然没有改变。^①

下面是一处具有代表性的中世纪庄园的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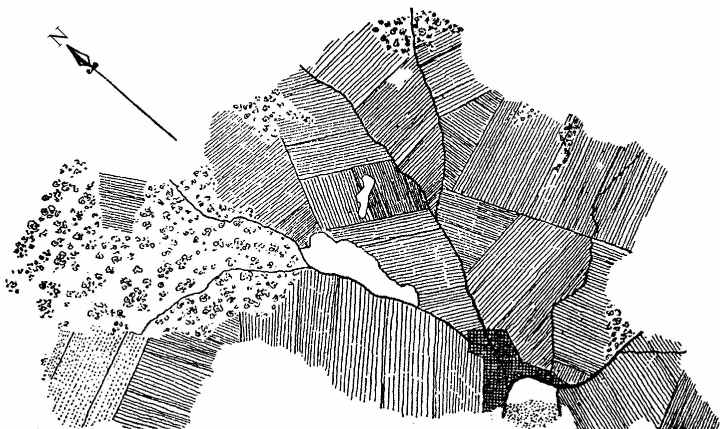


图 3-1 欧洲中世纪一所庄园的平面图

上图是包括 35 户人家的中世纪村庄的一幅平面图。村庄的耕地面积共计 837 英亩。草地和森林地(在图的左方)是共同使用的。有的户主占有至 52 块分散的土地。村庄位于图下面的深黑部分。

资料来源：〔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67 页。

这里除了领主的自留地以外，所有的可耕地分为三块：春耕田、秋耕田和休耕田，即三田制度。

庄园制度从 6 世纪开始慢慢形成，到 10 世纪初的时候在中欧和西欧已经非常普遍，当外族进攻和法兰克帝国瓦解而需要地方势力壮大以自保的时候，拥有围墙的庄园和城堡以及聚集在周围的村庄成为这一时代的典型特征。^② 由于人口过分依赖于食物，所以人口的增长率取决于更多的土地投入和农业技术的突破。但是，到 1300

①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第 358—359 页。

② 同上书，第 373 页。

年,欧洲仍然做不到这一点,所有的土地承载能力达到了极限,食品价格上升,人们的营养状况恶化,人口死亡率大为增加,人口呈现下降趋势,直到15世纪才恢复过来。17世纪以后,由于科技的进步、新航路的发现使得人口增长发生了质变。^①

四、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经济

与世界体系中的其他区域一样,1200年以前的亚欧大陆腹地以对食品和服装的获得为特征,由于这里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构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一) 亚欧大陆腹地的早期经济状况

亚欧大陆腹地是游牧民族冲击亚洲东部、南部和欧洲的出发地,这里远离海洋,外部力量很难攻入,又很容易进攻周围地区,同中国、中东、印度、欧洲都有着密切联系。在农业区域和游牧区域的交界地带,是亚欧大陆东西方经济文化和交通的必由之路,连接中国和西亚、欧洲的“丝绸之路”正是从这里经过的。

和世界许多地区一样,生活在亚欧大陆腹地的原始人类也长期处于旧石器时代,以狩猎、捕鱼和采集为生,食物来源常常不稳定。新石器农业革命时代,这里部分地区也曾经有过简单的锄耕农业,但牲畜饲养业是主要内容。受自然条件的制约,锄耕农业最终被放弃,畜牧业发展起来,尤其是辽阔的草原提供了充足的饲料,畜牧经济脱离农业,游牧部落逐步形成。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最重要的是马的家养成功,这给游牧民族的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动力,迁徙速度和节奏的极大提高使得游牧经济能够寻找到最良好的草场。除了同农耕民族正常的经济交流和物品交换之外,凭借着马匹所带来的机动性,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向农耕世界发起了一次比一次强烈的冲击。游牧民族的力量优势主要体现在马上,马奔跑的速度远远快于牛类,饲牛的农耕民族在其中处于相对劣势。

^① [英]科林·麦克伊韦迪、理查德·琼斯：《世界人口历史图集》，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4页。

到公元前 1、2 世纪，分布在亚欧大陆腹地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仍旧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流动生活。由于这一地区幅员辽阔，游牧民族各自都有牧场，虽然偶尔因争夺牧场发生一些冲突，但是基本上互不相扰，大都相安无大事。^①

（二）匈奴时代亚欧大陆腹地的经济状况

早在战国时期，匈奴各部就已经在秦、赵、燕以北地区游牧。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了匈奴各部，据有大漠南北，盛极一时；东汉以后，其势衰落，被迫西迁，其余部分在十六国时期进入中原和河西活动，先后建立若干民族政权。匈奴统治亚欧大陆腹地的数百年间，其畜牧业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匈奴的本部从地理上看，自己形成一个单位，是高原之中的一个大盆地，周围有山岭作为屏障，东有兴安岭，东北有肯特山，南边有阴山、贺兰山，西边是阿尔泰山，西北是唐努山，唐努山略取东北走向，然后折向西南，延长为杭爱山脉，杭爱山脉隆起在蒙古高原的西北部。^② 从整个蒙古高原的地理环境来看，荒漠所占的地方最大，草原面积因雨雪的多少而决定时大时小，植物中生长得面积最大的是草类，有些地方虽然可以耕种，但是地域很小，能种植的作物主要是大麦和燕麦。^③

匈奴“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駝、驴、骡、騊駼、騊駼。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儿能骑马，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④；“匈奴俗，岁有三龙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⑤。这说

① 刘景华：《论古代中北亚游牧民族的移动及其影响》，载《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5 卷第 1 期。

② 陈序经：《匈奴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6 页。关于匈奴疆域的具体论述详见《史记·匈奴列传》、《史记·蒙恬列传》、《汉书·匈奴传》、《汉书·李广苏建传》。

③ 陈序经：《匈奴史稿》，第 64—65 页。

④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五十。

⑤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第七九。

明,匈奴当时是一个狩猎与畜牧的民族,而且以血缘为核心纽带来组织社会结构。

匈奴单于自头曼、冒顿以后,对狩猎非常重视,其狩猎不只以射鸟兽为食或娱乐,而且以之作为一种军事训练、一种严格纪律的手段,匈奴人从小就练习射猎,在羊背上射,在马背上射,这样长期训练的结果是严格遵守纪律、严格执行命令,这是冒顿之所以能够东败东胡,西击月氏而建立一个大帝国的原因。^①在汉章帝时期(公元45年)时,匈奴人仍然没有放弃射猎的生活,“其岁,单于遣兵千余人猎至涿邪山,卒与北虏温禺犊王遇,因战,获其首级而还”^②。

在社会发展的初期,人们主要是靠打猎为生,经过一个时期,人们懂得养畜之后,畜牧逐渐变为主业,射猎成为副业,匈奴在头曼和冒顿单于时代,已经进入畜牧为主、射猎为副的时代,所以匈奴后期已经过渡到了游牧时代。^③

匈奴此时的主要经济状况表现为:“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④;“随美草甘水而驱牧,……衣皮蒙毛,……食肉饮血”^⑤;“因水草为仓廩”^⑥。另有史料记载:“(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春,(耿)秉出張掖居延塞,击匈奴林王到沐楼山,渡漠六百里余,绝无水草,得生口辞云:匈奴林王转北逐水草,秉欲将轻骑追之,都尉秦彭止之而还。”^⑦这些都说明了匈奴逐水草而居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匈奴主要依靠的畜类是马、牛、羊,在这三者之中,马为最重要的,马肉、乳可以做食品,马乳可以做乳酪。^⑧

① 陈序经:《匈奴史稿》,第68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第七九。

③ 陈序经:《匈奴史稿》,第69页。

④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列传》第六四下。

⑤ 《盐铁论·备胡》。

⑥ 《盐铁论·论功》。

⑦ 袁宏:《后汉记·明帝纪》。

⑧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人“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解裘”。《盐铁论·备胡篇》载,匈奴人“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他们不但食畜肉,还把畜乳制成乳浆和干酪,称之为“匣酪”和“烦鼓”。

匈奴人的饮食、衣着及其他日用品多来自牲畜。匈奴人的食品中,牛羊肉、乳尤为普遍,“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①。匈奴人用畜皮制作衣服,他们很早就制作裤子、长靴、长袍、尖帽和风帽,这种服饰,无论在行动或者保暖方面,都很适应马背上的生活。^②匈奴人还懂得以皮革造锺甲,称为“革笛”,用马皮做成的皮筏,称为“马革船”,可作为渡河工具。匈奴人的住所叫做“穹庐”,是毡帐所制作的幕,故又叫帐幕,用木条作柱梁,穹庐一般不是很大,所用木材不多,较为轻便,易搬迁,包括父母在内的一家四五口人,睡在里面很挤。^③

虽然有许多史书言匈奴人不事耕种^④,但是有大量的历史记载,说明匈奴有过耕作之事,不但在本部有^⑤,在西域还有骑田^⑥,类似汉族地区的屯田。匈奴人耕田产谷,还建有谷仓藏谷^⑦,近年来发掘的匈奴墓中有铁制的铧和镰刀,有石臼,说明匈奴确有农业生产活动。^⑧

匈奴人也有一些自己的手工业,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和战争用品。匈奴较为发达的是兽毛皮革制品,衣服、马褂、长靴、尖帽、风帽等穿着用品,穹庐的墙壁、地毯、毛毡,这些物品除了自用以外,还用于贸易和馈赠;其次是木制品,穹庐用的柱梁、马鞍和车,其日常食畜

①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五十。

② 陈序经:《匈奴史稿》,第71页。

③ 同上。

④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毋耕田之业”。

⑤ 《淮南子·原道训》:“雁门之北狄不谷食。”《盐铁论·备胡》:“外无田畴之积。”《盐铁论·论功》:“马不粟食。”《汉书·李广利列传》:“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欲嫁不熟。”

⑥ 《汉书·西域传·乌孙》:“匈奴发骑田车师。”

⑦ 《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记载,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击匈奴至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汉书·匈奴传》记载,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卫律卫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陈序经认为这些粟谷不一定是匈奴自己生产的,可能是汉朝所给予的,或者是匈奴自己劫掠而来的,但是可以证明匈奴人既然已经开始种谷、藏谷,就可能已经开始食谷了,而不是仅仅食肉,详见陈序经:《匈奴史稿》,第72页。

⑧ 同上。

肉,杀了牛羊以后,其骨用于作器皿或者工具^①,虽然出土的匈奴墓文物有一些陶器,但是其应用范围并不是很广泛。

匈奴将骑术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对游牧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使远距离大规模的放牧生产成为可能,它把人的能动性与马的高速灵活性结合起来产生了强大的机动能力。匈奴的畜牧业经济也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一旦出现黑(旱)白(雪)灾害,牲畜就会大量死亡,甚至危及整个民族的生存。因此,这种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经济,致使这个民族的经济不稳定,决定其政治和军事的不稳定性。另外,游牧的流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畜牧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与改进。匈奴人在大漠南北较艰苦的条件下,为更广泛地取得生活资料的补充,一次又一次恢复发展其畜牧经济的同时,有时也常把放牧和狩猎结合在一起。

(三) 1—6 世纪亚欧大陆腹地的经济状况

除了匈奴以外,活跃在这一地区的较为强大的游牧民族还有大月氏和恢哒等。大月氏出自于游牧民族,但是经常通过战争劫掠获得奴隶,这些奴隶被广泛地应用到农业生产和水利灌溉上,花刺子模、索格底亚那、帖尔美兹、费尔干纳等地的人工灌溉工程,如地下水渠、灌溉运河等,在规模和数量上较以前有很大的发展。

大月氏处在东西商路上,因之获得了巨大的贸易利益,地中海东岸各地来往的商人多会于此,大月氏充当着东西贸易的中介,其贩运商品也是丰富多样的^②,为了适应商业贸易的需要,大月氏还发行了自己的钱币。^③

3 世纪以后,大月氏便开始衰落,其城市经济开始衰落,自然经济逐步加强——出现了一个个的庄园,庄园的周围又筑起了城墙,形成了城堡,首领住在城堡里,周围是田地、果园,城堡外还有市场,广大的人工灌溉网掌握在庄园主手中,居民基本上从事农业。农民种植的作物有稻、小麦、黍、大麦、豆类、苜蓿、葡萄,还可能有棉花,但是

① 陈序经：《匈奴史稿》，第74页。

②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七八。

③ 王治来：《中亚史》，第119页。

畜牧业仍然占很大的比例, 匈奴人本身就仍然保持很大比例的畜牧业, 但他们已经定居并开始从事农业, 丝路的商业利益一直占据其收入的很大比重。^①

自公元4世纪初起, 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游牧民族, 陆续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众多的农耕化小政权。中国原有的汉族政权西晋则被迫南迁, 史称“东晋”。这些游牧民族建立的农耕化小政权存在了长达3个世纪之久, 最后完全融入了中国的农业区域。

(四) 突厥的游牧经济

突厥源于亚欧大陆腹地的核心地带, 本为匈奴的旁支, 最初游牧于叶塞尼河上游至阿尔泰山一带。匈奴国亡后, 突厥因与邻近部落争夺牧场失败, 南移到了博格多山一带。5世纪中叶, 柔然部落崛起于蒙古高原, 突厥迁移到了阿尔泰山的南麓。6世纪中叶, 突厥建国, 开始大举扩张, 最终成了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 “其地, 东自辽海(辽河)以西, 西至西海(咸海)万里, 南自沙漠以北, 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②。突厥占据的中亚, 正处在东西丝绸之路的要冲, 突厥因之从事中国与拜占庭国的丝绸居间交易。

6世纪晚期, 突厥分化为东西两支。以阿尔泰山为界, 东突厥统治着蒙古大草原, 西突厥则占据着里海以东的广大中亚地区。至11世纪左右, 突厥人活动的场所包括北亚的蒙古草原、中亚草原、欧洲的南俄罗斯草原, 这些地方的突厥部落仍然主要以游牧为主, 活动在中亚南部、西亚、南亚以及小亚细亚半岛的突厥人, 则大多农耕化了。^③

突厥人主要从事畜牧业, 随水草迁徙, 过着游牧生活, 以毡帐为居室, 食肉饮酪, 身披裘褐, 披发左衽, 善于骑射。^④ 突厥的畜牧业很发达, 但是其游牧经济不太稳定, 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小。

① 王治来：《中亚史》，第143—145页。

② (唐)李延寿：《北史》卷九九，列传第八七，《突厥铁勒》。

③ 刘景华：《论古代中北亚游牧民族的移动及其影响》，载《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5卷第1期。

④ 林幹：《突厥社会制度初探》，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突厥的狩猎业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突厥文《噉欲谷碑》^①载:“吾人时方居总材谷(即阴山山谷)及黑沙(城)。吾人居彼,以大兽、野兔自给,民众口食无缺。……此(当时)吾人之境况也。”

手工业在突厥社会中也有悠久的传统,早在兴起之前,突厥人就已经学会了锻冶技术,冶铁手工业很早就在突厥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②突厥人还能够制造车辆,木器制造业也是其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他们还掌握了制造鱼胶的技术。^③

在突厥后期,“从前突厥牧民的生产是游牧,现在则除了畜牧之外又兼事农业生产”^④,突厥经济已经开始农耕化了。

13 世纪以前,单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将,整个亚欧大陆存在着农业和游牧两种最为显著的生产形式,这两种生产方式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获得足够的生产资料——食品和服装。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定居和游牧。

第二节 世界货币:1200 年以前亚欧大陆 腹地对丝绸贸易垄断权的争夺

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出发,中国作为 19 世纪以前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缘区和半边缘区呈地缘上不连续的分布状态,这 and 现代世界体系纯粹的理论模型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当时的世界体系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欧洲和西亚处于半边缘区,亚欧大陆腹地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区,贸易将主要在核心区和半边缘区之间进行。由于半边缘区和核心区之间地理上的空间距离过于巨大,则国际贸易路线就成为这种世界体系能否得以维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世界体系的维持还取决于地缘优势的相互制约以及世界的安全结构。

①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857 页。

② 林幹:《突厥社会制度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1 年第 3 期。

③ 同上。

④ 马长寿:《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历史研究》1958 年第 4 期。

13 世纪以前,由于核心区和半边缘区的脱离,在世界体系内部形成了两条非常重要的巨大国际贸易路线——一条是丝绸之路,另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正是这两条交通路线将世界体系的核心区与半边缘区联系起来。

一、13 世纪以前国际贸易路线的形成

据历史考证,早在汉代以前,以丝绸为贸易对象的国际贸易交通路线——丝绸之路就已经开始出现了。^①

(一) 丝绸之路的初步形成

公元前 6—4 世纪,西亚的波斯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其疆域西至地中海东岸,东至印度河流域,北起锡尔河,南到阿姆河。波斯帝国内部的驿道遍布,发达的交通连接了中亚、西亚和南亚,沟通了亚欧两大洲之间的往来。其后,马其顿帝国的崛起,庞大的帝国东部边缘已经到了帕米尔高原,至此帕米尔高原以西直至地中海地区的交通全部贯通。虽然这个帝国很快就崩溃了,但是古典时代的世界交通呈现出了一个新的面貌。

与此同时,东亚的中国在公元前 3 世纪完成了统一,建立了强大的秦帝国。秦帝国统一了度量衡,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网络,秦代还统一了全国车轴的长度,这使得整个中国的交通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的统治能力和控制半径空前扩大,帝国规模也空前地扩大,中国第一次开始作为一个整体对外接触,其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秦帝国开始了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他们击退了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修建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由于秦帝国是一个短命的朝代,统一后的中国很快陷入内战的泥沼,直到汉帝国建立以后,整个国家才重新统一起来。

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里,东西方世界各自出现了一个大帝

^①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考古学家在阿尔泰地区发现了公元前 5 世纪的贵族坟墓,里面保存了中国的丝织品;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拉沟东口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丝织品;另外波斯的《贝希斯敦铭文》、印度古籍《考铁利亚》和《摩奴法典》都有关于中国丝绸的记载;德国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村的考古发现以及古希腊的雕刻和彩绘人物所穿衣服都被肯定为是中国的丝绸。

国——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但是这两个帝国从来没有正式地接触过。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并和西域乌孙国结盟,共同抗击匈奴,汉帝国因此取得抗击匈奴的胜利,随着匈奴的衰弱,“丝绸之路得以畅通,这大大促进了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①。

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起点为汉都长安,在中国境内分为南北两道:北道从长安出发,经咸阳、兴平、礼泉、乾县、彬县、长武、泾川至平凉,再经固原、海原、靖远、景泰、古浪至武威;南道从长安出发,经咸阳、兴平、武功、郿县、宝鸡、千阳、陇县、陇城、秦安、通渭、陇西、渭源、临洮、临夏,至青海的民和、乐都、西宁,再往北过大通河,越祁连山扁都口,经民乐至张掖,在此与北道汇合。中段即为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敦煌,途经武威、永昌、山丹、张掖、临泽、高台、盐池、临水、酒泉、嘉峪关、玉门、布隆吉、安西和敦煌。西段又分为南北两道:“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②。

中国境外的丝绸之路也分东、中、西三段。东段也分南北两道:南道有两条路线,一条从皮山西南行至叶尔羌河上游到克什米尔,另一条是从莎车经塔什库尔干,沿帕米尔河过阿富汗至土库曼斯坦,南道商路可以抵达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北道有两条路线,一条从孤墨到天山,过伊塞克湖,绕葱岭北道哈萨克斯坦境内,一条从疏勒西行到大宛、康居、奄蔡。中段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脉和卡维尔沙漠之间,这条路较为直而便捷。过安息,余下向西的称之为中国境外丝绸之路西段,这条商路共有三条路线:一条以塞琉西亚为起点,沿着幼发拉底河左岸,或经幼发拉底河附近阿拉伯游牧部落的沙漠地带西北行,度过贝利赫河至叙利亚,再西北行渡过幼发拉底河,西行抵达土耳其,之后中国的丝织品从这里辗转贩运欧洲各国;一条从底格里

① 夏秀瑞、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②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第六六上。

斯河的塞琉西亚出发,渡过幼发拉底河西北行,西北行至叙利亚,再至土耳其,或西南行至大马士革,再转向地中海东海岸;一条从太西丰出发,沿底格里斯河左岸北上,经伊拉克,西北行,至土耳其。

另外还有一条经天山北路和东南俄草原的丝绸之路,汉代时受匈奴侵扰而断绝^①,后来在三国时期车师内属魏国,此路重新开通,称之为北新道。^②罗马帝国为了摆脱安息人和撒珊人对于丝路贸易的控制,发展在印度洋上的海路的同时,力图开辟这条新路。

汉帝国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中国第一次将西域纳入自己的版图。公元前60年,汉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在西域都护府的维持下,与丝路沿线国家建立了经常性的政治经济往来。

“尽管有了丝绸之路,但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罗马商人未能经由陆路直接去中国,中国人也未能取道陆路直接到罗马。”^③但是,尽管如此,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却由此发展起来。

位于中东、中亚地区的各个国家并不情愿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直接发生贸易往来,从帕提亚人到阿比西尼亚人都试图直接控制整个东西方的贸易,从而居间获利。为此,罗马人积极开展对于印度洋的贸易,更多的商队转而从事海上贸易而不是陆路贸易。与此同时,中国的航海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公元前112年,汉帝国出兵南越(包括今中国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越南北部地区),并在当地设立郡县,中国南方的沿海航线开始畅通。为了进一步扩大汉王朝的对外影响,汉武帝时期,中国开辟了印度洋航线^④,这条线路从中国的雷州半岛出发,经南海进入泰国湾,穿过马来半岛抵达孟加拉湾和印度半岛。这样,虽然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出自不同的目的,却是第一次将东西方的海上航线连接起来,由于海上航线的主要贸易品仍然是中

①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第六六下,载:“元始中(公元1—5年),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耳厄)。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挂置,心不便也。”

② (三国)鱼豢:《魏略·西戎传》。

③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184页。

④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国的丝绸,所以这条路线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到了公元2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和中国开始战乱频仍,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开始衰落,但是沿途的国家仍然试图维持这种贸易往来,3世纪时,阿比西尼亚人控制了红海,开始对海上交通征收重税,同时撒珊王朝也开始利用陆上贸易牟取暴利。

(二) 丝绸之路的繁荣

公元2世纪末至6世纪末,世界各主要文明古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动荡。在整个古典时期,中国、希腊、罗马、印度位于亚欧并居于统治地位,然而这时来自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族从世界体系的边缘向核心区发起了进攻,最终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进程。

此时的中国已经过渡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此时对于丝绸之路最大的威胁——匈奴——已经西迁,因而这一时期丝绸之路并没有中断。

魏晋六朝时期,各王朝为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做出了相应的努力。曹魏时期,针对地方豪强大族欺压商人的行为,政府曾经在河西地区实行过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一、实行‘国所’制度,即给过往的商人发通行证,对持有‘国所’的商人予以保护;二、实行平价收买商品,对于愿意将商品在当地出售的,政府可以出钱以平价购买;三、协助商人购买内地商品,商人如果购买中原地区的商品,政府可以协助。”^①北魏统一中国北方以后,丝绸之路更为畅通,在这一时期,陆上贸易路线较之两汉大大地向南北扩展了。

同一时期,位于中国南部的一些割据政权鉴于传统的陆上贸易受到北朝政权的阻隔,便积极拓展海上贸易,积极开展军事航海活动,遣使出使海外国家,组织大规模的官方贸易,积极招徕外商,并且不惜发动战争以维护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经过几个世纪的经营,中国的商船“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槟榔屿,4世纪到锡兰,5世纪到亚丁,终于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②。

经过数百年的战乱,中国终于在6世纪重新完成了统一,虽然隋

① 夏秀瑞、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43—44页。

②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

朝是短命的朝代,但是随之而来的唐帝国却把中国带到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时代。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法兰克国王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试图重新统一欧洲,经过二十年的苦战,地中海又变成了罗马湖,但是好景不长,阿瓦尔人、伦巴第人、穆斯林以及后来的马扎尔人相继侵入欧洲的心脏地区,整个欧洲被大胆的侵略者团团围住^①,尽管如此,东西方的贸易较之以往更加繁荣。

这一时期的主要贸易路线为^②:

陆路贸易路线:

(1) 北道——出玉门关,经哈密、巴里坤湖,折向西,经库车北山外特克斯河流域,渡伊犁河、楚河,经吉尔吉斯托克马克河,哈萨克东南部的江布尔城,沿锡尔河至咸海,由此西北行过恩巴河、乌拉尔河、伏尔加河至库班河口对岸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刻赤(东罗马帝国的重要港口),抵达黑海。

(2) 中道——从吐鲁番东哈拉和卓,经焉耆、库车,至喀什,过葱岭,经俄罗斯费尔干纳盆地和撒马尔罕以西一带,至乌兹别克境内布哈拉东北,穿过阿姆河后西南行,至俄罗斯马里,再西行横贯波斯全境,抵达波斯湾。

(3) 从古楼兰,经和田,至莎车南叶城县,过葱岭,经阿富汗的瓦罕,至阿富汗阿姆河南巴达克山地区,再南行经巴米安、加兹尼,至北印度,达阿拉伯海。

海上贸易路线:

从广州出发,经香港大屿山以北入海,过海南岛东北角及东南的独珠山,再过越南的占婆岛、燕子峡、归仁、牙庄、藩朗至昆仑岛,西南过新加坡海峡至苏门答腊岛,或者向东航至爪哇岛,或转向西北沿马六甲海峡,过海峡南部的布罗华尔群岛、苏门答腊岛北部东海岸棉兰、婆罗士岛一带,至尼科巴群岛,转向西航,至斯里兰卡,再沿阿拉伯海东海岸西北行,过印度的奎隆、印度西部一带、布洛奇,至卡拉奇,再西航至波斯湾的阿巴丹,幼发拉底河口的奥波拉,由此溯河至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316—321页。

② 夏秀瑞、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67—68、92—96页。

巴士拉 ,转陆行达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该航线从奥波拉出发 ,出波斯湾 ,至巴林岛 ,出霍尔木兹海峡 ,途径阿曼、也门 ,最后直达东非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这条航线将东亚、东南亚、南亚、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东南岸以及东非沿岸连接起来 ,成为 16 世纪以前人类定期使用的最长的航线。

二、13 世纪以前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

在 13 世纪以前 ,国际贸易的贸易额很大 ,但是商品的贸易流向及其性质是不同的。

(一) 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及其流向

汉帝国开通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以后 ,中国的商品开始源源不断地对外出口 ,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主要是丝绸之路的沿途国家。

汉帝国时期 ,由于丝绸之路主要途经中亚地区 ,中亚各国对于世界贸易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3 世纪以前 ,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 ,南方还没有完全开发 ,游牧民族主要进攻的也是中国的北方。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是 ,中国过去的贸易形式主要是贡使的集团采购 ,而中亚和欧洲则采取私人购买的形式 ,这样的话 ,就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套利行为。

表 3-7 中国与丝路诸国的贸易简况

	往来时间	地理位置	国家状况	与中国的贸易
康居	西汉武帝时期 ,约公元前 2 世纪前后	地处中亚腹地 ,大体分布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	人口约 60 余万 ,兵力 12 万 ,民众以游牧为主 ,其地盛产皮毛。	是中国丝绸重要的居间贸易者。
大宛	西汉武帝时期 ,约公元前 2 世纪前后	地处中亚费尔干纳盆地 ,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	居民 30 万 ,大小 70 余城 ,农业和畜牧业都比较发达 ,盛产稻、麦、葡萄酒和汗血马。	是中国丝绸西运的重要集散地之一。

续表

	往来时间	地理位置	国家状况	与中国的贸易
大月氏	西汉时期	地处今阿姆河流域一带。	民 40 万,拥兵 12 万,是一游牧大国。	居间贸易
大夏	公元前 2 世纪以前	地处印度、中国、安息三大国的中心,是中西交往的重要孔道。	民 100 多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公元前 2 世纪被大月氏征服。	居间贸易
贵霜帝国	公元前 1 世纪	统治范围包括今阿姆河及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地跨中亚及印度西北部。	公元 1 世纪初,大月氏贵霜翥候丘就统一了月氏各部,建立了贵霜王朝,先后占领了康居、罽宾、濮达、高附、安息东部及印度西北部。统治范围包括今阿姆河及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成为地跨中亚及印度西北部的强大帝国。	贵霜帝国是中国丝绸西运的第一站,月氏人利用地理优势,与中国开展贡使来往及民间通商,再将中国商品转运于西方,由此赚取高额利润,贸易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国北方生产的生丝、丝线和丝绸。
安息	建于公元前 248 年	位于伊朗高原,又称帕提亚王国。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中国丝绸无论走东段的哪条路线,如果想要运往	公元前 2 世纪发动一系列对外征服战争,版图北达里海,南抵波斯湾,东接大夏、印度,西至两河流域。	安息得以垄断东西方的贸易,因为高额利润的原因,安息始终竭力阻止罗马与中国发生直接贸易,积极转运东西方的产品,中国的丝

续表				
	往来时间	地理位置	国家状况	与中国的贸易
		罗马,都要汇集到安息。		绸、铁器流向西亚和罗马,西方的珠宝、玻璃、香药、象牙、犀角及各种奇禽异兽经由安息运往中国。
身毒(印度)	西汉时期	古代印度在陆海丝路上均处于重要的地位,凭借其地理位置的优势,逐渐成为中国与罗马海上贸易的中间站。		罗马人为获取更多的丝绸,绕开陆上的安息人,从海路到印度采购中国的丝绸,同时罗马等西方国家的货物也由此运往中国。
大秦(罗马帝国)	汉代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相距甚远,海陆均有若干国家阻隔,陆上最主要的居间国是安息,海路为阿拉伯人所阻。公元1世纪中叶以后,罗马人掌握了印度洋上的季风秘密以后,逐渐获得了印度洋上	由于中国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罗马,使得地中海一带的罗马城市成了丝织业的中心,中国的丝绸在这里被拆解后重新染色,织成罗马人喜欢的绫绮。	中国丝绸是罗马人孜孜以求的货物,罗马是当时中国丝绸最大的消费市场,罗马每年流入阿拉伯半岛、印度和中国的金币不下1亿塞斯特斯(约合10万盎司黄金) ^① ,罗马商人将金银、玻璃、海西布、火浣布、金缕罽以及东南亚的象

①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

续表

	往来时间	地理位置	国家状况	与中国的贸易
		的制海权 ,中国与罗马之间实行了直接通航 ,但是大量的货物往来还是在印度完成。		牙、犀角和香料运往中国。
大宛	魏晋南北朝			双方主要是朝贡贸易形式 ,大宛向中国进贡珊瑚、琉璃、白叠布等珍贵物品 ,大宛商人除了在中国购回大量的丝绸以外 ,还转口别国的货物。
粟特 (即汉代的奄蔡)	魏晋南北朝	居于咸海和里海之间		主要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 ,民间贸易也很频繁。
恢哒 (南朝称之为滑国 ,西方称之为白匈奴)	公元 5 世纪崛起。	阿姆河流域一带 ,公元 5 世纪中叶 ,几乎占据整个中亚 ,并击败了波斯撒珊王朝 ,迫使波斯进贡 ,成为中亚第一强国。		5 世纪后 ,控制了丝绸之路 ,垄断了丝路贸易 ,多次向中国南北朝朝贡。

续表				
	往来时间	地理位置	国家状况	与中国的贸易
波斯	公元 226 年以后	位居两河流域,控制波斯湾的出海口,印度西北以及里海以南的地区。		控制中国通往中亚、西亚和拜占庭的商队往来要道,又将近东、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上居间贸易也攫归自己掌握。 ^① 中国输出商品除了传统的丝绸、铁器外,纸张的出口逐渐增多。
大秦	公元 4 世纪前后		公元 4 世纪,古罗马帝国走向分裂,分为东罗马和西罗马。	这一时期罗马与中国的贸易陆海路并行,并且还开辟了经由缅甸的西南丝绸之路,贸易物资主要还是中国的丝绸和大秦的各种珍宝、火布琉璃等。
波斯	唐代	位于丝绸之路主干线中段,为中西陆路交通的要冲,是广州直航“通海夷道”的终点以及继航至东非的起点,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中泊港。	波斯撒珊王朝于 7 世纪中叶为阿拉伯所败,沦为阿拉伯的辖地,但是仍然保持和唐朝的贸易往来。	波斯运往中国的货物主要有:珍珠、无孔珍珠、琥珀、玛瑙床、香药、火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犀牛、大象。豹、狮子、活褥蛇等,中国运往波斯的货物主要是各色丝绢、锦袍、钿带等。

① [苏联]伊凡诺夫：《伊朗史纲》，三联书店 1973 年版。

续表

	往来时间	地理位置	国家状况	与中国的贸易
大食	唐代	8 世纪中叶至 9 世纪中叶 , 阿拉伯帝国达到鼎盛时期 , 东迄中亚细亚和印度西北境 , 北至西西里岛及意大利南端 , 西经非洲北部达到西班牙 , 是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国家。		大食与唐帝国的贸易往来是陆海并行的 , 但是以海路为主。从唐朝输往大食的货物主要有 : 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香料、麝香、肉桂等。运往中国的主要有 : 各色香料、珠宝、犀角、象牙、宝刀等。
北非、东非				唐代中国与非洲各国的贸易往来主要是阿拉伯商人居间 , 从中国输出丝绸、瓷器、铜铁器 , 同时将非洲的象牙、犀角、乳香和玳瑁等输往中国。

资料来源 : 夏秀瑞、孙玉琴 : 《中国对外贸易史》, 第 25—33、53—58、124—132 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 , 在宋以前 , 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是围绕着中国的丝绸展开的 , 因此 , 对丝绸之路的控制 , 抑或是与中国发展朝贡贸易就显得异常重要。

在这一时期 , 中国和其他地区商品制造技术的交流也很频繁。

表 3-8 中外商品及其制造技术的交流

	中国商品及其技术的外传	境外商品及其技术传入中国
汉代	<p>汉代中国经丝绸之路输出的商品有丝绸、漆器等生活用品,有铁器等生产工具,以及中国的植物品种,如肉桂、生姜、谷子、高粱等,纸张开始向外输出。</p> <p>中国的养蚕缫丝技术已经沿着丝绸之路开始外传,沿海路传入日本和朝鲜,冶铁技术和水利灌溉技术也开始传到域外。</p> <p>特别是中国的冶铁技术不但改进了世界各地的生产工具,还被中亚地区的许多国家重新锻造,制成锋利的武器。</p>	<p>首先是中亚诸国的皮毛大量输入中国,从罗马运来的毛纺织品种类繁多,质地精良,随着毛纺织品的输入,其生产制造技术也逐渐被我国新疆各族人民吸收。汉代从中亚、西亚进口的最大宗货物是马匹,武帝末期,仅中央直接掌管的军民就已经达到了四十多万匹,马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及交通运输的重要工具。同时,中亚、西亚的一些植物品种也传入了中国,主要有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豆、胡瓜、胡荽、胡蒜等。</p> <p>同时,还有一些珍奇异物,如大秦的珍珠、琥珀、珊瑚等,身毒的大象、犀牛、孔雀等,安息狮子、鸵鸟等。</p>
魏晋南北朝	<p>这一时期中国最大的输出商品仍然是丝绸,输出规模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前代,这时养蚕缫丝技术自汉代传入新疆以后,开始逐步向境外扩散。大约在4世纪时,养蚕缫丝技术经中亚传入了波斯,中国养蚕缫丝技术传入波斯后,波斯开始制造以丝为原料的织锦,不久即开始返销中国。大体与此同时,养蚕缫丝技术传入印度。</p> <p>养蚕缫丝技术传入西方大约在6世纪前后,自从东罗马掌握了蚕丝技术以后,拜占庭出现了庞大的皇家丝</p>	<p>这一时期埃及玻璃从海陆两路成批输入中国,其制造技术也随之逐渐传入,但是这一技术在中国相延未久,即告失传。</p>

续表

	中国商品及其技术的外传	境外商品及其技术传入中国
	织工场,开始大量生产丝绸,除了供本地销售以外,还运往欧洲各地。东罗马对蚕丝技术进行了垄断,直到12世纪才传入南意大利。	
隋唐时期	<p>中国丝织技术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开始输往东西方各国,它们在中国丝绸文化的基础上各自发展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丝织业,并且反馈流向唐帝国。公元8世纪,中国丝织技术传入阿拉伯世界,主要在公元751年怛逻斯战役之后,被俘的中国工匠使得西亚织造锦缎等高级丝织品的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其后,欧洲所需的丝织品有相当部分取自阿拉伯。</p> <p>唐代的瓷器出口也是在这一时期,但是中国的烧磁技术也随之外传。</p> <p>早在魏晋时期,中国纸张开始外传。7—8世纪时中国的纸张主要出口阿拉伯,8世纪后,怛逻斯战役后,造纸术传入撒马尔罕,阿拉伯办起了第一个造纸厂,从此撒马尔罕纸流传于阿拉伯亚洲。不久巴格达又建立第二家造纸厂,10世纪后,大马士革等地也建起了造纸厂,从此这里成为欧洲用纸的主要产地。</p> <p>10世纪以后,中国的印刷术随着造纸术传入了阿拉伯和埃及。</p>	这一时期香料和药材是中国主要的输入产品,同时有大批的农作物如波斯枣、扁桃等品种传入中国,大约在7世纪,印度的榨糖法被引进,以改进中国的制糖技术。

资料来源：夏秀瑞、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33—36、62—65、135—144页。

中国对外的技术交流主要以丝绸技术为核心。因而 ,中国在宋以前作为世界的制造中心 ,主要向世界各地提供服装产品 ,这也是古代世界贸易的核心内容 ,因为粮食是这一时期各个国家主要的生产内容。

(二) 欧洲出口商品的结构及其流向

表 3-9 罗马帝国的贸易结构

贸易方向	贸易的主要内容
国内贸易	埃及的小麦、纸莎草纸和玻璃织品 ,叙利亚的亚麻布、毛织品和各种水果 ,小亚细亚的羊毛、木材和小地毯 ,意大利的酒、油和各种制造品 ,高卢的谷物、肉类和羊毛 ,西班牙和不列颠的各种矿物。
国际贸易	波罗的海地区的琥珀、毛皮和奴隶 ,哈拉以南非洲的象牙、黄金和奴隶 ,亚洲的各种奢侈品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有香料、宝石、调味品和最受欢迎的丝绸。

资料来源：〔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第 236—237 页。

“中国的丝织品是各地最为需要的 ,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 90% ,剩下的 10% 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 ,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 ,如 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 ,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 ,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 ,其中黄金占首位。”^①

这种状况一直在持续 ,直到 8 世纪以后 ,东罗马帝国仍然和西突厥结成军事同盟 ,与波斯帝国争夺对丝绸的贸易垄断权。

表 3-10 欧洲中世纪的贸易结构

	欧洲中世纪的国际贸易结构(1200 年以前)
--	------------------------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第 183—184 页。

欧洲内部区际贸易	食品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贸易品 ,包括谷物、黑麦、鱼卷心菜、大蒜、洋葱、苹果、啤酒、香槟等 ,其他还有英格兰毛皮 ,低地国家和法兰西的兔毛 ,农民用的山羊皮和绵羊皮 ,俄罗斯的狐狸皮、熊皮、海狸皮、紫貂、白貂。
----------	--

续表	
	欧洲中世纪的国际贸易结构(1200 年以前)
与欧洲外部的国际贸易	黄油、乳酪、腌猪肉、胡椒、羊毛、亚麻、木材、布、生姜、香料、丝绸、织锦、挂毯、甜酒、香橙、葡萄干、无花果、柠檬。

资料来源：〔英〕：波斯坦、爱德华·米勒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 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42—315、398—514 页。

在欧洲中世纪，食品是欧洲贸易中最为主要的内容，“谷物仅是横穿大陆和北欧海上航运的基本食物中的一种。欧洲奶业和牛奶贸易的历史是经济史上一个被忽视的主题，但是黄油和乳酪作为国际贸易物品的主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更重要的是鱼，因为在中世纪鱼消费量很大，当时有许多海上渔场。在欧洲所有的河口和海滨，都可以看到大批的鱼在运进运出”^①。虽然这一时期，许多原材料也是重要的贸易内容，但是这些原材料主要是木材（主要用于建筑和烧炭）和纺织品。在欧洲中世纪的贸易中，食品等纯粹生活用品构成了这一时期贸易的主要内容。^②

（三）亚欧大陆腹地出口商品的结构及其流向

亚欧大陆腹地基本上属于干旱草原，在这种自然条件下畜牧业显然是最好的生产适应方式，匈奴、突厥、回纥、契丹，一直到蒙古人都是以畜牧业为主的。畜牧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农耕地区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但是这些民族也曾积极参与了各国的贸易往来。那么，发生在这两者之间的贸易的动力来自哪里呢？这需要考察以往的贸易结构和商品的流向。

1. 匈奴与农业区的贸易往来

边境贸易对于匈奴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很早以前，这种贸易往来就已经发生，匈奴用于交换的主要物品是牲畜，史载“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

① 〔英〕波斯坦、爱德华·米勒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 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44—145 页。
② 同上书，第147 页。

谷量马牛”^①。匈奴对于边境贸易的依赖，在历史上也有详细的记载：“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愿上遣使厚与之和。以不得已许之大市……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②；“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③。后来，汉武帝在马邑以交易为名，试图伏兵以诱单于，后为单于发觉，自此两国处于交战状态，即便如此，两国的边境贸易并没有断绝，“自是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④。到了东汉时期，一再受到汉朝痛击的北匈奴仍然“愿与吏人合市”^⑤，在汉朝答应互市之后，“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⑥。

陈序经认为，匈奴人与汉的贸易物品，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生活享受，另一方面是他们把交换来的汉人物品作为商品转卖给他人以从中牟利，或者是用来交换别的物品，即匈奴是将商品运往西域诸国包括大秦的中间人。岑仲勉也指出，“匈奴早已运用（北道）为转输华丝于西亚罗马之通途”^⑦，西域诸国既然不能直接和汉帝国进行贸易，只好依赖匈奴人，“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⑧，“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⑨，在汉末与西域诸国直接交通之前，匈奴的势力一直延伸到葱岭以西的安息，即使汉与西域诸国直接贸易以后，匈奴的威胁仍然存在。^⑩ 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占据了河西一带，与西域的交通得以畅通，开始与西域诸国

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六九。

② （汉）贾谊：《新书》卷四，《匈奴》。

③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列传》第六四下。

④ 同上。

⑤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第七九。

⑥ 同上。

⑦ 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6页。

⑧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六。

⑨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六三。

⑩ 陈序经：《匈奴史稿》，第73页。

进行直接贸易，匈奴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匈奴人昔日垄断的贸易转到了汉人和西域人的手中，匈奴与汉的贸易发生了逆转，不得不把价值多倍的牲畜来换取汉人的物品，造成极大的入超。陈序经认为匈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其统治者用惯了汉人的珍贵物品，要使之终止使用很难。^① 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其实造成匈奴牲畜价格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两点：其一，汉朝已经从小宛国获得了优质战马供给；其二，匈奴失败以后，汉朝对于作战的马匹需求下降。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匈奴人在边境贸易上的进一步破产，随着汉朝的不断军事进攻^②，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部归汉，北匈奴最后渐次退出了漠北地区。

对于匈奴发展对汉的边境贸易解释为居间贸易是可信的，解释为匈奴统治阶层为了自己的生活享受就不太可信了。因为蒙古高原地区的气候和当时匈奴人的居住条件和居住习俗，是不适合于穿着丝绸衣服的，亚欧大陆的横向主轴——沿着北纬30—40度——向西的货物运输才可能使得当时主要的国际贸易物资——丝绸——有相应的市场。

2. 突厥与农业区的贸易往来

突厥与中国的贸易主要以丝绸为主，“我与汉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他们给予我们大量的金子、银子和丝绸”^③，突厥的羊、马不断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等大量输入突厥。^④ 突厥此时以金银和帛作为通货，奴隶改变身份，必须用金或者帛来赎身，唐太宗时曾下诏，“隋乱，华民多没于虏，遣使者以金帛赎男女八万口，还为平民”^⑤。这也是丝绸成为突厥货币的证据。

突厥汗国建国后，就参与了丝绸之路贸易。突厥十分重视与中

① 陈序经：《匈奴史稿》，第73页。

② 主要的战争有：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朝大举征伐北匈奴，永元三年（公元91年）耿种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

③ 阙特勤碑文，载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304页。

④ 沈斌华：《内蒙古经济发展史札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⑤ 《新唐书》卷二二八，列传一四〇上，《突厥上》。

国的贸易：“其后曰土门，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①中国的割据政权出于战略目的，争相结好突厥。北周“既与和亲，分给缯絮锦彩十万段”，而“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②。突厥参与丝绸贸易的形式有三种：

（1）朝贡贸易

隋朝重新统一中国以后，突厥与中国的绢马贸易已经经常化、合法化。“明年（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③史书经常记载突厥与隋的贡赐往来，“大业三年，炀帝幸榆林，启民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前后献马三千匹，帝大悦，赐帛万三千段”^④，“帝法驾御千人大帐，享启民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人，赐物二十万段，其下各有差”。（《隋书·北狄》。《北史》作“赐物二千段”，误^⑤）。到突利可汗时朝贡贸易已经进行过370次，“突厥前后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辈”^⑥，又“帝诏鸿胪少卿刘善因持节册号（泥孰）吞阿娄拔利泌础陆可汗，赐鼓纛，段彩巨万”，迄至天宝元年，突骑施黑姓可汗还不断遣使通贡，谋取中原丝帛。^⑦

（2）和亲贸易

通过和亲之盟，可以从中国得到大量丝帛。“从处罗征高丽，赐号为曷萨那可汗，赏赐甚厚。十年正月，以信义公主嫁焉，赐彩袍千具，彩万匹。”^⑧“长安三年，遣使者莫贺达干请进女皇太子……默啜更遣大酋移力贪汗献马千匹，谢许婚，后渥礼其使”，“毗伽可汗妻骨础禄婆匐可敦率众自归……封可敦为宾国夫人，岁给粉直二十万”，“统叶护可汗来请婚……遣真珠统俟斤与道立还，献万钉宝钿金带，

① 《北周书·突厥传》。

② 《周书》卷五十，《异域传》列传四二，《突厥》。

③ 《北史》卷九九，列传第八七，《突厥铁勒》。

④ 同上。

⑤ 李明伟：《安西大都护府的伟大功绩与突厥对丝绸之路的贡献》，载《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⑥ 《北史》卷九九，列传第八七，《突厥铁勒》。

⑦ 《新唐书》卷二二九，列传一四〇下，《突厥下》。

⑧ 《隋书》卷八四，列传四九，《北狄突厥》。

马五千匹以约”^①。这是突厥积极与中国联姻的主要原因。

(3) 互市

史载“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书约与连和钞边,默棘连不敢从,封上其事,天子嘉之,引使者梅录啜宴紫宸殿,诏朔方西受降城许互市,岁赐帛数十万”^②。“其后阅一二岁,(突骑施苏禄)使者纳贽,帝以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妻之。是岁,突骑施鬻马于安西。”^③互市也是当时贸易的主要形式。

基于游牧民族本身的特点,突厥不会大量地消费丝绢,其从中国得到的巨额丝绢除了少量地用于贵族豪奢消费外,主要通过粟特(即康国(Samarkand))销往东罗马帝国。^④公元522年(北齐天保三年),土门可汗击败了柔然汗国,创立了突厥汗国,到6世纪中叶成为控制丝路贸易的大国。从公元6世纪中叶起,突厥人尤其是西突厥积极参与了转口中国丝绢输入波斯、东罗马的贸易事业,有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促成贸易活动。^⑤如《突厥碑文注》记载:“朕二十岁时,拔悉密之亦都护成为我种落之民,因不遣队商,我遂出征。其队商没有来。为质问此事,我遂出征。”^⑥西突厥为了打破波斯萨珊王朝居间贸易的垄断,不惜发动战争,要求在波斯开辟市场自由销售丝绢,与东罗马到波斯采购丝绸的商人直接贸易,但是,波斯击败了突厥,进军乌浒河(阿姆河)北岸的布哈拉(Bahrom)。由中亚经波斯、里海南岸至东罗马的商路仍然控制在波斯人手里,突厥不得不积极开辟由天山北路或草原经中亚、里海北岸、南俄草原至东罗马的贸易路线。突厥成为中国与波斯、东罗马帝国丝路贸易的重要一环,它所

① 《隋书》卷八四,列传四九,《北狄突厥》。

② 同上。

③ 《新唐书》卷二二九,列传一四〇下,《突厥下》。

④ 《隋书·裴矩传》载: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射匮可汗遣其犹子,使率西蕃诸胡朝贡”。这说明突厥人是西蕃胡(粟特商人)商队的组织者、领导者。从沙畹《西突厥史料》和亨利·玉尔《中国闻见录》的记载分析,西突厥转输华丝的贸易主要由其属国康国擅长商业的粟特人代理经营。

⑤ 李明伟:《安西大都护府的伟大功绩与突厥对丝绸之路的贡献》,载《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⑥ [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第291页。

获取的大量廉价丝绸成为波斯、东罗马帝国丝绸商品的重要来源之一。

3. 回鹘参与农业区的贸易

回鹘是敕勒族中最为古老的一个游牧部落,在其协助唐朝政府击败突厥以后,获得了丝路上的垄断绢马贸易权。唐朝约定每年赠送2万匹绢(唐制,一匹等于40尺),并设立马市。回鹘“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①，“岁送马十万匹”唐则“酬以缯帛百万匹”^②。回鹘卖给唐朝的马匹,每年最高可达10万匹,按每匹马40匹(后增加为50匹)绢的价钱,每年的绢马贸易额可达400—500万匹绢,史载这一时期的绢马贸易十分频繁:“八年七月给回纥市马绢七万匹”,“宪宗元和十年八月,以绢十万匹偿回纥之马直(值)”,“十二月以绢九万七千匹,偿回纥马直”,“十一年二月,以内库缯绢六万匹,偿回纥马直”,“四月以绢二万五千匹,偿回纥马直”,“文宗太和元年三月,内出绢二十六万匹赐回纥充马价”,“六月,命中使以绢二十万匹,付鸿胪寺宣赐回纥充马价”。这些绢帛主要都是通过新疆和中亚,出售到欧洲。^③

由于丝织品既是唐朝的赋税对象,可以作为货币使用,同时也是财富的一种储存手段,又是生活的必需品,还是国际贸易最重要的物品,各方面的需求不断上升,造成了唐王朝的通货紧张,乃至“财力屈竭,岁负马价”。此时,唐王朝连年内战,急需大量的军马,但是回鹘向唐王朝输出的马匹多半病弱不堪用^④,唐朝为了保持安定的外部环境,只有长期忍受损失,按马匹数支付绢价。到公元780年,唐积欠回鹘马价绢140万匹,虽然在807年,唐宪宗一次还清了积欠,但是第二年回鹘所带之病弱马匹比常年又多了一倍,这种贸易状况一直持续到842年,回鹘政权灭亡,唐朝才偿还完所有的积欠。元和八年,李绛说:“我三分天下赋,以一事边。”^⑤和回鹘同在的是所谓

① 《旧唐书》卷一九五,列传一四五,《回纥》。

② 《新唐书》卷五七,志第四一,《食货志一》。

③ 崔德明:《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④ 沈斌华:《内蒙古经济发展史札记》,第43页。

⑤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列传一四二《回鹘上》。

“九姓胡”这些人主要来自康国,他们或是替回鹘贵族经营,或是同回鹘贵族合营,或是假借回鹘的势力,从中居间贸易,在西域开辟市场,将绢销往中亚细亚和欧洲,从中获利。^①

亚欧大陆腹地作为居间贸易者,从世界体系的物资流动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南方的中国主要从亚欧大陆腹地获取其用于战争的马匹,而欧洲和西亚获得了丝绸,亚欧大陆腹地获得了中间的利益。基于那时,世界并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国家货币,丝绸这种商品表现出了极强的国际货币的作用。

第三节 核心区与边缘区在生产和贸易上的 结构性冲突：1200 年以前亚欧大陆 腹地的地缘军事结构

基于地缘经济上的原因,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和其南面的农业民族有着长期的结构性潜在军事冲突。来自亚欧大陆腹地的部队全由骑兵组成,这些骑兵部分来自于对其他部族和农业地区的劫掠,加上较为充足的马匹,这里容易动员组织起一支机动灵活,行动神速而且数量庞大以十万计的武装,能随时投入战斗。依靠这样的武装,游牧民族长期威胁着农业民族的经济安全。

一、中国的军事经济

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的北方已经开始与游牧民族的骑兵发生了接触,中国军队开始由车兵转为步兵,骑兵开始受到重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灭掉六国,统一了中原地区,建立秦朝。中原统一后,北方匈奴的威胁就成为中国的安全隐患。为了解除匈奴的威胁,巩固自己的统治,秦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将匈奴逐向更北方,随即,开始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以巩固北疆。《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已并天下,

^① 沈斌华:《内蒙古经济发展史札记》,第 43—44 页。

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秦长城是将燕长城、赵国北长城、战国秦昭王长城进行大规模修复，在这三处长城的基础上修筑起来的。虽然已经有这三处长城作基础，但历经连年征战，长城损毁严重，还需将这三处互不相连的长城进行连接，加以延长，因此，工程量极为浩大。除了大规模地使用军队、征发民夫外，还使用了大量的罪犯。据载，“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①。历经多年，长城基本完工了。除了基本的城墙之外，城墙上还修有观察、防御和隐蔽设施，以及外围的关堡和烽堠，在险要地段建有关城，使其联属相望，在长城的外沿往往还修有障碍物如壕沟、陷坑等，构成了一个坚固完整的防御体系。秦万里长城西起今甘肃省岷县，沿洮河向北至临洮县，经定西县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由固原县至甘肃省环县和陕西省靖边、横山、榆林至神木县，由神木县进入今内蒙古自治区后，穿越巴彦淖尔盟、阿拉善盟境内的乌兰布和沙漠，蜿蜒于狼山，又由石兰计北口，向东经固阳县、武川县，沿大青山至呼和浩特市北与赵长城相连，再经过集宁市，由兴和县进入河北省围场县与燕长城相连，向东经辽宁省抚顺市、本溪市折向东南，最东端直至今朝鲜首都平壤西北部的清川江入海口，绵延长达万余里，自此长城有了“万里长城”之称。

长城的修建，使长城以南的内蒙古地区归于秦朝统一管辖，秦朝在这里设立郡县，修建直道，移民屯田，使古代内蒙古部分地区第一次归附于统一的中央王朝统治之下，加强了中央与边疆地区的联系，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在历史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以后历代都有重要的影响。

长城的修建一方面割断了游牧民族和中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抑制了游牧民族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有效地发挥了防御匈奴的作用，在军事上把野战变成了要塞战。同时屯田制的实施和交通道路的修缮，使中国军队后勤问题进一步得到保障。但是，长城的作用仅仅在于自保，一而至汉，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对峙仍然在持续。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汉代也大修长城。汉高祖时期 ,汉军三四人无法抵御一个匈奴骑兵 ,游牧民族在军事拥有绝对的优势。除了有技术上的原因 ,也有制度上的原因。表 3-11 是中国宋以前各代的兵制 ,反映了中国兵役制度的具体情况。

表 3-11 中国古代的兵役制度

	兵 制	内 容
秦代	役兵制 : 劳役和兵役结合 , 在役为兵 , 役罢为农。军粮自备。	服役两年 , 一年在郡内 , 一年在京城或者边境。
西汉	役兵制 , 承秦制。	服役两年 , 一年在郡内 , 一年在京城或者边境。
东汉	募兵制	只设中央禁卫军 , 地方不设军队 , 东汉后期 , 州兵和家兵出现。
三国	募兵制、征兵制和抢掠并重 , 以及私家兵。后期 , 士兵单独入册 , 出现了世兵制。	军队分中央和地方两种。
两 晋 南 北 朝	延续三国时期制度。	十六国的军队则全族皆兵 , 建国后改为世兵制。
隋	府兵制 始创于西魏。西魏制 : 男子成丁 , 有才力者入伍 , 免租庸调 , 所需马匹粮食由相邻 6 家共同承担。隋制 : 男子成丁后 , 受田服兵役 , 每年分为十二番 , 每番一个月。	每乡设一团 , 几个乡设一坊 , 坊上设军府 , 由中央的十二卫和东宫十率统率。卫官归皇帝 , 率官归太子。
唐	府兵制 , 军器、粮食、衣甲皆自备 , 马匹官供。	唐全国共分 634 府 , 府下设团 , 团下设队 , 队下设伙。后来改为募兵制 , 唐末中央不堪重负 , 以地方兵补充军事力量。
宋	禁、厢、乡、蕃四种。禁军由中央统率 , 厢军由州县统领。州县以外的兵为乡兵 , 戍守边境的是蕃兵。	厢军主要服劳役 , 戍卒则要不断地换防 , 即耿戍法。

资料来源 : 刘洪涛 : 《中国古代士兵生活与征战》,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995 年

版。

从兵制上讲，农业区的这种方式与游牧民族的“力能弯弓，尽为甲士”相比，有很大的劣势。

在作战方式上，汉唐以后，骑兵成为主力作战部队，这样部队的机动性虽然很好，但是战斗力却大为下降，宋朝改进了弩器，恢复车战，但是机动性却大为下降^①，仍然无法对付来自游牧地区的草原骑兵。

从军事经济上讲，农业民族根本无法抗拒这种消耗战，汉武帝时期，“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②。尤其是粮食消耗巨大，数十万军队驻守或者长途出击，需要十多万人从后方供给辎重。汉宣帝时期，赵充国一支军队10281人，月耗粮食199630斛，盐1693斛，草20多万石。^③对匈奴作战主要是骑兵，所以，马匹对于中原地区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所以汉武帝时，开始大力提倡养马，在水、陇西、北地以及上郡等畜牧条件较好的地方养马，并且设立了专门的养马机构。唐代也设立专门的养马机构，后来开始用金帛和茶盐换取游牧民族的马匹，这时主要有回鹘入朝驱马市茶，唐玄宗时准许突厥人在西受降城（今内蒙乌加河北岸）进行茶马贸易。养马极盛时期，“马之来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④。为获得良马，还发动过战争，其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与大宛国的战争就因此而起。

由于中国缺乏对战马的饲养经验和技能，战场上损失的马匹也极多，如胭脂山之战“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⑤。中国在与游牧民族的军事对比之中，始终处于劣势。

① 刘洪涛：《中国古代士兵生活与征战》，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88—89页。

② 《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③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五十。

④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

⑤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五十。

二、欧洲以及西亚地区的军事状况

古希腊很不重视骑兵,而是依靠不断改进的步兵方队来进行战争,因为古希腊的多山地形根本不适应骑兵作战。希腊步兵的主要武器是长矛,带头盔,胸挂铠甲,腿上绑有胫甲,一手持圆盾,一手持长矛,腰间挂有短剑,战斗通常经双方商定,在平坦的地面进行,并不强大的骑兵负责保卫前进中方阵的侧翼。古希腊的甲兵是由各城邦的中上层自由民组成,轻步兵多来自社会的下层,其中许多弓箭兵和投石兵是雇佣兵。马其顿时代的军队由本地的专职士兵组成,主要是从当地的农民中按照籍贯招募而来,并且按照籍贯编制方队中的连。马其顿军队的基本武器是梭镖和长矛,加长的长矛可以获得率先攻击的优势。马其顿军队的方阵是仿照希腊方阵建成的,由轻步兵、重步兵组成,步兵实行结阵冲锋,骑兵实行袭击。马其顿的重骑兵装备和重步兵装备基本相同,但是他们的长矛往往刺中第一个敌人以后就拔不出来,接下来的战斗要靠刀剑来进行。

公元前3世纪末,古罗马军队淘汰了长矛和弓,开始用一种短剑来组织他们的军队,这种短剑长度约为两英尺,剑宽约两英寸,很重,剑头锋利。^①与此同时,罗马人改进了盾牌,盾牌高约4英尺,宽约2英尺,可以保护身体的大部分。古罗马兵器的另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标枪的使用,古罗马军团的士兵一般持有短剑和标枪两种武器。短剑的启用和分队组成的高机动性的军团使得古罗马军队的作战效能达到了极至。古罗马的士兵来源于罗马的自由公民,后勤由车队供应。侦察兵可以提前20英里实施侦察。

古代欧洲农业区域的战争除了阵地战以外,更为重要的是防御战,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时候,城防设施以及建筑技术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最早的永久性防御工事就是用泥土和石头构筑的城墙。到了公元前后,筑城技术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军事上的重大创新就是扎营技术的突破,适用于野战的进攻和防御工事技术的突破也在逐步改变着作战的方式。

^① [美]T. N. 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罗马帝国分裂以后,骑兵在欧洲战场上占据了显著地位,步兵完全成了辅助部队,这一时期并没有新式武器诞生,战争主要发生在欧洲内部,其军队军事机制渐趋衰败。公元630—1000年之间,欧洲基本军事力量是重骑兵。重骑兵头戴古盔或者圆锥形头盔,锁子甲从颈项一直到大腿,脚蹬铁履,上部为皮靴或者胫甲保护小腿,手和腕部戴有铁手套,手持圆盾,每个骑兵马鞍上绑有一件较重的大氅,用于御寒。作战队形前排的战马的头、颈、雄等部位都挂有盔甲。重骑兵的兵器通常有弓、箭袋、长枪、大刀、短箭等。通常是步兵和骑兵协同作战。步兵分为重步兵和轻步兵。重步兵装备的盔甲和武器与重骑兵相似,有头盔、锁子甲、铁手套、胫甲(或者到膝长靴)和锁子甲外面的大氅。轻步兵多为弓箭兵,也有标枪兵,他们披的盔甲较少,大多数士兵穿的是皮制戎装,有的士兵戴有头盔,除了弓、箭袋或长枪外,通常还带有短剑。但是这样的骑兵在作战时,由于载重过大,只能是小跑和慢跑进行冲锋。

7世纪时,伊斯兰国家突然兴起,穆斯林的军队在军事技术上乏善可陈(穆斯林的军队起初并不披甲,后来也逐步披上了锁子甲),军事技术向着尽力减少马匹所负的重量方向努力,以取得骑兵的机动性。其军队的战术则是让骑兵不顾一切地冲锋,直到对方的阵地被打开缺口为止,这种机动性换来的是横扫从西亚到北非的广大地区。

三、亚欧大陆腹地的军事经济

亚欧大陆腹地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其最基本的原因在于游牧经济赋予了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在军事上以极大的机动性。

(一) 亚欧大陆腹地游牧民族获得军事优势的经济因素

畜牧业是游牧民族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是强大骑兵队伍依赖的基础,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述,在冒顿单于下,“大者万骑,小者千骑,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游牧民族以游牧为生,在环境上占尽优势,其狩猎和放牧完全近似于军事演习。而同一时期的农业地区,如果组织一次战争,就要经历动员、装备、征调、训练等许多阶段,游牧民族可以省略以上步骤,他们的及龄

壮丁早已在马背上进行生产,他们的武器就是他们的谋生工具,他们从来不缺乏战斗性。^①

(二) 亚欧大陆腹地游牧民族获得军事优势的技术因素

骑兵早在公元前600年前后,就在亚洲中部和西南部所向披靡,临近的中国和波斯不得不使自己的部队适应骑马作战。到了公元前,使用弓箭的骑兵在亚欧大陆腹地的西南部即中亚和西南亚地区所向无敌,但是,对于中国和欧洲而言,这些骑兵尚没有占据完全的主动。

马镫是骑兵诞生最为重要的技术发明^②,在马镫发明以前,骑兵主要是骑在坐垫上,士兵容易从马上摔下来,而且无法用尽全力去攻击敌人,或者马匹用于牵引战车,但是车战受地形的限制非常之大。有了马镫以后,士兵可以手持长矛,利用马匹的速度所产生的冲力攻击敌人。马镫的使用对于骑兵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骑士的脚有了着力点,便能变砍击为切击,从而提高杀伤效果。

古罗马后期发展起来的骑兵的重要兵器是长矛和剑,但是,来自波斯和亚欧大陆腹地的骑兵的武器是弓箭和长矛,这使得欧洲军队无法克服躲避弓箭分散队形和防止敌人冲锋密集队形之间的矛盾,因此,弓箭的作用开始在欧洲军事上受到重视。但是,有效地使用弓箭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并且需要开阔的地形,这些优势都是生活在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所独具的特点。

毫无疑问,穆斯林崛起时,其军队和欧洲的军队,尤其是与重骑兵相比,相对处于劣势,但是由于欧洲骑兵在机动性上过于笨拙,亚洲骑兵的特点就是奔跑迅速,出没无常,并不作正规的阵地型接触战。常常是突厥的轻装骑兵骑着马狂奔,佯装逃跑,将欧洲的军队诱到开阔之地,然后实施包围,从四面八方进行乱箭袭击,重点进攻侧

^①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6页。

^② 据考古资料:突厥时代阿尔泰的马衔是铁制,成对,但不完全相称。衔有两环,环端穿孔系带。带扣由铁、铜或骨制成,扣里有活轴,使带可松可紧。马镫据库莱墓葬群出土所见,可分三类:(1)最流行的是宽镫板、小革孔的8字形马镫;(2)形制略简,环孔顶端扁平,开一革孔;(3)此类形制最繁,环孔上方有高鼻,革孔横开。这些马镫制作甚巧,环孔及踏板镂空花纹,有的镫还镶上草木纹银错。

翼和背后,而不是进行正面接触,中世纪欧洲封建制骑兵遇到亚洲的作战方式以后,极大地暴露了自己的缺点。

(三) 亚欧大陆腹地游牧民族南侵的经济因素

在1200年以前,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南侵的因素有两个:

1. 转嫁危机,获取食物

基于食品的特点不同,导致了游牧民族的南下。因为,农产品作为食品可以越季储存,秋天收获以后,自冬历夏尽可食用,但是畜牧产品缺乏这一特性,一旦冬季大雪灾或者夏季出现旱灾,马、羊等牲畜大批死亡以后,储存的时间很短,这就导致了游牧民族必须南下寻找食物。

游牧民族一般选择在“冰合”时节入侵中原,“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候冰合渡河”^①。冰合便于渡河,不习水性的突厥骑兵选择这个时节入侵中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按照畜牧业生产的特点,马匹在秋季最为肥壮,骑兵的战斗力也就最高,同时,南方秋季正是农产品收获的季节,因而,自秋至冬,就成为游牧民族用武的“旺季”。此外,还应估计到“胡地隆冬,草枯泉涸”,此时掠夺临近的农业地区,正是为了解决草原地区人畜的给养问题。由此看来,游牧民族入侵的季节性,不外是游牧民族对游牧经济的制约性反映。

2. 控制丝路

游牧民族南侵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要控制丝绸之路,因为丝路上的贸易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利益。

从公元6世纪中叶起,突厥人尤其是西突厥积极参与了转口中国丝绢输入波斯、东罗马的贸易事业,有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促成贸易活动。西突厥曾两次派出使团(主要是粟特人,如粟特人摩尼亚克)到波斯要求自由贸易丝绸,但均被波斯国王库斯佬·阿奴希尔宛严厉拒绝。波斯王甚至烧毁了突厥人倾销的丝绸,毒死突厥使团的人。西突厥遂派摩尼亚克携带大批丝绸出使东罗马帝国(公元

^① 《通典》卷一九七,《边防》一三,《突厥》。

568年,北周天和三年,北齐天统三年)与查士丁尼(Justin)皇帝缔结共同对付波斯的军事同盟。

从本章第一节的亚欧大陆腹地的贸易发展也可以得出结论,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持续地从丝绸之路上获得利益,也就持续地以其军事优势控制这一地区。

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获得这一地区的军事优势,取决于其“战斗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一致性,也取决于与农业区域贸易结构的特殊性。

第四节 亚欧大陆腹地融入核心区的一般范式——辽

基于食品获得方式的压力,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凭借着军事上的优势,往往南侵到农业地区并进行农业生产。最初,这只是部分边民呈现的个体行动,后来成为许多游牧民族的集体行动,他们进入农业地区,建立自己的国家,重新组织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构成了1200年以前,尤其是蒙古帝国崛起以前,所有从亚欧大陆腹地南侵的游牧民族的共同特征。最初采取这一集体行动的是鲜卑族的拓跋部,公元386年,拓跋珪大会诸部于牛川(今呼和浩特东南),决定建都盛乐,国号为魏,这是亚欧大陆腹地历史上第一个游牧民族统一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的中央王朝。

拓跋部本来是一个游牧部落,受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开国皇帝拓跋珪曾经亲自耕田,以做表率。为了鼓励农业发展,拓跋珪进一步南迁都城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并于398年春,迁山东(太行山以东)各州郡吏民36万人、工匠10余万人至北魏本土从事农业生产,还在五原至稠阳塞(今包头)一带进行屯田。486年,北魏孝文帝实行了著名的均田制,第一次将一种理想的井田制付

诸实施。^① 此后，拓跋部日趋农业化，直至完全融入到整个核心区的农业生产之中。

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个从同一地点先于蒙古帝国崛起的契丹民族融入核心区的过程。

一、辽以前辽地的经济类型

辽建国以前，大约在 500 年的时间内，共有十几个民族生活在辽地，辽地在历史上不以农业为主，也并不单纯地从事畜牧业的生产，许多民族兼营畜牧、渔猎、采集和农耕，这些民族大多处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其经济类型具有鲜明的与其所处自然带相吻合的地理特征。^②

早期生活在这里的古代民族主要有室韦、乌洛侯、豆莫娄、地豆干、勿吉、靺鞨、奚和契丹等，其生产形式包括狩猎、畜牧和农耕，各个民族的生产形式表现了相当强的自然景观特色^③：

表 3-12：辽建国以前辽地的民族分布及其生产类型

生活的地区		生产的类型
北室韦	沿江森林草甸区	渔猎为主
室韦	森林区	渔猎为主
南室韦	森林草原区	狩猎、畜牧为主，兼营少量农业
乌洛侯	森林草原区	狩猎、畜牧为主，兼营少量农业
豆莫娄	森林草原区	狩猎、畜牧为主，兼营少量农业
地豆干	干草原区	畜牧为主
勿吉	森林及森林草原区	农耕、狩猎为主，兼营少量畜牧业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502—503 页。

②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 1—12 页。

③ 见《魏书》卷一〇〇《失韦传》、《乌洛侯传》、《豆莫娄传》、《勿吉传》，《北史》卷九四《室韦传》、《地豆干传》、《奚传》、《契丹传》，《隋书》卷八四《北狄传》，《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

靺鞨	森林及森林草原区	农耕、狩猎为主 ,兼营少量畜牧业
奚	灌木草原区	畜牧、狩猎为主
契丹	灌木草原区	畜牧、狩猎为主

资料来源：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 页。
各个经济区的具体位置详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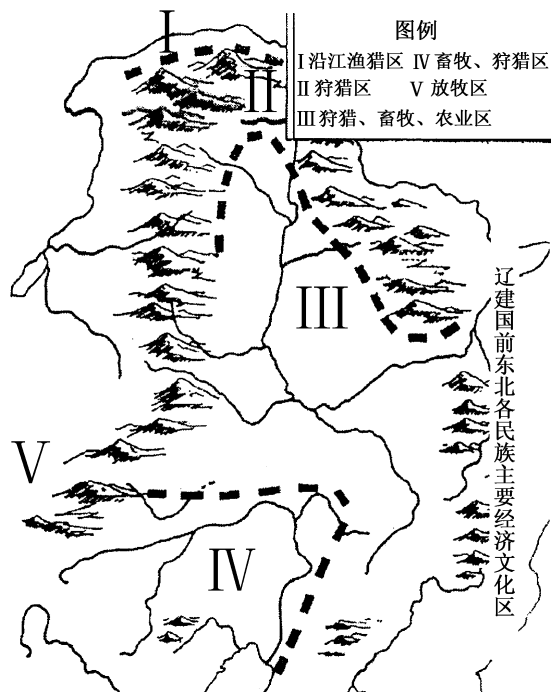


图 3-2 辽建国前辽地主要经济区

资料来源：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 12 页。

从图 3-2 中可以看出，辽地在辽兴起以前，其生产表现出较强的地域特征。

二、辽农业人口的形成

一千多年来，畜牧业一直是契丹族重要生产部门。史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湏酪，挽强射生，以给

日用”。

契丹族的畜牧业一直是比较发达的，随着契丹势力的扩大“（以故）群牧滋繁，数至百有余万”，从阿保机到耶律宗真近200年间，“群牧之盛如一日”。

在契丹族的畜牧业结构中，一直以羊、马为主。史载契丹输出的畜类亦以马、羊为多，阿保机之前的真君，“求朝献，岁贡名马”；显祖时，亦“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建国后，契丹对南唐一次献羊35000只、马300匹；还有一次除拿羊、马入贡外，另以羊30000只、马200匹出售。在河北榷场，宋朝每年从契丹购买羊有数万只。贺正旦礼物除御马、鞍马之外，贺生辰礼物有散马200匹，贺正旦礼物有散马100匹。每年八节回赐高丽及奉使，亦有鞍马9匹、散马16匹、羊200只。契丹的畜种另有少量的牛、驼、猪、兔和鸡。辽圣宗开泰八年（公元1019年）曾“诏阻卜依旧岁贡马千万只，驼四百四十”。辽道宗寿昌五年（公元1099年）征讨耶律剌部，“获马、驼、牛、羊各数万”。宋王曾去契丹，“时见畜牧牛马橐驼，尤多青牛黄豕”。畜产品构成了契丹生产的主要内容。

在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以前，一些早期首领就已经开始在契丹人的内部倡导农耕^①，但是契丹人的农业生产仅仅停留在一种萌芽状态，其真正形成传统的农业形式，是在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之后。

辽本土的农业人口主要来自于中原地区的战俘和移民以及渤海国的农业移民，这些移民来到辽地以后，为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这些非农业民族的活动地带形成了固定的农业垦殖区。^②

从中原移民至辽的人口主要来自于战俘，自发移民的影响和数量远远小于战争移民。自从唐末以来，中原地区一直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以至于崛起后的契丹人在阿保机的带领下，由河

① 《辽史》卷四八，志第十七下，《百官志》四，《南面京官》云：“涅里教耕织。”《辽史·食货志》亦云：“皇祖均德实为迭刺府夷董，喜稼穡，善畜牧，想地利以教民耕。”

②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16—35页。

朔和代北一带不断地突袭中原 ,契丹趁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为了扩充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实力 ,契丹人开始大规模地掠夺中原的人口。

表 3-13 辽对中原农业人口的迁移

年 代	进攻地点	掠夺人口
唐 天 复 二 年 (902)	阿保机“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 ^① ”	“俘生口九万五千” ^②
唐天祐元年	“拔数州”	“尽徙其民以归”
神册六年(921)	檀、顺等十余城	“俘其民徙内地”
天赞三年(924)	“遣兵略地”燕南	徙蓟州民实辽州地
天赞三年(924)	共安置中原移民而设 36 个州	

资料来源：《辽史》卷 1,《太祖纪》上、下；《辽史·地理志》。

以上活动主要集中在辽太祖、太宗年间,其活动范围在燕山以北。西拉木伦河流域是其经济和政治的核心地带,其农业生产也始于西拉木伦河流域。

到了辽世宗和圣宗时期,燕云十六州已经归入辽统辖范围之内,其对中原的移民安置多在于此地。

表 3-14 辽对中原农业人口的迁移

年 代	地 点	人口来源
统和六年(988)	进攻长城口	被俘者“分隶燕军”
统和六年(988)	攻破莫州	俘获人员“使隶燕京”
统和七年(989)	进攻河北破易州	宋鸡壁砦守将郭荣率众来降,诏屯南京,迁易州军民于燕京,又“鸡壁砦民二百户徙居檀、顺、蓟三州”

资料来源：《辽史·圣宗纪》。

同时,渤海人也开始向辽地迁移,渤海国是 7 世纪以来,以靺鞨人为主体的一个封建化地方政权。《隋书·东夷传》载,其主要居住在黑龙江下游至长白山一带,以牡丹江、第二松花江流域为腹地,其生产结构与同时代东北地区的其他山地林区的民族一样,为半农半猎,那里气候湿润,土地肥沃,农业有相当的基础,在西迁之后,更加

①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② 同上。

容易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 ,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渤海人后迁至营州。^①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大举兴兵 ,灭渤海国 ,许多渤海人迁至辽本土。

表 3-15 上京、中京地区以渤海移民为主要人口成分而设置的州县

	来 源	时 间	地 点	备 注
长泰县	本 渤 海 国 长 平 县 民	太祖伐 ,先得 是 邑。	迁 其 人 于 京 西 北 ,与 汉 民 杂 居	上京道临潢府
定霸县	本 扶 馀 府 强 师 县 民	太祖下扶馀。	迁 其 人 于 京 西 ,与 汉 人 杂 处 ,分 地 耕 种。	上京道临潢府
保和县	本 渤 海 富 利 县 民	太祖破龙州。	尽 徙 富 利 县 人 散 居 京 南。	上京道临潢府
潞县		太祖破蓟州。	布 于 京 东 ,与 渤 海 人 杂 处。	上京道临潢府
易俗县	本 辽 东 渤 海 之 民	太 平 九 年 大 延 琳 结 构 辽 东 夷 叛 ,围 守 经 年 乃 降。	尽 徙 于 京 北 , 置 县 居 之 ,是 年 ,又 徙 渤 海 叛 人 家 属 居 焉。	上京道临潢府
迁辽县	本 辽 东 诸 渤 海 人	大 延 琳 叛 ,后 以 城 降。	徙 其 家 属 于 京 东 北。	上京道临潢府
渤海县	本 东 京 人		因 叛 ,徙 置。	上京道临潢府
宣化县	本 辽 东 神 化 县 民	太 祖 破 鸭 绿 江 府。	尽 徙 其 民 居 京 之 南。	上京道临潢府
长霸县	本 龙 州 长 平 县 民		迁 于 此 地。	祖州
咸宁县		破 辽 阳 迁 其 民 置。		祖州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 ,《北狄传》下。

续表

	来 源	时 间	地 点	备 注
怀州	本唐归诚州，太宗兴帐放牧于此。	天赞中，从太祖破扶馀城，下龙泉府。	俘其人，筑寨居之。	祖州
扶馀县		太祖	迁渤海扶馀县降户于此	祖州
显礼县	本显礼府人	太祖伐渤海	俘其王大，迁民于此	祖州
富义县		太宗	迁渤海义州民于此	庆州
长宁县		太祖平渤海	迁其民于此	永州
义丰县	本铁利府义州	辽兵破之	迁其民于南楼之西北	永州
仪坤州	应天皇后建州	太祖平渤海	俘有技艺者，多归（后）帐下	永州
龙华州		（唐天复三年）太祖伐女真	俘数百户实焉	永州
永安县		太祖平渤海，破怀州之永安	迁其人置寨于此	降圣州
长乐县		太祖伐渤海	迁其民，建县居之	饶州
临河县	本丰永县人	太宗分兵伐渤海	迁于潢水之曲	饶州
安民县	渤海诸邑	太宗	所俘杂置	饶州
恩州	太宗建州	开泰中以渤海户实之	中京道	
恩化县			开泰中以渤海户实之	中京道
黔州		太祖平渤海	以所俘户居之	黔州

续表				
	来 源	时 间	地 点	备 注
盛吉县		太祖平渤海	俘兴州盛吉县民来居,因置县	黔州
迁州		圣宗平大延琳	迁归州民置	迁州
润州		圣宗平大延琳	迁宁州之民居此	润州
海阳县	本东京城内渤海民户		因叛居于此	润州

资料来源：《辽史·地理志》。

表 3-16 辽东京地区的移民情况

	所置州县	备 注
东 丹 移 民	辽阳府、开州、辰州、庐州、铁州、兴州、汤州、崇州、海州、幕州、显州、涿州、贵德州、沈州、严州、集州、广州、辽州、祺州、遂州、通州、韩州、双州、银州、同州、咸州、信州、龙州、湖州、渤海、郢州、铜州、涑州	根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辽东京道内各州县,大多与渤海故州县没有地域上的继承关系,含有这类移民的州县共有 50 个,其中有明确户额记载的仅 22 个,有户 1 万 7 千余户。韩茂莉推算,大约一共有 10 万 8 千余口,计 20 万人左右。 ^① 据记载这些被迁徙的人仅仅是居住在城市和附近被汉化的渤海人和高丽人,保持着较高的生产技术和手工业技艺,因此南迁之后对促进契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渤海 遗 民	归州：太祖平渤海,以降户置,后废。统和二十九年伐高丽,以所俘渤海户复置。尚州：以渤海户置。东州：以渤海户置。	
渤海、东丹俘户	归州、宁州是之。	

资料来源：《辽史·地理志》。

①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 32 页。

以上资料显示,对于渤海国人的移民主要的集中在辽代开国的前期,移民主要的迁往地点是辽的政治经济中心区,主要集中在辽上京和东京道一带。据统计,上京道各县,说明移民来源的各州县共计47个,其中含有渤海移民的有22个,约占总数的47%,因而上京道既是契丹人的发祥地,也是其政治经济中心,大量的渤海人迁入对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①但是正是这种农业立国的本位思想,致使辽国后来应对金和蒙古帝国的进攻时显得力不从心。

辽代的人口迁移主要来源于渤海国和中原,到辽太宗会同年间,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才告停止,农耕区大体形成,人口相对于土地趋于饱和状态。

三、辽境内生产类型的分布

由于在辽境内农业人口逐渐占据了优势,同时又因为契丹以游牧经济建国,游牧经济在辽的境内仍然占据相当的地位,所以就形成了“草原插花田”^②这种独特的生产经营形式。与此相同,邹逸麟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果,他认为:“契丹在其本土,总的说来仍以畜牧为主要产业。汉、渤海人开辟的农耕地,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都是草原上的插花地,不像中原地区那样有大片农田连在一起。”^③辽本土的这种变化,来自于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及其以后各代辽帝王对汉城营造和相应的农业的开发,其特征有:(1)汉城分布的不均匀,从西拉木伦河流域到大凌河,乃至滦河流域都有汉城分布,这与耶律阿保机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关;(2)汉城的建立是辽发展农业的根本,是一个转折点;(3)辽农业区呈现区域性集中的特征,形成了西拉木伦河流域医巫闾山北端以及辽中京周围三个农业区。^④

①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30页。

② 这种提法是陈述先生针对辽境内草原上有农业集中区,农业集中区里又有草原的特点提出来的。详见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3—24页。

③ 邹逸麟:《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载《辽金史论集》第2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

④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37—38页。

表 3-17 辽农业区的人口及其生产

	农业人口(人)	垦区分布	农作物	耕作方式
西拉木伦河流域	296 140 ^①	农田主要分布在州县城附近,这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农业地理特征。	粟、粱、高粱、小麦、林果	半农半牧
医巫闾山北端	142 500	依托上京道各头州、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州城为中心的插花式农田分布形式。		半农半牧
辽中京周围地区	600 000	农业生产是辽中后期这一地区的重要发展方向,州县城附近以汉人、渤海人为主,余者主要为奚人的农业活动地区。	粮食、纤维类经济作物粟、黍、荞麦	半农半牧
辽东地区	400 000	辽代东京道的农田也呈现插花式分布的特征,城邑、聚落周围形成大小不等的农田插花地,人口多的州府,其农田的延展范围也大。	粟、麻类、林果	半农半牧
燕云十六州	南京道计238 000户,下31县;西京道160 200户,下34县。 ^②	农业最为发达。	粟、黍、荞麦、高粱、小麦、水稻、桑、柘、麻、林果	南京道为精耕农业区,与中原相近,西京道铁制农具:铧、耘锄、长锄、犁镜、耜、镰、锄、勾镰等。 ^③

① 这一数据是据《辽史·地理志》载西拉木伦河流域共设置1府、11州,共有53 700户,推算而来。见Karl A. Wittfogel,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 Phila., America Philosophical Society, pp. 41—57;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255页;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74—196页;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40页。

② 《辽史》卷四十,志第十,《地理志》四,《南京道》。
③ 《北京出土的辽金时代铁器》,载《考古》1963年第3期。

续表

	农业人口(人)	垦区分布	农作物	耕作方式
其他地区	主要是指豫州、宁州、乌深州、长春州、泰州、春州构成的内防线城市体系以及由通化州、镇州、天德军等外防线体系。	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就地发展农业,草原深处形成以边防城为核心的农业绿洲。	小麦、麻类	半农半牧

资料来源: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图6,第48、52、61、64、76、78—80、89、98—99、105—119页。

辽以畜牧起家,其在建国以后仍然力图保持着传统的产业优势和生活方式,其实行畜牧业的方式有如下几种,见表3-18。

表3-18 辽游牧经济的分布地区和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	游牧地区
斡鲁朵 ^①	直至辽末,共设有十二宫一府。	复选数万,给四时游牧 ^② ,随着皇帝四处迁徙。
部族牧地	除了迭剌部受汉民影响较大以外,其余各部基本保持着部族的传统生产方式。	契丹八部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一线,上京道州府境内,新八部主要分布在契丹八部的外围,辽圣宗时形成的三十四部分布在新八部的外围,主

① 《辽史·国语解》:“斡鲁朵,宫也”;《辽史·营卫志》:“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据杨若薇总结,斡鲁朵是皇帝所居之地的宫帐,划入斡鲁朵的人户平时在皇帝所处之地游牧,并和扈从军一同拱卫皇帝的安全。随着皇帝四处迁徙,形成一个巨大的游牧集团。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辽史》卷六十,志二九,《食货志》下。据韩茂莉的研究认为此乃是斡鲁朵的马群数量。见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122页。

续表		
	组织形式	游牧地区
		要在边疆地区 ^① 。
官牧场	西路群牧使司、倒塌岭西路群牧使司、浑河北马群司、漠南马群司、漠北滑水马群司、牛群司。 ^②	浑河马群司领养的马场在东京道南部,倒塌岭位于西京道,其余三大牧场位于上京道。 ^③
私人牧场	私人牧场是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乌州为大王拔刺所占,遂州为南王牧地,丰州为遥辇氏僧隐牧地,闾州为罗古王牧地,松山州为普古王牧地,豫州为陈王牧地,宁州为官宁王牧地。 ^④

资料来源：《辽史·地理志》，《辽史·百官志》，《辽史·食货志》。

经过辽长期的农业化经营,其境内的生产类型结构^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体形成了如下几个区域：

农业区：燕蓟地区；

农牧混杂区：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的上京道南部、中京道全部、东京道西部；

农牧混交带：从西拉木伦河流域向南延伸至燕山山脉,西经今山西大同地区、内蒙古河套平原,至雁门关与宋为界,此范围之内,除

① 《辽史·营卫志》载：契丹八部之乙室部“司徒鸳鸯泊”，品部“司徒居太子坟”，楮特部“司徒居柏坡上罽（金革）山之侧”，乌傀部“司徒居徐母山、赫里河之侧”，涅刺部“居黑山北，司徒居赫里河之侧”，吕不部“司徒长春州西”，突举部“司徒居冗泉侧”，以上韩茂莉考为西拉木伦河流域，见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124—125页；新八部之突吕不·室韦部“戍泰州东北”，涅刺部·拿古部“戍泰州东”，迭刺部·迭达部“戍黑山之北，部民居庆州南”，乙室·奥傀部等其他各部多以俘户置之；《辽史》卷三三《营卫志》载，辽圣宗时所置34部族游牧于泽州、谭州、望云县、倒塌岭、辽水、柳湿河、松州、平州、东北女真之境、黑山、高州、傀乌古部以及慈人县等地。

② 《辽史》卷四六《志十六》，《百官志》二，《北面部族官》。

③ 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

④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

⑤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139—140页。

今张北坝上一带为放牧区外，人们的生产形式均为半农半牧型，农业开垦区与定居聚落呈插花形式；

畜牧、狩猎、农耕混交区：以北分布着契丹人以外的非农业民族，他们所持的生产形式与经济文化类型，与辽建国前基本相仿，所不同的是部族的族属与名称有所变易，分布在大兴安岭以东森林及森林草原区的各部族，包括室韦、女真、靺鞨、铁骊等都兼营畜牧、渔猎及少量农耕地；

牧区：大兴安岭以西为半干旱草原，乌古、阻卜、敌烈等部族分布在这里，他们的生产形式以放牧为主，狩猎仅占很小的一部分。

辽土内以燕山山脉为界，各生产区域表现为从由农耕区、半农半牧区向畜牧、狩猎区逐次变化的特征。

随着历史的发展，亚欧大陆腹地草原上又兴起了新的游牧部落，这种新的、纯粹的游牧部落在军事上，较之转型从事农业的游牧民族同样具有优势，农耕化的游牧民族最终全面放弃了畜牧业生产，成为农业民族中的一员，这一轮亚欧大陆腹地向农业区域的融入就宣告结束，等待着下一个游牧民族对农业区域的重新占领和进行自身的农耕化。

游牧民族从亚欧大陆腹地向农业区域的融入过程，基本上都是占领、迁移、移民、农业化为基本过程。

小 结

食品、服装构成了1200年以前的世界生产的核心内容，独具特色的丝绸制品成为这一时期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内容，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依靠他们的马匹——或者依靠马匹发动战争，或者依靠马匹来交换——获得了丝绸，也获得了利益。

客观地理环境为塑造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类型和不同的文化特性提供了内在的物质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各民族文化创造的发展趋向，并且越接近原始阶级，这种影响力也就越大。这种地理环境导致出现两种显著的分工。

(1) 生产的分工

生产的分工将草原和农业区的人们分成牧民和农夫,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不同的生产方式还造成了不同的食品结构,肉类食品的流动性在现代储存和冷藏技术发明以前,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①,而农业区域生产的粮食则相对贮存的时间要长得多。食品的储存性质导致了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经济存在的脆弱性,和潜在的侵略的必然性。

(2) 动力的分工

“牛为耕稼之本,马即致远供军。”正是生产方式导致的对于动力的不同需求,也进一步导致亚欧大陆腹地具有更大的军事优势。马匹的饲养是游牧民族较之以牛耕地的农业民族具有更大的军事机动性,和潜在的侵略的可能性。

(3) 这种优势的后果

从经济区位来看,粮食生产大都是普遍性的,而纺织品及其原料生产大都是区位性的,具有区位性的产品之间贸易较为频繁,而且数量也较大。^②这样,丝绸构成了世界贸易的核心内容,进而演变成为一种世界货币。

鉴于丝绸生产的独特作用,构成了1200年以前世界体系生产结构的主要内容,也是1200年前东西方贸易的动力源泉。

但是,亚欧大陆腹地作为一个独特的经济区域,其对丝绸的需求反而很小,相对于能够居间获利丝绸而言,其更大的潜在需求是粮食。这就导致了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不断地依靠其武力南下,导致中国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北方的广大空间,为来自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融入世界的核心区创造了条件。

①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② 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第4页。

第四章

1200—1800 年的亚欧大陆腹地^①： 重组及其结果

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他们所以激发了健康的和强有力的反应，不是在一个普遍的专制主义下粉碎反抗，是由于这一事实：他们适应草原条件的力量的机动性，不得不在周围的森林和山脉中停止。

——〔英〕哈·麦金德

制度提供人类在其中相互影响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的关系得以确定，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了一种经济秩序。

——〔美〕道格拉斯·诺思

1026 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意为拥有四海的汗。亚欧大陆腹地的机动力量第一次被成功地组织起来，游牧经济区域第一次出现了帝国机制，这比农业区域要晚了整整近 2000 年，但是其所征服的区域至今尚未被哪一个政治单位所超越。

^① 1200—1500 年的亚欧大陆腹地达到了其历史上最大范围，整个游牧经济扩张到了所有农业区域，并且和农业区域发生了制度性的冲突。

第一节 共存的悖论——亚欧大陆腹地 融入农业区的继续

游牧民族凭借着其地缘上的强大优势,经常强行攻入农业区域和游牧区域的交叉地带,并占领这一地区,但是最终却消失在这一地区。在蒙古帝国崛起以前,这种状况仍在持续。

一、亚欧大陆腹地融入核心区的继续——金

(一) 女真族的早期生活

女真最早生活在中国的东北一带,起源很早,成分很复杂。^①早期的女真人以渔猎为生^②,史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所听以佃鱼射猎习为劳事”^③;“国初无城郭,四顾茫然,皆茅舍以居”^④;“国主晟曾浴于河,牧于野,屋舍、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与其下无异”^⑤。随着金对中原地区的进攻,以及不断从中原地区劫掠人口迁往金本土,金本土的经济和生产类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金建国以后,开始大规模地对中原地区实行掠夺,移民以实金境,下面就是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① 《三朝北盟汇编》卷三,政宣上帙三载(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许涵度刻本):“世居混同江以东,长白山、鸭绿江之源”;“自咸州之东北分界入山谷,至于粟沫江中间所居,隶属咸州兵马司者,许与本国来往,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居粟沫江之北,宁江之北者,地方千余里,户口十余万,散居山谷间,依旧界外野处,自推雄豪为酋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则谓之生女真。又有极边远而近东海者,则谓之东海女真。多黄发,鬓皆黄,目睛绿者,谓之黄头女真。”《金史·世纪》载:“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真,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真。”

② 《金史》卷一,《世纪》载:“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载:“好渔猎,每见野兽之迹,蹊而求之,能得其潜伏之所,又以桦皮为角,吹嗷嗷之声,呼麋鹿而射之。”

③ 《金史》卷四四,《兵志》。

④ 《大金国志》卷三,《太宗》。

⑤ 《大金国志》卷十,《熙宗》。

表 4-1 金向中原的几次移民情况

年 代	移 民 情 况
金天辅六年(1122 年)	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民实之……七年以山西诸部族近西北二边,且辽主未获,恐阴相结诱,复命皇帝昂与李董稍喝等以兵四千护送,处之岭东,惟西京民安堵如故。 ^①
天辅六年(1122 年)	时国主自入燕后,所掳中原士大夫之家侏(女)姬、丽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归其国。 ^②
天辅七年(1123 年)	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 ^③ ,金人既大得所欢,号职官、富户,因尽括六州之地,上户几二三万,起发由松亭关,去燕中 ^④ 。
天辅七年(1123 年)	“且闻天祚北走鞑靼,经营擒之。乃遣左企弓等部所得燕山职官、富户,东取榆关,平滦路以归。” ^⑤
宋靖康二年(1127 年)	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以归。 ^⑥
金大定十七年(1177 年)	大石在夏国西北,昔窝斡为乱,契丹等响应,朕释其罪……遣使徙之,俾与女真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长久之策也。于是徙西北路契丹人曾预窝斡乱者上京、济、利等路安置 ^⑦ ;又以西南、西北招讨司契丹余党,心素狠戾,复恐生事,它时或有边隙,不为我用,令迁之于乌客里石垒部及上京之地。 ^⑧

金人北迁的人口与辽相比,要少得多,迁移的人口结构也很不相同,非农业人口占有一定的比例,而且以城市人口居多,这对金本土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⑨

在金的本土之内也有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但主要是围绕着拱卫

①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② 《大金国志》卷三,《太宗》。

③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④ 《三朝北盟汇编》卷十六,政宣上帙十六,引《北征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影音许涵度刻本。

⑤ 《三朝北盟汇编》卷十七,政宣上帙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影音许涵度刻本。

⑥ 《宋史》卷二三,《钦宗纪》。

⑦ 《金史》卷八八,《唐括安礼传》。

⑧ 《金史》卷四四,《兵志》。

⑨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151—152页。

上京以及其他政治军事目的而进行的^①，金本土的移民表现为两个特征，以女真猛安和谋克^②户为主，被迁移的女真猛安、谋克有相当的农业基础，逐渐打破了辽时形成的农业地理格局，农业开发区从辽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一带逐渐向东移动，构成了新的地缘经济形势。随着金在1117年灭辽、1126年灭北宋之后，开始由本土向外迁移人口，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往中原地区^③，估计这一时代迁移的人口可能多达100—240多万^④，金本土境内各地就呈现了一种阶段性的发展状态。在占领辽、宋以前，金的经济中心在金上京会宁府一带，

① 据《金史》卷七二《银兀可传》：“上自将攻黄龙府，进临益州，州人走保黄龙，取其余民以归”（金收国元年，1115年）；“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真、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以官之，且使从宜居处”（收国二年，1116年）；“分鸭挞所迁谋克两千户，以银兀可为谋克，屯宁江州”（收国二年，1116年）；《金史》卷二《太祖纪》：“以娄室言黄龙府地僻且远，宜重戍守。乃命合诸路谋克，以娄室为万户镇之”（天辅二年，1118年）。《金史》卷七二《娄室传》：“太祖取黄龙府，娄室请曰：‘黄龙一都会，且僻远，苟有变，则邻郡相扇而起，请以所部屯守。’太祖然之，仍合诸部谋克，命娄室为万户，守黄龙府。”《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辽通、祺、双、辽等八百余户来归，命分置诸部，择膏腴之地处之”（天辅二年，1118年）；“辽户二百来归，处之泰州”（天辅二年，1121年）；“遣昱及宗雄分诸路谋克之民万户屯泰州，以婆庐火统之，赐耕牛五十”（天辅五年，1121年）；“其居宁江州者，遣拾得、查瑞、阿里徒观、奚挞罕四谋克，挈家属、耕具，徙于泰州，仍赐婆路火耕牛五十”（天辅五年，1121年）。《金史》卷四四《兵志》：“发春州粟，赈降人之徙于上京者”（天会元年，1123年）；“徙辽、润、来、隰四州之民于沈州”（天会元年，1123年）；“命徙移耶，懒路都勃堇完颜忠于苏频水”（天会二年，1124年）；“诏赎上京路新迁宁江州户口卖身着六百余人”（天会二年，1124年）；“命以徒门水以西，浑曈、星显、僞蠡三水以北闲田，给曷懒路诸谋克”（天会九年，1131年）。《金史》卷七《世宗纪》中：“诏西北路招讨司契丹民户，其尝叛乱者已行措置，其不与叛乱及放良奴隶，可徙乌克里乌垒部，令及春耕作”（大定十七年，1177年）；“尚书省奏徙速频、胡里改三猛安二十四谋克以实上京”（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诏於速频、胡里改两路猛安下选三十猛克为三猛安，移置于率都畔窟之地，以实上京”（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

② 《金史》卷七一，《婆庐火传》：太祖定“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

③ 〔日〕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5—518页。

④ 〔日〕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166—167页。

金迁都南京之后,经济重心便转移至辽东和辽西一带。^① 根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到金后期的泰和七年(1207年)^②,金在其本部和南部人口比例较高,而在契丹旧地,人口相对较少,这与金在本土发展农业和辽国在长城沿线侧重发展农业有很大的关系。

(二) 金建国后形成的两大经济区域

1. 金本土的“插花式”经济区

据考古发现,在金的本土一共有106座古城,王永祥将城分为六级:

表 4-2 金本土的城市系统

级别	城市规模(周长)	城市功能	城市数量
一级	大于 7500 米	京城	1
二级	4000—5000 米	路所在地的州府城	2
三级	2500—3500 米	州城	15
四级	1500—2500 米	县城或者猛安	8
五级	1000—1750 米	谋克	57
六级	400—750 米	边堡	20

资料来源:王永祥等:《金代黑龙江古城述略》,载《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2期。

这些城镇沿江河分布,主要在阿什河沿岸、拉林河右岸、呼兰河沿岸、松花江直至黑龙江口,城镇之间的距离一般在10—30华里之间不等^③,在这些城镇的周围形成了插花式的农业形式,同时这些城镇也承担着交通、军事以及政治的功能。农业的垦殖区由西拉木伦河流域、辽河流域拓展到了松花江流域,农耕技术得到提高,女真、契丹、奚等民族相继加入汉、渤海等农业民族所从事生产方式之中。这时女真的农业生产仍然是以插花式农业生产形式为主,但是此时的农业生产活动已经大为发展,辽东至长白山、阿什河、乌裕河一线都

① 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0页;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169页。

② 许多学者认为《金史·地理志》所载的户口年代是泰和七年。见韩光辉:《金史·地理志 户口系年正误》,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刘浦江:《金代户口研究》,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167页。

③ 王永祥等:《金代黑龙江古城述略》,载《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2期。

已经成为金的农业经济区域。

金上京、东京和咸平一带自然条件很好,适于发展农业,这里也就形成了金重要的经济开发区,东京府处于连接北京和上京之间交通的重要位置。东京府形成了以沈州为中心的重要经济区,从沈州向北可达上京会宁府,向西通往辽西,向东则通往辽东,在道路的沿线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和城镇,由此可以认为东京府对于金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

金北京路和临潢府的农业发展则与辽代规模相当,由于政治中心由西拉木伦河流域转移到阿什河流域,临潢府渐趋衰落,北京路的中心集中在辽西一带。^①

2. 金中原经济区

金统一中国北方之后,基于军事和经济上的原因,形成了几次大规模地从金本土向中原地区移民的过程。天会五年(1127年)开始,金人开始招抚战争中的流亡人口,许多南逃的人开始北归,同时金人将一些战俘安置在河北一带。金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后立刘豫为大齐皇帝^②,管理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以及陕西陇东等地,在金和南宋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地带。

大约从金太宗天会十一年(1133年)开始,原来居于金本土的女真猛安、谋克,以及奚、渤海、契丹等民族开始大规模地向中原移民^③,其中先以金兵部队为主,后来则尽起本土居民大举南迁^④,其原因在于“金人既复取河南地,犹虑中原土民怀二王之意,始创屯田军及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具有之,多

①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183—184页。

② 《金史》卷三,《太宗纪》。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九,靖康中帙七四,引《北征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许涵度刻本)。“范仲熊贷命令往郑州养济途中,与燕人同行,因问此中来者是几国人,共有多少兵马,其番人答言,此中随国相来者,有达靶家、有奚家、有黑水见、有小葫芦家、有契丹家、有党项家、有(黑吉)嘎斯家、有火石家、有回鹘家、有室韦家、有汉儿家”(靖康元年,即1126年)。

④ 《大金国志》:天会十一年“秋,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

至五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①，其中屯田军是南迁的女真猛安和谋克户^②。

贞元元年(1153年)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③，完颜亮开始大规模南迁宗室贵族：“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猛安、谋克，并为合札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勛、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翰论、和尚、胡刺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果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达族属处之河间”^④，“起上京诸猛安于中都、山东等路安置”^⑤；“诏请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给复十年，以实京城”^⑥。正隆年间(1158年)，“迁中都屯军二猛安於南京”^⑦；“大定二年(1162年)正月，咸平、济州二万入屯京师”^⑧；“大定十三年，徙东北等戍边汉军于内地”^⑨。但是，这些南入中原的移民活动反而造成了令女真人意想不到的后果，“山东、河北猛安、谋克与百姓杂处，民多失业”^⑩；“南路女真颇有贫者”^⑪；“女真人户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尽得薄地”^⑫，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八，绍兴十年八月、十月，《丛书集成》本。

② 三上次男的《金代女真研究》、张博泉《金史论稿》和韩茂莉的《辽金农业地理》对此都有共识。

③ 《金史》卷五，《海陵纪》。

④ 《金史》卷四四，《兵志》。

⑤ 《金史》卷八三，《纳合椿年传》。

⑥ 《金史》卷八三，《张浩传》。

⑦ 《金史》卷五，《海陵纪》。

⑧ 《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⑨ 《金史》卷四四，《兵志》。

⑩ 《金史》卷九二，《曹望之传》。

⑪ 《金史》卷八八，《唐括安礼传》。

⑫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为此,金又在中原内部对女真猛安和谋克进行了迁移^①,这给中原的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同时也造成了金后方防线的空虚。

金占领中原以后,本土的200多万猛安、谋克户“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官田,使自播种,以冲口食”^②。据《金史》记载:“海陵正隆元年(1156年)二月,遣刑部尚书(纥乞)石烈娄室等11人,分行大兴府、山东、真定府,拘括系官或荒闲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绝户地,戍兵占佃官籍监、外路官本业外增置土田,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盖以授所迁之猛安、谋克户。”^③金人最初入迁中原的移民本没有和汉民杂居在一起,其“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间落。千户、百户虽设官府,亦在其内”^④。到了金世宗,开始改变这种猛安、谋克与汉民杂居的状态,“初猛安、谋克土田山东,各随所土地,散处州县。世宗不欲猛安、谋克与民户杂处,欲使相聚居之,……遂以猛安、谋克自为保聚,其田土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⑤。大定二十年(1180年),金世宗申明:“猛安、谋克人户,兄弟亲属若各随所分土,与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助济,此亦相劝之道也。”^⑥

女真人向农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强迫性质的。“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

① 主要的迁移有:《金史》卷七《世宗纪》载,大定二十年(1180年)“徙遥落河、移马河两猛安于大名、东平等路安置”;《金史》卷四四《兵志》载,大定二十一年“遣大兴尹完颜迪古速迁河北东路两猛安”;三上次男认为迁往大名、东平一带,见〔日〕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216页;《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载,大定二十二年“遣刑部尚书移剌撻于山东路猛安内摘八谋克民,徙于河北东路酬斡、青狗儿两猛安旧居之地”;“其弃地以山东东路貳黑河猛安下蘸答谋克,移里闵斡鲁浑猛安下翁浦谋克、什母温山谋克九村人户徙於刘僧、安和二谋克之旧地”;《金史》卷八《世宗纪》下载,大定二十二年“徙河间宗室于平州”。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炎兴下帙一四四,引《金虏图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许涵度刻本。

③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④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炎兴下帙一四四,引《金虏图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许涵度刻本。

⑤ 《金史》卷七十,《思敬传》。

⑥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阙。女真、汉儿百姓，可并量力为蚕桑。”^①“近制以猛安、谋克户不务栽植桑果，已令每十亩须栽一亩，今乞再下各路提刑及所属州县，劝谕民户，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并以事怠慢轻重罪科之”，泰和元年（1201年）“猛安、谋克户每田四十亩树桑一亩，毁树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②。而且，真正的情况又有不同，大定十七年（1177年），金世宗才知道“近都猛安、谋克所给官地，率皆薄瘠”，这时许多女真人“（石斤）芦为席，或斩刍以自给”^③，“腴田皆豪民久佃，遂专为己有”^④，同时“官地非民谁种？然女真人户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尽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⑤。金政府开始调整这种局面，于是“拘官田在民久佃者与之”^⑥，“无牛者官给之，土薄者易以良田”^⑦。但是这又会造成另外一种结果——对整个中原地区原有经济秩序的破坏。

这样的结果是，女真人南迁之后，既不能发展当地的经济，反而成了经济的包袱，其粮食主要靠漕运到燕京。“中都、河北、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则物力多，赋税重，此古所谓狭乡也。”^⑧尤其是金都城南迁燕京之后，整个国家经济的生产和消费都开始向这一带集中。中都燕京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全国物资流转的主要物资是粮食，这些粮食来自山东与河北，通过漕运到达燕京^⑨，从原来依赖本土的经济转而依赖中原地区的生产。

①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② 《金史》卷一一，《章宗纪》。

③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④ 《金史》卷八三，《张汝弼传》。

⑤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⑥ 《金史》卷八三，《张汝弼传》。

⑦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⑧ （金）赵秉文：《滏水集》卷一一《梁公墓名》，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 《金史》卷二七《河渠志》载：“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牐以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通往燕京的水路经由“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沧州、会州”最后至运河。漕运的物资来自“苏门、获嘉、新乡、卫州、浚州、黎阳、卫县、彰德、磁州”等，一部分来自于“衡水则经深州会滹沱”，这一段主要漕运“献州、清州之饷”，两路物资“皆合于信安海壩（河边地），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牐，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另一路“霸州之巨马河，雄州之沙河，山东之北清河，皆其灌输之路也”。

（三）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制度性冲突

1. 金的国防制度安排

（1）征兵制度

签军是金代的临时征兵制度，“凡汉军，有事则签取于民，事已则或亦放免”^①。金代的签军制度与其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粮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曰猛安，谋克”^②，进入中原以后的猛安、谋克“若遇出军之际。始月给钱米，老幼在家依旧耕耨”^③，这对女真人的生产和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来说，签军制度严重妨碍了当地的生产和经济发展。

金征南宋时“调诸路猛安、谋克军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虽亲老丁亦不许流侍”^④，“计女真、契丹、奚三部之众，不限于丁数，悉签起之，凡二十四万……又签中原、渤海、汉儿十五道，每道各万人，合蕃汉兵为二十七万”^⑤。针对这些情况，金世宗也曾进行过一些改革，但不久又恢复旧状^⑥，签军制度给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动……阖家为苦”^⑦。

汉人则基本上不受签军制度的制约，虽然“凡汉军，有事则签取于民，事已则或亦放免”^⑧，但是与猛安、谋克户相比，数量仍然是有

① 《金史》卷四四，《兵志》。

② 《金史》卷四四，《兵志》。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炎兴下帙一四四，引《金虏图经》，上海古籍出版社涵度刻本。

④ 《金史》卷五，《海陵纪》，中华书局点校本。

⑤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十，《虜亮叛盟》。

⑥ 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诏河北、山东等路所签军，有父兄俱已充甲军，子弟又为阿里喜，恐其家更无丁男，有误农种，与免一丁”，但是随及改变“凡成丁者签入军籍”。见《金史》卷四四《兵志》，《金史》卷八八《唐括安礼传》。

⑦ （金）刘祁：《归潜志》，中华书局点校本。

⑧ 《金史》卷四四，《兵志》。

限的^①，猛安、谋克为主要兵源的这一制度，有金一代并未变动。^②

(2) 军马的饲养

金中期国家的政治中心南移到中原地区以后，其关于部族畜牧业发展的问題就很少再见于记载，仅有的记载为大定十七年（1177年）“以羊十万付乌古里石垒部畜牧，其滋息以予贫民”^③，明昌二年（1191年）“诏赐施括里部羊三万口……以振其乏”^④。由于金注重发展农业，相对而言，畜牧业渐趋衰弱，用于战争的马匹相应供给不足，金袭辽制，国家官马的牧养地设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初设五群牧所，世宗时改设为七。^⑤

“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抹之为言无蚊蚋，美水草之地也”^⑥，金初天德年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浦速斡、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仍辽旧名”^⑦，金世宗时置所七“曰特满、忒满、斡睹只、蒲速碗、欧里本、合鲁碗、耶庐碗”^⑧，“斡独碗、浦速斡、耶鲁碗、讹里都、虬斡、欧里本、乌展、特满、骆驼都、讹鲁都、忒恩、蒲鲜”^⑨。据考辽代这些牧群除了浑河牧群设在东京道，倒塌岭西路牧群设在西京道以外，余者皆在上京道，金代的牧群分布大体也与此处于相似的位置，即故辽的上京道。^⑩

金代迁都中原以后，在马政管理上的措施，实行了类似北宋盛极一时的“保马法”，即“散驂马，令中都、西京、河北东、西路，验民物力分畜之，又令它路民养马者，死则於前四路所养者给换，若欲用则悉

① 据统计，在正隆五年（1160年），海岭王在全国十五路共签军27万，其中24万为猛安、谋克户，约占88.8%，其余的为汉军。详见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214页。

②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214—215页。

③ 《金史》卷七，《世宗纪》。

④ 《金史》卷九，《章宗纪》。

⑤ 《金史》卷四四，《兵志》。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同上。

⑨ 《金史》卷二四，志五，《地理》上。

⑩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291页。

以送官。此金之马政也”^①，但是由于这属于为官养马，则造成了“在官荒田及牧马地，民多私耕者”^②；“荒闲之地及牧马地，其始耕垦，费力当倍”^③；“军人以春牧马，经夏不收饲，瘠弱多死”^④。这种状况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女真战斗力的急剧下降。

2. 金人南迁后新的经济制度安排

金人南迁以后，即陷入寻租而生的状态。“金人北军，一家蒔地不下数顷，既无赋税，春则借农以种，夏则借人与耘，秋则借人以收”^⑤；大定二十二年（1181年）“闻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之民，骄纵奢侈，不是耕稼”^⑥；同年，世宗说“近遣使阅视秋稼，闻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或种而不耘，听其荒芜者”^⑦；大定二十二年（1181年）“以附都猛安户不自种，悉租于民，有一家百口，垄无一亩者”^⑧。这样，“京畿两猛安民户不自耕垦，及伐桑为薪鬻之”^⑨，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的整个华北地区经济。针对这种情况，金世宗下谕：“自今皆令阅实各户人力，可耨几顷亩，必使自耕耘之，其力果不及者防许租赁。如惰农饮酒，劝农谋克及本管猛安、谋克并都管，各以等第料罪，收获数多者亦以等第迁赏，……不种者杖六十，谋克四十，受租百姓无罪。”^⑩《金史·食货志》载：“民口二十五授田四顷四亩有奇”，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全国共有猛安、谋克部民6 158 636口，依民口25授田4顷4亩计算，应授田9952.3万亩。据前表，中原地区的猛安和谋克户占全国总数的55.6%，土地的开垦量如果与这一比例相一致，则中原地区的猛安、

① 《金史》卷四四，《兵志》。

② 《金史》卷一〇七，《高汝砺传》。

③ 《金史》卷一一四，《石抹世勳传》。

④ 《金史》卷九一，《李术鲁阿鲁罕传》。

⑤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〇，炎兴下帙一二〇，引《朝奉朗崔陟孙淮夫梁叟上两府札子》，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许涵度刻本。

⑥ 《金史》卷八，《世宗纪》。

⑦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⑧ 同上。

⑨ 同上。

⑩ 同上。

谋克户垦地约为 5533.5 万亩,与猛安、谋克户集中程度一致,河北二路、山东二路、大名府路约 3164.8 万亩,由于金代没有留下关于土地数量的确切记载,韩茂莉根据宋代的数字进行了推算^①,假定宋金两代这一地区土地开垦的数额相近,那么金代猛安、谋克户所占的垦田占这一地区的 1/3 左右。^②但是“有一家白口,垄无一苗者”,“种而不耘,听其荒芜者”大有其人,可以推知,女真人在这一地区的生产水平,是出乎原来金的上层的意料。可以推断,女真人在中原地区的经济效率并不是很高,要远远低于汉族人的生产效率。

同时,女真人还要在赋税上享有优惠条件,《三朝北盟会编》:“其金人北军,一家蒔不下数顷,既无税赋”^③,大定二十三年(1183 年)“猛安、谋克部女真户所输之税”定为牛具税或牛头税,“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内地(金本土)诸路每牛一具纳税五斗,为定制”^④;“金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束十有五斤”^⑤,章宗泰和年间,“减牛头税三分之一”^⑥。可以计算,猛安和谋克户的赋税比之普通汉民要轻得多。

在低税率和拥有良田的情况下,南迁的猛安和谋克户的生活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世宗大定九年(1169 年)“以大名路诸猛安民户艰食,遣使发仓廩减价出之”,“诏赈临潢、泰州、山东东路、河北东路诸猛安民”,大定十一年“命赈南京屯田猛安被水灾者”^⑦,大定十二年

① 《文献通考》载:北宋元丰六年(1083 年)京东路有地 2671.9 万亩,和北路有地 2790.7 万亩,合计 5462.6 万亩,据漆侠订正,这两路的确切数字应为 9495 万亩。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8—67 页。

②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 216—217 页。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〇,《炎兴下帙》一二〇,引《朝奉郎崔陟孙淮夫梁叟上两府札子》,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许涵度刻本。

④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⑤ 同上。

⑥ 《金史》卷一一,《章宗纪》三。

⑦ 《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命赈山东东路胡刺温猛安民饥”^①，大定十七年（1177年）“东京三路十二猛安尤缺食者，已赈之矣”^②。种种情况说明，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出了问题，一方面猛安和谋克户拥有最好的土地，一方面享有最优惠的税率，但是他们缺乏应有的农业技术和知识，致使整个社会的效率低下，社会矛盾激化，这是整个上层统治者丝毫不顾忌劳动分工、禀赋的比较优势造成的，也是国家试图垄断资源、对国民实行歧视性待遇所造成的结果。

同时，女真上层的利益集团也趁机从中牟利，“山东、河北猛安、谋克与百姓杂居，民多失业”^③，“朕闻括地事所行极为不当，如皇后庄、太子务之类，止以名称便为官地，百姓所执凭验，一切不问”^④，结果“本为新徙四猛安贫穷，须刷田与之。若张仲愈等所拟条约太刻，但以民初无所得地之由，自抚定后未曾输税，妄通为己业者刷之”^⑤，一些显贵趁机冒占官田、民产^⑥，“山东军括地，以为得军心，而失民心”^⑦。

3. 新制度实行的后果

女真传统社会组织的解体，造成了这个社会交易成本的上升。猛安、谋克户居住形式发生了变化，女真人十分不习惯。女真人长期以来是家长制社会，其生产活动是以集体劳动为特征的，一旦进入中原地区，要求实行一户一户的单独劳动形式，对其生产的效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金世宗决定恢复女真人原来聚居生活和集体生产

① 《金史》卷六，《世宗纪》中。

② 《金史》卷五十，《食货志》五。

③ 《金史》卷九二，《曹望之传》。

④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⑤ 同上。

⑥ 例如《金史》卷九八《完颜匡传》载：其“事显宗，深被恩遇……承安中，拨赐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济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旧业辄夺之”；《金史》卷八三《纳合椿年传》载：其“冒占西南路官田八百余顷。大定中括捡田土，百姓陈言官豪占据官地，贫民不得耕种”；《金史》卷七《世宗纪》载：“山后之地皆为亲王、公主、权势之家所占，转租于民”；《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载：“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至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

⑦ 《金文最》卷四九，《元好问·张伸可东阿乡贤论跋》，中华书局点校本。

形态^①，一旦金人恢复了原有的社会组织，试图保持其军事力量，与南迁之后的女真人所要从事的生产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金政权面对发展经济与国家安全的两难困境。

从经济上考虑，金对原汉族人口农业技术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从军事上考虑，金对女真人原有的军事制度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出于战略目的，需要大批女真人南迁，但是女真人的生产方式又和现在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式相互冲突，汉人的农业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与当地的环境相符合，女真人的社会组织依赖于女真人的生产方式，在南迁之后，女真人原有的技术无法从事农业生产，而从事农业生产就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组织，原有的社会组织正是其保持军事上强于汉族的原因。

对于资源，本应该由那些最具有生产效率的人来占有，但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女真南迁之后，实行按口授田，但是此时的肥田已经被原有的居住者占领，为了给予女真人较好的生活条件，于是给予了女真人特权，也就是分到更好的田。女真人种田造成了整个社会效率的低下，于是寻租开始出现，女真人把土地出租给那些更有效率的人耕种，出于本民族长远利益的考虑，政府对寻租行为施加干预，以维持这种低效率的状态。同时，金代的兵役又以猛安和谋克为主，良田多数掌握在他们手中，但是壮丁又要从事兵役，农事荒废，整个社会效率低下。女真传统社会组织的解体，致使金所依赖的军事力量大打折扣，在括地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占据土地的豪强，瓦解了中央的统治能力，不但使下层的女真人无法得到良田，而且掠夺了汉民的土地，同时自己又进行寻租，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女真南迁之后，既要进行农业生产，仍然要服兵役，而汉民却不用服兵役，这样对于女真人而言，可谓苦不堪言，最终汉民失去了良田，女真人却仍然无法实现富裕，只有部分的权贵获得了实惠。

所以，可以认为女真为蒙古所灭，主要原因还在于其固有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崩溃。

^① [日]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第321—339。

二、亚欧大陆腹地融入农业区域的继续——西突厥

（一）突厥汗国的经济状况

6世纪末,突厥分为五部,摄图称沙钵略可汗,毗罗称第二可汗,大逻便称阿波可汗,玷厥称达头可汗,此外还有步离可汗。各汗无所统辖,分居四面,而以沙钵略可汗最为强大。

突厥各部所属封地条件各不相同,中、东、北面三部皆为漠北和漠东较为穷困贫瘠之地,所治部民经营狩猎、畜牧,西面可汗则据有中亚绿洲、河中肥沃地带。粟特城邦诸邦,都向其纳贡称奴,粟特诸邦是丝路贸易的垄断者,也是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因之西面可汗拥有国力最强。

畜牧业是突厥全部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其俗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①,其“种类资给,惟籍水草”^②。突厥人的衣食住行生活所需,都取自牲畜,尤其衣羊、马为主,祭祀婚丧往来,无不以羊、马为取材对象,人的贫富贵贱,也以羊马的多少为计。^③突厥人的畜牧业也和季节性的狩猎活动经常结合在一起,弓箭是其须臾不离的工具,他们精于骑术箭法,行动灵活。游牧和射猎的结合,这是突厥兴起的重要原因。

突厥国境内各种行业比较全面,但是突厥人很少经营与畜牧、射猎以及与攻战无关的行业,突厥人只从事冶铁铸兵、制造箭杆、穹庐支架、战车等几种,其余如金银雕镂、琉璃烧制等皆役使其属部为之,整个商业则完全让粟特人垄断,对于农业则视为贱业,只是为了“兼食饼饵”的需求,迫令所属城郭诸国作为贡税交纳,或者命令汉族奴婢为之。^④

突厥社会以一夫多妻制的父系家长制大家族构成突厥社会的基本细胞,突厥社会私人财产权已经得到承认,主要的财物是羊马。据

① 《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② 同上书,隋主诏书。

③ 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④ 同上书,第127页。

日本学者研究突厥儒尼碑文认为,突厥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很明显,其拥有的畜数多寡不一,有马 600 匹者、60 匹者(Kemcik-dzirkak 碑)以及 6000 匹(Uyuk-turan 碑)者,最为贫困的人也拥有一定数量的畜群。^①与突厥的私人所有制并行的还有部落所有制,私人只能拥有羊马,牧地则是部落公有的,各部落的马群烙印有不同的印记,且各有不同的放牧区域^②。“虽迁徙无常,而各有地分”^③,由于游牧需要区分冬、夏牧场,一般的部落营地都在冬牧场附近,同时允许各家利用闲荒隙地,兼营各种副业,由此可以推断土地的私有制开始出现。奴隶是突厥人财产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其主要来源是随着汗国的壮大和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而被征服和掠夺来的,这些奴隶主要是照看牲畜,提供各种手工制品和农产品。突厥社会内部也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大体可以分为贵族、因战争致富的平民和唯习游牧的平民三种。随着经济的繁荣,突厥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的织锦丝绸、金银器皿以及各种带钩、带饰和铜镜已经广泛地为之所用。

在 6 世纪末,亚洲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突厥的南面,中国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局面,波斯帝国与突厥时战时和,并且乘东罗马帝国内乱,兵临博斯普鲁斯海峡,达拉要塞以及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尽为所占,国势复振,波斯帝国出现了撒珊王朝复兴的景象,突厥于此时发生了 20 年之久的内战。此前,中国的北齐、北周实际上是突厥的儿皇帝,西亚一带的诸小国沦为突厥的部属,波斯帝国也常常屈从于突厥的军事压力之下。隋朝统一之后,隋文帝下决心脱离对突厥的藩属关系,停止对突厥的岁贡,这批岁贡乃是维系突厥汗国强大的重要物质保证,也是突厥取得臣下效忠和垄断丝路贸易财源的重要手段,隋朝的绝贡使之骤感国用不足,并且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④于是突厥汗国开始对境内的属部大肆敛财,以拯救财政

① [日]护雅夫:《古代トルコの社会构造》,载《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I,山川出版社昭和 55 年版,第 115 页。

② 《唐会要·诸藩马印》。

③ 《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传》。

④ 薛宗正:《突厥史》,第 146—148 页。

危机,但是其境内人丁稀少、地产贫瘠,以至于“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君长,仅有私怨,突厥之北,契骨之徒,切齿摩牙,常伺其后”^①;“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②,其内部矛盾激化。

突厥汗国分裂的另一重大原因在于其国家制度合法性的破坏。其国制初设四大汗国,后来增设至大小七个汗国,这种旨在削藩、推恩的制度遭到了失败,因为增设汗国的最初目的是针对日益强大的西面可汗,但是小汗数目的增加,旧有可汗封地有所削减,其封地尽在西面可汗境内^③,这使得四大汗国内部矛盾急剧激化。突厥分裂以后,唐帝国开始联合西突厥,并发展为和亲政策,与之结成军事同盟,同时利用和平互市的机会,向突厥购买了大量的战马和耕牛^④,为战争做了准备,虽然两国战争互有攻守,最终东突厥终为所破,突厥族成为了大唐帝国诸民族的一员。

(二) 西突厥向农业区的融入

西突厥和东突厥一样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但是西域的地理条件和漠北迥异,加之受西域各族的影响,开始出现了城居化和定居化的趋势。西突厥可汗牙庭由草原向城堡转移。留居在漠北的突厥部落恪守马上民族的习俗,自突厥建国开始,直到后东突厥汗国灭亡,可汗设牙庭于都斤山,一直是结帐而居,后东突厥汗国曾经一度“欲修筑城堡”^⑤,为谋臣劝阻,游牧民族一直拒绝定居的生活方式,西突厥建国之初尚保持这一习俗,到了统叶护可汗之世,风气已经发生了变化。《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载碎叶已经为统叶可汗的政治中心了,其夏日依旧野外结帐,冬日则入城居住,巴尔托里德《七河史纲要》明确记载碎叶为西突厥都城,到了乞毗咄陆可汗时期,城堡的地位更加重要,“保可贺敦城,自轻出招叛亡,阿悉吉·阙俟斤

① 《北史》卷九九,《突厥传》。

② 同上。

③ 薛宗正:《突厥史》,第142—146、175页。

④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八年(625年)正月,突厥颉利可汗……遣使朝贡。”《唐会要》,卷九四:“八年正月,吐谷浑、突厥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

⑤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九六《突厥》,中华书局2000年版。

逆击之，(乙毗)咄陆败，袭取白水胡城以居”^①，阿史那贺鲁称汗“独居一城，深沟高垒，用以自固”^②。这说明突厥的习俗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化：(1) 西突厥两厢部落酋首大都建都于城堡，虽然其两厢基本上属于游牧地区，但是其部酋基本上已经城居化了；(2) 岭右诸突厥部落早已经入境随俗，城居化、定居化的程度更高于两厢本部。^③

可以肯定，“某些突厥部落……在公元十至十一世纪进入定居城市文明阶段，西突厥汗国正处于由游牧文明向城市文明过渡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④。突厥向农业经济区域的渐渐融入，迁徙型的游牧经济逐步地变成了要塞型的农业经济，失去了其固有的机动性。

(三) 西突厥汗国消亡的地缘政治后果

突厥汗国以前，亚欧大陆腹地诸部林立，没有统一的政治军事力量维持这一广袤地域的秩序，这一地区局面非常混乱，丝绸之路的贸易也缺乏有效的保障体系。东、西突厥汗国建立后，凭借其军事力量，在各部、各属国设立颉利发、吐屯等监国，征调兵马，督其征赋，“虽移徙无常而各有地分”^⑤。在公元6—8世纪突厥称雄于漠北和西域，并与东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和中国的北齐和北周发生了密切的交往。

突厥曾经两次佐北周伐北齐，第一次发生在公元563—564年，结果以北周和突厥联军打败而告终，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突厥引兵躲避北齐兵锋，致使联军失败；第二次发生在公元564年，仍然因突厥“寇齐并州，众十余万，入长城，大掠而还”^⑥，这与不认真作战有关。突厥参战的主要原因在于获得中国对西域丝绸贸易的垄断权。

突厥与波斯最初的关系建立在联军破恢哒人时，恢哒人是突厥

①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

②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三三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 薛宗正：《突厥史》，第338—341页。

④ [苏联]伊斯卡柯夫：《古代突厥城市的兴起》，原载于《共产主义旗帜报》1983年9月30日，热夏提汉译文载《中亚研究史料》(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内部刊物)1985年第1期。

⑤ 《周书》卷五十，列传四二，《异域下·突厥》。

⑥ 《资治通鉴》卷一六九，陈文帝天康四年、五年。

的宿敌,同时,波斯正迫于怛哒人的压力,被迫向之进贡称臣,于是两国决定结盟联合破怛哒,但是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两者就因为瓜分怛哒人的土地上发生争执,最后,突厥撕毁协议,将怛哒旧境全部据为己有。事实上,引发波斯和突厥冲突的重要原因还在于丝绸贸易纠纷。河中地区被突厥接管以后,因为丝绸贸易是这一地区的主要项目,而此时波斯已经能够生产蚕丝,实行丝禁以保护自己本国的丝业的发展,这对于突厥是不利的。公元567年,突厥派使者进行交涉,结果多被波斯人投毒杀死,两国交恶,突厥于是决定和东罗马联盟以对抗波斯。公元568年突厥使者到达君士坦丁堡,谒见了查士丁尼二世,两国正式结盟,东罗马准许突厥商人不必经由波斯中介,直接入境进行买卖,最后爆发了长达20年之久的两国联军攻打波斯的战争,但是两国联盟最终没有消灭波斯,相反,由于东罗马帝国收留了突厥的叛属,最后两国联盟破裂。^①

尽管中国、波斯和突厥为争夺丝绸之路的战争持续不断,但是丝路贸易从未停止过,不同的只是该地域的贡赋税收变换了主人而已。突厥汗国的产生,实际上使中国和西方国家间贸易的广大丝路地域结束了混乱,有了保障体系。中国与波斯、大食、东罗马帝国等丝路贸易大国有了直接的接触与往来,西突厥抵御了大食帝国向葱岭以西、中亚地区的扩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丝路贸易的屏障,唐帝国与大食的直接战争得以避免。^②隋唐两朝几经努力,最终击败了突厥汗国,东突厥内附,西突厥西迁,中国等于全盘接受了突厥汗国留下的政治遗产,安西、北庭都护府以及伊、西、庭州和羁縻州府的设置,就是在突厥汗国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建设。

中国、突厥、波斯、东罗马、怛哒、柔然诸大国在亚欧大陆腹地争战不休时,在阿拉伯半岛从事游牧业的阿拉伯人在西亚悄然兴起。尤其当波斯与东罗马帝国因长达数十年的战争而实力大为削减之后,大食帝国便乘机在这一地区迅速扩张。公元636年(贞观十

① 薛宗正:《突厥史》,第107—108页。

② 李伟明:《安西大都护府的伟大功绩和突厥对丝绸之路的贡献》,载《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年),大食帝国打败了东罗马帝国,夺取了其东方领土叙利亚,不久又兼并了波斯萨珊王朝。从8世纪初开始(公元705年),大食名将异密屈底波开始东侵,先后破中亚安国、康国、俱密、石国、拔汗那、吐火罗等国,葱岭以西逐渐成为大食的领土。作为唐朝的属国,西域各国纷纷向唐求援,从两唐书及《册府元龟》等中国史籍的记载看,当时唐朝并无实力和意志阻止大食的东侵,对各国的求援只能敷衍搪塞。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对于葱岭以西形势的严峻及大食东侵的后果(大食东侵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唐朝,设立中国总督)全然不了解,或者说对形势的估计(尤其是安史之乱后西域的形势)根本错误,而这一时期在葱岭以西只有西突厥还有力量足以与大食抗衡,并且与大食军队多次激战。西突厥阿史那氏附唐后一直是抵御大食向外扩张的中坚力量,率十姓突厥先后曾领伊西节度使、绩西节度使、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平西道行军大总管、武威道行军副总管、定远道行军大总管等职。开元二年(714年),阿史那献西征都坦,光复碎叶,遏止了大食。开元三年,阿史那献主持定远道行军,远征铁门关(布兹加斯山口),攻克西拔汗那,全面反攻大食。《册府元龟》卷999载有大食东侵时,康国、安国、吐火罗、俱蜜等国向唐朝求援的表文,表文均将救援的希望寄托在突骑施部身上。如安国表文(开元七年二月):“……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滋泽,仍请敕下突骑施,令救臣等。臣即统统率本国兵马,计会破大食。伏乞天恩,依臣所请……。”^①吐火罗叶护开元十五年遣使上表:“……奉颂天可汗进旨云,大食欺侵我,即与你气力,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悯,与奴身多少气力,使得活路。又承天可汗处分突骑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其事若实,望天可汗却垂处分奴身……。”^②当大食东侵时,突厥突骑施首领苏禄往往协同中亚各国打击大食,大食深为所苦。史载异姓突厥突骑施苏禄兴起,唐册封为十姓可汗、“金方道经略大

^①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② 同上。

使”苏禄率突骑施多次重创大食。718年(开元六年),大食贾拉赫率军攻入河中,并准备入侵中国,被突骑施包围,被迫付赎金后逃走。开元七年(719年),大食阿布德从呼罗珊大举入侵河中,安国、俱蜜国告急。苏禄驰救,挫败大食进攻。开元八年(720年),大食赛义德再犯河中,被莫贺达干击败,包围于飒秣建城中,导致河中各国纷纷起义反抗大食。开元十一年(723年),大食再次兴兵进攻东拔汗那,突骑施奉诏驰援,又一次大破大食。开元十二年(724年),希沙木哈利发再次派遣穆斯林率大食军进攻东拔汗那,包围渴塞城,苏禄遣其子尔微特勤驰救。在突骑施攻击下,大食军狼狈逃过药杀水,又遭石国、康国夹击,败退回忽毡。是役沉重打击了大食,被大食称为“渴水日之战”灾难。开元十五年(727年),大食呼罗珊总督阿什拉什的暴政激起河中、乌浒水域诸国反抗。突骑施应吐火罗国之请,于开元十六年(728年)出兵,攻入捕喝,进军乌浒水南,与大食决战。729年,苏禄又发起反攻,将阿什拉什围困在飒秣建城。730年,苏禄又与来援救的大食呼罗珊总督朱奈德激战于撒秣建、捕喝城,从而将大食势力遏止在河中个别孤城中。开元十九年(731年),朱奈德率兵进攻吐火罗,企图一举消灭吐火罗、突骑施支持的波斯复国势力。苏禄率兵进军河中,迫使大食撤兵。开元二十年(732年),苏禄会合康国,进攻大食占据的飒秣建,将引兵来救的朱奈德重重包围,大食2000精兵伤亡殆半,直到哈利发遣兵来救,方才获救。在突厥突骑施的不断打击下,大食的向外扩张活动遭遇重大挫折,东侵中国的计划化为泡影。因此大食称苏禄为“AbuMuzahim”,即挑战者或头触者。^①

8世纪后期,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并且于751年击败唐朝,突厥人开始日益伊斯兰化。^②突厥几个世纪里一直在亚欧大陆腹地及其周边地区进行大迁徙,在迁徙中人种发生变化,突厥文化也日益多

① [苏联]巴尔托里德：《中亚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7页。

②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375页。

元化。^① 尤其是,一贯信奉中北亚游牧民族原始萨满教的突厥人,大多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由突厥人或突厥化民族建立的哈拉汗、迦色尼、塞尔柱等三个王朝,在中亚历史乃至亚洲历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塞尔柱帝国的崛起,将突厥人的冲击作用推向了高峰。塞尔柱突厥原住在中亚北部草原。公元1000年时由酋长塞尔柱带领移至锡尔河下游,过后再迁至呼罗珊地区。1037年,它打败迦色尼王朝,占据伊朗大部分地方。1055年,塞尔柱大兵进入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奉哈里发为傀儡,自己作为“素丹”而成为世俗国王。随后,塞尔柱人继续西进,打败各处阿拉伯人及拜占庭人,攻克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等要地。全盛时期的塞尔柱帝国,其版图极为广阔,东起中亚锡尔河、哈阿姆河上游一带,西括小亚细亚半岛,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伊朗的几乎全部、中亚大部分地区都是它的领土。只不过,它毕竟是走向农耕化的游牧民族,政权未保持严格的统一。因塞尔柱的到来,引起了拜占庭皇帝的极度恐慌。拜占庭向罗马教皇求教,由此引发了长达两个世纪的西欧十字军东征。依附于塞尔柱突厥而从中亚一直跟到小亚西北部的奥斯曼土耳其(即突厥)人,14和15世纪里征服了巴尔干半岛上的欧洲人,推翻了拜占庭帝国,并在16、17世纪中发展成为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庞大帝国。

与此同时,突厥人开始进入哈里发王朝的军事机构,日益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随着哈里发王朝的日渐衰弱,突厥雇佣军由原来的仆人变成了主人,好战的突厥人迅速地将伊斯兰教国家的边境扩张到了小亚细亚和印度,这种势头直到蒙古帝国崛起以后,才被遏制住。^②

由于西突厥的坚强屏障,才使得唐朝有近百年的时间经营西域、中亚的丝绸之路,使得葱岭内外的贸易路依然畅通。自唐与突骑施

① 刘景华:《论古代中北亚游牧民族的移动及其影响》,载《长沙电力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5卷第1期。

②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375—377页。

交恶,吐火罗被灭,突骑施衰亡,“唯有大食,莫逾突厥”^①的格局打破,大食必然与唐朝为控制丝绸之路而发生正面冲突。天宝十年(751年)七月,高仙芝率唐军与大食在中亚怛逻斯发生激战,唐军败绩,大食遂控制葱岭以西的丝绸之路。唐朝近百年来在葱岭以西的经营彻底结束,中亚各国从此脱离中国政府。

第二节 亚欧大陆腹地社会制度的变革

和早期其他生活在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一样,蒙古最初的社会组织也是以血缘关系为主,这种方式对于农业民族以地缘为主组织而成的社会在军事上更有效率性,蒙古崛起以后,成吉思汗改革了蒙古的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将游牧民族自有的机动性发挥到了极致。

一、蒙古早期的社会组织——阿寅勒和古列延^②

阿寅勒(ayil),蒙古语意为若干个帐幕和幌车组成的牧营或牧户;古列延(küriyen/grüyen)是由许多阿寅勒聚集而成的。

根据《蒙古秘史》记载,阿寅勒在成吉思汗12世祖脱罗豁勒真时代(约9世纪后半叶)就已产生。^③11—13世纪的蒙古牧民从事畜牧和狩猎,其经济生活主要是畜牧。蒙古游牧民拥有牛、绵羊、山羊和马,骆驼很少。^④那时的蒙古牧民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采取一个或几个血亲相近的个体家庭或家族在一起自行放牧,即“阿寅勒”^⑤;另外一种结成相当大的集团来生活和游牧,即“古列延”^⑥。

① 《全唐书》卷九九九。

② 蒙古语音译词,古代蒙古族个体经营畜群的方式,从事游牧生产的原始经济活动形式。

③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8页。

④ [苏联]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

⑤ 《蒙古秘史》,第89、128节。

⑥ 同上书,第5、6、7、8、73、82、85、90、100—102、213节。

在 11—12 世纪的蒙古人 , 或者以阿勒寅 , 或者以古列延的方式进行放牧。因为 , 对于游牧经济而言 , 特别是对于马群来说 , 大牧群的方式并不可取 , 较为富裕的牧户会采取阿勒寅的放牧方式 , 而贫穷者则选择古列延的放牧方式。但是 , 古列延的方式无法解决袭击和战争。^① 因此 , 大古列延分成若干小古列延 , 小古列延再分为若干阿寅勒。

个体家庭阿寅勒逐渐发展成为蒙古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 , 自 10 世纪以来 , 古列延这种共同经营畜群的方式逐渐演变成军事组织。

二、蒙古汗国的建立及其国家制度

铁木真等人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战 , 终于在 1206 年春建立了大蒙古国——“也克·忙豁勒·兀鲁思”。铁木真及蒙古贵族们在斡难河举行仪式 , 建九脚白旌纛 , 即蒙古国大汗位 , 号成吉思汗 (在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即汗位时就被称为成吉思汗 , 但那时他只是蒙古部的一个首领而已)。“成”在蒙古语中意为强大 , “成吉思”是它的复数形式 , 表明成吉思汗是蒙古高原最强大的君主。蒙古国建立后 , 成吉思汗制定了一套统一的国家制度。

(一)《大札撒》

《大札撒》是成吉思汗时期实行的成文法典。札撒 , 意为“法度”、“军令”。《元史·太宗纪》:“大札撒 , 华言大法令也。”

成吉思汗统治初期 , “当蒙古各部归并于他的时候 , 他废除了那些蒙古各族一直奉行、在他们当中得到承认的陋俗 , 然后他制定从理性观点看值得称赞的法规。这些法规 , 很多是符合沙利阿特的”^②。蒙古各部统一后 , 成吉思汗重新确定关于治理国家、训练军队、整顿社会秩序的种种“训言”和以前的“札撒”。《大札撒》原文已佚 , 散见于《世界征服者史》、《史集》、《埃及志》等书。据《元朝秘史》等记载 , 成吉思汗在征战过程中 , 为了加强战斗力 , 曾在各种不同场合相继颁布过若干“札撒” , 如 1202 年在与塔塔儿部交战之前 , 就“号令

① 同上书 , 第 79、81、90、98—103 节。

②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第 28 页。

诸军,若战胜时,不许贪财,既定之后,均分;若军马退动至原排阵处,再要翻回力战,若至原排阵处,不翻回者斩”^①。1203年,在战胜克烈部王罕后于帖麦该川大猎时,又举行大聚会,“订立完善和严峻的法令”^②。1204年征服乃蛮时,令整治军马,宣布违反《大札撒》的人,要处以死刑。1206年各部实现统一后,又将原有习惯法及成吉思汗本人关于治理国家、训练军队、整顿社会秩序的各种“训言”和“号令”,作为处理国家事务的依据,并载入青册。1219年(金兴定三年),成吉思汗在亲征花剌子模前,又召集一次大会,对“(自己的)领导规则、律令和古代习惯重新作了规定”,“依据自己的想法,(他)给每个场合制定一条法令,给每个情况制定一条律文,而对每种罪行,他也制定一条刑罚。因为鞑靼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便下令蒙古儿童习写畏吾儿文,并把有关的札撒和律令记在卷秩上。这些卷秩称为‘札撒大典’,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会集共商国事和朝政,他们就把这些卷秩拿出来,仿照上面的话行事,并根据其中规定的方式部署军队,毁灭州郡、城镇”^③。

《大札撒》虽已失传,但从有关记述中,仍可看到其中某些条款的内容。例如,那颜们除君主外不得投托他人,违者处死;擅离职守者亦处死;构乱皇室,挑拨是非,助此反彼者死;发现及收留逃奴而不交还其主者死;盗人马畜,除归还原马外,应赔偿同样的马九匹,如不能赔偿,即以其子女作抵押,若无子女,则将本人处死;“谁个胆敢反对他(成吉思汗),他就执行他颁布的札撒和法令,把此人连同他的部属、子女、党羽、国家和土地,统统毁灭干净”^④,等等,就是例证。有些习惯、禁忌,也被收入《大札撒》中。

该部法典已失,但在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以至元朝时期,一直是蒙古族所遵行的重要法典,并主要在蒙古地区实行。法典内容包括政治、军事、行政、刑事、民事、贸易、社会秩序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① [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第102页。

②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5页。

③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28页。

④ 同上书,第27页。

《大札撒》是蒙古国一切生活的准则、制度和法令。

《大札撒》不仅规定了选举、外交、诉讼、刑事犯罪等条文，还规定了商业、赋税、义务、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条文。《大札撒》对新建立的蒙古国家政权的巩固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千户制

千户制是成吉思汗于1204年创制的军政合一的制度。是世袭之职，对大汗有交纳贡赋、带兵出征作战的义务，也可参加讨论军国大事。

千户制的特点是，将全部牧民用军事方式编制起来，使之隶属于各个千户那颜。^①每个千户，既是军事单位，又是基层社会组织。千户一般授予开国有功的功臣，令世袭管领。成吉思汗即位后，将全蒙古部众划分为95个千户^②，册封给有功之臣，即千户那颜。千户之上是万户，封木华黎为左翼万户，统辖地直到大兴安岭以东，封孛斡儿处为右翼万户，统辖地至畏兀儿阿尔泰山西麓。各千户长要由功臣来担任此职，千户之下又分为百户、十户。万户、千户、百户、十户的大小规模不尽相同。有的名为千户，实际户数多达数千。如术赤台千户，即由4000兀鲁兀部众组成，也有不足1000户的。据《史集》记载^③，成吉思汗母亲诃额伦和季弟铁木哥斡赤斤共得“忽必”（份子）1万户，二弟合撒尔4000户，三弟合赤温子阿勒赤歹2000户，异母弟别勒古台1500户，长子术赤9000户，次子察合台8000户，三子窝阔台5000户，幼子拖雷5000户。百户也有类似情况。

千户的组成各不相同：一些是由同族结合而成的，如弘吉剌部的按陈驸马，亦乞刺思部的孛秃驸马，汪古部的阿剌忽思；一些是重新收集分散在各部的同族组成的，如伯岳吾部汪古儿、捏古思部纳邻脱斡邻勒、忙兀部的畏答儿、兀鲁兀部的术赤台等大都率部投诚后忠心不二者，还有一些是由不同部族组成的，这是多数，多为成吉思汗在战争中夺获的俘虏。此外，成吉思汗还将他的母亲、兄弟、亲属们

①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362—385页。

② 《蒙古秘史》，第191页。

③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362—385页。

分配为不等的万户、千户。

各级那颜为受命管理百姓的地方军政长官,他们必须绝对服从大汗和大汗的宗亲。如发现有渎职或背逆行为,大汗及其宗亲有权随时加以撤换或惩处。万户和千户那颜在其管辖范围内,不仅享有世袭封地权利,还拥有分配牧场、征收赋税、差派徭役、统领军队的权力。建有特殊功勋、被授予“答刺罕”称号的那颜,享有免除赋税、独有战利品、不受法律约束和制裁、九次犯罪不受罚、有自由放牧等权利。

千户制是打破旧有的部落组织而建立起来的。^①它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方行政单位。通过千户制,全蒙古百姓都被纳入千户之内,并被固定在指定牧区内,不得任意移动;“人们只能停留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违反此令,迁移者要被处死,收容者也要受严惩。因此,谁都不得庇护谁;如果长官是位宗王,那他决不会让一个最普通的人在他的队伍中避难,以免破坏这条札撒。所以,没有人能够随意改换他的长官或首领,别的长官也不能引诱他离开”。^②凡年满15岁至70岁的男子都要服兵役,并随时根据国家命令,自备马匹、兵仗、粮草,由千户、百户长带领出征;所有男性公民,既是牧民,又是战士。

所有的这些规定,彻底改变了亚欧大陆腹地以往的管理模式,稳固了大汗的权位,使分散的各部再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强大的势力来对抗汗庭。千户制的建立,是成吉思汗在军政制度方面的重大改革,改变了以往氏族、部落联盟自由结合的分散状态,促进了经济的相互渗透和吸收,还把各级那颜和广大百姓固定于特定的地域内,从而形成层层的隶属关系,形成了新的管理模式,产生了极大的效率。

(三) 怯薛制

怯薛,突厥—蒙古语,汉译多作“宿卫”,蒙古、元朝护卫军。怯薛人员称法薛歹、怯薛丹。辽、金时,蒙古高原各部落首领皆有宿卫

① 《蒙古秘史》,第124页;〔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第133页。

②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34页。

亲兵。分旧番入值 护卫皇帝 亦称旧怯薛。

怯薛是 1204 年成吉思汗为迎击乃蛮部太阳汗时组建的。1206 年 蒙古国建立后 成吉思汗又下令进行扩编 将原有宿卫 80 人 护卫、散班 70 人 扩充至 1 万人 其中 1000 名充宿卫 1000 名充箭筒士 8000 名充散班。散班由万户、千户、百户和十户那颜以及白身人儿子中有技能、身体强健者充任。千户那颜儿子许带弟 1 人、伴当 10 人 百户那颜的儿子许带弟 1 人、伴当 5 人 十户那颜及白身人的儿子许带弟 1 人、伴当 3 人。其所需马匹、物品等项 除以本人所有财产充用外 许按规定于本管民户内征敛供给。^① 它实际上是为控制分布于各地的各级那颜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怯薛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大汗金帐和分管汗庭的各项事务 分别为：火儿赤——佩弓矢者（环卫）；云都赤——侍上带刀及弓矢者（环卫）；昔宝赤——掌鹰隼者；札里赤——书写圣旨者；必阇赤——书记、主文史者；博尔赤——厨子；八刺哈赤——守城门者；答刺赤——掌酒者；兀刺赤——典车马者；速古儿赤——掌内府尚供衣服者；帖麦赤——牧骆驼者；火你赤——牧羊者；忽刺罕赤——捕盗者；虎儿赤——奏乐者。

怯薛还从事宫廷服役 有昔宝赤、速古八赤、必阇赤等繁多名目 称怯薛执事。皇帝死 其斡耳朵（帐殿）保留一定员额怯薛歹。诸王亦各有怯薛。入元后 怯薛歹成为近侍大官 朝廷大员及重要官员多由此出身。怯薛歹任官 经由怯薛长向皇帝荐举 不经中书省奏议 称别里哥选。出任随朝官员后 仍按番入直宫廷服役。

护卫军的职责明确 制度严格。怯薛分 4 队 轮番供值 每三昼夜轮值一次 称“四怯薛”。“四怯薛”分别由成吉思汗的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任长官 后裔世袭。博尔忽领第一怯薛（博尔忽早死 后由成吉思汗名义代领）博尔术领第二怯薛 木华黎领第三怯薛 赤老温领第四怯薛。此外 每一个宿卫、教班或箭筒士 又由专人统领 统领由亲信那可儿担任。

凡怯薛军成员 享有特权 其地位在外地的千户长那颜之上 若

^① 《蒙古秘史》第 224 页。

千户长与护卫军发生争斗,则先治千户那颜罪。护卫军还可直接参与断案和听审,向外传达大汗旨意,护卫军还可出差发杂役。调任外官时,大都担负重要职务,免各种杂役。

怯薛的建立,对于蒙古帝国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成吉思汗的对外扩张都起了重要作用。

蒙古国的建立使蒙古高原各部落结束了各自为政、互相争战的局面,形成了一个有统一制度的国家,因此成吉思汗在祖国的统一事业中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同时,生活在蒙古高原的人民也结束了多年的战乱生活,逐步趋于稳定和繁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第三节 蒙古帝国时期游牧经济的机动性分析

蒙古征服的辽阔帝国至今尚无国家超越,最为核心的原因在于其经济运行机制中所蕴含的极大机动性,这种机动性表现为生活条件、生产条件和战斗条件的一致性。

一、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的一致性

(一) 生活和生产的共同目的——畜群

畜群作为游牧经济的生产成果,既表现为生产的手段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如一头母畜,当它产奶时就充当生活资料,当它产仔、产毛时就充当生产资料;一头公牛当它被用于乘骑、拉车、驮载货物时就充当生产资料,当它被宰杀食用时它的肉就充当生活资料,皮毛既可充当生活资料又可充当生产资料。

从游牧民族的历史上看,畜群构成了其生产和生活的核心内容。关于古代蒙古人的人均最低需要量,1920年,И·М·马伊斯基在对一个普通游牧家庭生活费用进行了专门调查,根据他的资料,五口人

家需要 13 头牛、90 只羊、3 只骆驼和 14 匹马，共 120 头，人均 24 头。^①

在游牧经济几千年的历史上，存在过牧畜头数多达数以万计甚至数以十万计的大规模游牧生产。《元史译文证补》说：莫伦之“畜群富饶，每登山以观，牲畜遍野，顾而乐之”。《史集》中也写道：“每隔几天，她就要吩咐将畜群赶到一起，她的马和牲畜，多到无法计算，当她坐在山头上，看到从她所坐的山顶直到山麓大河边满是牲畜，遍地畜蹄……”^②。鲁布鲁克也看到，拔都每天饮用 3000 匹马的马奶做成的忽迷思。^③ 据此可推算出拔都马群规模：可以挤奶的牝马有 3000，不能挤奶的牝马也不少于 3000，总计 6000，骟马亦有 6000。这样，马群总数不少于 12 000 匹。在游牧经济条件下，马和羊群之间存在着 1：6 或 1：7 的自然比例，而牛群规模一般与马群规模相当。^④ 根据这种自然比例，拔都的畜群规模可达 10 万头左右。这种经营大规模游牧畜牧业的事实可以从蒙古国学者研究整理的有关 18—20 世纪蒙古贵族经济资料中得到证实：（1）1773 年博格德·格根有牧畜 91 253 头，到 1864 年就增加到 118 506 头，年平均增长 300 头；（2）多日崔列恩王公的牧场有牧畜 15 000 头以上；（3）札木仓霍尔洛王公有牧畜 11 071 头；（4）拉马英·格根的畜群在 1921 年前有 9000 只骆驼、12 000 匹马、150 000 只羊。^⑤ 据王龙耿、沈斌华的估算数据：13 世纪为 110 余万，14 世纪 200 万左右，15 世纪 160—190 万之间。^⑥ 根据上述两个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出 13、14、15 世纪蒙古百姓的牲畜总头数：13 世纪为 2640 万头，14 世纪为 4800 万头，15 世

① [苏联]И·Я·兹拉特金：《游牧民族社会经济史的几个问题》，载《民族译丛》1981 年第 5 期。

② [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 1 卷第 2 分册，第 18 页。

③ [意]柏朗嘉宾、[法]鲁布鲁克：《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可东行记》，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14 页。

④ 《蒙达备录》说：“有一马者，必有六七只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

⑤ [苏联]И·Я·兹拉特金：《游牧民族社会经济史的几个问题》，载《民族译丛》1981 年第 5 期。

⑥ 王龙耿、沈斌华：《蒙古族历史人口初探（11 世纪—17 世纪）》，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 年第 5 期。

纪为 2240 万头—4560 万头之间。^①

对于 13、14 世纪的蒙古人来讲,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的不是金银,而是畜群,有了畜群就有了一切。在畜群中,马匹的牧养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马能够提供给游牧民族马乳、马肉以及皮和毛,提供了游牧民族基本的生存资料——食品和服装。马的使用标志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马是游牧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它比一切更受重视,马的使用不仅使游牧成为可能,而且引发了游牧社会生产力的一系列变革和进步。

(二) 游牧民族的居住形式——编壁毡房蒙古包

公元 7 世纪前,蒙古人的住房是皮棚。那时有相当多的蒙古人以狩猎为主要谋生手段,他们把猎获的野兽皮剥下来,覆盖在木头支起的架子上作为住房。到公元 8 世纪以后,蒙古人逐渐脱离皮棚,住进了毡包。《蒙古秘史》中称“斡鲁格台儿”或称“失勒帖速台格儿”,意思是有天窗的房子和有编壁的房子,都是指蒙古包而言,我国汉文古籍称穹庐、毡帐,也叫帐幕。

在现代蒙古语,编壁“失勒帖速”为“哈那”一词所取代,“格尔”这个词泛指一切房屋,“斡鲁格”一词则专指蒙古包天窗的毡帘。有趣的是,蒙古语称地穴为“斡鲁格”,由此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蒙古包是由古代游牧民的皮棚或地窝堡发展而来的。

蒙古族的住房被称为“蒙古包”,是在我国满族和蒙古族接触频繁以后。满语称家为“博”,故满族把蒙古人的房屋称为“蒙古博”,“博”和“包”谐音,于是用汉字表达时,取其音和形,写作“蒙古包”。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蒙古包,是蒙古民族的传统住房,蒙古人住蒙古包至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蒙古包是圆形的,由条木椽子、网状编壁(即哈那)、圆形天窗和门构成,外面盖上毡子,再用鬃毛绳或皮绳子加固而成。蒙古包编壁底部还有一层围毡,夏天掀开通风,冬天放下来保暖。蒙古包的大小规格,是由每顶包所用哈那的数量多少决定的。通常分四、五、六、

^① 包玉山:《蒙古族古代游牧生产力及其组织运行》,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七、八、九、十、十二个哈那的蒙古包。就是同一个类型的蒙古包也分大中小三个规格。如果是五个哈那的蒙古包,大型的就比小型的多十根椽子。在这些蒙古包中,牧民一般都喜欢住五六个哈那的蒙古包。

搭盖蒙古包有严格的次序。首先铺好地盘,然后依次按照下列顺序进行:竖立包门,支撑哈那,系内围带,支撑木圆顶,安插椽子,铺盖内层毡,围哈那毡,包顶衬毡,覆盖包顶套毡,系外围腰带,围哈那底部围毡,最后用绳索围紧加固,就是一顶浑然一体的蒙古包了。

蒙古包是东南向而设的。这与古代北方草原民族崇尚太阳、有朝日之俗有关。但这种东南向习惯不仅是一种信仰,更多的是为抵御严寒和风雪,因为他们居住在高寒地带,冬季又多西北风。

蒙古包的最大优点是易拆易装,便于搬迁。一顶蒙古包只需要两峰骆驼或一辆勒勒车就可以运走,两三个小时就能搭盖起来。再就是可以就地取材,就地制造,民间手艺人就能制作。还有,蒙古包看起来外形虽小,但包内使用面积却很大,而且室内空气流通和采光条件好,冬暖夏凉,不怕风吹雨打。很适合经常移场放牧的游牧民居住和使用,尤其是行军作战。

二、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的一致性

《蒙古秘史》记载,为了获得肉、皮毛和羊毛,他们到处饲养着羊^①,在秋末冬初的时候,就宰羊和冻肉,把它贮存起来。^②各种家畜的肉都供作食物,不但是煮着吃,而且烤着吃^③,乳制品是食物的主要来源之一^④,其食品构成中,也有一些植物的果实。史载:“他们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吃的是这些动物的肉和其他死去的東西。他们的

① 《蒙古秘史》,第100节。

② 同上书,第19节。

③ 同上书,第12节。

④ 同上书,第85、130、145节;(宋)李志常记载丘处机西行蒙古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也有记载。

酒是马奶，甜食是一种形状似松的树木所结的果实，他们称之为忽速黑^①(qusuq)，在当地，除这种树外，其他结果的树不能生长，它甚至长在一些山上，由于气候极冷，那里找不到别的东西。^②”

蒙古军队出发时，一般每人带有三匹战马，随身携带的是较为轻便的奶酪和干肉，如有必要时可以喝马血，吃马肉。^③战马的草料问题也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战斗发生在草原上。由于马匹的草料在整个亚欧大陆腹地俯拾即是，则蒙古骑兵行军时不需要为马匹准备饲料，士兵自带食品和装备，都是最小的用量，尤其是蒙古人的食品结构基本上取材于畜牧业，而且奶酪和肉干体积小、重量轻，因此，实行突袭的军队并不需要庞大的辎重部队，基于畜牧业生产和生活用品的生产特点，也不必保有后方的供应基地。有一个重要的现象，蒙古骑兵大部分的战马是母马，士兵能靠喝马奶生活^④，这样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

13—16世纪蒙古高原上的经济以游牧业为主，狩猎业占相当的分量，只有极少量的农业。其手工业很落后，只有简单的家庭手工业。居住在西北部森林地带的部落以狩猎业为主，其他大部分部落或者半游牧半狩猎，或者以游牧业为主、以狩猎业为辅。游牧部落饲养着牛羊马等牲畜，马的饲养量较大。马受到特别重视，既作为交通工具，又用于战争和狩猎，并以马的乳、肉、皮、毛作为重要的生活资料。逐水草游牧的生活方式，带有军队行军、宿营的特点。

三、生产条件和战斗条件的一致性

(一) 勒勒车

车辆是进行游牧生产所必备的生产工具之一。在蒙古高原上，青铜时代就已经出现车辆并得到大量使用，它是经过一个马拉物的

① 对于这种果实究竟是榛子还是松子，有两种意见，《世界征服者史》的英译者博伊尔(J. A. Boyle)做了详细的讨论。详见〔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25页，注释10。

②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23页。

③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378页。

④ 〔美〕T. N. 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第94页。

阶段,从爬犁演变而来的。^①游牧人用它进行生产、运输货物、防御野兽和敌人进攻。到了11—13世纪,蒙古人的造车技术已相当发达,数量亦惊人。^②史书记载,蒙古人曾使用过“合刺兀台·帖儿坚”——幌车、“合撒黑·帖儿坚”——巨辇、“格儿·帖儿坚”——房车、“贴木儿·贴列格”——铁车等近十种车辆。^③

由于游牧民族迁徙不定,车子成为其交通必需。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早就有造车用车之习俗。据《北史》载,“突厥语称车子为‘康里’”。勒勒车为蒙古式牛车,为草原牧人重要的交通工具。《黑龙江志稿》中云:“蒙人栽重致远,驼、马而外,有达呼尔所制之一种辘轳车,亦称‘大辘轳车’。轮不甚圆,辘不求直,轴径如椽,轮高四尺余,以一牛拽之曳而行,首尾相连,一童子可御十余辆,唯遇山路崎岖,防其损折,须携带斧凿,此为普通运载之车。”

勒勒车的特点为车轮高大,结实耐用。勒勒车的车轮长达1.4米至1.5米,相当于牛身的高度。车轮较大,适于在并不平整的草地、低凹坑陷的沙滩、白雪覆盖的高原上长时间地行进。勒勒车载重量大,载重达200—300斤,挽以1牛。蒙古车的材料主要是干透的树木和桦木,这些树多生长在牧区的山岳地带。它的构造分为车上脚和车下脚两部分。车下脚是由车轮、车轴、车头组成的。蒙古车的车轮子一般是用6个木辘组成的,辘为弧形,衔接为1个轮子,车轮的高度为1.5米,每台车共2个车轮。车轴心长达45厘米,外端直径约为29厘米,内端直径约为32厘米。轴条一般用榆木和柞木制作,每根长达65厘米左右。车轴心与车辘之间,放射状排列36根车辐,支撑车轮。车轴两端有车头,这些部件,构成车下脚。车上脚由车辕、车撑、车槽组成。车辕长达4米多,后半部分配以8至10条横

① 盖山林:《蒙古高原青铜时代的车辆岩画》,载李迪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第1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意〕柏朗嘉宾、〔法〕鲁布鲁克:《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第210—211页,纪流注译:《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③ 《蒙古秘史》,第6、28、55、64、85、100、101、121、124、199、232、234、244、278节;〔蒙古〕贡嘎尔:《喀尔喀简史》(蒙文版)下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01—802页。

撑,轅穿过约1.5米的车槽。在两轅顶端系以编好的绳状柳条,套于牛脖子悬的横木上。这样,勒勒车就可以在交通不发达的沼泽、草地、荒滩上自如地前进。

各地的勒勒车体态构造基本相同,但也有一些适合本地特性的改造。勒勒车按照用途分为轿车、箱车、水车3种。轿车顶上浑圆,有用黑毛绳压边的白毡覆被、可以启闭的毡门。两边有1尺高的栏杆,侧底铺着木板。有的里面还放着皮衣皮袜之类。供为羊守夜的人使用,或者走敖特儿时,让老人孩子坐在里面,慢慢地在前面行进。箱车是用木头打的箱子,上面是三角形的,用毡子覆盖,装在车上,存放一时不用的肉面、衣服、物品。水车是用木头箍的大水桶做成,外面用铁箍约束,现在锡盟有的地方仍然使用。此外,勒勒车还有篷车。《蒙古秘史》里谈到,成吉思汗的夫人孛儿帖兀真就曾躲藏在黑篷车里,逃过了泰亦赤兀惕人的追寻。

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庞大的勒勒车队都是由十几辆甚至几十辆车组成的,最前面的叫“忙豁仑”,为了不使车队走散,每头牛的犄角都用绳子相连,最后一辆车拴有大铃铛,以便使最前面的车能够听到。

车辆的出现和使用,极大地延伸了牲畜的运输能力,迅速提高了游牧生产力,同时也解决了蒙古军队进行长期的远距离征战的后勤问题。

(二) 蒙古马与马具

呼伦贝尔草原是蒙古马的主要产地,蒙古马体质粗壮结实,四肢粗短,坚实有力,体高在120—130厘米之间,体重约为300公斤。其主要特点就是持久力强,能够适应恶劣的气候以及粗放的饲养条件,恋膘性强,抓膘迅速而掉膘缓慢。蒙古马无论严寒酷暑都生活在野外,具有极强的忍耐力,能够在险恶的地形长途跋涉,而且速度惊人。马是游牧民族的交通工具,用于围猎和战争,马的使用及各种马具的发明,构成其发展变化的核心内容。

马具分为基本器具、辅助器具和配套器具三种,基本器具又分为马笼头、马嚼子、马鞍、马镫、马拌、前腿拌六种。从这些基本器具看,一般都是成对配用,各显其能。如马笼头和马嚼子配用,马笼头主要

用于牵引,马嚼子主要用之于骑乘和驾驭;马鞍和马镫配用,主要用于在马上充分发挥手臂、腰部、腿部力量;马拌和前腿拌配用,马拌主要用于新驯服之马,还用于备用之马,使之不能走远,前腿拌的作用则相反。^①

在六种基本器具中产生最早的可能是马笼头,最初的马笼头也只能是一条绳子,用它拴捆马脖加以牵引和控制马。经过人们长期的实践经验和发明创造之后,这条绳才逐渐地演变成了今天的笼头。在使用马笼头的过程中人们发现,用笼头不能很有效地驾驭马。于是,人们用偏缰作嚼子驾驭马,这便是最初的马嚼子,之后才产生了用骨头和铁做的马嚼子。马嚼子的产生标志着马背民族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有了马嚼子更容易调整正在奔跑中的马的方向和速度,使人和马合为一体。^②

马鞍的产生是在马笼头和马嚼子之后,从鞍垫演变而来。恩格斯说:“在较古老的雕塑品上,武士是骑在没有鞍子的马上的;以后,我们发现曾有一种类似褥垫或坐垫的东西,最后,才有类似现今东方流行的那种高马鞍。”^③从考古资料看,在中原地区,殷周时期的马,主要用于驾车,马背无鞍。战国时期才出现了供乘骑用的鞍垫,可称之为“低鞍”^④。马鞍产生之后不久马镫也就产生了。有了马镫之后,人才能长时间地稳坐在马背上并能自由地做各种射箭、套马等动作。

关于马镫的起源,有人认为游牧民族为了乘骑方便而发明了马镫;也有人认为农耕民族为了掌握骑术进行骑兵作战的需要而发明了马镫。据史料记载,战国赵武灵王时期中原人才引进和学会“胡服骑射”,开始使用包括马镫在内的各种马具。据专家们考证,公元

① 杨·巴雅尔:《蒙古族马文化研究》(蒙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247页。

② 包玉山:《蒙古族古代游牧生产力及其组织运行》,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98页。

④ 盖山林:《骑牛岩画·伏牛石刻·用镫时代》,载李迪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第5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187页。

前1世纪或2世纪,中亚游牧民族或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就已经发明了马镫。^①“他们当中大异密^②的标志是:他的马镫是铁制的。”^③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镫是因射箭和套马的需要而产生的。最初的马镫是用绳子做的,这是一个最具革命意义的发明。世界上没有哪一项发明比它简单,但却在人类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对此,李约瑟写道:“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脚踏(马镫)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④因为,从用绳子做的马镫过渡到金属马镫,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只是更进一步的完善而已。

马镫发明以后,骑兵就成了最主要的作战兵种,依靠着骑兵,蒙古军队获得无与伦比的机动性。12至13世纪初,蒙古帝国建立了一支无与伦比的骑兵,大大增强了整个基于地缘经济所带来的对比优势。

蒙古军队大约有40%是从事突击行动的重骑兵,他们全身盔甲,盔甲通常是皮制的,或者缴获的锁子铠甲,头盔和当时的中国和拜占庭的士兵一样为简易头盔,重骑兵的主要兵器是长枪,每个士兵还配有一柄短弯刀或者一根狼牙棒,另外60%是轻骑兵,除了戴有头盔以外,身上不披铠甲,轻骑兵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和掩护,为重骑兵提供火力支援,肃清残敌和跟踪追击。蒙古士兵在战斗之前,披一件丝绸长袍,因为箭很难穿透这种丝织品,只会连箭带布一起射进伤口,因此,医生只需将绸子拉出来,就可以将箭头拔出。^⑤每个骑兵都配有几匹战马,以便急速行军或者长途追袭而不至于速度下降。

标准的蒙古野战部队是由三个万人队组成,每个万人队有10000名骑兵,每个万人队再分为10个千人队,每个千人队分为10

① 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盖山林:《骑牛岩画·伏牛石刻·用镫时代》,载李迪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第5集,第181—187页。

② 蒙古语,将军。

③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23页。

④ [英]李约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页。

⑤ [美]T. N. 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第93页。

个百人队,每个百人队在分为10个十人队,蒙古军队最多的时候不超过24万人,用于西征的部队不超过15万人。

标准的蒙古军队战斗队形是由五个横队组成的,每个横队都是单列的,各个横队之间的距离很宽,前两个横队为重骑兵,余者为轻骑兵,在这五个横队之前另有一些轻骑兵负责侦察。^①

蒙古军队通常采取包抄运动战术,首先由中军发动冲锋,右翼则迅速绕到敌人的背后和侧翼,将敌人包围,或者迫使敌人保护其交通线,乘敌军混乱之际,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蒙古军队还常常诱敌深入,当一股蒙古军队将敌人吸引住,敌人长途袭来,这种过程往往经过几天的时间,敌人完全离开根据地时,蒙古军队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四面八方。对于攻城战役,蒙古军队通常采取突袭的手段,对于防守严密的城池,蒙古军队留下一部分军队围攻,然后主力部队则迅速绕城前进,直袭敌人后方,后方敌军通常没有充分的戒备,蒙古军队的轻骑兵已经冲进了城门。

(三) 游猎

蒙古族远古先民为了生存向大自然获取禽物时,以采集野生果实、猎杀动物为主要生活、生产方式。远古蒙古部落或在深山老林中,或在江河两岸,或在戈壁柴达木原野上繁衍生息。^②那里树木丛生、百草丰茂,飞禽走兽成群结队,大自然优越的生态环境为远古蒙古部落从事狩猎得以生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良好条件。蒙古族狩猎先民们是以“林中百姓”或“林中猎人”之称载入史册的,其活动地域为深山老林或江河湖泊地带。随着狩猎生产的发生和发展及地理环境和物种分布的具体情况,狩猎先民们开始有了生产劳动的详细分工。因而,居于深山老林者,以狩猎动物为生,居于水田河畔者多以捕鱼为生。

随着社会的进步,蒙古族狩猎生活逐渐成为本民族生产活动的主要部分,其基本狩猎形式也几经变革。这在史籍里是有迹可寻的。

^① 同上书,第95页。

^② 扎格尔:《蒙古族狩猎习俗》,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31卷第1期。

据史籍记载,古代蒙古人在狩猎时常用的方法有:设置网套捕捉,用弓箭射杀,驯养鹰隼捕获猎物等。《蒙古秘史》记载:“孛端察儿没有被(哥哥们)当作亲族看待,便说道:‘我还在这里住什么?’他骑着一匹患脊疮的短尾、黑脊青白色马出走,说道:‘(走出去)死就死吧,活就活吧!’顺着斡难河水的流向,纵马而行,来到了巴勒浑·阿刺勒,在那里搭了个草棚住下。那样居住着时,(孛端察儿)看见雏鹰捕捉野鸡吃,便拔取患脊疮的短尾、黑脊青白色马的尾毛,做成套子,把雏鹰捉住。没有食物吃时,(孛端察儿)窥伺被狼围阻在山崖上的野兽,射杀而食之,或去拾取狼吃剩的兽肉充饥,兼养自己的鹰。他就这样渡过了那一年。到了春天,野鸭飞来了时,(孛端察儿)把自己的鹰放了出去,捕捉到(许许多多)野鸭和雁,(吃也吃不完,)挂在许多枯树上,散发出臭气,挂在许多乾树上,腥气难闻。”^①这里所云“(用)黑脊青白色马的尾毛,做成套子”,“窥伺射杀”和“放鹰捕捉”等,都是古代狩猎生活十分真实而生动的写照。诸如此类用马鬃、马尾编织网套,以捕鱼猎兔、网罗飞禽等,不仅见于史籍记载中,其基本形式至今在蒙古族狩猎生产活动中被沿用。驯养鹰隼来捕捉猎物,这一狩猎形式曾以“释鸨兀阑灰”(蒙古语,意为驯禽捕猎)之称,在古代蒙古人中广泛盛行。《蒙古秘史》所载:“那时,也速该·把阿秃儿在斡难河畔放鹰捕猎。”^②“朕等放鹰围猎时,宿卫与朕等同去放鹰围猎。”^③“成吉思汗极其重视狩猎,他常说,行猎是军队将官的正当职司,从中得到教益和训练是士兵和军人应尽的义务,他们应当学习猎人如何追赶猎物,如何猎取它,怎样摆开阵势,怎样视人数多寡进行围捕。因为,蒙古人想要行猎时,总是先派探子去看有什么野兽可猎,数量多寡。当他们不打仗时,他们老那么热衷于狩猎,并且鼓励他们的军队从事这一活动:这不但为的是猎取野兽,也为习惯狩猎锻炼,熟悉弓马和吃苦耐劳。每逢汗要进行打猎(一般在冬季初举行),他就传下诏旨,命驻扎在大本营四周和翰耳朵附近的

① 《蒙古秘史》第24、25、26、27节。

② 《蒙古秘史》第54节。

③ 同上书,第232节。

军队作好行军准备,按照指令从每十人中选派几骑,把武器及其他适用于所去猎场的器用等物分发下去。军队的右翼、左翼和中路,排好队形,由大异密率领;他们则携带后妃(khavātin)、嫔妾、粮食、饮料等,一起出发。他们花一两个月或三个月的时间,形成一个猎圈,缓慢地、逐步地驱赶着前面的野兽,小心翼翼,唯恐有一头野兽逃出圈子。如果出乎意料有一头破阵而出,那么要对出事原因作仔细调查,千夫长、百夫长和十夫长要因此受杖,有时甚至被处极刑。如果(举个例子)有士兵没有按照路线(蒙古人称之为捏儿格(nerge))行走,或前或后错走一步,就要给他严厉的惩罚,决不宽恕。在这两三个月中,他们日夜报告猎物的情况,其数之多寡,已赶至何处,从何地将野兽惊起,等等。最后,猎圈收缩到直径仅两、三帕列散(parasang)时,他们把绳索连结起来,在上面复以毛毡;军队围着圈子停下来,肩并肩而立。……猎圈再收缩到野兽已经不能跑动,汗便带领几骑首先驰入;当他猎厌后,他们在捏儿格中央的高地下马,观看诸王同样进入猎圈,继他们之后,按顺序进入的是那颜、将官和士兵。几天时间如此过去;最后,除了几头伤残的游荡的野兽外,没有别的猎物了。”^①。“合罕本人曾命令在契丹地和他的冬季驻地之间,用木头和泥土筑一堵墙,墙上开有门,这样,大批的野兽可以从远方进入墙内,他们则照前法猎取。察合台(Chaghatai)在阿力麻里(Almaligh)^②和忽牙思(Quyas)^③地区完全照此建造了一座猎场。”^④

古代蒙古人的狩猎活动,最初为生活、生产所需,其目的为获得食物充饥,或得皮毛以保暖。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政治经济方面的需求,蒙古族狩猎活动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军事训练及作战演习活动,并

①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30—31页。

② “苹果园”，位于谢米烈契耶(Semirechye)，伊犁河谷中，今伊犁附近。参见[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36页，注释10。

③ 其具体位置有争议，可失哈利认为在巴尔惜罕(Barskhan)以东，大小开肯河(Great and Lesser Keiken)从其流入伊犁河；伯希和认为它可能是卢布鲁克的额乞乌思(Equius)，但是巴尔托德和米诺尔斯基认为额乞乌思就是可失哈利的亦乞—乌古思(Iki-ögüz)。同上书，第36页，注释11。

④ 同上书，第31页。

可以起到在战时保障军队食物供给的重要作用。《蒙古秘史》记载：“其后，成吉思汗从答阑·捏木儿吉思，顺合勒合河而下出发时，点视人数，共有二千六百人。成吉思汗率领一千三百人，沿着合勒合河西边行进，兀鲁兀惕部、忙忽惕部一千三百人沿着合勒合河东边行进，一路上围猎储备食粮。这时，忽亦勒答儿创伤尚未痊愈，他不顾成吉思汗劝阻，冲向野兽奔驰，创伤重发而死。成吉思汗命人将他的尸骨安葬在合勒合河边斡儿讷兀山的半山崖上。”^①这里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蒙古社会的狩猎情形。

蒙古人的狩猎活动分别以个体、氏族、社会群体来进行。个体或氏族内所进行的狩猎规模不大，属小范围内的生产活动。而社会群体合作的狩猎则是有组织、有规章及纪律、按部就班的大型生产活动。蒙古人对那些体力强大和习以为群的猎物，则往往采取众人围猎的方式，而那些体小力弱的猎物，如貂、灰鼠、旱獭等，则主要以个体进行捕猎。个体所进行的狩猎活动一般以其物种，分别称之为猎狐、射禽、钓鱼、打貂等。而社会群体性的狩猎活动则称之为“打围”或“围猎”。

古代蒙古人的狩猎活动最初为个体的、为谋求衣食所进行的小型生产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古代蒙古人的狩猎活动逐渐成为蒙古族生产劳动的主要内容，并构成蒙古族生产活动的一种基本形式，逐步发展演变成为其政治、经济、军事服务为目的的。

在当时战乱的年代，人们为了抵御敌人的袭击，往往结成大的集团游牧，移场时像部队行军那样列队行进，屯营时结成环形的圈子，防备敌人突入。包括铁木真在内的蒙古高原居民，终年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生活。在当时冷兵器条件下，狩猎活动更具有军事特点，刀箭等狩猎工具就是兵器，狩猎的方式方法就是战略战术，简直可以说狩猎就是作战。狩猎和作战的不同之处主要是对象不同，前者的对象是动物，后者的对象是人。一次狩猎，特别是大的围猎，就是一次实战演习。

成吉思汗建军作战的原则方法以至给养供应的途径，都打上了

^① 《蒙古秘史》，第170节。

游牧狩猎经济的烙印。在这种自然条件下生活的蒙古族,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许多游牧民族,他们在社会实践生活中,为了生存,与自然条件进行了顽强而有计划的对抗,并在游猎游牧过程中与动物作战,更进一步完善了自身的作战军事思想,从而为以后武力统治整个蒙古高原奠定了坚实的军事作战基础。

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赋予了蒙古骑兵极大的机动性,这在当时是其他军队无法比拟的,这种机动性还使得蒙古军队能够建立强大的情报系统,侦察部队可以侦察到150公里以外的敌情,从而使部队的集结有充裕的时间,兼之迅速的集结能力,蒙古军队的机动性达到了骑兵作战的顶峰。

第四节 游牧经济的结构性扩张及其冲突

一、蒙古帝国扩张的地缘后果

(一) 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商业城市

讨来思——在今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西接欧洲拜占庭帝国的小亚细亚,东连丝绸之路,北距丝路重镇塔那(亚速海附近)、萨莱(里海北、伏尔加河东岸),南面通向亚欧陆路贸易和海路贸易转换中心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

诺夫哥罗德——今莫斯科的下诺夫哥罗德,是亚洲与西、北欧经济交流的枢纽,元代后期中国北方和中亚的商队常常在此与欧洲汉撒同盟各城市从事水运的商人互换货物。

玉龙杰赤——即土库曼斯坦的库尼亚乌尔根奇(曾为花剌子模都城),是中亚地区回回商队与欧洲、西亚商队商品交换、货物中转的枢纽。

大都——元大都是元代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政府专门设立管理商业的大都宣课提举司,规定商税“三十分取一”,后下令对在旧城市肆迁往新城的降为“四十分之一”,除牛马、果木以及酒醋以外,

“皆为不合税之物”^①，以此来刺激大都的商业。大都的交通也极为发达，陆路有条条驿道通往各个省份，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使沿海的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大都，从而大都成为全国各地和域外诸国的货物集散地。在大都的市场上，有大汗国产的粮食、茶叶、盐、丝绸、瓷器、珠宝、酒、日用器皿和纺织品等，也有来自外国的沉香、乳香、安息香、龙脑香、犀角、象牙、珍珠、翡翠、玛瑙、宝石、玳瑁等。

在这一时期，还有塔那（亚速海附近）、萨莱（里海北、伏尔加河东岸）、塔拉斯（俄罗斯江布尔城）、阿力麻里（新疆霍城）、可失哈耳（喀什葛尔）、肃州（酒泉），以及别失八里（吉木萨尔）和哈刺火州（高昌）等。

志费尼记述这一时期蒙古人的美好生活：“他们人人都占有土地，处处都指派有耕夫，他们的粮食，同样地，丰足富余，他们的饮料犹如乌浒水般奔流”^②；“至于别的部落，他们的命运也牢牢确定。凡是从前购置不起一张棉絮床的人，今天可以一次跟他们做三四万金巴里失^③（balish）或银巴里失的生意。现在，巴里失值五十个金的或银的密思合勒（misqal），约等于七十五个鲁克尼（rukni）的那（dinar），其金位为三分之二”^④；“他们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彼等喜爱之山珍海味，彼等选择之果品’。饮的是‘麝香所封之（醇酒）’。所以情况成了这种：眼前的世界正是蒙古人的乐园，因为，西方运来的货物统统送交给他们，在遥远的东方包扎起来的物品一律在他们家中拆卸，行囊和钱袋从他们的库藏种装的满满的，而且他们的日常服饰都镶以宝石，刺以金缕，在他们居住地的市场上，宝石和织品如此之贱，以致把它们送回原产地或产矿，它们翻到能以两倍以上价格出售，而携带织品到他们的居住地，则有似把香菜籽送至起儿漫

① 《元史》卷九四，《食货二·商税》。

②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24页。

③ 巴里失是一种金锭或银锭。见〔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26页，注释14。

④ 见〔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24页。

(Kerman)作礼物,或似把水运到翁蛮(Oman)作献纳^①”^②。

(二) 沟通了亚欧大陆内部的直接贸易

蒙古帝国的兴起,使亚欧大陆内部的贸易发生了一次极为重大的变革,那就是,在历史上,亚欧大陆实现了直接的通商。

游牧经济较之农业经济更容易和商业经济联系起来,生产结构的单一促使游牧民族频繁地和周边地区进行边境贸易往来。蒙古帝国在军事上的强大力量有力地支持了本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尤其是元朝大汗经济上采取的开放政策,更加推动了亚欧大陆内部贸易。元朝时期的驿站制度,对亚欧大陆的贸易发展提供了较为良好的条件。早在成吉思汗的时候,出于战争的需要,蒙古人就在各征服地修建驿站,最后形成了东西相连的驿站网络,这一制度在元代得到加强,从大都出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驿站星罗棋布,这些驿站不仅遍布中亚、西亚,甚至欧洲的许多地区都修建了驿站,从而形成了一个横贯亚欧大陆的庞大交通网络。

1. 陆路贸易

元朝的陆路贸易,较之唐代的丝绸之路更前进了一步。蒙古的西征不仅使中亚、西亚和欧洲联结起来,而且还开辟了一条新的商路,这条新的商路从和林出发(今乌兰巴托附近),穿过南俄罗斯和东欧,最后抵达欧洲各个城市,这样,蒙古帝国就形成了一个包括东亚、中亚、南俄罗斯、波斯和欧洲的庞大交通网络。

元代东西方的交通线仍然分为三条:北道经天山以北,过钦察汗国与西方诸国相连,具体经过别失八里(今新疆木萨里)、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楚河流域、循锡尔河以北、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多瑙河流域;中道出河西走廊、高昌、焉耆、龟兹、勃达岭、热海道、昭武九姓、波斯、两河流域、地中海东岸;南道出河西走廊、罗布淖尔、昆仑山北、可失哈耳、葱岭、阿姆河南、里海南、两河流域、地中海东岸。

此时北方的各游牧民族已经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对粮食、纺织品、饮料的需求越来越大。元政府也鼓励商人迁往漠北发展贸

① 多此一举之意。同上书,第25页,注释11。

② 同上书,第23—24页。

易,还特别给予免税的优惠,同时发给金牌和银牌以便利乘驿。从中原销往漠北的产品有粮食、饮料、丝织品、镜子和银器等,蒙古草原的牲畜、皮、毛、筋角等南运中原,元朝末期,还进行大规模的绢马贸易。新疆地区和中原的贸易往来也非常频繁,经营的商品主要有棉布、马、骆驼、葡萄酒、葡萄干、玉等,棉花和西瓜等农作物开始传入中原和江南地区。

大汗国与其他各个汗国之间的贸易也很频繁,主要通过赠品和互赠品的方式进行。诸汗国向大汗国所赠的主要是奢侈品和特产,大珠、珍宝、玉器、水晶、驼马、文豹、狮虎、药材以及特产的佩刀。大汗国一般回赠银币、锻帛、绣彩、金银和特产,这些形式和历代的官方贸易及其附带的易货贸易一脉相承。

真正从事贸易活动的是往来东西方的国际商队,欧洲、中亚和西亚的商人一般携带大量的金银、珠宝、药材、奇珍异兽、香料、竹布等商品,在中国购买缎匹、绣彩、金锦、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

2. 海路贸易

造船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海路贸易的发展,元朝政府的海外贸易远盛于前代。

(1) 造船业的进步

元代的造船基地有很多,主要有扬州、泉州、广州、赣州、汴梁、襄阳等,造船的数量十分可观。“至元十年(1273年),刘整请教练水军五六万及于兴元金(今广州)、洋州、汴梁等处造船二千艘。”^①“中国的船只分为三类:大的称作艚克,复数是朱努克;中者曰艚;小者为舸舸姆。大船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帆系用藤篾编织,其状如席,常挂不落,顺风调帆,下锚时亦不落帆。每一大船役使千人;其中海员六百,战士四百,包括弓箭射手和持盾战士,以及发射石油弹战士。……此种巨船只在中国的刺桐城(泉州)建造,或在隋尼凯兰(广州)即隋尼隋尼建造。……船上造有甲板四层,内有房舱、官舱和商人舱。……中国人有拥有船只多艘者,则委派船总管分赴各国。

^① 《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

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富有的了。”^①元代最大的船载重量为万石，1石合120斤，载重万石应是600吨左右，也有载重5000料的，1料相合1石，应为300吨左右，在海路贸易中经常使用的船只往往是1000至2000料的居多。^②

（2）元代的贸易政策

元代接管了南宋的海外贸易事宜，招降了南宋主管泉州市舶的官吏，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宣布“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募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③。

这一时期，设置市舶机构，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军占领两浙、福建等地以后，又在杭州、温州、广州设置市舶司，推行官商贸易。“延祐四年（1317年），帝赐帖失海舶，秃坚不花曰：‘此军国之所兹，上不宜赐，下不宜受。’”^④元代从事的贸易主要是奢侈品。由此政府加强对海路贸易的控制和垄断以及增加财政收入，大力推行各种形式的官商贸易，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形式之多样，超过前代。^⑤政府或者特派使臣持重金赴海外采购，或者利用一种商人——斡脱，为其经营海路贸易和放高利贷，或者官府出钱出船，选择海商为其经营，再进行利润分成，其特点是或官本官办，或官本商办，或官商合办。^⑥

（3）东西方商品和科技的交流

到了13世纪，丝织品仍然是中国主要的输出商品，由于这一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大大地超过前代，所以丝织品的输出地域也十分广泛。与汉代相比，此时的丝织品已经较以前不通了。汉代的丝织品多为生丝和未经染色的丝织品，元代输往欧洲的多是缎、织锦和具

① [埃及]阿瓦米雷校注：《依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0—491页。

② 夏秀瑞、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234—235页。

③ 《元史》卷十，《世祖纪七》。

④ 《元史》卷一六九，《贾昔刺传》。

⑤ 夏秀瑞、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238页。

⑥ 夏秀瑞、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238页。

有各种图案的精致丝织品。自13世纪以来,中国输往意大利的丝绸、锦缎,多用于显贵服饰及罗马教廷的仪仗等。元代的丝织物进入了埃及、马格里布、西苏丹和东非沿岸的许多国家地区的社会生活。蒙古军队到达西亚时,中国织匠再次被遣送到阿拉伯,中国丝织品上的凤凰、龙、麒麟等被引入阿拉伯丝织纹中,中国的养蚕缫丝法传入印度尼西亚时,成为当地的家庭手工业。元代的丝织品和丝织品技术的外传,改变了许多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惯,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

元瓷大量的输出逐步改变许多地区人们的消费观念,造成了海外诸国对瓷器的进一步需求,元磁及其技术又传到了更多的国家。元磁输往的主要地区有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以至北非和东非,元磁深入各阶层人民的日常生活,还改变了他们的建筑风格。例如东非人在建筑物的墙壁和墓碑上,常常按一定的距离镶嵌上中国精美的瓷器,这已经成为中世纪东非沿岸一种特有的风习。^①

蒙古军队的西征将火药传入了西方世界,埃及马木鲁克王朝与蒙古军队在大马士革一役中击败了蒙古西征的军队,俘获了制造火药的工匠和大量的火器,从此,火药传入埃及。火药最初传入欧洲则是从事对华贸易的阿拉伯商人带过去的。

(三) 河运和海运带来生活方式的结构和生产的动力的变化

蒙古灭南宋后,统一了中国,南北经济交流也进一步扩大。有元一代,水运蓬勃发展。内河航运,开通了大都(今北京市)至杭州间的大运河,为南北物资交流提供了条件;海运方面,经多次探索,开辟了由长江口直达天津的航路,使其成为元代海运漕粮的主要航线,同时大力发展海上交通,加强了与海外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在漕运、海运的发展中,元政府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漕运公司、海道运粮万户府等。

元统一中国后,大都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而江南继两宋之后,仍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北方主要是大都所需的粮食及其他物资多由江南供应。当时,元代一年的粮食征收额约为

^① 同上书,第281页。

1200 余万石,江浙行省即占 449 万余石,几近一半。江南物资又主要依靠运河北运,因此,南粮往北漕运,于是就成了元代航运的重要内容。元初,南粮北运依靠原有运河作主要漕路,并以旱地陆运为辅助。具体路线为:从杭州开始,经江南运河,在京口过长江,再由扬州运河,在淮安北面入黄河,逆流而上,到中滦(今河南封丘西南黄河北岸),转陆运 90 千米至淇门(今河南淇县南),入御河(今卫河),水运至通州,再陆运至大都。水陆两运法,绕道远,速度慢,损耗大,难以解决问题,再加上政治、军事的需要,不得不另开新河。为此,元朝政府便着手修凿大运河,以使其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

至元十二年(1275 年),水利专家郭守敬遵元朝政权之命,以都水监之职巡视河北、山东水道,以择设水路驿站地点,将可通舟之处绘成地图,上奏元世祖。次年春正月,开挖宋、金以来即以相通的汶、泗之间旧有河道。至元二十年(1283 年),经中书省奏准,正式委兵部尚书李处巽负责开凿济州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寿张(今山东梁山县西北)县尹韩仲晖、太史院令史边源相继建言开河置闸,引汶水通行舟船到御河,以便利公私漕贩。中书省遣漕运副使马之贞等巡视地形,计划工费之需,图上可开之状。元世祖于是诏出赀币 150 万缗、米 400 石及其他所用之物,征发附近州郡丁夫 3 万,由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等统领其役。该年正月动工,六月完工,起于须城安山西南,经寿张西北到临清,合于御河,长 125 余千米,其中建闸 31 座,以度高低、分远远,节泄水量。河成,元世祖亲自取名会通河。此河实际上是济州河的延长,使杭州至通州间的水路全线贯通,不再陆路转运。但此段河道地势复杂,又无水源,全靠河闸节制通航,故于次年又将原来负责为官方运输物资的 3000 户站户改为专供河役,采伐木石以备修河之用,每年委派都水监官 1 员巡视督工,将河道闸堰改建为石,36 年后的泰定二年,才告完工。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郭守敬奏言疏通通州至大都间原金代运河,以改变此段陆运状况。元世祖采纳其议,于至元二十九年春动工,次年秋告成,总长 82 千米,取名通惠河。此河动工之日,世祖命四怯薛人及诸府人专其役,量其高深,按段分工,规定完工日期,并令丞相以下,皆亲操备锤以为倡导,由郭守敬指授而后行事。远相蒙古族入月赤

察尔亲率部属,著役者之服,至所分之段,动手施工,在其带动下,趋者云集,依时而成。这表明了元朝统治者对此段运河修建工程的高度重视。

通惠河虽循金代运河旧迹,但水源不同。金代运河从今北京西北引玉泉山诸泉水,东南注入高粱河,再向东凿渠引高粱河水以达通州,因水源有限,故河开成后常阻滞漕舟。元疏此河时,则按郭守敬的先行勘查,将原使用而含沙量过大的浑水改引溉田,济漕使用清水,由昌平区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会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今什刹海),然后循金代运河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为保证通惠河有充足的水源,还在大都西北修筑了一条长达25余千米的白浮堰,把西北各路泉水一齐拦住尽归积水潭,再入河中。这样,通惠河有了充分的水源,航运得到了保证。

从此,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漕船可从杭州直达大都,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南北相连,北起大都、南迄杭州的元代大运河,全长1500余千米,可分下列几个部分:(1)通惠河,即大都运粮河,从北京到通州,长82千米;(2)通州运粮河,从通州南下,东入大沽河,西接御河;(3)御河,即卫河,天津南至临清,接会通河;(4)会通河,从临清到须城安山,接济州河,长125余千米;(5)济州河,从须城安山到济宁,接泗水,入于长江;(6)扬州运河,从黄河到扬州瓜州,入于长江;(7)江南运河,从镇江经常州、苏州、嘉兴,直达杭州。元代的漕运,在初期海运未发展起来时主要靠河运、陆运,海运航线开通后,即改海运为主,河运为辅,而随着海运的繁荣,运河的作用并未消失,除继续运输部分粮食外,还运输盐、茶、贡物及提供官船往来,许多商人也通过运河进行南北物资交流,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相继在运河沿线兴起的通州、临清、济宁、东昌等地,皆舟舫辐辏,商业兴盛,著名一时,而位于江南运河线上的杭州、镇江、扬州等旧有都市,则随着运河的畅通而继续发展。

元代南北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也为明清两代运河的继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开通后,不仅解决了南粮北运,而且也沟通了南方和北方民族的融合,从而大大促进了北方民族借助中原的农业技术来结合当地的环

境,发展本民族的农业经济。

对于蒙古人而言,大运河开凿的后果是整个蒙古社会所依赖的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畜力变成了水力。这种动力的变化直接影响着蒙古对于中国的统治及其自身的发展,尤其是饮食结构的巨大变化,导致了对江南粮食过于依赖,从而改变了蒙古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基础。

二、亚欧大陆腹地扩张动力的经济分析

(一) 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增长模型比较

从公元前3000年直至20世纪,亚欧大陆腹地是一个适应游牧型经济的地理区域,沿着2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从亚洲大陆向西向南,地缘上相邻的区域都能够从事农业生产^①,而匈奴、突厥和蒙古等各个民族所居住的内陆亚洲则只能够进行游牧型的生产。即使现在发生了重大的农业技术变革,这一地区的自然景观仍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从要素禀赋上看,农业作物和牧草对于土壤和降水量的要求并不相同,正是这种差别造成了亚欧大陆上草原区和农业区在自然景观上的不同,同时这种不同的要素禀赋塑造了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对于农业和游牧两种生产方式而言,其增长条件和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在于:在一块开垦过的土地上能够生产一种或几种粮食作物,其生产周期是一年。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耕种两三英亩土地,生产的粮食足够大户人家吃一年。^②唐宋时代的中国人均年食量为“一人年食三十石(汉小石)”,约合7.885市亩的产量,平均每户占有土地20市亩^③,合英亩3.6亩(一英亩合6.072市亩),可以推算在古代东亚和欧洲的农业生产力大体相当。在金代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82—92、106—110页;曹冠一:《中国农业经济史》;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美]德伯里:《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236—240页。

②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91页。

③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164页。

中原地区精耕农业区实行了区种法,但是并未能够成功地推广。^①金末,河南一带粮食亩产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②

金代的农作物主要以旱地粮食作物为主,旱地粮食作物中又以粟类作物最为重要,小麦主要种植在中原地区,由燕山一线经山西忻州、陕西无定河流域,至甘肃临洮构成了冬小麦种植北界,这一界限以南,以冬小麦为主。在这一区域内,其他农作物与冬小麦轮作,实行两年三熟种植制度。这一界限以北为春小麦种植区,农作物一年一熟。^③

由于农业生产具有时令的性质,所以在田野上形成了一个一个小村庄,用于人们居住、贮存以待来年,在更大的范围之内,形成城镇,可以进行跨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

游牧经济产生得相对较晚,与之相适应的是辽阔的大草原,由于这些地方缺乏足够的热量和水分,仅仅能够生长适于食草动物食用的草本植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把驯养动物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游牧经济的第一要件就是要有大面积的牧场,直至今日,一个游牧团体很少超过200人,常常连100人都不到,其人口密度大概是每平方公里1—5个人。^④在马和骆驼被驯化以后,草原上的交通问题得到解决,游牧经济的机动性就完全得以体现,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跟随牧群逐水草而居,草原上的生产具有非常大的流动性。

从两种生产方式技术角度讲,农业生产需要特定的技术支持,对劳动力的投入要求很高,中国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这就要求在固定的土地面积上,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尤其

① 区种法一般按田间耕作方式不同,将土地分为带状区或者方形区两类。带状区田,将长十八丈、宽四丈八尺的一亩地,横为十五町,町间留十四条人行道,道宽一尺。每町长四丈八尺,宽一丈五寸。每隔一尺掘一尺宽、一尺深的沟。把掘松的土壤放在沟内或沟间,然后在沟内种庄稼。方形区田又分三种:上农夫区,每区六寸见方,区间距离九寸,一亩地作三千七百区;中农夫区,每区九寸见方,区间距离二尺,一亩地作一千零二十七区;下农夫区,每区九寸见方,区间距离三尺,一亩作五百六十七区。详见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281页。

② 《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③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280页。

④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92页。

是农业生产周期为一年或者是半年(部分地区两年三熟),农业作物必须经过重新种植才能够再次收获,游牧经济则与此大相径庭。游牧生产的一些技术要求仅仅针对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比如说马、牛、羊毛皮和奶制品的技术,但是对于这些产品本身的生产几乎没有劳动力的要求,因为牧群只要有相应的草场,它们就会自动繁衍,所以,游牧经济的扩大生产的第一要件就是草场面积的扩大。

因而,游牧型的生产方式属于单一要素的增长模型,其投入要素就是土地,获得的土地越多,财富就会越多,因为畜群的繁殖基本上无需人工过多的投入,这种生产对土地的需求类型没有特别的要求,这就使得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就具有一种对于土地的扩张潜质,农业型的生产方式属于双要素的增长模型,其投入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在这种生产模型下,土地或劳动力的投入都要受到边际收入的约束,所以在这种生产方式下,首先会发生变化的就是劳动和土地的比率,由于古代农业技术发展得十分缓慢,而适合开垦的土地又是有限的,适用于农耕土地的有限供给造成了农业区域对于人口的总数有相应的上限。所以,在农业区域内,农业技术没有重大突破以提高单位产量或者耕种更为贫瘠的土地,其结果就是内部自发地调节人地的比例,而不是向外扩张。

亚欧大陆腹地草原区地缘上相邻的是农业区,两种生产方式对于土地的不同要求,决定了两种生产方式不同的对外态度:游牧经济对外扩张会以土地的绝对面积为追逐目标,农业经济会以土地的相对面积为追逐目标。

(二) 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军事内涵比较

古代战争的技术突破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中国周代发明的战车,第二次是古罗马帝国的冲锋方阵,但是这两种技术最终被另外一种技术突破所取代,那就是骑兵。骑兵的产生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世纪欧洲的骑士制度、阿拉伯帝国的产生以及蒙古帝国的对外征服,无不与此息息相关。

骑兵技术最早产生在中国北方草原区^①,中原地区也从那时开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339页。

始学习骑射,著名的事件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试图扭转中原地区和草原地区在军事上过于悬殊的差距,但是中原地区的军事力量除了偶尔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以外,大多以失败告终,同样的军事技术相对抗,中原地区军事仍然处于劣势的原因在哪里呢?

骑兵技术最为核心的资源是马匹,马具的产生虽然也是骑兵技术的重要部分,但是马匹始终是整个战争中最为核心的工具。马匹在战争中的应用使得整个作战部队获得了极大的机动性,马匹不但可以随时找到草料来喂养,同时也可以战争的同时维持生产,从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看来,他们由于没有固定的基地,其牧群是随军而行的,这样他们的生产和战争就合而为一了。

在农业经济条件下,基于生产的季节性和土地资源的相对稀缺性,需要有一个核心区——城市——维护整个经济的协作,尤其是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更是需要这种协调工作。整个农业区域就形成了一个城市网络,这样形成了一个静态的社会生产格局,如果对外作战,就必须抽调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离开自己的生产基地,带着大量的辎重去寻找敌人,其机动性大打折扣。

对于整个战争的工具——马匹的生产——所需要的条件正好和农业生产相反,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产出良马,同时养马要在长山大谷、美草甘泉的空旷之地成群牧养,才能为骑兵作战长途追袭之用^①;“即使今天,在牧区用套索捕捉一匹蒙古马,装上马鞍,不需要再喂食,能连续骑150多英里,这是常见的事”^②,蒙古军队出征时,一般每人配有三匹战马,可以连续行军几天几夜。相对而言,农业区域内的养马就成了大问题,就宋而言,养一匹战马需要养活25人的土地,但是却又没有良好的草场,于是把战马分配给老百姓饲养,平时可以做畜力使用,可是这样的战马不但容易生病^③,而且其体力训练的侧重点无法适应战争。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在冷兵器时代

①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9页。

② Owen. Lattimore, “Chingis Khan and the Mongol Conquests”, Scientific American, August 1963, p. 68.

③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00页。

的中国,出动一支 10 万人的军队,需要 30 万民夫背负粮草,平均每天行军速度 40 公里,其作战半径只有 640 公里,只能支持 16 天的战斗。这与蒙古骑兵每天行军 150 公里,1000 多公里的作战半径,能够持续几个月至几年的战斗力相对比而言,其优劣不言而喻。

从两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内容来看,马匹的意义同样是不同的。农业民族以粮食生产为主要内容,另一个产业是家庭的纺织业,粮食、棉花和丝绸的生产是其整个国民经济的核心内容,马匹的生产则是作为国防所需要的武器而生产的,是要和消费品的生产发生资源上的竞争,两者之间就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游牧民族的生产主要是以马、牛和羊为主,这些产品解决了他们的食品和服装,马匹的生产对于他们而言既是生活产品,也是战争的工具,马匹生产得越多,其财富也就越多,并不形成对其经济资源的替代作用。

进而言之,农业经济的生产存在着对于资源而言的“大炮与黄油”之间的竞争性需求——多生产马匹就要少生产粮食,国防需要额外消耗整个社会的财富,而游牧经济的“大炮”和“黄油”是同一种产品,其生产的马匹越多,其社会财富也就越多,也就越具有向外扩张的实力。

(三) 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的社会制度比较

游牧经济这种生产方式并不是以地域为特征的,其整个社会组织是以人为单位建立起来的,类似于现代政治制度和企业制度的科层组织,“成吉思汗出现以前,他们没有首领或君王。每一部落或两部落分散生活;彼此没有联合行动起来,其中时时发生战斗和冲突”^①。在成吉思汗将蒙古社会重新编制以后,“军队的检阅和召集,如此有计划,以致他们废除了花名册(daftar-i-arz),用不着官吏和文书。因为,他们把全部人马编成十人一小队,派其中一人为其余九人之长;又从每十个十夫长中任命一人为‘百夫长’,这一百人均归他指挥。每千人和每万人的情况相同,万人之上置一长官,称为‘土绵(tümen)’^②长。按照这种组织,每逢情况紧迫,需要人或物,他们就

①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 23 页。

② 突厥语义为“万”。见[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 37 页注释 16。

交给土绵长办理,土绵长再交给手下的千夫长,如此降至十夫长。其中有一种真正平等的精神,每人的劳动都与他人的一般多,别无差别,因为不管钱财和势力。如果要突然召集士兵,就传下命令,叫若干千人在当天或当晚的某个时刻到某地集合。‘他们将丝毫不延误(他们约定的时间)但也不提前。’总之,他们不早到或晚到片刻。他们的服从和恭顺,达到如此地步:一个统帅十万人马的将军,离汗的距离在日出和日没之间,犯了些过错,汗只需派一名骑兵,按规定的方

式处罚他,如要他的头,就割下他的头,如要金子,就在他身上取走金子”^①。整个蒙古社会以十进制的方法组成了一个军政合一的组织,这样的组织不但具有极强的纪律性而且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农业经济的生产是以地域为特征的,其社会组织以城镇或者村镇为核心,主要目标是针对地域内部的稳定兼顾外部防御,处于农业区域的两河流域、中亚以及中国中原地区,在13世纪都已经形成了十分发达的城镇网络。^②居民附着在这些城市和村镇周围,从事生产活动,这种以地域为特征的组织形式相对缺乏足够的纪律性,当然也不具有很强的军事力量。

蒙古帝国迅速称霸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其同在亚欧大陆腹地上的对手——金和花喇子模等国开始由游牧转向农业生产,游牧民族占领农业区之后,其基于原来生产方式而形成的社会组织结构,往往与所征服地区的社会组织结构发生制度性冲突,正处于转型阶段的这些国家,其社会组织的协调性在防御游牧民族方面反而比农业区域更弱。

例如,女真族长期以来是以家长制为共同体的社会,其生产活动是以集体劳动为特征的,一旦进入中原地区,农业生产要求实行一户一户的单独劳动,原来的社会组织结构根本不适合农业生产,于是女真人解散了适用于游牧经济的社会组织——猛安和谋克户制度,并

① 同上书,第33页。

② 详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351—361页;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80—99页。另外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也系统地论述了中东西亚以及东亚地区13世纪的城市网络,详见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于大定二十年(1180年)申明：“猛安、谋克人户，兄弟亲属若各随所分土，与汉人错居，每四、五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助济。”^①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女真人不但对农业知识准备不足，而且解散了的猛安和谋克户制度又削弱了女真人固有的军事优势。后来，金世宗又试图恢复女真人原来的聚居生活和集体生产形态^②，但是特定的生产方式需要特定的社会组织，一旦金人试图恢复原有的社会组织，就与南迁之后的女真人所要从事的生产发生了严重冲突，女真人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失去了原有的活力，保持着自己独特社会机制的蒙古各部乘机崛起了。蒙古军队的实力在1206年以后，就已经今非昔比了，再加上金国本身内部矛盾冲突，灭亡金国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东、西亚地区，作为游牧民族的阿拉伯人征服了两河流域以后，又雇用了突厥骑兵四处扩张^③，最后陷入了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型的两难境地，此时蒙古帝国突然开始西征，等待他们的命运只剩下了被征服。

小 结

蒙古帝国霸权的实现取决于两个事实：

一、亚欧大陆腹地的全面扩张是一种地缘政治后果

蒙古帝国的成功是建立在女真人和突厥人失败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女真和突厥依赖传统的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继续侵入农业区域，自己本身的经济开始农业化，其军事传统上保存着游牧经济的特色，这样就形成一个位于亚欧大陆腹地与整个农业区域之间的军事上强于农业区域、经济上弱于农业区域，而经济上强于游牧区域、军事上弱于游牧区域的缓冲地带，形成了递进型地缘政治结构。这种地缘政治结构对处于缓冲地带的半农业化的游牧民族是不利的，因

①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② 〔日〕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第321—339页。

③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351—377页。

为从地缘上讲,其在两方面都处于劣势,这就更激化了其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了被灭亡的命运。尤其是女真所建立的金国,将长期以来农业区域所形成的长城防线向南推移到农业区域的经济核心区,就更加为后来蒙古帝国的南下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亚欧大陆腹地的全面扩张是一种地缘经济后果

在蒙古帝国崛起以前,游牧民族的南侵只是以部落为单位,所做的一种无规律性、缺乏长期目的的随机性侵扰,并没有形成有计划、大规模的南下。但是,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统一了亚欧大陆腹地的所有游牧部落,并对其社会结构进行了改革,这种对于社会结构的数字化改革的结果就是,将亚欧大陆腹地对外扩张的目的绝对化。

支持这种扩张的是亚欧大陆腹地的地缘经济特点。这一时期的主流作战方式是骑射,生活在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与作战条件达到了统一。

第五章

1800 年以后的亚欧大陆腹地^①： 衰退及边缘化

在资本主义中有一种竞争形式，即垄断之间的竞争，通过减少生产成本来争得霸权地位。……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恐怕是我们文明的物质基础改变了。资本主义有金融的、商业的、工业的形式，在产业革命之前和产业革命之后，它的运作规则是一样的。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在一个世纪以前，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增加了海上强国相对于陆上强国的机动性。……铁路在草原上创造了更加伟大的奇迹，因为它直接代替了马和骆驼的机动性……

——〔英〕哈·麦金德

① 16 世纪以后的亚欧大陆腹地从本论文的角度上讲，是一个不断缩小的区域，因为传统上，亚欧大陆腹地即指“Eurasia Steppes”，自从俄罗斯挣脱了金帐汗国以后，这块草原就开始不断缩小，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游牧民族不断地变成农业民族、工业民族，最后，只剩下蒙古地区保持着从上古时期就因之而称霸亚欧大陆的生产方式。所以，在本章所指的亚欧大陆腹地是一块不断缩小的游牧经济区。

由于深受热带森林和海洋限制,蒙古骑兵的最大势力限制在亚欧大陆腹地、俄罗斯、中东、中亚和中国的范围内。虽然蒙古帝国的最大规模仅仅维持了几十年,即分裂为四个大汗国——忽必烈建立了元朝,旭烈兀变成了波斯的统治者,拔都的后代统治了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统治了中亚,但是,游牧骑兵相对农业步兵所具有高度机动性直到1800年以后,才彻底失去其优势。

1800年以后的世界有什么不同呢?

1800年以后世界生产的主要问题——粮食的生产,得到了突破性的解决;其次,世界的生产中心转移到了欧洲和北美,世界贸易的路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不再是世界生产的中心;其三,就是在军事上,弓箭骑兵彻底地失去了机动性的优势,火药为主的来复枪占据了优势^①,亚欧大陆腹地的机动性优势开始丧失;其四,就是1877年伦敦至上海的海底电缆铺设完成,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另外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之中。

西方世界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了东西方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世界的动力因为技术的变革也发生了突变,从而改变了旧的地缘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对比关系。亚欧大陆腹地的蒙古部落“从此变得湮没无闻”^②。

第一节 世界体系核心区的转移：世界生产方式的转变

一、工业化生产的出现

地理大发现的意义对于西方来说,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发现,但是这种发现是基于西方世界寻找其要进口东方货物所需要的黄金和白银,在滨下武志和弗兰克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也就是说,直到1800年前后,西方世界仍然没有办法改变自己

^①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229页。

^②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88页。

对于东方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甚至以偷运鸦片的方式来寻求贸易顺差。19世纪中叶这种状况还在继续,不过欧洲的资本主义关系早在16世纪就已经开始萌芽了。

事实上,地理大发现的意义,在于欧洲找到了一个消费其在东方世界无法出售的消费品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培育起欧洲的资本主义市场。

蒙古帝国的西征运动扫荡了经常冲击基督教世界的穆斯林帝国,虽然它在东亚地区迅速败退,其在东欧和西亚的势力得以维持,蒙古帝国对伊斯兰的有效抑制,使得西欧在较为和平的环境下得到了发展。欧洲经济的增长从10世纪时就已经开始了,到了14世纪,中欧和西欧的人口显著增长,大约增长了40%,人口的激增促使了人们努力改进农业技术,反过来,粮食的增长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增长。^①9世纪为3000万人,到了11世纪期间,其人口增长率在1/5以上,12世纪则高于1/4,13世纪则更是高达1/3,到14世纪初,欧洲人口总数达到了空前的8000万。^②此时欧洲的人口分布已经与古典时期不一样了,古典世界时期,欧洲的人口主要围绕着地中海这条轴线呈纵向分布在地中海的北岸,此时的欧洲人口则沿着比利时到意大利的这条轴线分布^③,一系列欧洲强国崛起在欧洲内陆和西欧沿海地区。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新开辟地区的粮食运往人口稠密的西欧,西欧则向其提供各种工具和制成品。^④欧洲外部的和平环境使得国际贸易开始发展,东西方贸易交通开始重新恢复,赋予国际贸易发展动力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自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从穆斯林手中重新夺取了地中海这一交通要道,并且渴望获得东方的奢侈品;一个是13世纪蒙古帝国的建立,这个几乎横贯亚欧大陆的帝国使得东西方直接贸易第一次成为可能。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19页。

② [英]科林·麦克伊韦迪、理查德·琼斯:《世界人口历史图集》,第12页。

③ 同上书,第12—13页。

④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20—21页。

欧洲大陆上国家林立,面积都不是很大,这在地理条件上制约着欧洲难以做到自给自足,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习惯性地依赖外部的市场和商品。随着人口的增加,交易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使得各个国家和城市处于极为紧张的竞争状态,人们需要不断地寻找新的原料产地、新的市场和新的航线,欧洲人最终出海开始远航。

1800年以后,整个世界经济发生了质变,整个世界的动力为此发生了改变,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开始从欧洲向全球扩散,质变的显著性标志就是体力经济转变为机器经济,机器经济首先从欧洲发生突破。

就欧洲而言,最为重大的技术突破就是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欧洲在这方面取得的技术进步有:1200—1500年间,欧洲的普通船吨位已经增加了1—2倍,载重量为150—200吨的狭长帆船让位于600—800吨的圆体帆船;13世纪时艏舵被采用;14世纪以后葡萄牙改制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船可以逆风航行,这些优点的结合,结果是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为灵活的船产生了,经济效益更为提高。14世纪时欧洲的航海者绘制地图的技术有了相当的发展,远洋航行成为可能。1485年前后,葡萄牙人率先在航海中使用星盘。15世纪时,欧洲人的船舰已经配置了火炮,但是还不能够击毁舰船。16世纪前20年,佛兰德、德国和英国人发展了铸炮技术,使得海军战术由攻入敌舰转变为舷炮齐射,这使得欧洲人能够控制世界各个大洋及其交通要道。^①此时的东方世界远远地落在后面。

伴随着欧洲商业的开展,欧洲人的商业技术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复式簿记的会计制度比以前更加准确地确定自己的财务状况,与此同时,金融的创新^②使得欧洲商业更为发达,也促进了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现象就是股份公司的创立,充分地调动了整个欧洲资本,大规模的资本可以投入到各种各样的事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23—25页。

② 欧洲在此时已经铸造出各地通用的标准硬币,更为重要的是银行业的发展和信用票据的金融创新使得商业往来更为顺畅。

业之中去。

在巨大的商业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民族国家开始逐步在欧洲形成,商人们渐趋与民族国家的君主相互结盟。商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结合,为欧洲发现新大陆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蒙古帝国的崩溃致使欧洲不能再穿越亚欧大陆腹地发展与东方的贸易,穆斯林世界走向封闭,绕过穆斯林地区寻找去往东方的航线,成为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巨大的牟利机会,诱惑着欧洲许许多多的商业冒险家,终于在15世纪末,几艘小帆船离开了欧洲海岸,向西航去。

西方世界扩张对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关键性意义在哪里呢?布罗代尔抓住了有关扩张的关键性事实:“新世界的金银使欧洲有能力在超过其财力的条件下生活,用超过其本身所能储蓄的金钱来投资。”^①因为当时欧洲并不能生产出什么能够使东方民族感兴趣的東西,欧洲的制造品通常比东方的产品质量差,而且价格高,相反,达·伽马收集的一船胡椒和肉桂在他1499年回到欧洲时,其价值相当于整个远征队费用的60倍,于是葡萄牙人决定垄断新航线的贸易^②,而葡萄牙人所利用的资本就是从美洲大陆源源而来的白银。葡萄牙人凭借着他们占有优势的海军力量,在印度洋上粉碎了穆斯林海军,从而控制了香料贸易,但是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仍然没有完全被驱逐出贸易领域,毕竟葡萄牙绕经好望角的航行成本高昂,而且,葡萄牙本国并没有出产的物品用来交换,只有用从美洲获取的白银来支付,其香料价格就要达到相应的价格才能盈利。与此同时,西班牙人的航行也取得了相应的成就,16世纪,东方的香料贸易和美洲的银矿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16世纪末,这两个国家急剧衰退了,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是伊比利亚国家卷入了欧洲当时的冲突,致使它们筋疲力尽而至衰落,当时欧洲政治的显著特点就是王朝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与后来的欧洲大陆国家一样,西班牙试图垄断海外事务,又过分关注欧洲大陆事务进而从人力物力

① [美]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127页。

②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132—133页。

过度的浪费中衰落下去。^①更为实质的原因在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国家没有能够利用其在海外所获得的机会,向其殖民地提供它的工业制成品,相反,它从中世纪开始就已经在制造业上从属于西北欧。随着世界贸易内容的迅速转变——从由富人消费的奢侈品转向由平民消费的工业制造品^②,垄断贸易而获利的可能性开始下降。西班牙的成功为本国带来了大量的财富,由于本国出口产品停留在原料上,反而造成了本国物价上涨,形成金融危机,但是这笔财富为整个欧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金。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沿海国家仍然渴望香料,因为发展制造业的效果并不会迅速显现出来,所以英国国王爱德华六世在给休·威洛比爵士的一封信用几种语言写成的公开信中写道:“发现和贸易为远征队唯一的目的。”在此之后,荷兰人充分利用了伊比利亚国家的衰落,整个17世纪成为荷兰人的黄金世纪。随后,脱颖而出的是英国人,英国人通过圈地运动而发展起来毛纺织业,随着其海外移民的不断增多和殖民地的扩大,终于寻找到了市场,此前,丝绸仍然是人们的消费对象。整个17世纪,英国呢绒制品成为主要的输出口,这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经济的繁荣。随后,英国的棉纺织业贸易也在欧洲和美洲之间开展起来。随之而来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得欧洲彻底地脱离了体力经济,完全进入了机器经济时代。1776年美国独立以后,美国执行了新的贸易政策,从而限制了欧洲产品进入美洲市场,欧洲在美洲失败而失去的市场后来被亚洲的失败所补充,尤其是中国的一系列失败为欧洲的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的机遇,世界经济的重心转移到了欧洲和北美。

世界体系核心区的转移以及世界贸易路线的变化,使欧洲开始摆脱来自亚欧大陆腹地大陆霸权的压力,世界开始走向海洋霸权时代。

二、奢侈品生产的继续——持续到1800年前后的中国经济

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穆斯林重新崛起以后,东西方的交通要道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148—151页。

② 同上书,第151页。

在此被封锁,此时的中国进入了明帝国时代。从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明代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到1800年前后,中国的生产、消费和人口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①但是,帝国的经济增长随即戛然而止。

(一) 粮食和服装问题的突破性解决

中国生产的增长得益于西属美洲和日本白银的进口,人口增长得益于引进早熟水稻并因此而有一年两季的收成,其次得益于引进美洲的玉米和红薯,从而使可耕地面积和粮食的收成都有增长。^②“可以判断玉米是在明代中后期经西域传入中国的,到了清代才逐渐在南方传播。”^③与玉米配合起着培育人类的重大作用的是红苕、马铃薯、高粱、大豆和花生。红苕适合于江南丘陵,马铃薯适合高寒山区,高粱、大豆适合寒冷的中国东北地区,花生则适合生长在华北一带,这些都是16、17世纪才传入中国的作物,使得中国耕地面积相对扩大,粮食产量大为提高,人口则迅速增长。^④

虽然早在两千年以前,中国的广西、云南、新疆等地区已采用棉纤维作纺织原料,但是,其经济价值并未被人认识到^⑤,作为生产原料则发生在宋元之际^⑥。棉花传入中国,大约有三条不同的途径,一般认为棉花是由南北两路向中原传播的。南路最早是印度的亚洲棉,经东南亚传入海南岛和两广地区,至少在秦汉时期,之后传入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区。第二条途径是由印度经缅甸传入云南,时间

① 人们对于明代中国人口看法不一。威廉·阿特韦尔认为,1500年中国人口已达1亿;费正清认为,1600年中国人口为1.5亿;布鲁克认为,1600年可能达到1.75亿人。

② 〔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59—160页。

③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页。

④ 同上书，第394—395页。

⑤ 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棉花,最初是被人当作花草一类的东西看待的。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在其《苏莱曼游记》中记述,在今北京地区所见到的棉花,还是在花园里被作为“花”来观赏的。《梁书·高昌传》记载,其地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纆,名为白叠子”。

⑥ 明末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写道：“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棉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至我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纆盖百倍焉。”

大约在秦汉时期。第三条途径是非洲棉经西亚传入新疆、河西走廊一带,时间大约在南北朝时期。

宋元之际,棉花传播到长江和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到13世纪,棉花已传到陕西渭水流域。从这时起,棉布逐渐替代丝绸,成为中国人民主要的服饰材料。元代初年,政府设立了木棉提举司,大规模向人民征收棉布实物,每年多达10万匹,后来又把棉布作为夏税(布、绢、丝、棉)之首,棉布已成为主要的纺织衣料。从明代开始棉织业在中国全面普及,朱元璋在立国之初曾诏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征八两;木棉,亩四两。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①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亦载“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可知当时植棉和棉纺织已遍布全国。

由于非洲棉和亚洲棉质量不好、产量低,到了清末,中国又陆续从美国引进了陆地棉良种。清代,中国的棉布产量很高,每年有大量的棉布出口。19世纪30年代,从广州出口到欧洲、美洲、日本、东南亚等地的棉布,每年达100万匹,1819年出口最多,达330万匹。^②

至此,中国的粮食结构和服装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劳动力的主要目标不再是粮食和服装,中国生产力出现了极大的剩余。

(二) 手工业生产的本质性发展

从元开始,中国政府对于丝的赋税结构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征收丝织成品改为征收原料——生丝。其变化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经营了规模巨大的官营丝绸作坊,分类较前代更细,政府对原料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出现了专门从事养蚕缫丝的农户和专门从事丝织业的“机户”,私营丝织业进一步发展,社会进一步分工,私营丝织业和农业开始分离,私营作坊产出的成品供给上升。政府既可以直接在市场上买到丝织成品,也可以将原材料向市场上出售,经济进一步趋向于市场化。

明代承袭元代的工匠制度,将元代40多万匠户编籍入册,并且

^① 《明史》卷七八,志五四,《食货》二。

^② 赵翰生:《中国古代的纺织与印染》,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子孙世代从事该项手工业。最初,明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允许手工业者独立地从事手工业生产,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很大的提高。

明代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手工业上:人们改进了纺纱与织布工具,大大地提高了纺纱的效率;矿冶业改进了生产技术,立了土高炉,用土高炉冶炼钢铁,陶瓷制作改用铁刀制作,竹刀被淘汰,采用先进的上釉方法,制丝技术也得到了提高,如湖州、嘉兴等地采取炭火干燥法制丝;在一些手工业行业,如印刷、制茶、制糖、榨油、造船、粮食加工等生产过程中,先后采用了简单机具。明代在棉纺织业、矿冶业、陶瓷业、造船业、制糖业、榨油业、制茶业、印刷业等手工业领域中出现了一些家庭手工业作坊,但家庭手工业作坊大都是属于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范畴,实行独立自主经营。

同时,政府规定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必须种植经济作物,如桑、棉、麻等,提倡农户养蚕、巢丝、纺纱、织布,鼓励男耕女织。随着经济作物产量的不断增长,手工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到了明代中叶,民间丝织业进一步商品化,很多丝绸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用货币可以直接在市场上买到所需的各类丝绸,中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明万历九年(1581年),赋税制度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化,“一条鞭”法将一切实物税^①都改为货币税,宣告了实物税的消亡,也标志着中国手工业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经济模式。中国的经济正式脱离为衣食而生产的经济,进入货币化阶段。

①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局限,丝绸除了服用功能之外,还以一种实物货币的形式出现,甚至在一些出现财政危机的历史时期,如钱币制度混乱的魏晋时期,可以作为贸易的中介,取代钱币的作用。有时候,政府还以国家法令的形式,确定绢的货币地位。在《唐律疏议》中明文规定,在计赃和计罪罚时,要以绢匹为筹码,许多人服兵役期间,所携带的充当钱财的物品,多为绢。这种状况在唐以后,才有所改善。丝绸还是一种赋税的税种,这在世界赋税史上独一无二,丝绸是国家征赋的财源之一。唐代两税法试图变革实物税为货币税,但在实行的过程中,仍以实物税为主,直到唐穆宗时,政府才明文规定,两税既可以纳钱,也可交纳布帛。有宋一代,仍沿用两税法,夏税所输纳税物,一般折为布帛,称为“税绢”,其“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常用绢代替,有“身丁绢”之称。在这些税赋中,丝绸占了当时官府丝绸总收入的一半。元代的税赋较为混乱,但是原南宋统治下的南方地区仍沿袭宋代旧制,即按地亩分夏秋两税征收,秋税粮,夏税纳木棉、布帛、丝绵等物。明代中叶以前,主要仍然是推行两税法,实质内容没有变化。

（三）茶叶生产的发展

中国是“茶的故乡”，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就开始了茶事活动。汉魏六朝，饮茶风尚在长江流域逐渐普及并蔚然成风，茶叶生产和贸易亦得到相应的发展。^①唐代开创了古代茶业发展的新阶段，“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茶之为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渐成“比屋之饮”。中唐以后，封建官府开始控制茶业生产与贸易，推行茶法，茶叶在国计民生中日益占据重要的地位。宋明以来，茶产日盛，茶法日密，尤其是明代茶叶生产与贸易得到了很大甚至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发展。明代茶叶生产的地域分布，较之前代又有所扩展，除北直隶、山东、山西布政司生态环境不宜植茶外，南直隶及其他11个布政司均有生产，而且在秦岭、淮河以南广阔的茶区内，许多不曾产茶的地方开始引种茶叶，且形成名茶。有的地方则是传统生产又有新的发展，出现了全面发展、名品纷呈的繁荣局面。

1600年以后，中国开始出口茶叶。^②到19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茶叶出口的大国，并且控制世界茶叶市场的价格，茶叶在这一时期的出口值中位居第一。^③

从16世纪中期开始，白银注入中国经济所造成的扩张更为壮观，明代在经济上越来越银本位化，茶叶、丝绸和瓷器的生产构成了这一时期出口的主要内容。除了17世纪中期因为政权更迭出现了短暂的间歇外，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国经济重新开始扩张。^④

三、中国经济的边缘化

（一）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

汉族人重新恢复了在中国的统治之后，亚欧大陆腹地重新恢复昔日的贸易关系，中国也沿着昔日的朝贡贸易体系继续发展，但这已经接近了朝贡贸易的尾声。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一共有三种形

① 郭孟良：《明代茶叶生产的发展》，载《殷都学刊》2000年第2期。

② 〔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63页。

③ 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187页。

④ 〔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第224页。

式：与周边其他国家的朝贡贸易，私人从事的针对更远距离的海外贸易，与游牧民族的边境贸易。

1. 朝贡贸易

明朝中国重新恢复了朝贡贸易，但却又实行海禁。对于明代中国而言，朝贡贸易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基于国内的需求以及丰厚的利润，许多海外国家都积极开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向中国派遣朝贡使节，携带各种特产进行朝贡，运载大批货物参与互市。据《皇明祖训》记载，明初至明中期，到明来朝贡的国家计有 15 个，其中包括日本、菲律宾的苏禄群岛、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越南的占城、泰国、锡兰、柬埔寨的高棉、苏门答腊的亚齐等。明政府在福建的泉州、浙江的宁波、广东的广州三地设立市舶司，配备人员负责朝贡贸易工作。明代朝贡贸易发展的一个标志是商品出口数量扩大了，明代在朝贡贸易中，除了进口一部分奢侈品外，还出口了大量的中国土特产品、手工业品、生丝绸缎、瓷器、金属等产品，从而使明政府获得了巨额利润。

2. 私人海上贸易

明代的商人、牙商、牙行都广泛地参与海上贸易，私人海外贸易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明王朝实行海禁，不准海民通番，进行海外贸易，但是，在巨大的利润驱动下，海民和商人通过各种途径仍私通海外，输出中国的丝绸、丝绵、陶瓷、铁器等产品，输入国外的香料、宝石、药材等产品，从中牟取利润。同时，广东、浙江、福建等省的税收也不断增加，福建漳州的海外贸易税收，在明万历四仅为一万银两，而万历二十二年扩大为三万银两。^①

3. 边境贸易

边境贸易有集市、马市、茶市等形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森林中的狩猎民族运往中国的产品有马匹、毛皮、人参、药材等，明朝农民和商人输出的产品有粮食、茶叶、布匹、丝绵、绸缎、食盐、瓷器等。明朝专门设立了茶马司管理茶马贸易的组织，公元 1372 年（洪武五年）至 1411 年（永乐九年），明王朝先后在陕西、洮州、河州、西宁等

^① 施菊英：《世界近代前期经济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2 页。

地建立了茶马司,专门负责茶马贸易事务,明朝不仅实行金牌制的茶马贸易,向前来游牧民族征收马匹赋税,还垄断茶叶经营,为了控制茶的生产与流通,对茶马贸易实行专卖制度,不准私茶买卖,并在茶产区设立税课司,负责征收茶税。

(二) 东亚朝贡贸易的结束

16世纪以后,全球贸易开始向大西洋集中,包括欧洲的工业制品、美洲的原料、非洲的劳动力在内的洲际三角贸易成为这一时代欧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葡萄牙人取代了阿拉伯人在亚洲和印度洋地区的贸易权之后,形成了另外一个洲际三角贸易,贸易的内容包括亚洲的奢侈品、美洲的金银、欧洲的工业品。

葡萄牙人控制着欧洲到亚洲的所有重要海上通道和战略要地,马六甲是其在亚洲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和军事要塞,他们还于1514年抵达中国广州,随后取得了明朝的特许,开始从事对中国的贸易。但是这一时代,欧洲的工业产品较之亚洲的产品显得粗糙,找不到销路。所以,葡萄牙人以中间商的角色出现,他们从东印度群岛运香料,从日本运白银和铜,前往中国,将中国的茶、丝绸、工艺品运到东印度群岛和日本,或者将亚洲的产品运往欧洲,用欧洲从美洲掠夺的黄金、白银运往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购买产品。

这种贸易结构中,大西洋贸易有利于欧洲,印度洋贸易对中国有利,这种贸易结构一直到1800年以后,英国人将鸦片输入中国,白银开始从中国流出。

这一时期的贸易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其中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美洲的农作物进入中国,如花生、玉米、甜薯等易生长、产量高的农产品,推动了人口激增。其次,就是美洲金银持续流入中国。虽然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一直在国家贸易之中占据优势,但是贸易主导权却逐渐被欧洲人掌握。过于依赖贵金属的中国终于因为白银的逆流和剩余人口的出现而不堪重负,庞大的帝国由于经济的凋敝导致财政濒于破产。

(三) 边缘化的中国

1834年英国废止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广东十三行的对外贸易垄断权成为了亚洲市场

开始进入近代的标志。尽管对于鸦片战争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这是英国向亚洲输入资本主义,也有人认为西欧从此将亚洲纳入了自己的体系,使之成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农业殖民地、商品倾销市场以及投资地和工业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鸦片战争成了近代亚洲的转折点。^①

这种转变的标志有:

1. 中国失去了茶叶和生丝出口的垄断地位

历来由中国垄断的茶叶和生丝出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日本,到20世纪初叶为止,日本已经取代了中国而基本垄断了美国的绿茶市场。这一时期,欧洲的生丝业已对中国的生丝构成了威胁。^②同时,由于印度阿萨姆红茶试制成功,1839年孟加拉茶叶公司和阿萨姆茶叶公司成立,历经40年的经营,广大的茶园相继建立。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向英国出口的印度红茶已经凌驾在中国之上。^③

2. 中国对外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主要的输出商品中占第一位的是茶叶,占第二位的是生丝。英国向中国输出的主要是毛织品、金属品和印度棉花,此时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的阶段。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主要的进口商品为鸦片和工业品。从1850年和1860年的数字看,其中鸦片的比重占到54%和48%。^④此后,中国的白银开始大规模外流。

3. 劳动力进入世界市场

滨下武志认为,亚洲市场进入近代的一个特征就是,“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真正的苦力贸易”,形成了西欧资本下的亚洲劳动力市场,因为这些劳工被投入殖民地经营,进而形成了向本国汇款的网络,这些汇款单独进入贸易金融、投资和地产市场,并且在这些领域流通和运转,这样就形成了以劳动力资金流为契机的亚洲金融市场,

①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② 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上卷,第187页。

③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第13页。

④ 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上卷,第186页。

协调了亚洲区域内的各种经济关系。^①

但是,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看,劳动力进入世界市场更是本区域生产边缘化的直接后果。本国出口下降,产品销量下降,劳动力外流,以劳动佣金平衡国际结算,构成了本国边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中国的边缘化,对亚欧大陆腹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节 亚欧大陆腹地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

一、边缘区经济——1800年以后的蒙古

明代时,蒙古各部已有粗放经营的农业,“论者或曰:‘夷人肉食不藿食也。’又曰,‘不火食也’。此在上古或然耳。可观诸夷耕种,与我塞下不甚相远。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此等传来已久,非始于近日,惟瓜瓠茄芥葱韭之类,则自款贡以来种种具备。但有耕种惟籍天不籍人。春收秋敛,广种薄收,不能胼胝作劳一倍其入”^②。这时的农业只是畜牧业的一种补充,并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

随着农作物种类的增多,农业的边界开始北移,这种情况在1800年以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和阴山地区的有效积温,对于一些农作物而言,已经足够,糜子和荞麦在这些地区得到了推广和种植。蒙古草原中南部地区的积温条件则适合许多新培育的农作物生长。^③大兴安岭以东、哲里木盟和昭乌达盟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阴山南麓、蛮汗山山区和鄂尔多斯高原的东南部,降水量可达400毫米,可以满足北方一季作物的生长。^④在科布多

①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第15—16页。

② 王建革:《定居与近代蒙古族农业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第29页。

③ 同上书,第26页。

④ 《内蒙古农业地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8页。

地区,很早时候就有许多依附于游牧业的农业种植业,到20世纪初已经很发达。^①在蒙古地区的农作物主要有抗寒的糜子、黍子和荞麦。

随着农业界线的北移,从清代开始,蒙古传统游牧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世纪以来的这种变化更为明显。农业的北侵引起蒙古人的游牧业发生了变化,这种农业的北进配合近代商品经济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蒙古人游牧业的影响尤为明显。^②

清代乾隆以后,互市这种形式已经消亡,中国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市场障碍不复存在,许多商人和汉人从农业区迁往草原,发展贸易和农业。这种状况持续发展,到了近代,草原上的农业得到了很大发展,游牧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蒙古草原南部地区形成了半游牧半农业社会,北部仍然保持着纯牧业的特色。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草原地区的生产形式和生活方式在近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 生产形式的变化

蒙古草原大规模的农业始自于清,中央政府在内蒙古的许多地区设有官设农场。官设农业主要是发展灌溉农业。例如,雍正年间,清政府在图拉河和鄂尔坤河沿岸设立官有农场,乾隆二十七年,在科布多附近的布彦岱河畔设立官有农场。这种农业的发展,对游牧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在近代,科布多一带游牧民族经营的农业,呈点状零星地分布在汉人农业区周边,也实施灌溉。其灌溉农业分为两种。一种是休闲式灌溉农业,不施肥除草,播种后四处游牧,灌溉时回到原地进行灌溉。尽管这种农业不太影响游牧业,但已经影响到游牧范围,因为游牧圈不能离农田太远。另一种农业方式几乎排斥了游牧业,在乌拉库姆地区,小麦的一年灌水达8次之多,高度集约化。灌溉农业需要整治河道、修筑渠道,这不是个人能完成的,

① 《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畜・农业》,昭和十三年一月,第206页。

② 王建革:《农业渗透与近代蒙古草原游牧业的变化》,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需要整个部落的协作。^①

在地接新疆的扎帕察地区,1921年蒙古革命后,农业发展的主要限制条件是渠道修建中的劳动组织问题,因为游牧民分散,而修渠恰恰需要劳动力集中。^②游牧经济可以兼营一些灌溉农业,但是灌溉农业要求人们要相应地定居生活。

同一时期,在热河一带,游牧民族兼营农业时,对农业并不很重视。喀喇沁部只在那些不利于牧草生长的地方种植麻黍等农作物。他们在雨量集中的7月份种植麻黍,用天然的曲木做成犁耙耕地,以3—4头大牲畜牵引,耩耙几次后,撒播种子,任其自然生长,等到秋天收获,收获也极简单,只是把穗子割掉而已。^③20世纪初,热河全境基本上已经农业化,农牧交错带北移至昭乌达盟和哲里木盟一带。

受干旱的气候条件限制,直到民国时期,内蒙古中部的农业程度仍然很低。在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地区,“蒙古人附带生产是农业,而主要的生产是牧业。所种植的多是一些糜黍子,这亦是蒙古固有的谷种。其方法,多是四月间入种,先以牛很简单地耩耙一下,就把种子种下去。雨后这些种子自然会侵入土层里面,再过相当时期,到了秋天,就穗而结实了。他们又没有特别的刈获农具,腰上只带一把小刀子,只是胡乱割了了事。这种耕种与收获法,是最原始的,……他们的农地,是由牧场分割的,因此表现的形式,有的是圆形,有的是半圆形,有的是方形,有的是短册形”^④。

在外蒙古,农业只发生于有灌溉条件的地区,但其影响也很明显。例如,居住在贝加尔湖的奥克哈岛的一支布里亚特蒙古,在19世纪末期,在农业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掌握了复杂的灌溉系统。那些未从事农业的游牧民在冬营地以圆形或椭圆形扎营,以保护中

① 王建革：《农业渗透与近代蒙古草原游牧业的变化》，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牲畜・农业》，昭和十三年一月，第195—294页。

③ 鸟居さサテ：《土俗学上より观にる蒙古》，东京大镡阁，昭和二年二月，第1022页。

④ 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7—38页。

间的牧群 夏营地则分散放牧。在半农半牧部落那里 更多地实行了定居 聚落形态也多种多样 ,一般只是沿道路的方向呈线形分布 ,但有的蒙古部落在走向半农半牧时 ,其聚落形态仍呈环形。^①

(二) 居住形式的变化

农业界限的逐渐北移 最终对游牧民族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从事了农牧兼营的牧民 ,比纯粹从事游牧者更加需要定居。渐渐地 ,许多牧民开始定居。

19 世纪末 ,俄国学者记载道 :“ 巴林右旗人几乎全已定居 ,但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巴林人是直接过渡到汉式土房子的。他们是这样过渡的 ,当毡缝破损时 ,从事农业的巴林人已经不能用新毡来加以更新了 ,而是在木架子周围造一道芦苇篱笆 ,用泥抹住。这样他们就有土房子了。”^②

20 世纪初一些日本学者的调查表明 ,从事农牧兼营的牧民 ,已经开始半定居半游牧的生活 ,并且住进了土屋 ,并由几家或更多的家庭形成圆形或方形小村落。^③

在察哈尔 ,出现了定居游牧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主要内容是有固定式的蒙古包 ,在季节性营地内定居。下面是一份出现关于定居的游牧区的调查表。

表 5-1 察哈尔北部蒙古聚落状况

(蒙古包单位 : 个 ,家畜单位 : 头)

地名	固定包数	移动包数	人口数	家畜数
镶黄旗	6	12	30	牛 600 羊 400
海皮嘎	40 + 60(土房子)	—(农区)	120 + 350	—
牛群	4(土房子)	—	12	牛 50 羊 200
哈依保巴嘎	未知	—	77	马 150 牛 200 羊 500

① Lawrence Krader ,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Turkic Pastoral Nomads ,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ol. 20 ,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 , 1963 , pp. 84—85.

②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波夫 :《蒙古与蒙古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428 页。

③ [日]陆军参谋本部 :《蒙古地志》,国书刊行会 昭和 51 年 ,第 67—68 页。

续表				
地名	固定包数	移动包数	人口数	家畜数
马呼号多	5	50	128	牛 200 马 200 羊 2500 骆驼 150
帕嘎凯奥恰斯	14	—	25	牛 14 羊 500
帕乞察斯玛	26	—	30	牛 100 羊 500
巴劳虾鲁搭拉	—	6	28	马 250 牛 130 羊 450
马依诺尔	—	5	18	牛 70 羊 300
波多路塔	—	3	5	牛 15 羊 180
依荷拉	—	3	25	马 30 牛 50 羊 190
海里喀多	7	—	22	马 7 牛 40 羊 140 骆驼 2

资料来源：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昭和 12 年 12 月，第 359—361 页。

可以看出，这一地区已经有了许多牧民开始定居，并且“在察哈尔一带，中等收入的牧人多采用（这种）双重居住方式，夏天远距离放牧时在移动包内居住，冬天在房子里居住”^①。

1938 年，日本学者对扎鲁特旗和阿鲁科尔沁旗一些村庄的调查表明，游牧地区的游牧范围已集中在村周围，但除了农牧兼营者在村外放牧外，还有纯放牧者，有着更大的放牧半径，甚至保存了游牧时代的传统，以蒙古包进行移动放牧。^②

哲里木盟扎鲁特旗的定居情况见表 5-2。表中表明，到了近代，游牧民族的居住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① [日]桥口三郎：《チメムル厩白旗のヤムタ部落》，蒙古善邻协会编《内陆アジア》第 2 辑，生活社刊，昭和 17 年 9 月，第 193 页。

② 满铁调查部：《兴安西省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畜产调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 14 年 4 月，第 6—12、206 页。

表 5-2 扎鲁特旗定居的具体案例

地名	以农为主户数	移动式放牧户数	纯游牧户数	户均牲畜数
奥喀诺好村①	83 户	10 户	3 户	牛 103 头,马 19 头,羊 56 头,山羊 64 头,农业自给自足。
诺多姆村②	46 户	17 户	9 户	
北花胡哨村	村内的下层贫民都经营农业。	中上阶层兼营牧业。		共有 270 头成畜,无蒙古包形式的游牧,只雇人放牧。
南花胡哨③	72 户	3 户。只在村庄周围 10 里的范围内活动。		

总之,大约从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开始,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一部分游牧民族放弃了游牧生活方式而转到经营定居的农业,内蒙古各地,包括呼和浩特、鄂尔多斯、科尔沁和喀喇沁等处,以及内贝加尔的布里亚特和外贝加尔地方,有大量的蒙古人成为定居农民。蒙古农民当然没有放弃畜牧业,只是经营方式与以前有所不同。同时,在许多地方,蒙古人仍然没有完全定居下来。在蒙古和布里亚特的其他地区,蒙古人开始把游牧经济和小规模的农业结合起来,尚未完全定居,这种情况在科布多、喀尔喀、内蒙古和布里亚特的许多地方可以看到。因此,在 18 到 19 世纪的蒙古人之中,可以看到畜牧业与农业结合的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按照传统方式经营的畜牧业和狩猎业在蒙古牧民中仍然是大多数。其次,亚欧大陆腹地与亚欧各国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① 满铁调查部：《兴安西省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畜产调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 14 年 4 月，第 233—237 页。

② 同上书，第 252—258 页。

③ 同上书，第 277—278 页。

18世纪以后,内蒙古出现了许多几乎只有汉人居住的城市,外蒙古即喀尔喀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城市。许多佛教寺庙兴建起来,寺庙的周围出现了大片的汉商居住地。从19世纪末开始,许多汉人迁居到内蒙古,到20世纪,在内蒙古的总人口中,汉人已经占了1/3。

19世纪下半期,俄国的商业资本和部分工业资本进入了外蒙古、喀尔喀、巴尔虎、科布多以及新疆境内。19世纪末和20世纪,日本和欧洲的工商业也开始了对内蒙古地区的投资。游牧地区的生产不再是独立的系统,而是成为了整个世界生产体系之中的一个链条。

二、边缘区经济——1800年以后的穆斯林世界

到了1500年以后,伊斯兰教徒对外的扩张达到了它的历史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有着三个著名的伊斯兰帝国——跨越中东、北非和巴尔干的奥斯曼帝国、波斯的萨菲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火药的发明和利用它制造的火器和火炮,是这三个帝国崛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①

构成这三个帝国军事力量的主要成员由突厥人组成,受蒙古帝国西征的压力,突厥人于10世纪开始迁徙进入中东地区,并且于1055年攻占了当时的穆斯林首都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帝国。到了13世纪,这部分突厥人击败了拜占庭,占领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1299年,奥斯曼帝国建立。奥斯曼土耳其人能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获胜,主要原因是他们最先大规模地向西方借用火炮和开炮能手。在波斯,阿拔斯一世效法土耳其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支火炮部队,莫卧儿帝国的创建人巴布尔在1523年侵入印度时,也以奥斯曼土耳其人为榜样,将火炮排在自己军队的前面,以粉碎骑兵的冲锋。

1258年以后,塞尔柱突厥人对波斯的统治告一段落,伊尔汗国建立,但是,1300年以后,这一地区的城市和灌溉系统重新得以恢复,1500年,萨菲王朝建立。

^① 满铁调查部：《兴安西省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畜产调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4年4月，第38页。

穆斯林帝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来自于欧洲人提供的最先进的大炮和最富有经验的炮手,同时,这些帝国行政效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国王拥有绝对的权力。16世纪穆斯林国家出现了一些较为英明的君主,加之拥有一支组织良好的行政队伍,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最优秀的人物,维持了帝国良好的运作。

穆斯林帝国获得这一时期的中东地区的霸权以后,重新获得这一地区的经济霸权,同时作为一个特征显著的经济单位,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

奥斯曼帝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帝国境内大片肥沃的土地生产出丰裕的粮食和原料,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等古老的城市制造出大量的手工业产品。拥有丰富的木材、铁、铜等重要的矿藏,帝国特殊的地理位置极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和过境贸易。印度的经济同样是令人炫目,这里出产质地优良的纺织品,这里还是香料群岛货物西运的集散地,也有着极为丰富的香料。穆斯林商人对南亚贸易的控制,对于帝国的财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17世纪就不一样了,这些帝国开始衰落。到了18世纪,穆斯林世界被欧洲远远地甩在后面,对于这种变化,唯一的解释就是其在经济领域,无论是工业、农业、金融方面或者商业组织,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①,一旦无力维持贸易路线的垄断地位,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西方逐渐地控制了中东地区,这种局面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稍有改观,许多穆斯林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随着石油在能源之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中东成为最重要的原油的生产基地。

蒙古帝国成功打通东西方贸易路线,为沿丝路国家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利益,而蒙古帝国的衰落,使西亚地区的穆斯林国家重新获得垄断东西方贸易的巨大利益。然而,世界生产核心的转移以及国际贸易路线的变化,造成了西亚穆斯林地区的整体衰落。

^① 满铁调查部：《兴安西省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畜产调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4年4月，第58页。

三、亚欧大陆腹地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

(一) 重新恢复的短暂的朝贡贸易

17世纪以后的蒙古各部分裂为三大对立势力,喀尔喀部拥戴库仑呼图克图,察哈尔部拥戴林丹汗,卫拉特部则拥戴葛尔丹博硕克图,这些部落分别试图征服各部,但是都没有成功。因为,每个部落既无可靠的后方、可靠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又没有力量和机会把对外市场和攻掠富裕文明地区的通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①这个时候,中国的中央政府重新控制中亚与中国的贸易。

蒙古被迫退回蒙古草原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迅速发展,时局稳定下来之后,陆上丝路贸易也重新开通。这一时期,亚欧大陆腹地的西域诸藩与明帝国联系密切,交往频繁,贸易隆盛,朝贡关系得到了稳固发展,之间贡赐次数繁多,规模巨大。

明代丝路是在汉唐丝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许多路段与汉唐时代的时期大体吻合,也有局部同之处,较为明显的是汉唐到元代一直很繁荣的丝路南道中衰了,在原来的中道和北道之间出现了一条新的道路,形成了新疆境内新的南中北三道。由于明政府鼓励新疆各地方政权“朝贡”,因而新疆与内地的商业往来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活跃。^②

陆路丝路开通以后,西域各国纷纷向明帝国派出使臣和庞大的使团,向明政府朝贡,明政府也以回赐的方式赐给前来朝贡的国家中国的物品。各国朝贡的规模很大,贡使人数常达几百人之多,如沙哈鲁使团的贡使就有500多人。^③明朝的大批白金、瓷器、文锦、纱罗、绢布赠送给西域沿途各地王廷,西域诸国朝贡时,常常带大量的玛瑙、马匹和当地土特产品。永乐十七年,哈密向明朝进贡,派出的使者及商人有290人,贡马3500多匹及貂皮、硃砂等物,明政府回赐的

① [苏联]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299页。

② 杨富学:《明代丝绸之路及其贸易》,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

③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载《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93页。

纱3.2万锭,文绮百匹,绢1500匹。^① 明朝政府一方面对西域诸国朝贡来的马匹及当地的土特产品有所希图,再者就是想利用这种手段来维持自己宗主国的地位,使“远方万国无不臣服”^②。西域诸国的政治目的相对要小得多,更注重经济利益,“西域使客多是商贾,假进贡之名,籍有司之力以营其私”^③。其向明朝政府进贡的物品都标有相应的定价,以此获得相应的回赐,所得回赐物可以沿途出售^④,哈密、吐鲁番等地还经常指名乞赐所需之物^⑤,同时其所携之各国土特产品可以乘机交易,明政府“听其量带方物来京贸易”^⑥,贡使进京后,可以开市五日,“许官民各色铺行人等持货入馆,两平交易”^⑦。西域商人沿途在河西的甘州、肃州、临洮及北京买卖、定居,使西域商人遍及西域、河西及北京一带。^⑧

表 5-3 明代与亚欧大陆腹地朝贡贸易统计

	哈密	吐鲁番	撒马尔罕	别失八里	失刺思	撒里畏吾儿	哈烈	瓦剌	火州	柳城	于阗	哈密哈儿	八答黑商	亦思弗罕	塞蓝	俺都淮	俺的干	乞力麻儿	杀鹿海牙	小计
洪武 (1368—1398)	3	10	1		4			1		1										20
永乐 (1403—1424)	47	12	18	11	5	1	10	2	8	5	5	2	1	1		3	1	1	1	135

① 《明太宗实录》卷二一六。
② 《明史》卷三三,《于阗传》。
③ 《明仁宗实录》卷五上。
④ 《明武宗实录》卷四三。
⑤ 《明仁宗实录》卷五上。
⑥ 《明武宗实录》卷四三。
⑦ 《明会典》卷一一二,《礼部七十·给赐三》。
⑧ 杨富学:《明代丝绸之路及其贸易》,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

续表																	
洪熙 (1424—1425)	3	1				2								1			7
宣德 (1425—1435)	36	16	9	16	2		3	3	1	2		2		1	1		91
正统 (1435—1449)	40	4		10	1	5	2	2	1	2		1					67
景泰 (1445—1456)	6	2	2	3			2	2						1			17
天顺 (1456—1464)	20	2		2		1						1	1				27
成化 (1464—1487)	28	14	2	1	7	1	1	2					2	1			59
弘治 (1487—1505)	12	18	5		1												20
正德 (1505—1521)	15	6	10														31
嘉靖 (1521—1566)	5	9	5		1												20

续表

隆庆 (1566 — 1572)			1																1
万历 (1572 — 1620)	3	4	2								1								9
合计	218	89	63	44	16	15	11	11	9	7	6	4	3	3	3	4	1	1	521

资料来源：杨富学：《明代丝绸之路及其贸易》，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原文有两处计算错误，已改正。

可以看出，西域诸国与中国的朝贡贸易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并且来往的次数繁多，规模很大。

（二）边境贸易内容的变化——茶马贸易的发展

在与中亚各国的朝贡贸易以外，明代的边境贸易也很频繁。瓦剌向明朝派遣使臣进贡，也将蒙古的许多产品在明朝境内出售，瓦剌经常而且最重要的是与明朝进行的茶马贸易。

明朝主要的贸易对象是马匹。对于茶马贸易有很多相关的记载，永乐元年，明与哈密“市易马四千七百四十匹”^①，宣宗时，“亦力把里使臣打刺罕马黑麻等，以马来鬻。有司定价：中马每匹钞三千贯，下马每匹二千五百贯，下下马每匹二千贯，骠驹一千贯”^②。

这一时期，茶马贸易是明政府与游牧地区贸易的大宗，因为蒙古仍然是其北方最为严重的威胁，才有“车驾频岁北征，令马，遣官多隣綵币、瓷器，市之失刺思及撒马儿罕诸国”^③。明朝政府还从西域诸国获得贡马，据统计，明成祖在位的22年间，几乎每年都有西域使

① 《明太宗实录》卷二五。

② 《明宣宗实录》卷四三。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三。

者入明贡马。^①明太祖时期,每年用茶叶50多万斤,从洮州、河州、西宁等地易马13800多匹^②,这些马匹多为戍边之用^③。马匹在整个朝贡贸易和边境贸易之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其次,才是一些珍稀产品,例如骆驼、宝石等。

这一时期,蒙古与明的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15世纪前半期,明朝对瓦剌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位首领封王之后,瓦剌即与明朝表文贡使往来不断。脱欢继马哈木为王时期,其下属大小头目受明朝封官者一百余人。也先时期受封者,更多达358人次。瓦剌与明朝之间通过朝贡和互市,加强了政治、经济联系,瓦剌入贡人数不断增加,多者一次竟达两三千人,贡马和皮张也常以数万计,出现了贡使“络绎于道,驼马迭贡于廷”^④及“金帛器服络绎载道”^⑤的局面。

瓦剌向明朝进贡及与中原地区贸易,主要是通过哈密,经由沙州、赤斤蒙古等卫,前往北京或在甘肃地区进行贸易,另一条路线是经由宁夏、山西大同至北京。瓦剌的贡使,一般在每年10月间进入大同,11月抵达北京,在京参加庆贺正旦节以后,于次年春返回。明朝也同时派出答使与其同往,来年再伴随瓦剌贡使回京。明朝也允许贡使在所驻馆舍与民间商人交易,为期3至5日,此为“贡市”。如1438年(正统三年)命脱欢贡使除3、5人进京外,其余留在大同“听其与民交易”^⑥。蒙古各部往往以朝贡为名,附带有特殊商队赶着大量贡外马匹,或在沿边重镇或到北京的会同馆进行贸易。瓦剌对明朝最大的一次进贡发生于1452年(景泰三年),也先与阿剌遣使3095人,进贡马驼40200余匹。明朝“通赏各色织金彩素纁丝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二匹,本色并各色阔绢九万一百二十七匹,衣服三千八十八袭,靴革未毡帽等件全”^⑦。明朝的药材、绸缎、布匹、瓷器、银

① 杨富学：《明代丝绸之路及其贸易》，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

② 《明史》卷八十，《茶法》。

③ 《明太宗实录》卷二五。

④ 《明英宗实录》卷二〇四。

⑤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

⑥ 《明英宗实录》卷三八。

⑦ 转引自杨富学：《明代丝绸之路及其贸易》，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

器都是游牧地区所需要的,其“服食器用,悉仰给于中国”^①,尤其是丝绸,“对内亚诸国来说,丝绸是他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中国礼品”^②。例如,明成祖时,哈密进贡,明回赐3.2万锭银两和“文绮百匹,绢千五百匹”^③,正统十二年,明政府回赐瓦剌“彩缎表里、布帛共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五匹”^④。朝贡贸易使明朝政府补充了所需军马,蒙古也获得了大量珍贵财物,享用之余,尚可通过丝绸之路转运至西域和中亚各地。

汉唐时期茶马贸易较为少见,至宋,中国茶叶开始大量地输入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地区,元代有所中断,到明代才又重新恢复并有所发展,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整个世界贸易路线发生了变化,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另外,游牧民族进行茶马贸易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喝茶,较之饮用马奶酒之类的饮料更有助于消化,也比饮水更安全,能够提神不像酒精那样使人困倦,在冬天更能抗冻耐寒”^⑤。《明史》亦载牧民“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⑥。因而,茶叶是游牧地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明代初期,曾经禁止私茶出境,但后渐被取消,明代茶叶主要是以私茶、官茶、贡茶进行交易,为此,明政府设有茶马司,掌管茶马贸易。

明亡后,这种贸易也日益减少了,到乾隆年间,茶马贸易最终销声匿迹。^⑦

(三) 18世纪以后亚欧大陆腹地的边境贸易

18世纪以后,汉族商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从前的边境贸易,他们开始亲自到草原和山区的蒙古人中,购入原料和畜产品,卖出中国乃至欧洲的商品。汉族的高利贷者、大小票号的经纪人和各种投机家

① (明)李承勋:《议处哈密事宜疏》,《皇明经济文录》卷四十。

② M. Rossabi,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5, p. 76.

③ 《明太宗实录》卷一一四。

④ 《明英宗实录》卷一五八。

⑤ M. Rossabi,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5, p. 9.

⑥ 《明史》卷八十,《茶法》。

⑦ 杨富学:《明代丝绸之路及其贸易》,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

随同商人一起进入蒙古地区,后来手工业者和农业移民也移往蒙古地区。^①

冷战期间,中国与苏联关系十分紧张,蒙古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支持苏联对中国的包围与遏制,中蒙关系一度紧张。蒙古对外经贸的主要伙伴是经互会国家。蒙古与经互会国家的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在1988年是93%,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个比例迅速降至1992年的61%和55%^②,余者皆转从中国进口来弥补,尤其是蒙古极度匮乏的日用消费品。蒙古前驻中国大使达·查希勒冈也认为:“我们蒙古在此前的一个历史阶段,主要是从东欧和苏联购进生活必需品的。现在开始从中国以相对合理的价格,较短的路程和时间,购进这些必需品了,这对蒙古国显然是十分有利的。”^③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蒙古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缓冲国,政治和经济现实要求蒙古必须同时与中国和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因此“发展同两个邻国——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睦邻关系是首要任务”^④。这一时期,蒙古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在经贸方面,苏联解体,俄罗斯对蒙古的经济支持能力下降,蒙古经济也随之衰退,蒙古政府试图通过发展与中国的边境贸易来复苏和稳定国内经济和政治。

中蒙两国自从1951年开始建立贸易关系,但是期间双边贸易关系发展不大,直到冷战以后,才结束这一状况。1989年,两国政府成立了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委员会,迄今已举行6次会议。

1991年1月,中蒙两国政府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以现汇贸易取代了协议记账贸易,同年,两国政府签署投资保护协定。之后,两国贸易发展迅速。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1992年,中国同蒙古的进出口商品总额为1.8387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为1.3576亿美

① [苏]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293页。

② 晓林:《蒙古的经济复苏与安全战略》,载《东北亚论坛》1994年第1期。

③ [蒙]达·查希勒冈:《当前的中蒙关系及其发展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2期。

④ 1994年4月7日蒙古外长贡保苏仍答新华社记者问。

元,进口额为4811万美元,1995年,全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619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6.2%,^①中国已成为继俄罗斯之后蒙古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从蒙古进口的主要是畜产品等原材料、废铜、木材等。

1997年1月,蒙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适应加入WTO的新形势,促进贸易自由化,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修改了《海关法》,规定自1997年5月1日起,将所有进口商品(酒精等除外)的进口关税税率降为零。1999年,国家大呼拉尔再次修改有关法律,将进口税率增加至5%,并于1999年7月1日开始执行。据中国海关统计,2001年,中蒙贸易总额为3.62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额为1.23亿美元,进口额为2.39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近年来均为10亿美元。1985年以来,两国在发展政府间贸易的同时发展边境贸易。目前,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河北省、吉林省等同蒙古有关地区和部门开展边境贸易,中蒙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经贸合作关系。据蒙方统计,截至2001年底,中国对蒙直接投资近700项,累计投资额逾1.35亿美元,占外国在蒙投资总额的40%,成为在蒙第一大投资国。

第三节 机动性的逆转

一、世界武器的变革

14世纪,黑火药开始用于欧洲战场,从而开始了人类战争史新的一页。

火药武器发明于中国的宋朝,在战争传到了金、辽、夏和蒙古,在蒙古人西征过程中,传到了伊斯兰国家,最后传到西欧。虽然欧洲人陆陆续续开设了火药厂,但是火药真正地发挥出威力、人们开始研究火药武器是在15世纪中叶以后,奥斯曼土耳其始用火炮攻打拜占庭帝国的城墙,开始了人类战争的新纪元。半个世纪后,奥斯曼帝国

^① 田增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凭借火药的威力,侵入了欧洲中部的维也纳,给欧洲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地缘政治变化导致了欧洲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一系列由技术革新尤其是火器给欧洲带来了新的机遇——武器有了很小的却很重要的变化。16世纪以前,欧洲步兵使用的武器是火药枪和滑膛枪,16世纪发明了轮枪机和燧发枪,随后世界军事技术发生了一系列令传统骑射技术越来越无法比拟的变化。

16世纪时,土耳其的精锐骑兵还拒绝使用火枪以代替弓箭,但是到了17世纪时,弓箭就从战场上完全消失了。15世纪下半叶,加农炮有效地取代了抛石机,成为了重要的攻城炮,攻城技术的变革又使筑城和攻城的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8世纪,阵地战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设防的城堡和要塞成为作战的对象。^①

下表列出了军事技术的变革情况,火药技术引发的技术变革主要发生在欧洲和北美。

表 5-4 :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TEL)^②

兵器名称	TEL
白刃战兵器	23
标枪	19
普通弓	21
长弓	36
十字弓	33
火绳枪	10
17 世纪的滑膛枪	19
18 世纪的燧发枪	43
19 世纪的来复枪	36
19 世纪中叶的来复枪(采用圆锥形子弹)	102
19 世纪末叶的后膛来复枪	153
斯普林菲尔德 1903 型来复枪(连发式)	495

① [美]T. N. 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第 123—142 页。

② 兵器杀伤力理论指数指的是各种兵器的相对杀伤效能，系根据兵器的射程、发射速率、精确度、可靠性以及杀伤半径等性能计算得之。

续表

兵器名称	TEL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机关枪	3463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机关枪	4973
16 世纪的 12 磅炮弹加农炮	43
17 世纪的 12 磅炮弹加农炮	224
18 世纪格里比尤伏尔 12 磅炮弹加农炮	940
法国 75 毫米火炮	386530
155 毫米通用引信火炮	912428
105 毫米榴弹炮(M—1 型)	657215
155 毫米舰载中央主炮	118068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时的坦克	6926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	575000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斗轰炸机	6926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斗轰炸机(P— 47)	135000
V—2 型弹道导弹	3338370
二万吨高空爆炸核弹	49086000
一百万吨高空爆炸核弹	695385000

资料来源：〔美〕T. N. 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第 116—117 页。

欧洲的军事革命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军事竞争,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国家利益成为欧洲政治的核心内容。国家林立的欧洲,二百多年间战争频繁,随着对外扩张的需要,武器改进的节奏越来越快。

炸药和火枪的出现并成为战场上的主要兵器是一个区域性技术并行发展的结果,铸铁技术是促使黑火药兵器发展的最重大的技术进步。^①技术的变革改变了战争依靠生物力量作战的历史,机械力量和化学力量进入了战争,拥有更为先进的武器,就更能取得胜利。火器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世界的生活方式。铸造枪炮需要更多的生铁、铜和钢,这反过来刺激了冶金和铸造技术的进步。如此一来,生产的专业化分工进一步加强,也相应刺激了这些领域的生

^① 〔美〕T. N. 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第 117 页。

产。从中国传来的火器导致军事方面的革命,也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

但是,在不同的文化制度下,火药技术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是不一样的。中国在宋、金、元各代战争中对火器有过很大的改进,但是在帝国统一以后,就失去进一步改进的动力。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火炮除了用于攻打城池以外,运用火枪则被视为有损骑士风度,骑士们更喜欢使用刀剑作战。在俄国和莫卧尔王朝,因为其拥有的火炮极大地压倒了敌人的原始武器,也失去了改进的动力。每个社会所处的地缘环境不同,对技术变革的敏感程度也不一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所面临的敌人强大与否,这也是一个地缘政治上的结果。

对于生活在亚欧大陆腹地草原区的游牧民族,因为其生产和生活仍然需要依赖骑射技术,而且在这一时期,其所面临的对手东面是中国传统的农业步兵,西面是俄罗斯帝国的雇佣军——哥萨克骑兵,相对而言,亚欧大陆腹地仍然是一个传统战争占主流的相对封闭的区域。直到亚欧大陆腹地东部边缘和西部边缘完全被来自海洋的力量所包围时,游牧经济在军事上才彻底地失去昔日的优势。

二、亚欧大陆腹地军事优势的丧失

(一) 蒙古军事帝国体制的瓦解

蒙古退出中原以后,旧的体制瓦解,各部重新回到成吉思汗崛起以前的混战状态。经过二十年的战争,蒙古正式分裂为东蒙古和西蒙古两大势力,东蒙古即蒙古本部,西蒙古即卫拉特,即元朝的斡亦剌惕,明称之为瓦剌。

13世纪以前,瓦剌部在以希什德河为中心的叶尼塞河上游至色楞格河支流木伦河周围的森林地区游牧,由于所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元朝的斡亦剌部虽然归于蒙古统治之下,但却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蒙古帝国崩溃以后,瓦剌部乘机寻求更大的自由和政治独立性。1388年,瓦剌部的也速迭儿杀死了脱古思帖木儿自立为汗,开始与蒙古本部争夺汗位。自从脱古思帖木儿死后,蒙古草原各部重又陷入更为混乱的状态。

1408年本雅失里在阿鲁台、马儿哈咱等人的拥戴下立为大汗。

但是他的地位其实并不稳固，有很多部众并不臣服于他，内部的战争仍然不断发生，帝国机制不复存在，从此亚欧大陆腹地重新回到蒙古帝国以前的混战状态。

（二）蒙古与农业区域战争的继续

中国的明朝方面，一直在为出征蒙古作准备，试图消除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明与蒙古的战争在明代建立之初，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1409年，明朝以蒙古拘杀使者为由出征蒙古。7月，十万明军直趋胘胸河。此次蒙古军队仍使用先前所用的“诱敌深入”法，获得了全胜，这使本雅失里、阿鲁台等声威大震，许多已归附明朝的蒙古部落重又叛明北归。

1410年，明成祖亲率50万大军出征蒙古，此时蒙古内部发生分裂。蒙古的内部分裂使明成祖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阿鲁台于1410年年底投降明朝。本雅失里则投靠了瓦剌，1412年被瓦剌马哈木所杀。东蒙古势力经过这次战争后大大被削弱了。

本雅失里与阿鲁台失败后，瓦剌的势力逐渐膨胀起来，这使明朝感到了潜在的威胁。1414年3月，明朝以瓦剌拘杀使者为由，明成祖率50万大军亲征瓦剌。明朝仅获小胜，却付出了相当大的损失。

1415年（永乐十三年）正月，瓦剌顺宁王马哈木、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剌罗遣使向明朝贡马谢罪，此后数年蒙古本部阿鲁台与瓦剌马哈木等均竞相与明朝交好，朝贡贸易不断。

1416年阿鲁台趁瓦剌兵败，出兵击溃马哈木，马哈木死去之后瓦剌势力更加衰弱。阿鲁台的势力重又复起。

1421年（永乐十九年），阿鲁台进犯明边，明成祖准备率兵亲征，后因阿鲁台北迁暂停。

1422年，阿鲁台又攻打兴和，此次明成祖又率兵亲征，但是此次阿鲁台又北走，明军为怕再中诱敌深入之计而未再向前追击。

1423年，阿鲁台又犯边，成祖继续率兵出征，但是阿鲁台却恰被瓦剌所败。

1424年，阿鲁台又率兵侵扰大同、开平等地边境，成祖再次率兵出征，至答兰纳木儿河（今喀尔喀河支流纳墨尔根河），却发现阿鲁

台又逃跑了,于是明军只得班师回朝。

连续多年的不断出兵,使得明朝财力疲敝,明成祖在回师途中病死,此后再也无力大举进攻蒙古了。

(三) 农业式军事防御的继续

经过明朝军队多次出击,加上蒙古各部之间的混战无力全面南侵,双方相持在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一线。

对于蒙古军队,明代没有更有效的办法,只有借助于传统的防御措施。于是,明朝开始重新修筑长城。明长城主要是在北魏、北齐、隋长城的基础上进行修缮,修缮方法为将烽火台加高加厚,修筑关堡,挖掘壕沟,部分地区将土夯城墙改建成石砌或砖砌城墙,重点是山海关至居庸关和北京至今山西大同一线的外长城。

为了有效地管理长城一线的防务,明朝将鸭绿江边至嘉峪关的长城沿边划分为九个防区,设立了九个边镇,分别为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镇,称之为“九边”,这九边除固原外,均直接与蒙古地区相邻,这九镇管辖范围分别是:

辽东镇。镇所设于广宁卫(今辽宁省北镇),后每年冬季移至东宁卫(今辽宁省辽阳)。所辖长城西起山海关向东北经宁远(辽宁省兴城县)、义州卫(今辽宁省义县),向东至广宁,转而向南,过辽河至今辽宁省海城县,沿辽河东岸向北,经沈阳市、铁岭、开原,最终直抵鸭绿江边,长约1000公里。这段长城于后金(满洲)兴起时被攻破。

蓟镇。镇所设于三屯营(今河北省三屯营),管辖长城西起四海冶(今北京市延庆县),东北至古北口,折向东南至马兰峪(河北省遵化县),向东经喜峰口至山海关与辽东镇相连,长约1500多公里,这一段长城离北京最近,造得也最为坚固,抗倭名将戚继光曾担任蓟镇总兵,并曾主持加固改进了本段长城。

宣府镇。镇所设于宣府(今河北省宣化市),所辖长城西起阳和卫(今山西省阳高县),向东北经今河北张家口、独石口,转向西南在四海冶与蓟镇长城相连,全长约600公里,宣府镇长城位置重要,号称有内外九重长城之多。

大同镇。镇所设于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管辖长城西起丫角山(今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境内),东至阳和卫与宣府镇相连,

约 300 多公里长。

山西镇。又名太原镇，镇所初设于偏头关（今山西偏关），后移至宁武，管辖长城西起河曲（今山西河曲县）黄河东岸，经偏关、老营堡、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直至与蓟镇相连，全长约 800 多公里。因其长城主要在大同、宣府两镇长城的后方，作为第二道防线使用，因此，又被称之为“内长城”。

延绥镇。又名榆林镇，明朝初期，其疆域曾到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加河、乌拉山一带，后蒙古各部不断南进，明朝势力不断后退，于是设立了延绥镇，镇所初设于绥德州（今陕西省绥德），后移至榆林卫（今陕西省榆林），管辖长城西起花马池（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东至黄甫川堡（今陕西府谷县境内），长约 900 多公里。

宁夏镇。镇所设于宁夏卫（今宁夏银川市），管辖西起宁夏中卫黄河北岸（今宁夏中卫县境内），东至花马池与延绥镇相连，长约 800 多公里。

固原镇。又名陕西镇，镇所设于固原州（今宁夏固原），所辖长城西起临洮、兰州一带，东至饶阳水堡（今陕西定边县）与延绥镇相连，明代后期，此镇长城改线重建。

甘肃镇。镇所设于甘州卫（今甘肃省张掖），管辖长城起于靖虏卫，经兰州、凉州向北，经甘州、肃州，向西止于嘉峪关，全长约 800 公里，明朝后期，凉州至靖虏卫长城随明朝的北进向北迁移。

但是，种种措施仍然没有办法阻止蒙古军队的进攻，明朝中叶，明军屡次败于蒙古军队。尤其是公元 1449 年，明英宗征蒙古瓦剌部，被瓦剌军队围困于土木堡，兵败被俘，而瓦剌部乘胜兵临北京城下，几至攻克北京。

鉴于此，明朝把修筑长城作为当务之急，直到明朝灭亡，修筑长城的工程几乎从未间断，最终形成了东起鸭绿江边、西至嘉峪关的规模宏大的长城。它横贯今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等九个省市，全长约 6300 公里。

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形成的这种要塞式防御措施，一直作为防御来自于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南侵的主要形式，至清，这种防御

形式退出了战争历史。

(四) 亚欧大陆腹地军事优势的逆转

中国从明代开始配备了火器,还设计了车兵。明代车兵的配置为车上20人,其中车正1人,推车6人,舵工1人,火箭手2人,鸟统手4人,佛朗机手6人,车下杀手1队12人,队长1人,圆牌手2人,长刀手4人,大棒手2人,耙手2人,火兵1人,共32人。^①但是这种作战方式从来没有在战争中应用过。

明朝军事上最大的成就是战马饲养的成功。苜蓿草的引进使得中原地区养马成为一种技术上的突破,它是饲养良种马的最好饲料。明代为了发展养马业,广泛地种植苜蓿草。

为了保证军队战马的供应,明朝政府专门有牧马草场,就是指明政府专供官民养马放牧的场地。明代养马有四种制度:一种是内厰,专供皇帝养马,马场大都设于京郊大坝;一种是兵部系统养马,主要是通过太仆寺和行太仆寺所属的苑马寺监和苑马场进行放养;一种是官方牧马,通过太仆寺及苑马场进行放牧;一种是民牧,由明代南北二京太仆所属单位(如苑巧场等)将马匹交给民户牧。^②依照明律,无论官牧或民牧,明政府都依律供给牧地,官牧马匹,依律分给边镇军队使用,民牧的马匹,都按规定供给京军使用。当时,全国牧马草场的面积约有2000万亩左右。^③

随着火器在军事上的应用以及军用马匹饲养问题的解决,亚欧大陆腹地相对于中国农业区域的军事优势开始渐渐消失。其中著名的标志性战役有明成祖征讨马哈木的忽兰忽失温之战和康熙征讨葛尔丹的昭莫多之战,前者是阵地战的作战方式开始取代骑兵的袭击战,后者则标志着骑兵彻底地丧失其传统的优势。

1414年(永乐十二年)2月,明成祖亲率50万大军亲征漠北,征讨马哈木。6月初双方军队相遇,蒙古军队仍然采用传统的冲锋作

① 刘洪涛:《中国古代士兵生活与征战》,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89页。

② 施菊英:《世界近代前期经济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78—79页。

③ 同上书,第79页。

战方式,骑兵分三路列阵距明军十余里的山头上,约3万余人,每人带从马三四匹。明军派兵向马哈木挑战,马哈木派蒙古骑兵冲下山坡迎战,明军则占据有利地形以密集的“神机铳炮”射击,蒙古骑兵退集山顶。后明军的東西两翼部队挺进,形成合围之势。傍晚,明成祖以火铳攻击山顶,数百精骑为前锋乘势冲锋,蒙古骑兵大败,瓦剌王子等十余人阵亡,数千人被杀,答里巴、马哈木、太平和巴秃索罗脱身逃走,逃亡到了土刺河。忽兰忽失温之战,是明朝与游牧民族战争史上少有的阵地战,其主要原因是火器开始应用于战争中,此次战役是明军与游牧民族在军事优势对比上的一次转折。虽然明代火炮已经用于军事,但是其威力尚不能扭转对于蒙古骑兵的劣势,直到清朝,昭莫多战役之后弓箭才彻底失去优势。

标志着骑兵的优势彻底终结的是1636年的昭莫多战役。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2月趁噶尔丹军队马匹疲瘦、不便远逃的机会,清军分三路出兵,将噶尔丹夹击于土刺河一带。1696年5月,清军与蒙古昭木多之战开始。

昭莫多位于肯特山南部,土拉河北面,汗山的东面。清军利用昭木多的地理条件,令绿旗官兵居中,将京城、西安的满洲官兵、察哈尔及诸札萨克蒙古兵居东侧,右卫官兵、大同绿旗兵沿河布阵,然后前锋领兵400吸引噶尔丹主力到昭木多。噶尔丹的先头部队遇到清军先锋之后,马上列阵战斗,清军且战且退,将噶尔丹军成功地吸引到了昭木多阵地。噶尔丹军队试图乘胜而进,与清军开始交锋,双方最初下马列阵步斗,结果噶尔丹军队却落入了清两路军的包围之中。噶尔丹军蜂拥攻击清军所占的小山,企图夺回制高点,但清军以藤牌和拒马木阻其冲锋,并弩铳齐发,集中火器猛烈攻击,当双方距离20步左右时,才达到弓箭的射程,双方开始弓箭对射,但噶尔丹作为前锋的精锐部队已经被火器消灭殆尽。

这一战清军共消灭噶尔丹军2000多人,俘虏3000多人,获得牛羊60000多只。噶尔丹的妻子阿奴哈敦以及许多大将阵亡,噶尔丹率少数人马突围成功。昭木多之战,噶尔丹主力尽被消灭,从此一蹶不振。

基于火器在这次战争中标志性的作用,昭莫多战役成为一次承

前启后的战役。从此以后,骑兵开始退出主流作战方式,游牧民族在亚欧大陆腹地的机动性彻底丧失。

第四节 作为缓冲地带:民族国家的产生

一、亚欧大陆腹地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

(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13—15世纪,金帐汗国一直统治着莫斯科及其周围的许多封建公国,金帐汗国后来分裂为鞑靼汗国、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其中后三者成为敌对的国家。从14世纪开始莫斯科大公利用替金帐汗征收贡赋的权力,打击和削弱其他公国,加强莫斯科的地位,并趁机扩大莫斯科的领土。1480年克里米亚汗国进攻金帐汗国,莫斯科公国乘机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15世纪末16世纪初,莫斯科大公把原蒙古人治下的俄罗斯人居住地并入莫斯科版图,莫斯科公国形成一个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整个亚欧大陆腹地的地缘优势开始逆转。

1552年,喀山汗国被沙俄所灭。在这次战争中,火炮和火枪的军事优势开始发挥作用,地雷炸毁了鞑靼人坚守三个月之久的喀山城,俄罗斯人迅速地占领了整个喀山汗国。1556年,阿斯特拉罕汗国被俄罗斯人所灭。沙俄吞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以后,继续向东灭掉了诺该汗国和以前臣服喀山的巴什基里亚,接着俄罗斯人就越过了乌拉尔山开始征服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

俄罗斯人征服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主要采取两种手段,一种是通过武力强行占领,一种是通过与土著首领购买的方式来获得。但是无论哪种方式,对于俄罗斯人而言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第一,俄罗斯人采取了欧洲人先进的军事技术,彻底逆转了步兵与骑兵的先前劣势;第二,从西伯利亚获得的大量皮毛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财富。

中亚地区包括今天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等五国所在的地区,面积近390万平方公里。由于中亚南部主要

是沙漠地区，俄罗斯人一时还无法进入，便瞄准了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中亚北部从15世纪以后，主要是哈萨克人的游牧地区。1734年安娜女皇下令建立奥伦堡，以便以此为基地大规模地侵略中亚地区。此后沙俄在哈萨克草原不断修建碉堡，并把一座座碉堡连成碉堡线，把大块大块的土地、牧场、森林和河流圈入自己的版图，逐步地蚕食中亚的哈萨克各部的土地。^①

哈萨克人分为大帐、中帐、小帐（帐或称玉兹）三部。大帐，即大玉盆又称乌拉玉兹，在清代文献中称为哈萨克右部，中帐即中玉兹，又称鄂尔图玉兹，清代文献称之为哈萨克左额小帐即小玉兹，又称奇齐克玉兹，清代文献称之为哈萨克西部。晚清政府准许归附于它的哈萨克人和布鲁特人（即柯尔克孜人或吉尔吉斯人）在伊犁将军管辖地区游牧，每年向他们征收赋税。土库曼人占有中亚西南部的卡拉库姆沙漠的四周地区，他们过着游牧生活。这些草原游牧人的封建社会的特点是保存着部落宗法制社会结构。在中亚南部，即费尔干纳盆地和阿姆河、锡尔河等流域，居住着从事农业的乌兹别克、塔吉克等民族，他们有较为发达的封建制度。在这些定居者所在的地区，形成了三个封建汗国——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三个汗国周围的一些部族或部落的首长，有的是分属于三个汗国的藩臣，有的是拥有伯克、阿奇木等称号的半独立的封建王公。19世纪以后，汗国之间经常爆发战争，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共同抵御外部侵略的力量，给沙皇俄国的侵略以可乘之机。^②

俄国除了使用武力直接占领以外，另一方面通过所谓的“谈判”，用欺骗、收买、“袒护”当地上层统治者中的弱者、颠覆强者等手段，分化瓦解上层统治集团，1822年和1824年沙俄政府废除了哈萨克中帐汗和小帐汗的统治，并把中帐的领土分成许多俄国的行政单位，逐步完成了对中亚诸地征服。

在西伯利亚东进的是哥萨克人，他们一边推进，一边修筑碉堡、

①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123页；《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简史》，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2—123页。

② 《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简史》，第120—121页。

据点和要塞,以此来保护他们的交通,哥萨克人利用西伯利亚密布的河流作为主要的交通手段,不断地向东推进。1610年,他们到达叶尼塞河流域,建立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要塞。1632年,他们抵达勒拿河,建立雅库茨克要塞,之后,与布里亚特蒙古人发生了一场战争,获胜后的俄罗斯人继续前进,到达贝加尔湖一带,1651年,伊尔库茨克要塞建立。俄罗斯人前进到黑龙江流域的时候,遇到了仍处于强大时期的中国,中俄发生了两次雅克萨之战,俄罗斯人战败。1689年8月27日,《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俄罗斯人对于亚欧大陆腹地的完全征服,此时的蒙古夹在两大帝国的中间,成为了一块巨大的缓冲地带。

18世纪前期中俄之间的争端集中在蒙古与俄国的划界问题上。这一时期,俄国主要关注与中国的通商问题。由于俄国对于俄蒙划界问题和逃人问题一再搪塞,导致1722年中俄贸易关系终止。此时,俄国由于长期与瑞典和波斯作战,无力再挑起中俄冲突,遂遣使入华谈判。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签订。条约确定了两国的中段边界以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相互关系。条约中所确定的中俄中段边界直至清末没有发生变动,外蒙古独立后,此边界变动也不大,至今仍大体为俄蒙边界。

俄罗斯人从西向东的征服,是建立在改变整个亚欧大陆腹地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要塞的建立彻底逆转了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昔日生产方式,河运的利用,使得亚欧大陆腹地在机动性上发生了转变。

(二) 俄国和苏联谋求亚欧大陆霸权及其失败

俄罗斯并不满足于《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所取得的领土,始终把夺取黑龙江入海口作为俄国向太平洋发展的目标。鸦片战争以后,从拿破仑战争中恢复过来的俄国,重新开始了在亚欧大陆上的侵略活动。1858年,俄国趁火打劫,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璦琿条约》,在随后的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国以武力相威胁,从中国攫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而贯通了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广大地区。俄罗斯征服亚欧大陆的行动完成了第一阶段。

但是,这一阶段俄罗斯并没有获得在太平洋上的不冻港,这使得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面临着没有终点的危险,于是俄国决心在朝鲜或者中国获得一个常年不冻港。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俄罗斯准备穿越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修建到海参崴的铁路。两年以后,俄罗斯占据旅大;四年后,出兵占领中国东北。至此,俄罗斯在亚欧大陆上的势力达到极限,从圣彼得堡到旅大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贯通全境,俄罗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陆上机动性和海上机动性。

俄罗斯帝国丧失海上机动性始于1905年日俄战争失利中对旅大的丢失,旅大的丢失使得俄罗斯彻底丧失了远东地区海上的机动性。虽然在二战时苏军又重新占领了中国东北及旅大,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苏军撤出中国^①,远东港口海参崴是一个半年港,极大地限制了俄罗斯海军的机动性。而在此之后,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美军在韩国驻扎的十万部队,极大地限制了俄军在远东的机动能力。^②

1979年,苏军侵入阿富汗,试图获得印度洋上的出海口。但是,阿富汗的游击战使苏军无法开展进一步的行动,最后苏军被迫从阿富汗撤军。这标志着苏联南下印度洋战略的彻底失败。

冷战结束后,苏联的解体使得北约和美国乘隙进入了乌克兰和外高加索地区以及中亚地区,使得俄罗斯在黑海和欧洲南部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影响全面萎缩。在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之后,俄罗斯已经基本从一个海洋大国萎缩成了一个内陆大国,而它的出海口仅

① 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文件表明,当时苏联之所以从中国东北撤军,最终放弃旅大,而甘于暂时冒西伯利亚大铁路找不到出海口的危险,是因为当时朝鲜和苏联达成的一项协议:朝鲜有意在统一后同意苏联使用它的不冻港。据中国体改委副秘书长温铁军在南开大学2001年11月17日的一次演讲。

② 麦金德认为朝鲜可能成为一个“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以从这些桥头堡支持陆上部队来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部队,从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见〔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页。

仅剩下了一个彼得堡^①，其海洋的机动性随之丧失。

（三）美国对亚欧大陆的遏制战略

从20世纪初开始，轮船和军舰成为新时代的机动力量，给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带来了新的活力，海洋大国的地缘政治理论得到新的发展。霍格思(D·G·Hogarth)^②认为，世界的未来取决于维持新月地区和膨胀的枢纽地区内部力量之间的力量平衡，斯皮克曼亦秉承了这一理论。美国海军将领马汉亦认为，海洋才是获得真正霸权的决定因素，并且主张美国“向太平洋扩张，夺取萨摩亚、夏威夷，控制巴拿马地峡”^③，以便积极地扩大美国在地缘上的纵深能力。这些理论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对外的地缘政治战略，亚欧大陆的地缘政治力量开始受到来自海洋机动性的遏制。

1901年，美国迫使英国缔结了《海—庞斯福特条约》，获得了开凿、经营和管理巴拿马运河的特权。1903年11月18日，美国与巴拿马签订了《美巴条约》，取得永久使用巴拿马运河区（约14.74万公顷）的权利。除了这一权利之外，美国还得到修建铁路和设防驻军的权利。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和使用权的获得，标志着美国的海洋霸权时代的到来。

二战后，苏联地缘政治力量延伸到了新月区的柏林和北京，美国

① 事实上，俄罗斯当初之所以能够从蒙古帝国的统治下挣脱出来，原因就在于俄罗斯获得了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上的机动性。20世纪初英国海军大臣和主管印度事务国务大臣的(L·S·Amery)说：“拥有广大草原地区的俄罗斯帝国，已经不在古老的草原的人民的口中，而是成为真正的农业世界的一部分，经济上它已经征服了草原，并且正在把它变成一个伟大的农业工业强国。”（见〔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页。）他认为，麦金德描写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大部分已经过时了，现在是铁路的机动性和海上的机动性的问题。他还预言，航空将作为动力来补充以上两种动力，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工业和发明。对于这种观点，本书同意有其最终的正确性，但是现实的发展告诉我们，对于海权和陆权的机动性的争夺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② 20世纪初霍格思曾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著有《The Nearer East》。

③ 美国的海军战略自西奥多·罗斯福起就遵循了马汉的理论。引文见〔美〕艾·塞·马汉：《海军战略》，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前言。

集团则沿着“内新月形”建成了三条防御线^①，牢固地将海洋霸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且成功地阻止了苏联集团向西到大西洋、向南到印度洋、向东到太平洋的扩张，使之没有能够走出具有成功意义的一步。但是，美国试图夺取欧亚大陆上陆权优势的努力——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遭到了失败。“美国在欧洲的主要地缘战略目标可极其简单地归结为：通过更加真实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来巩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桥头堡，以便使扩大中的欧洲成为向欧亚大陆传送国际民主与合作秩序的更有活力的跳板。”^②

美国在巩固自己海上霸权同时，步步为营地把自己的霸权从海洋推向亚欧大陆。

（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1949 年以后的中国

1945 年以后，东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从 1895 年甲午战争以来所经营的东亚国际体系不复存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的被动局面，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开始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

1. 中国在政治方面调整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调整与世界的关系的时间段可以分为冷战前期、冷战后期两个阶段。

冷战从 1944 年就已经开始出现萌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和苏联集团在全球范围内营造两大集团，形成了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全方位对立。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立即被苏联以及它的东欧卫星国和印度等一些亚洲国家承认。1950 年英国承认了中国的新政府，中国的新政府成功地

① 麦金德把在枢纽以外的国家分为内新月形地区和外新月形地区，分别包括中国、德国、印度以及美国、英国、日本等。枢纽地区全部是大陆的；外新月形地区全是海洋的；内新月形地区部分是海洋的，部分是大陆的；只有枢纽地区和内新月形地结合起来才会形成世界帝国。不难看出，二战以后美苏争霸事实上一直在争夺内新月形地区主导权。美国遏制苏联集团的三条防御线与内新月形地区完全吻合，其三条防御线包括北约组织、日美安保协定以及和沙特等中东国家的联盟。

② 〔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 114 页。

登上了世界舞台。但摆在新政府面前急需处理的是由于被侵略和内战而濒于崩溃的中国经济。

中国建国之初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治和外交政策,以谋求国际上经济和政治的援助力量。1950年2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和互助的条约以及许多经济协定。这些主要是美国对于苏联和新月地带加紧遏制所导致的。^①

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和苏联出现了分歧,60年代冷战中的冲突也表现出多元化^②:美欧冲突、美苏冲突、南北矛盾加剧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开始扩大。7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奉行多边发展的外交战略。中国奉行多边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有:脱离苏联寻求独立发展道路;与美国建交。这一期间,中国与法国、日本等主要大国也建立了外交关系,形成多边发展的战略格局。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开始积极发展多边自主外交,为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2. 中国在经济方面调整与世界体系的关系

中国的经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仍然停留在传统经济的水平上。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排名表上接近最底层,每人约58元人民币或15美元(1933年价格)2/3的产品来自农业,工业产品不足1/5,90%以上的劳动力依靠传统技术。^③

新中国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开始着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第一个五年计划使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绩,国民人均收入平均年增长8.9%(按不变价格计算)。随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新中国建立了以高度集中统一管理为基本特征

① 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43—46页;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43页。

② Denis Rumley, Tatsuya Chiba, Akihiko Takagi and Yoriko Fukushima, eds., *Global Geo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Asia-Pacific: A Regional Perspective*, Avebury, 1996, p. 3.

③ [美] 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151页。

的计划经济体制。^① 这一体制的弊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凸现出来，但是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逐步改革。

1978 年中国农村改革开始，1984 年中国城市改革开始，1992 年中国确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目标，开始逐步建设各种市场机制，脱离原来的计划体制。

同时，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种潮流：一种是以资本自由化为特征的全球化，一种是以贸易自由化为特征的区域化。中国的发展战略在于试图兼获两种潮流的综合利益，一方面，中国在全球事务中表现得较为温和，以谋求与美国的合作，获得来自全球的资本；另一方面，中国积极谋求区域经济一体化，试图谋求地区性贸易的比较优势，这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10+1”方案中得到了体现。^②

这样，中国开始谋求在政治和经济上重返世界体系，重新融入世界经济和政治机制。

二、民族国家的产生：亚欧大陆腹地内部的政治调整

（一）蒙古治为清帝国的藩属

1683 年清朝统一了中国，蒙古开始成为中国的藩属。为了防止蒙古各部重新联合，清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改组蒙古各部的政治和军事体制。如原来喀尔喀地区三个部改为四个部，第四部是由 1725 年从土谢图汗部分出的 19 个旗组成的，新汗的衔位封给亲清朝政府的蒙古王公，喀尔喀四部在 1655 年时有 8 旗，到 1725 年已增加到 74 旗。^③ 这样，蒙古各部的游牧面积不断缩小，最后，许多旗的面积还不到两个苏木^④大。清朝在蒙古各部派有专员，驻乌里雅苏台，称乌里雅苏台将军。清朝还把所有具有战斗力的蒙古人民编为

① 董辅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5 页。

② 刘爽、任洪生：《中国与东盟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原因及意义》，载《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 年第 4 期。

③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69 页。

④ 苏木相当于汉族地区的乡，蒙古地区的苏木要比乡的面积大一些，现在内蒙古地区的苏木方圆十几公里左右。

旗军,指挥权归旗札萨克,其本身既是军事组织,也是政治组织,所在地就是王公的封地。喀尔喀四部负责北方的防务,这时的清军已经开始配备了枪炮,但是蒙古军队仍然是长矛和弓箭。

清朝与蒙古各部维持一种藩属关系,每年蒙古各部的王、贝勒、贝子、公和札萨克都要向皇帝入贡,清朝宣布自己是蒙古各部的皇帝,蒙古各部的土地和财产归清帝所有。

清代的蒙古各部和过去一样,从事着畜牧业和各种简单的家庭手工业,生产肉类和乳类产品,自行制造蒙古包专用的毛毡、毛绳和皮绳,加工制造皮革和毛皮,用以缝制皮袄和靴子,用木材制造蒙古包的木骨架、柜箱、双轮马车、筷子、马鞍、弓箭、家具和其他家务必需的用具。蒙古各部的经济处于自然经济的阶段,由于蒙古各部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各种技术无法取得进步。牧民没有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只是作为私人的牧奴依附于各部王公,而且不能擅自脱离本部所在的封地之外,只能在同一个旗内从一个牧场移转到另一牧场。

由此,蒙古人民就被牢牢地束缚在小范围内的土地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1年蒙古正式独立。

(二) 依附与半依附——1911—1992年的蒙古

在蒙古独立前夕,俄、日、英、美诸国纷纷力图控制蒙古,受地缘因素的影响,俄罗斯最终成功地控制了蒙古地区。随着俄罗斯向东方的扩张,其与蒙古的经济来往日益密切。在1891—1908年期间,从俄国输入蒙古的商品增长了22%,从蒙古输入俄国的原料在这一时期增长了666%,蒙古成了俄国工业的重要原料来源地。到1909年,蒙古供给了俄国占其总进口12%的制革原料、13%的毛和毛皮、25.5%的马鬃、10.6%的牛、10.8%的马和24.9%的羊。^①

1911年12月1日,蒙古发表《告蒙古人民书》,宣布蒙古独立。1912年11月3日,在库伦签订了《俄蒙协定》,协定中写道:“由于蒙古人民保存其独特的制度的愿望,中国军队和行政当局已被逐出蒙古国境,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被尊为蒙古人民的君主。以此,蒙古对

^①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13页。

中国的过去关系已经终止……”^①但是协定中对蒙古为独立国家和关于蒙中关系的问题作了回避。协定对于外蒙古政府在保护自治权、建立武装力量、不准中国军队开入等方面,规定由俄国人给予帮助,并在附件中规定了俄国人的特权,但是,沙皇俄国拒绝承认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特别是不同意巴尔虎和内蒙古与外蒙古合并,这引起了外蒙古上层社会的不满。蒙古上层分别与俄罗斯和日本联系,最终结果仍然是俄罗斯取得了上风。不过,在中国的压力下,1913年11月5日俄罗斯与中国签订中俄声明,外蒙古有自治权,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是外蒙古的宗主国。^②

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外蒙古军队开进了巴尔虎和内蒙古地区。在俄罗斯的压力下,中国、自治蒙古和俄罗斯在1915年5月签订了新的条约,承认外蒙古的国际地位,三方同意:外蒙古仍属中国,它成为自治蒙古,中国不派军队进驻蒙古,不在蒙古土地上殖民,并不干涉蒙古的内政。这个协定对1913年10月23日中俄声明的各项原则全部予以追认。

这一时期,蒙古各部仍然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但是,寺院占据了绝大部分财产,领主次之,整个下层牧民拥有很少的财产。例如,在车臣汗部达尔罕亲王境内,许多牧民因为代偿王公的私人债务而破产,居民早已不再增加,到处是死亡;在同部内的卓立克图—贝子旗内,411个帐幕的主人有143个乞讨度日,这个旗的寺院和札萨克拥有比全部牧民一倍半多的马、骆驼和牛;在伊拉古克山—呼图克图辖区内,528户有163户是贫户或者赤贫户;在额尔德尼达赖亲王旗内,全部居民9265人中,乞讨度日的有5740人;在当时是盟长和刑部副大臣的卓克巴达尔琥亲王的旗内,所有牧民共有6200头牛和5000只羊,而该旗境内的两个寺庙就有10300头牛和12612只羊;在三音诺颜汗部内,额尔德尼—班第塔—呼图克图领地内,其属民878户有3124匹马,寺院和呼图克图有2094匹马,前者有骆驼4619匹,后者有4011匹,前者有绵羊、山羊24335只,后者有12680只;

①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20页。

② 同上书,第222页。

在达什多尔济旗内有 579 户牧民,这个旗共有 574 匹马,其中有 200 匹马是王公的,共有 1000 只绵羊,有 300 只是王公的,自治蒙古几乎所有的旗都是这种状况。^①

1912 年 11 月 3 日的《俄蒙协定》和 1915 年 5 月 25 日的《俄中蒙恰克图协定》以后,中国商人大部分被逐出蒙古市场,但是俄国的商品却不能迅速进入蒙古市场。1912—1916 年,俄国运往蒙古的商品没有超过市场需求的 30% 到 35%,而没有中国商品输入的蒙古市场,很快引起了物价上涨,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后,沙俄帝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俄国商品完全退出了蒙古市场。

在俄罗斯势力暂时削弱之际,日本乘虚而入,这时中国人徐树铮将军也率部进入了外蒙古地区,但是,随着 1920 年中国亲日派的倒台,徐树铮的部队撤出了外蒙古地区。

十月革命以后,外蒙古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支持下于 1945 年独立。

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蒙古跟随苏联实行了计划经济,组建了公社,也进行了公有化改革,建立了国营农牧场、马拉刈草站和牧民生产合作社。在苏联的援助下,蒙古也建立了一些基础的工业,但主要是汽车、拖拉机以及一些机械的修理和零部件的生产,并没有形成相应的生产能力。同时还建立了一些以食品加工为主的轻工业,主要是生产一些初级产品。

从 1945 年到 1992 年,蒙古的生产主要是依附于苏联的生产,主要为苏联的工业生产提供原材料。

小 结

1800 年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生产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世界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关系——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诞生,标志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诞生。在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下,食品和服装不再是唯一的必需品和奢侈品,许多工业

^①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 228—229 页。

品生产出来。区域性的技术体系的综合,使得整个技术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世界的动力也发生了变化,轮船、铁路等技术变革使得长距离、大规模贸易成为现实,从而世界的贸易格局发生了突变,工业制成品开始在大西洋两岸往来贸易,海洋成为国际贸易最为主要的交流通道。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经济的马匹和牛不再是战争、生产和交通的工具,成为单一的生活用品。

工业技术变革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军事技术的变化,随着火药和铸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阵地战重新成为这一时代的特色,游牧民族的马匹和弓箭失去了昔日效用,亚欧大陆腹地作为一个游牧经济的特殊区域从而获得世界霸权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总结这一时期的特点有以下几点:

首先,亚欧大陆腹地与周边地区的经济相互依存度高了,尤其是茶马贸易,标志着亚欧大陆腹地与中国贸易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绢马贸易的前提是以获利为目的,茶马贸易是以生活为目的。这种贸易性质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亚欧大陆腹地经济对于核心区经济的依赖,并且是以边缘区的形式出现的,这是一种地缘经济的结果。苜蓿在中国的引种成功,战马在中国的饲养成为可能,马匹不再是中国对亚欧大陆腹地贸易的主要内容,但是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粮食和茶叶成为边境贸易的主要内容,游牧民族对农业区域的依赖性大为上升。同时,火药技术的发明,将马匹的机动性化解,马匹从生产工具、国防物资变成了单纯的生活资料,其经济本身的含义大为下降,游牧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为下降,从而整个区域走向边缘。由于核心区产品早已完成分工,而作为边缘区的游牧民族的产品还没有完成分工,游牧民族的食品、服装、生活以及军事产品仍然依赖于动物,这与开始依赖物理力量和化学力量的核心区和半边缘区相比较,形势开始逆转。

其次,海洋霸权同时在亚欧大陆的东端和西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和东亚日本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从地缘格局上摆脱了长期以来对于大陆霸权的依赖,这使得大陆国家的地位持续下降。

最后,新中国成立后,对外采取“一边倒”的政治策略^①,蒙古则成为两个大陆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冷战结束以后,蒙古日趋成为大陆力量和海洋力量之间的缓冲地带。从世界体系发展的角度而言,如果中国和俄罗斯试图重新合作进行反体系运动,那么,蒙古将是大陆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如果中国继续脱离反体系运动,蒙古将成为大陆力量与海洋力量之间的缓冲地带,如果俄罗斯加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区,则蒙古将成为两大海洋力量之间的缓冲地带。

^① 沃勒斯坦认为,苏联集团的一系列行动是针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反体系运动。那么,中国在1949年以后对苏联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就是摆脱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区的现实,而加入了反体系运动。在反体系运动集团的内部,存在着中国和苏联两个大陆力量,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参与以海洋力量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体系。

第六章

理论与现实的反思

现代世界的标志是它的受益者的想象力和被压迫者反对他们的断然态度。剥削与拒绝接受剥削或者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构成了现代持续的对立,二者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在 20 世纪还远远没有达到最高潮。

.....

如果说,存在着一个与现代世界相联系并事实上成为其中心的思想,这就是进步的思想。这并不是说,人人都相信进步。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通过前面对亚洲大陆腹地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分析,我们解析了世界体系与亚欧大陆腹地发展之间的历史逻辑,并且对亚欧大陆腹地,尤其是蒙古的兴衰作了世界体系下的静态和动态的地缘关系分析,从而阐明了亚欧大陆腹地尤其是蒙古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走向。本书在即将结束之时,我对本书一直在论证的问题进行总结。

一、霸权之间的霸权与世界体系的关系

首先的问题是,如果 1500 年以前的世界体系是存在的,那么其内在动力是什么?

费正清、滨下武志、弗兰克等认为,在 1800 年以前,亚洲都维持

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王正毅进一步明确认为,“东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存在与16世纪以前的历史延续也许有许多种,但是其中最为根本的动力是历史上形成的朝贡体系”^①。因而,可以看出,滨下武志、王正毅等人对于16世纪以前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世界是承认的,同时也承认中国处于核心区的地位,并且存在着中心——外围结构,他们认为维持中国作为核心区的动力在于贸易结构。

但是,本书认为关于中国作为16世纪以前世界核心区的动力来源仍然可以继续探讨。

(一) 对霸权问题的理解

对于霸权问题的理解问题,首先是一个如何理解世界经济史的问题,确切地说是一个以什么标准去理解国际经济体系的发展阶段的问题,这是一个经济周期问题。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理解,就产生了对霸权的不同认识。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界一般认为,霸权问题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开始出现的,例如荷兰霸权、英国霸权、美国霸权等。^②有的学者对之有更为严格的界定,譬如19世纪拥有优势地位的英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导世界的美国,是这两个时代中“拥有绝对优势的经济地位和军事资源强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对世界的看法,执行一项国际秩序计划”^③,因而是那个时代的霸权国,霸权稳定论尤其支持这种观点。

严格地讲,尤其是从经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霸权问题实际上更应该是一个生产方式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国际贸易结构问题。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这种生产方式本身拥有着特定的机动性,而这种机动性和特定的国际贸易结构相结合,就构成了特定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具有主导地位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当然就是那个时代的霸权国家。因而书名中所提的“霸权之间”,实际上

①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22页。

② 这种观点在学术界较为流行,例如在斯塔夫里阿诺斯、苏珊·斯特兰奇等的作品中。

③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36页。

指的是亚洲和欧洲霸权之间的历史事实,或者说,是农业生产方式霸权和工业生产方式霸权之间的游牧生产方式的霸权。

蒙古霸权兴起之前,亚洲和欧洲的农业生产方式拥有世界霸权。当然,其对世界的意义,恰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说的那样,“同罗马治下的和平一样,英国治下的和平与美国治下的和平确保了一种相对和平和安全的国际体系;大英帝国和美国创造和确保了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①。那么,农业时代的东亚帝国和欧洲帝国是确保了相对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体系,但是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可以肯定的是,10—13世纪蒙古帝国的出现,第一次把东西方世界联系起来,因而,本书之所以定名为“霸权之间”既有指亚欧大陆腹地的霸权是位于东亚和欧洲之间之意,也有游牧生产方式是农业生产方式霸权和工业生产方式霸权之间过渡的霸权之意。把霸权和生产方式,抑或是和地缘经济联系起来,我们有理由把畜牧的生产方式作为农业和工业之间的一种过渡。或者认为,工业在农业的基础上产生,但是,恰恰相反,畜牧业导致了大工业,导致了一种新型的国际政治格局。

那么,蒙古霸权与世界体系之间,尤其是与1800年以前的世界体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

(二) 地缘生产结构的不同,构成了世界体系内地缘关系互动的内在动力。

食品、服装构成了1800年以前的世界生产的核心内容。

1800年以前,丝绸制品作为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内容,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主要依靠马匹获得。但是,绢马贸易关系是基于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这种压力导致了农业区域对马的需求上升。核心区中国并不能从这种国际贸易结构中获益。

农业经济解决了食品的储存问题,对于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有很大的提高,这是游牧经济无法比拟的,也是游牧民族在1800年以前南侵的原因之一。1800年以前,游牧经济作为一种地缘经济结

^①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44.

果,维持了霸权,但在经济上处于边缘区的地位,亚欧大陆腹地向核心区中国的融入是以南侵和改变生产方式的形式来完成的。

1800年以后,美洲大陆的发现,使中国获得了白银,西欧获得了发展。欧洲解决了粮食问题以后,突破了农业增长模式,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增长,世界体系的核心区开始转移,亚欧大陆腹地更加远离核心区,但是由于农业技术的突破,农业区域突破传统的界限,进入了亚欧大陆腹地,尤其是蒙古地区。这一转变虽然突破了几千年的传统农业区域的界限,但是此时传统的农业区域已经边缘化,而来自于新核心区的力量开始侵入这一边缘区,融入的方向在地缘上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因而,可以认为世界体系的发展是一种地缘经济的结果。

(三) 关于亚欧大陆腹地发展的动力问题

1. 亚欧大陆腹地地缘优势的获得是一种地缘经济后果

亚欧大陆腹地这块以温带草原为地貌特征的地理区域非常适合游牧民族,游牧经济在1800年以前使得生活条件、生产条件和作战条件达到了高度一致性,生活在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获得地缘比较优势,他们可以自由地迁徙,可以在任何地方从事生产,可以在任何条件下投入战斗,他们的生活的迁徙特性还为他们从事并且控制东西方的贸易提供了积极便利的条件。

2. 亚欧大陆腹地地缘优势的丧失是一种地缘经济后果

工业革命以后,机器作为新的动力取代了畜力,机器化大生产出现了,世界的生产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品取代农业品成为人们消费的主要内容,马匹饲养由战略物资变成了纯粹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时,由于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产品分工还没有实现,马匹对于他们而言,则成了单纯的生活资料。在工业经济支撑的现代军事面前,骑兵在攻击力和装备上都丧失了优势,游牧经济彻底丧失了军事上的霸权。

二、世界体系核心区终极动力:资本聚集还是技术聚集?

亚欧大陆腹地的兴衰引起我们进行思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出发,东亚、欧洲获得的世界霸权以及后来主要

是亚欧大陆腹地获得的军事霸权的主要原因在于地缘经济,而改变东亚和欧洲各自历史进程的是地缘经济在不同时代与技术相结合而产生出来的机动性是否能够维持这一霸权,亚欧大陆腹地是1800年前将地缘经济和社会技术条件结合得最完美而获得最大机动性的区域。

为什么1800年以前的世界体系核心区在亚洲?按照资本积累的速度,在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中积累财富的主要途径是奢侈品的生产和贸易,而在1800年以后,世界经济中积累财富的主要途径是工业品的生产和贸易。1800年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奢侈品的生产国,主要的奢侈品是丝绸、瓷器和茶叶,这完全是地缘经济的结果。1800年以后,西方世界不但找到了换取奢侈品的黄金和白银,而且对于中国奢侈品的替代品——印度红茶、南美咖啡和棉纺织以及毛纺织品。

就工业品的生产方式而言,它与奢侈品也非常不同。工业品通常是多要素生产的结果,而奢侈品常常取决于某一种要素供给的多寡。

因而从这种角度而言,给予1800年以前,尤其是16世纪以前以中国为核心区的世界经济以动力的是地缘经济。所以,我们对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有了新的理解。

就世界体系论理论本身而言,沃勒斯坦认为核心区的典型特点就是资本密集、高工资、产品技术含量高、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程度较低,其中最为核心的特点就是资本密集和产品技术含量高,虽然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都是一对连体婴儿,但往往不是资本密集导致技术聚集而是技术密集导致资本密集,资本密集不是“胜者通吃”的载体。另一方面,从地缘经济角度看,中国的传统优势在于技术而不是资本,是地缘经济产生了“地缘技术优势”导致的资本聚集,因为从“地缘技术条件”上讲,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是极富地缘经济特色的产品,其生产对于地缘经济的依赖程度相当高,几乎是不可替代的,因而其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也非常小,这和拥有广大殖民地生产羊毛和棉花,又用机器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大工业而言,是非常不同的。因而,中国传统的贸易结

构中往往是奢侈品居多,奢侈品居多的贸易结构往往是对中间商最有利的,谁控制贸易路线谁就会获利,这也是亚欧大陆腹地争夺陆上丝路的动力所在。工业品的贸易中间商获利相对小得多,利润获得最多的是产品的母国,因而1800年以后的国际贸易路线的安全就需要母国自己去维护了。

三、对世界体系的核心概念重新认识

1. 关于“中心—外围”概念

现代世界体系认为,世界体系的泛化是一个拟同心圆的空间概念,但是历史上的世界体系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呈现出了条状分布,中心区和半边缘区的横向贸易关系就成为整个世界体系的核心内容。同时,这种空间分布形式直接的地缘后果就是,边缘区要比半边缘区更容易核心化。

1800年以前的世界体系,基于产业内容的不同,导致了贸易方向呈东西向流动,南北方向的贸易主要是基于商业利益,并非是出自对于产品的需求。亚欧大陆腹地作为边缘区,地缘上与核心区相连,限于食品结构的内容,其融入以军事征服核心区为特征,以被融入核心区结束。

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出发,世界体系的周期,应该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周期,因而,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构成世界体系时间的主要内容。世界体系的经济周期可以同时存在,只不过发生在不同的地缘区域,直到一个周期被另一个周期完全融入。地缘经济有一种自我扩张的冲动,这无论是在游牧经济时代,还是在农业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时代。“自然资源在空间分布的不均匀,导致了人们在获取财富过程时间不一致和方式差异,就是所有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①

2. 关于融入与边缘化问题

正是来自亚欧大陆腹地的长期压力,致使核心区的经济重心不

^① 周轶:《帝国之反击(3)》,2001年6月2日,http://www.epicbook.com/history/counerattackhun3.html。

断南移,这种南移的结果就是为边缘区的核心化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亚欧大陆腹地霸权的衰落和中国的海禁,致使核心区与欧洲的贸易发生了不对称交流,核心区开始边缘化。

世界体系融入和边缘化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亚欧大陆腹地诸游牧民族不断向南融入,不断地重现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是古代的世界体系和现代的世界体系不同之处。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地缘经济的结果。

3. 关于世界体系的逆转问题

正是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所提供的空间,促成了蒙古帝国的成长,亚欧大陆腹地能够获得世界霸权基本是一种地缘经济导致的地缘政治结果,而不是世界体系论中所说的核心区拥有经济霸权导致的政治霸权。

四、地缘政治导致地缘经济结果:蒙古将从边缘区走向核心区?

(一) 现阶段蒙古的经济状况

现在蒙古国每年GDP为10亿美元左右,工业体系尚未建立,主要产业是采矿和牧业,煤、铁、金、有色金属等储量很丰富。额尔登特的铜钼矿,年产铜精矿粉约51万吨左右,产品的95%出口中国,全部的出口收入约占蒙古财政收入的40%。2002年6月底的牲畜存栏数为3000万头(只),每年出口约300万张皮革、1500多吨羊绒和少量的牛、马和羊肉。

1989年,中蒙双方成立了政府间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1990年3月在乌兰巴托举行首次会议,根据会议商定的原则,双方公司就一些合作项目达成了协议。1992年,中蒙又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双方签署了利用中国贷款在蒙古建马铃薯淀粉、粉条加工厂,半宝石加工厂和中国政府向蒙古赠送一批一般物资的换文。^①中蒙双方合作尚属初级阶段,例如中国从1991年度到1994年度,共向蒙古提供了1.3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以帮助蒙古的经济建设,计划

^① 田增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31页。

利用中国的投资,兴建60多个合资企业,但是就像蒙古外长所言的那样,“中国1991年给我贷款5000万元人民币,但到1994年我国只利用了其中200—300万元。1992年又给我们贷款3000万元人民币,当时我国政府只利用了1000万元购买日用品,连续几年没有使用好贷款,对双方都造成了损失”^①。1994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蒙古,双方签署了新的《中蒙友好合作条约》,条约中特别强调:“两国应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环保、交通、邮电等领域长期稳定地发展平等互利合作。”1996年以后,中蒙经济贸易合作发展较为迅速。

但是,目前,中国与蒙古经济合作大多限于短期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如果不算在我国商业和服务业的少数合作企业外,来自中国的投资和设备是有限的”^②。蒙古现在的绝大部分工厂企业都是苏联时期援建的项目,许多企业技术设备老化急需更新,同时一些长期项目仍然需要俄罗斯的技术和设备,所以现在蒙古对俄罗斯还有技术上的依赖惯性。因此,蒙古领导人曾多次表示,进一步发展同独联体各国的合作关系仍然是蒙古对外政策的一个首要方面,蒙古在经济上依附俄罗斯等国家的局面,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从而会对开展中蒙经贸合作带来一定消极影响。^③

蒙古的交通和通讯状况都很落后,这严重地制约着蒙古经济的发展,也制约着其对外的经济合作,因此,蒙古积极图谋求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希望“通过共同积极参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在发展亚洲公路网的框架内,用中国的技术和工艺,在蒙古建设公路,将乌兰巴托和北京连通……蒙中之间已经签订和实施有关发展铁路和汽车运输。蒙古利用中国的出海口和建立联合海运公司等重要的合同

① 张利军:《对中蒙经贸关系的回顾与思考》,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② 1994年4月7日蒙古外长贡保苏仍答新华社记者问。

③ 张利军:《对中蒙经贸关系的回顾与思考》,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与协议。我们期待在这方面继续扩大两国合作的深度与广度”^①。对于今后中蒙合作,蒙古方面认为“在矿山,特别是在燃料、动力、运输、邮电和第二产业的许多部门是有前途的”^②。蒙古政府希望保留和发展传统的畜牧业经济的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化企业,把蒙古由畜牧业原料出口国变为畜牧业工业成品出口国。

蒙古是畜牧业为主的国家,尽管已初步实现了国民经济由单一畜牧业向多元经济结构过渡,但其整体水平仍表现出资源型特征。目前的产业调整和对外贸易的变化也表现出资源型趋势。1991年向市场经济过渡后,经济连续三年大幅下滑。1995年GDP增长率为6.3%,经济有所回升。1996年以后GDP一直徘徊在1.3%—3.4%之间,经济始终缓慢增长。最近连续几年遭受自然灾害,畜牧业损失较大。2002年6月底蒙古国议会通过了设立阿拉坦布拉格自由贸易区的议案。该自由贸易区位于蒙古色楞格省蒙俄边境地区,此地历史上曾是中俄贸易的重要口岸,有“茶市”的美称,该区占地500公顷,在2003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对在该自由贸易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者,免征所得税;对投资设立贸易企业者,除前5年免征所得税,接下来的3年减半征税以外,还按照国际惯例对该企业运入自由贸易区的货物免征关税;此外,在该自由贸易区内还可经营博彩业。目前已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有意投资。蒙古国有意设立南、北两个自由贸易区,另一个位于与中国二连市交界的扎门乌德口岸,但该项目目前尚未启动。

(二) 新地缘形势下蒙古的地缘战略走向

1. 亚欧大陆腹地外围地区的区域化

冷战以后,美国凭借经济全球化的动力——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直接投资(FDI)——使世界经济的彼此依赖较之以前更加深入,试图以此来推行资本主义,彻底瓦解战略上潜在的敌对力量。但是,

① [蒙]达·查希勒冈：《当前的中蒙关系及其发展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2期。

② 1994年4月7日蒙古外长贡保苏仍答新华社记者问。

这种经济全球化有三个政治前提。^①其一,必须有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充任领袖国,领袖国的责任在于稳定国际货币,制定和执行国际商务规则;其二,领袖国必须和其他主要经济大国合作,才能稳定世界经济;其三,世界其他国家必须相信这种全球化对它们有利。由于政治上存在着以本国利益为主的民族国家,其追逐的目标就不会是在世界经济之中的绝对增长,而是相对增长。为此,一旦外在压力消失,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必要性减小,区域化开始占据上风。

冷战后,经济区域化迅速得到发展,形成了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三个主要的区域化组织。欧盟源起于1951年的欧洲煤钢联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欧洲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为了加强亚太地区在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的地位,在澳大利亚的倡议下,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虽然1994年18个成员国首脑会议议定2020年以前成立“亚太自由贸易区”,但是由于美国、日本和中国在本地区所关注问题的不同,这种地区性的经济与政治协作缺乏真正的基础。再者,亚太经合组织之下尚覆盖着“东亚10+3”方案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最终将让位于“东亚10+3”方案所提出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因为“尽管东盟各国支持亚太经合组织,但它们不会信任屈从于美国或日本支配的任何区域性组织”^②。

亚欧大陆边缘区区域化的发展,形成的两大政治力量逐渐凸现——欧盟和东亚。在东亚,特别是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的迅速增长,为东亚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冷战后的美国并不愿意放弃其在东亚的利益,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强大,美国担心中国会威胁其在东亚地区的利益。^③在欧洲,2002年欧元启动以后,欧盟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实质上的挑战。俄罗斯位于两个走向区域化的中间地带,其地缘的战略发展格局将影响着整个世界地缘政治格局

① [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文版序言。

② 同上书,第286页。

③ 王正毅:《21世纪中国的地缘发展战略》,载《南开学报》1999年第5期。

的重新组合。在亚欧大陆的南部,一直有伊朗和伊拉克向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提出挑战。

可以看出,亚欧大陆新的地缘格局是,欧洲和东亚开始走向区域化,俄罗斯地位相对下降,并且在中亚地区造成了权力真空,结果导致某个中东国家的相对强大。枢纽地区和新月地区组合的可能性再次出现,这将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提出挑战。

2. 哈萨克和蒙古——北约东扩的最后目标?

美国获得欧亚大陆霸权优势的条件在于,“棋盘的中间地带能逐步并入扩大中的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范围;南部地区不被某一个国家单独主宰;东部国家不联合起来将美国逐出近海的基地”^①。同时,航空技术的发展赋予了美国新的机动力量,依靠强大的空中优势,美国开始实施新的亚欧战略。

冷战结束以后的第一场战争是1990年的海湾战争。这次战争中美国取得了地缘经济上的后果,在地缘政治上没有取得相应的突破,伊拉克的政权仍然掌握在萨达姆的手中。于是,在宣称的战争目标完成以后,美军并没有退出海湾,继续寻找新的进军理由。

“美国还有一种设想,就是把‘北约’延伸到中东”^②,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美国随即也就加快了这一步伐。1996年的“科索沃战争并非孤立、偶然的事件,而是美国的精心战略安排”^③,科索沃战争是美国实施亚欧大陆战略、彻底控制欧洲的突破口。北约首批东扩和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国相对完成了对“棋盘”西部的控制。之后,便把眼光瞄准了“棋盘”的南部——中亚。

中亚地区对于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以及中国具

① 棋盘的中间地带指的是麦金德所说的枢纽地区,即亚欧大陆腹地。见〔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② 陈江:《海湾危机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1991年第1期。

③ 夏义善:《科索沃战争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1999年第4期。夏文认为美国打击南联盟的原因在于:“(1)将俄罗斯挤出巴尔干。(2)米洛舍维奇社会党政府为欧洲‘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堡垒’。(3)为北约东扩和南下地中海扫清障碍。(4)通过这场战争加深欧洲对美国的依赖,排挤俄罗斯的影响,以便在欧洲用北约取代欧安组织,建立以美国为主导、以北约为支柱的欧洲和世界安全构架。”

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亚五国和阿富汗处于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形成了一块巨大的缓冲地带,目前美国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战略优势非常明显,并且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均已成为北约的军事伙伴国(塔吉克斯坦除外),阿塞拜疆与北约建立了双边委员会,北约还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了专门代表处。包括乌克兰、摩尔瓦多、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在内的古阿姆联盟具有亲北约倾向,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乌克兰军事共同体的建立,也是为了摆脱俄罗斯对其石油管道的控制而建立起来的。“9·11”事件以后,美军迅速出兵阿富汗,完成了对阿富汗的控制,形成了一条从土耳其到阿富汗的空中走廊。

美国“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虽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必须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边缘巧妙地施展地缘战略手段”^①。也正是在这种条件制约下,使得美国才会在中东和中亚地区不遗余力地积极实施渗透性的地缘战略手段,不停地将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国家纳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体系之中。

2003年伊始,第二次海湾战争提上日程。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美英攻打伊拉克的地缘结果是基于完成对伊朗的遏制,以便隔离伊朗与俄罗斯、中国在地缘上的合作。阿富汗战争造成的一个地缘结果就是隔离了中国与伊朗之间的地缘接触。因此,控制伊拉克,彻底完成对于亚欧大陆南部的遏制是美国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亚欧大陆的地缘格局来看,枢纽地区的俄罗斯和新月区的中国仍然存在着地缘上唇齿相依的关系,虽然俄罗斯和中国联盟的可能性较小,但是,毕竟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种联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仍然会对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国——哈萨克和蒙古——实施渗透战略。

^① [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47页。另外,布氏在他的《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更加露骨地表明了这一观点。见[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哈萨克斯坦境内有三分之一的俄罗斯人，“哈东北和西北地区都居住着大量的俄罗斯移民，如果哈俄关系严重恶化，哈萨克就会面对领土被肢解的危险”^①。若美国成功地肢解了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族一方肯定会具有亲美倾向，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就剩下了唯一的一个缓冲国——蒙古。蒙古在中俄之间保持中立的最大作用就是使中俄两国之间能够保持一种缓冲的作用，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能够取得相互信任的地缘基础。一旦美国等欧洲势力进入蒙古，就会成功地隔离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的北约和美日安保及其在南中国海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会最终使中国和俄罗斯在地缘上越走越近，如何防止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地缘合作呢？办法只有一个，北约沿着土耳其—中亚—阿富汗继续东扩，直至哈萨克斯坦—蒙古一线。这样，北约凭借着空中优势，可以实施对于亚欧大陆腹地和东部边缘区之间的遏制。

蒙古在未来的亚欧大陆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之中，必将成为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争取的合作对象。从北约东扩的角度而言，蒙古在地缘政治上将面临着比以前更多的选择：依靠传统盟国俄罗斯，寻求战略盟友中国，进入北约体系正式加入西方国际政治体系。第一，依靠传统盟国俄罗斯。作为欧亚战略高地的中亚和蒙古，俄美都力求加以控制，而中亚大多数国家对北约的东扩持欢迎态度。当前，俄罗斯面临内忧外患——欧洲方面受到北约的挤压，亚洲方面与日本存在领土争端，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面临不断扩张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境内民族分裂分子不断制造事端，而其政治经济又处于转型时期，自保尚且困难，对于重新荫庇蒙古而言，将会显得力不从心。同时，蒙古对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上早已丧失了信心，渴望通过加强外部交往获取地缘力量。因而，从蒙古的角度出发，蒙古对于北约东扩到中亚地区应该是持欢迎态度的。第二，寻求战略盟友中国。随着中国对国际事务参与度的加深，影响力已超出地区范围，其大国地位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同时，中国已经形成了极大的市场，

① [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170页。

蒙古对中国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另外,出于平衡俄罗斯的立场,蒙古在地缘战略发展上,将不得不把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友好国家之一。但是,蒙古面对中国在全球及亚太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大幅上升,心态复杂。第三,加入西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便加大了对蒙古的援助,美国和日本的援助占到所有援助的一半以上。一旦蒙古成为西方阵营中的一员,其弱小的经济规模将会得到大量的“输血”,这显然是蒙古非常渴望的。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一旦蒙古成为北约最东端的“箭头”,其在地缘政治的性质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大国间的小缓冲国的角色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西方阵营的“桥头堡”角色,其国内的军事力量将会得到全新的装备,其地缘政治上的被动角色将永远不再。从这个意义上讲,蒙古的选择将与将来北约东扩呈现出非常积极的呼应关系。可以看出,如果美国一强挟北约持续东扩,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会发生巨变,蒙古将成为亚欧大陆地缘政治关系的支轴,它将决定着中美俄三个国家在这一地区政治博弈的结果。同时,蒙古将会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改变她在几个世纪里一直充当的边缘区角色,第一次成为世界体系核心区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我们在第一章提出的问题——世界体系论者一直担心:如果16世纪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已经存在,那么,世界体系论关于中国是一个世界帝国的假设就需要修改,如果东亚的兴起是地缘政治的后果,世界体系论关于东亚是西欧世界体系一部分的假设也需要修改。那么,由于地缘经济的原因,蒙古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数千年来始终处于边缘区的角色,但却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可以成为一个核心区国家,东亚其他地区的兴起是否真的是由其自身经济建设的成就所致吗?它们难道就不具有地缘政治原因所致的成分吗?当然,王正毅在其著作《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一书中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东南亚的兴起恰恰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① 整个东亚最终的兴起究竟是否完全是

^① 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地缘政治的原因 ,最终的答案还没有人给出 ,但是世界体系论者所担心的事情已经开始出现了.....

亚欧大陆腹地从其本身的地缘经济意义而言 ,从来不是也将不会是世界体系核心区的一部分 ,一旦地缘政治的因素被充分调动起来 ,亚欧大陆腹地——蒙古——必将开始向着世界体系的核心区迈进。

主要参考文献

一、中文参考文献(以汉语拼音字母排序)

(一) 参考书目

1.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 [埃及]阿瓦米雷校注：《依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 [美]埃德加·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第2版)，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4. [美]埃德加·胡佛、弗兰克·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
5. [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6. [苏]巴尔托里德：《中亚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8. [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 曹冠一：《中国农业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1.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
12. 崔德明：《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3.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 1978 年版。
14. (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点校本。
15. 陈序经：《匈奴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16. (唐)长孙无忌：《唐律疏义》，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17. [日]大河内一男：《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18.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19. (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20.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 2 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21. 冯元魁：《清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22.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
23.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3 卷，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24. [苏]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25.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26.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27. [苏]戈尔曼：《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十三世纪——二十世纪中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28. [法]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29. [蒙古]贡嘎尔：《喀尔喀简史》(蒙文版)下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30. [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31.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32. [比利时]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33. (西汉)恒宽：《盐铁论》，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
34. [美]H. J. 德伯里：《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35.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36. [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 2 册，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37. (汉)贾谊:《贾谊新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38. [英]科林·麦克伊韦迪、理查德·琼斯:《世界人口历史图集》,东方出版社 1992 年版。
39. [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40.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 1 卷第 2 分册,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41.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
42. (宋)乐史:《宋本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43. 李迪:《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第 1 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44. 李迪:《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第 5 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45.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 1956 年版。
46. (明)李承勋:《议处哈密事宜疏》,《皇明经济文录》卷 40。
47. [英]李约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年版。
48.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书店 1984 年版。
49. 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50. 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 1919—1979》,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51. 林幹编:《匈奴史料汇编》,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52. 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53. 刘洪涛:《中国古代士兵生活与征战》,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995 年版。
54. (金)刘祁:《归潜志》,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3 年版。
55.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56. [日]陆军参谋本部:《蒙古地志》,国书刊行会 昭和 51 年版。
57. 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
58. 卢明辉,刘衍坤:《旅蒙商:17 世纪至 20 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5 年版。
59. 罗旺扎布:《蒙古族古代战争史》,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
60. [意]洛·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 2 卷,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
61.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 年版。
62. (元)马端邻:《文献通考》,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63. (宋)孟拱:《蒙鞑备录》,商务印书馆民国 19 年(1930 年)版。
64. [哈萨克斯坦]努·纳扎尔巴耶夫:《站在 21 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时事出版社 1997 年版。
65.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绥远、察哈尔部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66. 《中国内蒙古土种志》,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4 年版。
67. (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68. 彭泽益:《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年版。
69.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70.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71. [英]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72.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73. 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始人》,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74. [日]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75. (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76.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
7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
78. 《苏联经济区划问题》,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79. 《蒙古人们共和国通史》,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80. [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
81. (明)宋濂:《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82. 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83.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84. (明)申时行:《明会典》,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85. 施菊英:《世界近代前期经济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 年版。
86. 史仲文、胡小林:《新编世界经济史》上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 年版。
87.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88.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89. 陶克涛:《毡乡春秋·匈奴篇》,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90.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91. [美]T. N. 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92. [日]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版。
93. (宋)王薄:《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
94. 王恩涌等:《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95. 《魏略·西戎传》,敦煌资料。

96.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97.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98. 王正毅:《现代政治地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99. 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100. 王正毅:《现代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101. 王治来:《中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102.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 1985 年版。
103.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版。
104.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 3 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105. 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106. [美]西奥多·舒尔茨:《边际报酬递增的源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107.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108. 夏秀瑞、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109. 邢莉:《草原牧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110. (宋)徐梦梓:《三朝北盟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111. (唐)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112. 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113. 邹逸麟:《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辽金史论集》第 2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
114. 杨·巴雅尔:《蒙古族马文化研究》(蒙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115. 杨栋生:《区域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116. 姚玉光:《内蒙古农业资源及利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117.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118. (晋)袁宏《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119.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120. [苏联]伊凡诺夫:《伊朗史纲》,三联书店 1973 年版。
121.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122.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123. 余也非：《中国古代经济史》，重庆出版社 1998 年版。
124. [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125.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126. 札奇斯钦：《蒙古文化与社会》，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127. (清)张穆：《蒙古游牧记》，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128.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129.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1、3 册，中华书局 1977、1978 年版。
130. 张守军：《中国古代的赋税与劳役》，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131. 张金锁、康凯：《区域经济学》，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132. 赵芳志：《草原文化：游牧民族的广阔舞台》，上海远东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
133.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
134. 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年版。
135. (金)赵秉文：《滏水集》，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6. 赵常庆：《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 年版。
137. 赵翰生：《中国古代的纺织与印染》，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138.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139.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140. 《中国农民负担史》第 1 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版。
141. 《明实录》，中国书店 1983 年版。

(二) 参考文章

1. [德]巴尔克曼：《评蒙古帝国衰亡对蒙古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边疆史研究》2000 年第 6 期。
2. 白音查干：《长城与匈奴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6 期。
3. 包玉山：《蒙古族古代游牧生产力及其组织运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4. 蔡凤林：《析议元代蒙古族吸收中原文化的有限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 年第 4 期。
5. [蒙]达·查希勒冈：《当前的中蒙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现代国际关系》1995 年第 2 期。
6. 方伦：《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区域经济研究》1988 年第 1 期。
7. 耿昇：《法国汉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

8. 郭孟良：《明代茶叶生产的发展》，《殷都学刊》2000年第2期。
9. 韩香：《隋唐时期长安与中亚的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02年第2期。
10. 韩光辉：《金史·地理志 户口系年正误》，《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1. 何跃：《论中伊关系的开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0月号。
12. 〔美〕亨利·塞瑞斯：《北虏风情 译序与注释》，《蒙古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6、17辑。
13. 候江波 林杰：《试论古代“东北亚丝绸之路”的特点及其现实意义》，《辽宁丝绸》2000年第4期。
14. 〔苏联〕И·Я·兹拉特金：《游牧民族社会经济史的几个问题》，《民族译丛》1981年第5期。
15. 纪崇安：《丝绸之路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暨南学报》1994年第3期。
16. 李秀敏：《蒙古的经济发展与东北亚经济合作》，《世界地理研究》2000年第3期。
17. 李明伟：《安西大都护府的伟大功绩和突厥对丝绸之路的贡献》，《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18. 林德全：《区域经济规划的理论与实用方法》，《数量经济、技术经济资料》1986年专辑。
19. 林幹：《突厥社会制度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20. 刘景华：《论古代中北亚游牧民族的移动及其影响》，《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5卷第1期。
21. 刘浦江：《金代户口研究》，《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22. 刘祜：《元代文化新论》，《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4期。
23. 马长寿：《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历史研究》1958年第3、4期。
24. 马建春：《唐朝与大食的海上交通》，《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25. 〔美〕迈尔斯·卡勒：《从比较的角度看亚太的区域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6期。
26. 任洪生、柳彦：《资本主义生产贸易体系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比较》，《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5期。
27. 孙佩兰：《丝绸之路上的汉唐刺绣》，《丝绸》2001年第2期。
28. 孙壮志：《中亚五国的地缘战略地位》，《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4期。
29. 特木尔保力道：《论蒙古族习惯法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30. 田澍：《明代甘肃镇与西域朝贡贸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
31. 王建革：《农业渗透与近代蒙古草原游牧业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32. 王龙耿、沈斌华：《蒙古族历史人口初探（11世纪—17世纪中叶）》，《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33. 王永祥等：《金代黑龙江古城述略》，《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2期。
34. 王正毅：《东亚国际体系何以成为可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2期。
35. 王正毅：《21世纪中国的地缘发展战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36.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理论与方法》，《欧洲》2002年第2期。
37. 王传剑：《试析冷战后美韩同盟关系的变化》，《国际论坛》2001年第8期。
38. 乌日其其格：《西方经济学对转轨中蒙古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当代亚太》2000年第7期。
39. 晓林：《蒙古的经济复苏与安全战略》，《东北亚论坛》1994年第1期。
40. 徐东升：《唐北宋河南地区交通与经济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1. 徐黎丽：《蒙古兴起前中国民族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42. 许菁：《经济全球化问题研究综述》，《兰州商学院学报》2001年第12期。
43. 杨富学：《明代陆路丝绸之路及其贸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
44. 杨文：《论公元1至2世纪中西丝绸之路及其贸易》，《甘肃高师学报》2000年第7期。
45. 杨益明、刘成武：《满洲里边境贸易研究》，《咸宁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1997年第3期。
46. 〔苏联〕伊斯卡柯夫：《古代突厥城市的兴起》，原载于《共产主义旗帜报》1983年9月30日，热夏提汉译文载《中亚研究史料》（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内部刊物）1985年第1期。
47. 袁刚：《隋修长城与大业初年的国防工程》，《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48. 扎格尔：《蒙古族狩猎习俗》，《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49. 张桂兰、张序强、徐淑梅、王金辉：《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产业合作开发研究》，《人文地理》2002年第1期。
50. 张利军：《中俄关系新格局的构筑与蒙古国外交战略的制衡和互动》，《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51. 张文生：《突厥启民可汗、隋炀帝与内蒙古》，《内蒙古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0期。
52. 周得京：《中国丝绸之路的繁荣》，《洛阳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9期。

二、外文参考文献

(一) 参考书目

1. Abu-Lughod, Janet L.,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 D. 1250—1350,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 Atal, Yogesh, Poverty in Transition and Transition in Poverty: Recent Developments in Hungary, Bulgaria, Romania, Georgia, Russia, Mongolia,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99.
3. Brzezinski, Zbigniew,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1st ed., New York, NY: BasicBooks, 1997.
4. Chase-Dunn, Christopher & Thomas D. Hall, eds., Co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Precapitalist World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5. Christian, David, A History of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 Oxford;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6. Crane, George & Abba Amawi,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Rea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7. Eatwell, John, Murry Milgate & Peter Newman,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The Macmillan Press Limited, 1991.
8. Frank, Andre Gunder & Barry K. Gills eds.,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9. Goldstein, Melvyn C. & Cynthia M. Beall, The Changing World of Mongolia's Noma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10. Hartshorne, Richard, The Nature of Geography—A Critical Survey of Current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Lancaster, Pa. 1946.

11. Hoover , Edgar M. & Frank Glarratani , *An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s* , 3rd ed. , New York : Alfred A. Knopf , Inc , 1984.
12. Hopkins , Terence K. , & Immanuel Wallerstein , eds. , *World-System Analysis : Theory and Methodology* , Sge Publication , 1982.
13. Hugill , Peter J. , *Global Communications since 1844 : Geopolitics and Technology* , Baltimore , Md.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99.
14. Ispahani , Mahnaz Z. , *Roads and Rivals : The Political Uses of Access in the Borderlands of Asia* , Ithaca ,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9.
15. Needham , Joseph ,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ume 1 :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16. Onon , Urgunge & Derrick Pritchatt , *Asia 's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 Mongolia Proclaims Its Independence in 1911* , Leiden ; New York : E. J. Brill , 1989.
17. Parker , Geoffrey , *Geopolitics , Past , Present and Future* , London ; Washington : Pinter , 1998.
18. Rasler , Karen A. & William R. Thompson , *The Great Powers and Global Struggle 1490—1990* , Lexington , Ky. :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1994.
19. Rossabi , M. , *China and Inner Asia :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 1975.
20. Rumley , Dennis , *Global Geo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Asia-Pacific : A Regional Perspective* , Aldershot , Hants , England ; Brookfield , Vt. , USA : Avebury , 1996.
21. Sanders , Alan J. K. , *Mongolia Politics , Economics and Society* , London : F. Pinter ; Boulder : L. Rienner , 1987.
22. Taylor , Peter J. , *Political Geography : World-Economy , Nation-State , and Locality* , 2nd ed. , Harlow , Essex , England : Longman Scientific & Technical ; New York : Wiley , 1989.
23. Wallerstein , Immanuel ,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 Cambridge [England] and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is :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 1991.
24. Wallerstein , Immanuel ,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III :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 1974 , 1980 , 1988.
25. Wesson , Robert G. , *The Russian Dilemma : A Political and Geopolitical View* , New Brunswick , N. 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1974.

26. Wittfogel, Karl A.,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 New York : Mcmilan, 1949.
27.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and East Asia and Pacific, Southeast Asia and Mongolia Country Unit, 1998.
28. 〔日〕护雅夫：《古代トルコの社会构造》,载《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I, 山川出版社 昭和55年。
29. 〔日〕桥口三郎：《チメムル厩白旗のヤムタ部落》,于蒙古善邻协会编《内陆アジア》第2辑 生活社刊 昭和17年9月。
30. 鸟居さサテ：《土俗学上より观にる蒙古》,东京大镡阁 昭和二年二月。
31. 满铁、北满经济调查所：《蒙古人民共和国の畜・农业》,昭和十三年一月。
32. 满铁调查部：《兴安西省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畜产调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昭和十四年四月。

(二) 参考文章

1. Cadrington K.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Geographical Journal, 1994, Vol. 104, No. 1—4.
2. Frank, Andre Gunder,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5000 years of World System history", Review, XIII, 2, Spring 1990.
3. Krasner, S. D.,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28, April, 1976.
4. Krueger, J. R. "Altaica Americana Annos 1960—1962", CAI, 1962, Vol. 7, No. 3.
5. Lattimore, O. "Return to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Geographical Journal, 1973, Vol. 139.
6. Lattimore, Owen., "Chingis Khan and the Mongol Conquests", Scientific American, August 1963.
7. Ramstedt, G. J. "Seven Journeys Eastward 1898—1921", MSOP, 1978, Vol. 9.
8. Richrd, J., "The Mongols and the Franks",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969, Vol. 3.
9. Wallerstein, Immanuel, "Long waves as capitalist process", Review 4, 1984.
10.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geoculture of development, 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r geoculture?", Asian Perspective, Vol. 17. No. 2. Fall-Winter 1993.
11.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rise of East Asia, or the world-syste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Keynote Address at Symposium on "Perspective of the Capital-

- ist World-System in the Beij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sponsored by project “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 Jan. , 1997.
12. Wang Zhengyi , “ Inherit or Transfer ? A Dilemma in Reconstructing Chinese Social Reality ” , Review XXI , 3 / 4 , 1998.
 13. Wiens , H. , “ Geographical Limitations to Food production in MPR ” ,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1951 , Vol. 41 , No. 4.

后 记

正如罗伯特·卢卡斯所说的那样：“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不会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当今世界，发展问题几乎成为所有社会科学学者所关注的问题，研究发展问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视角，既有已经近乎“破产”的发展经济学，也有如日中天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还有发展社会学这样的另类研究路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20 世纪 70 年代产生了一种新的研究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世界体系论”，它一经诞生，便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 50 年代的发展理论强调发展即一个国家的发展或单一社会的发展不同，世界体系论强调发展并非只是一个国家的行为，发展是一种“区域”行为或“世界”行为，应当将发展纳入“区域体系”中或“世界体系”中。在本书中，把机动性作为分析工具，进而分析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问题，本书的根本目的并非是提出获得世界霸权的最优方式或者战略，而是在于提出问题，在于对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观念提出挑战，因为早期的世界体系论者几乎一致认为，“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 1500 年左右的西欧，并且对于欧洲以外地区的兴起的动力有着不同的认识。本书的研究是尝试性的，世界体系论中的“区域发展”问题非常复杂，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的丰富和扩展。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原稿上修改完成的。我的博士论文的写作来自于一个“命题作文”，从酝酿到出版历经六年之久。1999年夏天，想报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的我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大楼13层经济研究所的走廊里，偶遇了著名经济史专家王玉茹教授，王教授在了解了我的基本情况以后，热心地把我推荐给了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王正毅教授，而王正毅教授对于东亚世界体系是否存在的问题非常关注，并且试图系统地研究亚洲国际体系以挑战沃勒斯坦的理论，并且已经推出了他的博士论文《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当然，这之前已经有许多学者对世界体系的“欧洲中心论”思想提出了挑战：美国西北大学的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 Abu-Lughod）教授，她在其名著《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的世界体系》集中探讨了16世纪以前，特别是13世纪的世界体系；施奈德（Jane Schneider）、蔡斯—邓恩以及弗兰克等将“世界体系”的逻辑假设前移到1500年以前；滨下武志主张1500年以前基于“朝贡贸易”的独立的“东亚世界体系”的存在。王正毅教授了解我的知识背景以后，认为我可以对亚欧大陆腹地这一世界体系论中的空白区域进行研究，并叮嘱我在准备专业课考试的空闲时间里，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结果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同时也开始了对亚欧大陆腹地发展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今天，虽然我的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并最终要出版了，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值得我进一步去研究，当然有一些问题超出了本书应该界定的范围，比如棉纺织业和丝绸工业哪一个更容易扩大再生产，进而影响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的问题，有关奢侈品贸易对于世界体系的形成问题，都需要我在下一步的研究中作专门的研究。

论文的完成和最终出版，特别需要感谢我的导师王正毅教授。在读博士的三年以及我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以来的两年时间里，我从导师那里不仅学到了许多知识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更学到了以宽容的胸襟和淡泊的心态做人，这是我从师的最大收获，也将会让我受益终生，我借此机会向王老师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同时，我的论文也得益于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季任钧教授、曹振良教授、周冰教授以及吴浙教授等各位老师孜孜不倦的教诲和热

情帮助,感谢在南开经研所的同学邓宏图、曹利群、陈佳琪、柳艳州、兰日旭、梁华等在我的论文开题之时给予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并且对同门师兄弟杨玉祯、李诚邦、张龙、郭宏、冯怀信等人的关心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逸舟教授、北京大学张小明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任晓研究员对论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和我的两位姐姐,我是在他们的支持和勉励下完成我多年的学业的。特别需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在生活和工作上她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还要深表感谢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社科编辑室的耿协峰主任和责任编辑张盈盈,本书的出版与他们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

世界体系分析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潜力的研究方向,它在中国应该有更为广阔和光明的前景,因而本书的研究只是一个开始而远非终结,我将继续努力,并欢迎读者给予批评和提出意见。

任洪生

2005 年夏于北京